

斯诺文集



埃德加·斯诺著

胡 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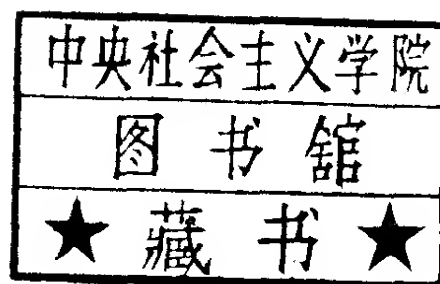
58733

大河彼岸

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



200412730



新 华 出 版 社

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

——巴斯卡尔



国庆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斯诺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1970年）



毛泽东同志会见斯诺，中为马海德。（1960年）



毛泽东和
刘少奇同志会
见斯诺。



周恩来同志和斯诺在北京怀柔水库。（1960年）

毛泽东同志为斯诺在《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上签名留念。右一为马海德，右二为路易·艾黎。（1960年）



斯诺夫妇在延安
参观毛泽东同志住
过的窑洞。



斯诺（右）和溥仪在北京。（1960年）



出版前言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写的几部关于中国的名著，曾被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使中国人民为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斯诺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通过目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增强了正义感。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历时四个多月。他深入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访问了红军指挥员和战士，访问了解放区的群众。这些访问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斯诺深情脉脉地写到：“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

DKS 135
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现在他们每天正在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斯诺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移居瑞士。然而他拿着美国护照，得不到访华的签证，他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取得签证，访问新中国。此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又两度来访。每次访问，他都搜集了大量材料，通过报道，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讴歌人民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伟大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麦卡锡主义对他全家的迫害，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诬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没有使他丧失对中美人民终将冲破重重障碍，开拓友好合作道路的信心。新中国是斯诺心爱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同客人说话，都离不开中国。在临终时，他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量所讲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沉痛悼念斯诺的逝世，毛泽东主席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这位诚挚的朋友，为了表彰新闻战线上这位出色的战士，我们决定出版《斯诺文集》。这套文集先出四卷，主要搜集了斯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九五八年首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的一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以前的游历记者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对中国、印度、苏联等地的访问情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尤其详细记述了他同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文笔精练，引人入胜。书中谈到，他已赢得了“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

第二卷《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这是访问陕北苏区后震动世界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这本书问世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当年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翻译出版时，为便于躲避反动派的检查，取名为《西行漫记》，如今我们重新出版时，恢复正名《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第三卷《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一九四一

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丑态，并以中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国际之间的关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信心。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此外，在本卷中我们还选了斯诺有关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有关中国抗战前景的若干篇文章。

第四卷《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九六二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撤掉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新中国。他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毛主席对斯诺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书末一章命题《前面的长征》，正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的前途所寄予的深情厚望。

在这四卷之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斯诺的散文特写集和其他著述。

斯诺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

透彻，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报告文学巨著。作为记者，他采访深入，作风严谨，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他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摹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发出动人的异彩。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史学家。

《斯诺文集》除了《红星照耀中国》曾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过外，均为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行。出版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斯诺在中国的老朋友，这些书是极好的纪念品。重温斯诺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从斯诺身上可以学习那朴实无华，诚挚勤奋、信任人民、前进不息的品德。他笔下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朴素而生动的描绘，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光明前景，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作出踏实的和坚韧的努力。

对于新闻文化界的同人来说，斯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而且他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及其为了探索真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斯诺，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删去了个别章节，和对某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作了改正外，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和内容。我们相信，广

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阅读这部文集的。

在出版本书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

序 言

《方生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书是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盲目的冒险性探索的传记(不单止我个人的),书中详尽地记述了我个人的经历,足够满足有理智的读者的好奇心——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主题,你更有理由感到惊奇。它旁及了当我二十二岁时到达中国的其他情况,当时我开始了在麦考密克上校开办的《芝加哥论坛报》中当国外记者的生涯。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国可以说是知名人士,因为我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而获得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国红军领袖会面与拍照的外国人。那是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的事了。其后一年,为了组织起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和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提出了停火协定。当时我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特派记者。我的报道还先后刊登在《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后来我还当上了《星期六晚邮报》的国外记者,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助理编辑。

毛泽东亲自向我讲述了他本人的事迹,并且向我叙述了到

那时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这些情况都已记叙于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拙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此书英文版尚未发行时，中译本已经面世，并且首次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消息。当年的年轻读者今天重逢时，很多已是中国第二级或第三级的领导人。

以上种种历史背景使我在一九六〇年再访中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北京与华盛顿双方仍存在着敌对的状态。到过红色中国的西方人中，极少数是革命前曾在中国居住过。我相信在战前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有机会重访中国的。

综观上文所述，有些人可能会臆测我到中国的签证是很容易取得的；但恰恰相反，我的申请表被耽搁了几年才批准下来——并且是一直搞到政府的最高层才被批准的。原因是：十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基于一个无视现实的妄自忖测上——即北京政权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是莫斯科的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但在北京政府成立十二年后，世人已清楚看到这种言论的错误。其后，人民共和国曾多次提出了重开交通的建议，但都被美国国务院所拒绝。我重访中国的申请被艾森豪威尔集团拼命阻挠。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出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除了未强迫我非法进入中国之外。

国务院还发出过几次官方消息，使人认为对于美国人之所以不能到中国去，北京政权应负全责。事实却不是如此简单。虽然，中国方面现在采取的立场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诚意谈判结束美国对台湾的武装防卫，双方互派记者是无用的。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中国政府曾经为许多美国人签署了入境证，其中

包括记者和作家。而真正使美国人不能到中国去的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为他当时禁止一切美国人到中国访问。他威胁地宣称：任何违反上述禁令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护照和可能被罚款或监禁；对于一些反对他的“不准出版有关中国书籍禁令”的有影响力的出版家，他又抛出了什么总统特权等法令。于是多年以来，这位国务卿使整个美国完全脱离了有关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直接消息。

直到一九五七年，杜勒斯先生最后炮制了他自己认为有资格派代表到中国去的新闻单位的名单——如果他们得到北京签证的话。北京方面宣称：除非美国方面同意接纳数目相同的中国记者到美国去，否则中国不能接纳他的所谓“合格”记者。杜勒斯先生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什么美国移民法禁止签署给共产党人的入境证。但这个借口是骗不到人的，因为苏联及其他共产国家的记者都已破例地获得了签证，这完全是有例可援的。然而，这个问题就如此的搁置下来，直到杜勒斯先生的逝世。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继续为以游客身份到中国去的美国人签发证件，但美国政府仍然不准美国人到中国去。在艾森豪威尔当权期间，很多著名的美国人，如埃莉诺·罗斯福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获得中国方面的签证，但是都被国务院以违犯国法的警告而致告吹。

一九五八年，经过了三年毫无成果的努力之后，北京政府放弃了和美国修好的愿望。这种转变的原因将于下面详述，但简而言之，即周恩来后来以最坚决的语气告诉我，他的政府认为在美国政府同意在处理两国争端的问题上双方不采用武力，

同时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对台湾领土的主权之前，继续谈判要中国作出任何让步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这种新的强硬的政策表示中国拒绝接纳美国国务院“委派”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北京官方还正式宣布：若美国不重新考虑其对台湾政策，中国将不会寻求互派记者。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我若以“记者”身份申请到中国去，显然是无用的。于是我以“作家”的身份来申请。我的护照上职业一栏也是如此填报的。同时，我又以同样理由向国务卿赫脱申请往中国旅行，搜集著书的材料。中国方面接纳了我的申请，但是国务院却马上拒绝了我的要求。这时候，我主要的难题是怎样击败国务院的管制而不致失去我的护照，并且不会成为一个“外交代表”而使中国取消我的签证。

在这个成败的关键时刻，我的非正式出版人贝内特·塞尔夫想法将我这本“可能的书”的版权卖给了《展望》杂志。《展望》于是向国务院申请“委派”我为它的“代表”。

《展望》杂志在国务院那张名单上是榜上有名的，但当该杂志的出版家表示希望派我到中国的消息传出后，该出版社便受到国务院的巨大压力。一些议员，甚至白宫都插手干预，企图说服它撤销我的提名。因为在国务院的纪录中，我是一个够资格被称为“共产党”的人。他们反对我到中国去的主要理由是：作为一个记者，在年轻时代我已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到现在我还是受他们所欢迎的；所以，我决不可能写出一个“满意的报告”。任何受到北京接纳的人都是会遭遇到华盛顿类似的反对的！

当然，国务院完全没有一条国际或国内的法例来“委派”或

“不委派”任何新闻媒介或记者，到一个它未承认的国家。所以，国务院最后在给《展望》的出版者加德纳·考尔斯的正式通知中“不表示意见地”承认它“没有任何办法”拒绝签发我的护照，如果考尔斯先生坚持派我的话。但是考尔斯坚持了。最后国务院只得忿忿地把申请书批准下来，让我“合法地”前往中国。

经过这样重重困难之后，我拿着护照到欧洲的中国政府办事处要求签发入境证。他们发现我的护照上仍然有不准到北朝鲜和北越旅行的禁令，他们认为这是令人难以满意的，因为以上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所以，他们发给我一个特别入境证而不需要再检查我的护照，这是颇为有趣的。

在两国的官方文章上，中国承认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而华盛顿却认为我是记者而不是作家。

中国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她的政府明确地决定那些事情是她的人民应该认识，那些是不需要知道的；那些地方准许记者去和那些地方禁止记者前往，本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写成的。我的目的是想使人们了解这个特别的政府为什么和怎样诞生在这个特别的国家里，她的专政权力是否作出比她所推翻的旧政权更光明的目标和结果。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 重访中国.....	(1)
抵达北京.....	(2)
宁静的都市.....	(9)
宏伟的城市.....	(13)
从孔子到毛泽东.....	(17)
包头回顾.....	(29)
蒙古的钢.....	(37)
白云铁矿.....	(44)
蒙古公社来去.....	(49)
中国为什么会变红.....	(56)
坐上总理的特别火车.....	(62)
古山成新岸.....	(67)
周恩来和美国.....	(75)
餐桌旁的谈话.....	(81)

第二篇 在浪涛冲击的地方(85)

巨变(85)

保安掠影(87)

长征(97)

实力人物(106)

毛泽东的家(113)

第三篇 社会主义建设(121)

钢的十年(121)

数字问题(127)

有关跃进的问题(129)

“六〇——六二”对中国的影响(136)

从姚伟谈到私人企业(140)

东北——工业的心脏(147)

两条腿比一条腿好!(154)

上层社会(158)

科学与教育(162)

业余教育“部”(175)

访钢铁学院(183)

在北京看到的天鹅湖(198)

喜晤马海德医生(202)

普及医疗的成就(214)

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224)

家庭：事实与幻想(236)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医学史(246)

从约翰·D·谈到针灸	(251)
------------------	-------

第四篇 民主专政

八百名老革命战士	(262)
党和人民	(267)
公共安全	(271)
“苦工”的真相	(279)
学习与劳动改造	(284)
有关少年罪犯的问题	(293)
“百花齐放”的前奏	(298)
团结——批评——团结	(300)
香花和毒草	(307)
“百花齐放”的尾声	(309)

第五篇 西北：新中国的摇篮

人口问题	(312)
访黄冈公社	(319)
成功的公社	(325)
西安	(338)
延安——革命的博物馆	(348)
延安师范学院	(355)
穷苦人民的骄傲	(359)
从柳林公社看中国的农村	(369)
黄河之水今变蓝	(380)
畅游三门峡	(385)

洛阳与郑州	(396)
-------------	-------

第六篇 江南行

(405)

重临上海	(405)
------------	-------

“建设，建设——”	(413)
-----------------	-------

上海市长一夕谈	(421)
---------------	-------

文艺与音乐	(429)
-------------	-------

犯罪和刑罚	(438)
-------------	-------

鼎足而立的三镇	(442)
---------------	-------

四川：天府之国	(447)
---------------	-------

西藏实况	(458)
------------	-------

少数民族	(466)
------------	-------

云南之行	(470)
------------	-------

第一篇 重访中国

当我在中国度过了四个月之后，我和一个十分高级的中国官员谈了一个晚上。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很自然地谈起来。他问我的印象如何，我提出了中国在物质和文化几方面的进步。

“但那只是各种事物表面的鸟瞰而已，”我说道。“我希望能有机会深入一些去观察。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你错了，”他说道。“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那倒是真实的。但这也算不得什么。旧中国实在是坏透了，一些改进是必须的。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人民。我相信他们已基本上获得了进步。但若指经济进步而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已经为一个根本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在我们能够自称为‘先进’国家之前，我们还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

抵 达 北 京

一个天朗气清的六月早晨，我向洛伊丝和我们的两个孩子西安和克里斯托弗告别，踏上了一部瑞士民航机离开了日内瓦，很快便飞抵新建的、全玻璃窗装饰以致闪闪发光的维也纳机场。在那里我转乘一部残旧的、捷克制的道格拉斯型飞机飞往莫斯科。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已经环绕地球飞了半个圈，坐着一架由中国人员驾驶的苏联制的涡轮喷气机在北京降落。

在莫斯科机场，我的行李被带进去检查，我自己则要接受海关和移民局的查问，并且要重新过磅。作为一个直达旅客，这些手续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立刻抗议重新过磅的手续。和其他旅客一样，我携带着二十五磅随身行李，在此之前从未遇到留难。但是在这里，一个执拗的青年官员却命令我脱去外衣，取下相机、底片和一个婴儿钢琴一般大的盒子，甚至要我把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磅上。他毫不理会我对俄文只是隐约记忆到一些，开出一张收据便不停地以俄文叫道：“请你快些付款，付款。”他要我付出相当于七十美元的数目作为超重行李的税项，等于共产集团国家的人民所需付的四倍。

“同志，请你理智些，”我对他说。“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洛克菲勒呀。我已支付了一千四百美元作为来回中国的费用。这么一点东西就要我多付七十元是否公平呢？”

他挥手叫我站开，但我在他的金发女助手眼中看到了一个同情的眼光，所以我继续说我超重的行李主要是带给北京朋友的孩子的瑞士玩具和巧克力糖（这是完全真实的），总值也不超

过七十元。“我宁可把这些礼物送给这里的苏联儿童们，”说着我开始把东西拿出来。当时一班人正在围观一位苏联农妇，她携带着一个小孩和一堆小山似的行李，要求航空公司给她免费乘计程车，因为公司的旅游车把他们扔在机场里。这群旁观者现在都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往我这边来，我看到一些是作学生打扮的中国人。

那位具有同情心的金发女郎正在和她的上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外还有两个女书记员也站在我的一边。固执的年轻人愤怒地喝开了她们，并且告诉我如我喜欢，可将超重物品留下，但如要带走，便一定要付款。说罢他便走进一间门上写着“管理处”的房子里。

当他的背影刚消失时，那位年轻的女郎便嗤之以鼻说：“哼，如此上级！”，跟着使用快速的俄文和其他人交谈了几句，便突然转身把我的东西放回盒中。我听到她喃喃地道：“不过只是一个蠢人而已！”从他们简短的对话片段，我知悉这个“主任”是在前一天才到任的。

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撕掉他所开的收据，将我的行李和机票盖上印，让我出了闸门。一会儿，我又见她为老农妇召来一部计程车将她送走。

当我离开时，她对我说：“一路顺风！”

我们于午夜时离开莫斯科，一个捷克人在一架巨大的苏联客机外用断断续续的英语和我交谈。“你是一个美国作家？到中国去吗？”他的眼眉掀得高高的。

由于在其后五个月内，我仍然是唯一被批准去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我遇到的人都以些微惊奇和揣度的态度来向我问候。

为什么我会到中国去？我是一个秘密使节吗？我的“光临”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有所转变呢？谁知道永远在我身旁的那只小皮包里装着什么神秘的使命？（答案：手提包里只有一些旧夹子，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汉密尔顿著的《神话集》，两本中文字典，一打空簿子，浴室用品，一尊赫姆斯像和大量的阿司匹灵而已。）

我没有详细地去解答这些捷克人的疑团，他们亦没有详细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他们共有六个人，都带着肥胖而充满资产阶级气味的妻子（都穿着拔佳式鞋），到中国去当为期两年的技术顾问——或者是去代替赫鲁晓夫先生的苏联专家吧，因为他们准备大量撤走了。这几个捷克人开始坐下来打桥牌，每点的赌注是几戈比。我则注视着地面上向北伸展到托木斯克的灯光。曙光开始笼罩了西伯利亚，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黑森林，只有中间被阴暗的湖泊所间断，人迹更加罕见。

我们飞过了一座新建的水坝和发电站，在伊尔库次克一个正在建筑中而情况极其混乱的机场中降落。接着，我们在一座类似军营似的建筑物里等候了很久，最后才获得供应一些黑面包、几片冷香肠和茶，这使我回忆起战时俄国的情况。不久，我们便慢慢通过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站。一小群穿着蓝黑色外套和宽阔长裤的中国青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一同登上由中国航空人员驾驶的伊柳辛型喷气机，机舱内洁净的布置使我一眼便看出是那种我所熟悉的北京式布置。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带我们到座位里。她们都穿着黑色长裤和高领的深红色中国丝织外套，长长的辫子上还扎着鲜红色的丝带。飞机升空后，其中一个女孩子给我一杯热咖啡和饼干。

“你好？”她以中国最流行的问候语向我说道。

“我好，谢谢你。”我的普通话赢得了她的一个浅浅的微笑。跟着，她简单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原籍北京，是一个贫农家庭的女儿，中学毕业生，当“空中小姐”已两年多了。稍后，她和一个漂亮的同伴给我送上了可口的小食品，包括有中国酒和啤酒；她们两人的礼仪和现代化的工作效能使我留下了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发觉在中国主要的航运线服务上，她们的表现是很普遍的。

整个早上我们飞行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上空，但是只能看到洁白的云层和蔚蓝的天空。突然，我发觉飞机骤然下降，热河地区苍翠的山岭就在下面，紧接着我们飞越了长城。那花园似的，灌溉得宜的田野，就象一幅幅彩色缤纷的织锦，加上那些带有古旧风味的方块田，一直伸展到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首都。

几分钟后，我们在新北京机场着陆，它那宽敞的飞机跑道外高耸着一座宏伟的现代化建筑物。我知道今天到中国来的旅客都不是无名之辈，所以在我想象中必定会有一些低级官员来迎接我。但是我被一个意外的热诚欢迎所深深感动了。当我迎着六月灿烂的阳光步出机仓时，看到一群曾经一起唱“友谊万岁”的老朋友。他们获悉我到北京的消息，都不怕麻烦，跋涉长途到机场来欢迎我。

欢迎的人群中，我首先认出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已居住了三十年，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支持者；冀朝鼎博士，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我俩最后一次会面是在重庆，当时他是孔祥熙博士和美财政代表的顾问；黄华，当我在美国支持的

燕京大学作短期任教时，他是一个学生领袖；唐明照，我和他最后会面时，他是纽约唐人街《每日新闻报》的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前合众社驻重庆记者，现在已入中国籍，是北京《中国建设》的工作人员；许先生，中国“工合”时的老同事；还有马海德医生，一个著名的美国外科医生，他的故事我将会在本书中作首次讲述。

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鹅卵石路驶往北京市区，这条路笔直地向前伸展四十公里，两旁栽种着灌木和其他绿影婆娑的树木。他们向我逐一介绍了那些被浓密的柳树，杨树，胡桃和其他果树环绕着的新型大建筑物：新的研究院，学校，永久性的农业展览馆，新建的工厂和很多在施工中的住宅区。在市区的外围排列着美观的砖砌房子。我们不久便驶过大使馆区，这里建筑了西化的白房子和花园，但又与北京的计划和风格相称。

“旧的使馆区里现在只剩下六个使馆，”路易·艾黎说。“但最后他们都要迁到这儿来的。旧使馆区的房子都陆续改建，因为许多国家办公厅都迁到那个区域办公了。”他还带着捉狭的微笑说：“我目前暂时住在西安鲁伯爵的旧地盘——即前意大利使馆。那里是十分优雅的，你将可以亲眼看到。”

在全部欢迎我的人群当中，路易和马海德是我最熟悉的两位。我首次和路易·艾黎会面是在一九二九年。我们成为朋友，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和他并肩工作，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报道他的事迹。现在他已是个世界知名的人士了——特别是在英国社会中，就是因为他创造了中国早期的合作化工业；为了他于战时在西北成功地创办了独一的，自给自足的三担合作社——有点象人民公社的雏形；为

了他对中文的学问和他所著的有关中文的书籍；为了剑桥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曾亲自推荐他有关中国的巨著中最近的几本著作。附带一提，路易是拒绝接受爵士册封的少数英国子民之一。

“现在就当我戴着爵士勋章，恭维我吧。”当我问及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这样回复我。他刚从他的故乡新西兰回来不久，在那里，他是新西兰总理的上宾。

艾黎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并没有失去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他的红头发稀疏了，他那强健的体格因为身体加重的关系显得有点松弛，他那双短壮的大腿再不能象过去使他能翻越几千里中国农村的那双铁脚了。然而，他告诉我，就在前一年，他花了八个月的时间，重踏着他年轻时的足迹，访问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省份。由于我时常和艾黎通信，并且阅读过他的著作，所以即使相别二十年，我对他仍不觉丝毫陌生。在珍珠港事变后，马海德的遭遇倒是我最模糊的。所以我转身向他问道：“你的情况如何呢？最近有什么工作？”

“和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结了婚，生下了两个孩子，现在差不多都长大了。为革命而受到的创伤现在已完全治愈了。”

“就这一点点吗？”

“我协助了扫除中国领土内一切梅毒的战役。那可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啊。你知道每一个医生都梦想能在一个国家里消灭一种他有能力扫除的疾病。我们成功了！来我们的学院吧，我将会向你详细介绍。”

“学院？”

“对！名字就叫做皮肤性病治疗所。”

谈笑间我们已到达我将下榻的新侨饭店，一座六层高的新建筑物，位于北京内城，附近就是哈德门，这条街以前叫做东交民巷。想当年，我经常踏着一部日本制的自行车到这条巷来，参加各大使馆每天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而我那只美丽的白色甘肃猎狗戈比，总是以皮带缚于自行车前面，催着我前进。现在这条街道完全属于中国人了，就跟中国的其他东西一样。

“休息吧！”这就是他们送我进房时给我的忠告。“你需要充分的休息来准备迎接为你安排了的节目。”说得多么对呀！

即使到今天，我也不能抱怨缺少深入观察中国的机会。因为当时在我所能利用的时间里，要观光的地方实在太大了。在五个月内，我参观了几十家工厂、医院、学校、城市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水坝，蓄水池，桥梁和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炼钢厂和煤矿等——从规模巨大的机械制造厂到瓷器制品厂。在数以千英里计的旅途中，我曾到黑龙江省与西伯利亚交界的附近地区，到过大连以外的渤海，踏着从前的足迹到达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穿过黄河流域再次见到了重庆和中国西部，在长江流域一带逗留了几个星期，南方则一直去到云南省和缅甸、越南接壤的地区。在访问期间，我到过中国十四个省的十九个主要城市。我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年轻的干部，总数超过了七十次。曾经和我会谈的各行各业人士包括有：军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学生、作家、教师、护士、僧侣、干部、园林管理人、解放前的地主、资源队员、医生、律师、科学家、音乐家、演员、报人、以前的资本家、伐木工人、牧民、囚犯、狱吏、芭蕾舞艺员、工会领袖、家庭主妇、电影工作者、诗人、发明家、针灸专家、工

程师、性病专家、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癌症专家、旧朋友、制竖琴工人、公园中偶遇的先生、蒙古人、西藏人、苗人、黎人、回教徒、驻中国的外交家和一个过去的皇帝。

我和这些人多数是单独交谈的，而且时常直接用中国语谈话，但这并不表示我有透视他们思想的能力。在正式的会见中，通常是有一名官员或翻译员在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没有人可能会把他的灵魂深处完全暴露出来，特别是有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在座。然而，我认为如果我不到中国来，是没有办法能这样进一步认识中国人的。

宁 静 的 都 市

在新侨饭店，一间拥有会客室、卧室和浴室的小套房每天房价是二十四元(约美金十元)，大约等于一个中国高级技工每星期的工资。房外有一个露台，可远眺外城。远方三层高，蓝色圆顶的天坛，亦可收诸眼底。它矗立在经过细意雕磨的大理石祭坛之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辉。从前的皇帝每年都到这里拜祭天地，祈求丰收。但是，这座建筑物并不是时常可见的，只有在太阳光能偶然照过工厂的新烟囱冒出的浓烟，而视力不受影响时才可见到。景色虽然美丽，但对我来说，房子价钱比较贵些，因此我迁到五楼的一间有浴室的房间，这里可俯视东交民巷，并且有机会注意到每一个进出新侨饭店的人，而价钱只是前者之一半。目前，北京有十二间现代化的大型宾馆，另外还有无数收费便宜的中国式旅店。各省也兴建了很多新型的宾馆。从前，除了几个滨海城市以外，各地都很少有西式设备的

酒店，但是目前，即使在我未去过的城市，或者连听也极少听过的地区，这样的设备也普遍得很。这些酒店统归中国国际旅行社管理，其中很多主要是为了安置从前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建筑的。差不多每间这样的酒店都设有中西菜服务部，供应给外籍住客的食物是不受限制的。据悉在各省的酒店里，食品的质量有很多比新侨饭店还要好，而且价钱也定得更低。我在新侨饭店每天饭餐费折合美金三元。

为了使准备来北京旅行的旅客的便利，在这里我有必要强调一下：新侨饭店的服务态度(尤其是礼貌方面)已达到过去的最高水准，虽然排场没有以前那么讲究。北京各酒店著名的西厨和侍应领班，都被调到各省里当酒店经理，训练出一批批的人才。与我曾经到访的各大酒店一样，新侨饭店的厨房是异常清洁的，工人们都非常有礼忠诚。他们对客人的反应非常敏捷，但是他们对小账则是有礼貌地婉言拒绝接受的。

服务性行业的工人再也不会被称为仆人，侍者或挑夫等(在火车站里，甚至连一个挑夫也找不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被别人称为“同志”。诚恳谦虚是他们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如果你想获得酒店管房的特别照应，最好就是知道他或她的名字，并且直接称呼他们，了解他们正在学习着什么。今天的中国工人在闲暇时，再不会作“麻雀消遣”，而是坐在柜台的钟板旁边，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俄语或其他教科书，准备在放工后参加补习班，有时则练习健身的太极拳。甚至连新侨饭店的总管老王(以前是北京饭店的侍应生)，每天早上六时半也到阳台上打起那芭蕾舞式的太极拳。

一天早上在早餐桌旁，他还故作神秘似的对我夸赞太极拳

的好处：“它对克服身体内的矛盾顶有用呢。”

和其他的国营企业单位一样，酒店职工有他们自己的党的核心组织。每一层楼都设有一个委员会管理他们的文娱室，那里摆设和张贴着毛泽东的雕塑像和画像，还有标语，照片，表扬信（这是用来代替以往的赏钱而送来的），提意见和批评的大字报，几件简单的家具，书籍，一部收音机和一部电视机（除了借给客人外，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各层楼的委员会每周或隔周开会交流经验，互相提意见及作自我批评，有时我因夜返关系，往往听到他们展开热烈的争辩。热烈而非狂暴——我这样想当我回忆起过去中国人若发生争辩，即使平时友谊极佳，也往往造成“先而口角，继而动武”的现象。

酒店工人和各阶层人士一般都参加扑灭蚊蝇的持久战；在街头，在公园，儿童们持着蝴蝶网争相追捕树枝上的蝉。真的，这些老害虫和鼠、田鼠、蚤、虱等害虫，中国确实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效地控制起来。街上的狼犬和无主猫也完全绝迹。北京不但远远比从前更清洁，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而且变得更宁静了。过去，北京的喧闹场所也没有上海和广州那么多，但是今天据我观察，随地吐痰，高声叫喊，争吵，赌博，毒窟，妓院，市场里的争吵声，街头小贩的讨价还价声，人力车声等，都已销声匿迹，一切都沉寂下来了。

晚上十一时以后，戏院休息，无轨电车也停止行驶，在照明设备甚佳的主要道路上，也只是偶然见到一两部汽车或自行车。除了后街有些重型货车和胶轮手推车经过的声音之外，整个城市到天亮前都是寂静无声的。我再也听不到天刚亮便响起来的小贩叫声，听不到脚上缚着小风笛的训练鸽子所发出的音

乐声，也听不到深夜时云吞面小贩哗啦哗啦的叫声。

公共汽车非常清洁，它们的女驾驶员和售票员对外国人尊敬而有礼。当我踏上公共汽车时，总是有些青年人站起来给我让座，盛意拳拳，推辞不易。司机谨慎地驾驶，并小心地响号示意；行人们遵守交通灯和交通标示，在安全的地方才横过马路。

在各间酒店和新的中央火车站旁，是有计程车乘搭的（包括有苏联制，东西欧制及美国制的。）为数极少的两座位三轮车也偶然可见。在新侨饭店附近，我坐上了一部三轮车，车工是一个衣着整洁、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人。他告诉我，解放前他是在旧北京饭店拉人力车的。由于我对北京话略有认识，这引起他愉快的反应，同时问我喜欢“新”北京的那几个方面。

“它比从前更清洁，更现代化，更美丽了，”我说。“表面看起来，它是十分宁静的。”

“宁静吗？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耸肩笑道。“人民是宁静的——但电台却热闹得很呢！”

我询问他的生活情况，他答道：“马马虎虎。”然后他继续说：“在旧社会，我完全没有可能娶得起老婆。现在我结了婚，妻子在人民公社的工厂里工作，也能赚到一些钱。我们的女儿在托儿所工作。在旧社会，有谁听过托儿所这个名称啊！”

他还告诉我最近他不能工作太多，因为他已五十八岁了，背部经常感到痠痛，要按时接受针灸治疗。但他是不用支付医药费的，因为他已加入了工会。

“目前我们稍觉缺乏的是食物；帝国主义者……”他喃喃自语道。“您是哪一国人？”他突然问道。

“我是美国人，”我答道。

他重复他的问题，我也再次回答他。

他转过身来，见我态度认真，便不再说话，只是继续踏车前进。

到目的地后，我把为数甚微的车资付给他，他有礼貌地接过了。“真是美国人吗？”我点了点头。他微微一笑，摇摇头，踏车走了。

宏伟的城市

十五年没有用过中文了，但是我仍然能听懂简单的中文对话，虽然我不敢说流利二字。在书写方面，从前我对基本中文的熟悉程度足可以进行翻译工作，但以前认识的中国字经过简化后，大多数都不认识了，而我又没有时间去学习这种新字体。即使如此，我所掌握的有限的中国话也是大有用途的——尤其用于对照翻译员究竟有无彻底翻译及到处听听别人的对话两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在访问期间，我发觉如果没有通行证，任何国籍的外国人都不能离开北京，或离开他被批准去的其他城市。通行证上严格规定了时间、地点和有效范围。不论是自费（即如我的情形）还是被邀请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被作为客人看待的。无论他们能否说中文，到了每个地方，总是有一个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向导或某些官员或干部在整个预先计划好的旅程中陪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监视，而是因为如果缺乏了翻译员，大多数外籍人都是寸步难行的。然而，一个目光敏锐而又略懂该

地语言的旅行者，只要他独自到处走动一下，便可以观察得更深入些。此外，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境内真真正正还潜伏着特务，所以一些必要的警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方面来说，他们没有正式对我作出过分的保护，所以我时常可以单独行动。况且我的老朋友们——中国人或旅华外籍人士——都抽出宝贵的时间带我到处游览，或者与我会谈。在市区的范围内，除了几处标明的军事禁区外，游客通常是可以自由观光的。

虽然如此，只是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活动，也不见得是一种“惩罚”。北京管辖的区域极广，从大运河边到长城之内，面积达五千平方公里。北京的面积、人口和行政方面便活象一个小国家一样。如所周知，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都之一，新政府施行的新建设，并没有破坏旧京城的和谐与完整，城中主要的宫殿和其他建筑物非但完封不动，而且保管得极为妥善。内城里建有皇城，皇城里建有宫城——即紫禁城，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期，当时北京名叫大都，有些宫殿的历史更为久远。修建北京市的中心计划是一条由南至北、长达五英里的大道，始于天坛，经过外城一系列的城门，直至皇城的入口处——天安门，前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这里，超过一百万的群众可以在一小时内聚集和分散。两旁就是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场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金色辉煌的琉璃瓦之下，这条中轴穿过一些朱红色的宫墙，通过紫禁城，两侧耸立着巍峨的宫殿，直抵亭台楼榭和寺院密布，树林苍翠的小山和人工湖边，这里现在已变成公园和运动场。在这些巨大的“门”附

近，现代化的交通网设立起来了，但是扩建工程需要拆卸大部分古老的外城，代之是四通八达的大道。城市建设计划还规定了建筑范围和高度，通常都尽可能地保持过去宽阔开朗的壮观。

三十年代我曾在北京住了五年——有资格称之为家。新北京比那个时代的旧北京大了三倍，人口达七百万。作为近代中国的首都，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五世纪。但事实上，几千年前它已经是华北的政治中心。如果要从“北京人”的时代来算，人类于五十万年前便在这地区的周围繁殖了。“北京人”遗骸的一部分化石，现存于一个特别的博物馆里，但颅骨和从前保持得完美之极的骨骼化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莫名其妙地失去踪迹。

北京还有十多家著名的博物馆，现代的图书馆和古代的藏书阁；有湖泊密布的公园及景色秀丽的园林，寺院林立的西山；有数不尽的新旧剧场、电影院、餐厅和娱乐中心。最近新建的体育场（即工人体育场）可容纳八万多人，此外，另一个专为迎接一九六一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体育馆已及时竣工，可容观众一万五千多人。在北京新城中，有的是宽阔漫长的林荫大道，数以百计的住宅区和现代化的政府建筑物——自早期兴建的斯大林式建设到近期采用中国革命建筑学而建成的建筑物（后者远较前者为佳）——城墙外巨大的马路和公路网伸向东西南北四方，无数的新学校与学院已建立起来，这一切确实把北京市容大大改观，除了旧北京内城仍保持原状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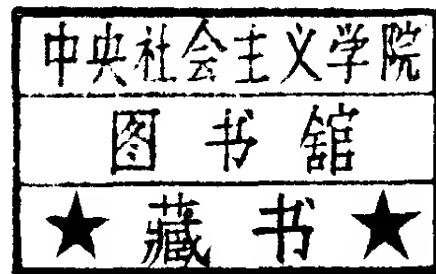
对外国人来说，北京的主要吸引力还是在于古老的北京式房子：外面围有高墙，里边有院子和花园；这些大房子很多已

做了学校、工厂或让人们分而居之，有些则改建成合乎实用而不尚外貌的新大厦。就象纽约一般。

可能最大的视觉转变是外城和郊区。现在那里已建立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和钢铁联合企业，因为附近有着丰富的铁、煤和铜等资源。目前北京市的产业工人达一百万。住宅面积已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但仍然感到住屋紧张。虽然国营工厂的工人都可以搬进新建的平房里居住，而且居住环境比他们过去的不知要好多少倍，很多家庭仍然要挤在一两间小房间里。幸而计划在郊区兴建的住宅面积是可以平衡人口的密度。

关于北京城的情况，我还可以说很多 很多，因为在这里，无论花多少时间也是不会感到兴尽的。很幸运的，我没有机会这样做。在我开始旅行时，已决定将我的旅行要求提交给外交部办公厅，尽可能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我所到过的地方去看看。由于过去我曾到过许多地方，甚至到过遥远的边区，这样我就可以广泛地观察究竟人民的生活是好转还是更恶劣。周恩来总理似乎也认为我的要求是合理的。

红色中国当然只是中国这个十分古老而又丰富的历史文明其中最接近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所汇编的许多书籍中，也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发展情况。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初期民主的经典著作中曾经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在摇篮中看出来。民族和国家的成长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他们必然继承其祖先的特征。”在谈到欧洲移民在新世界（指美洲）组成了使人震动的崭新社会时——当时确实使旧世界（指欧洲）正处于崩溃状态的君主专政制度震动起来，德托克维尔声称“其基本原因乃在于黑暗的过去”。一八三五年



美国只是一个不成熟而似乎却可以自由地抉择其将来的国家；如果德托克维尔的话适用于当时的美国，那么，我们更应看看今天的中国所到达的时间和空间，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民经过漫长的道路，从古代直到今天的历史。

从孔子到毛泽东

企图将中国长远的历史缩龙成寸，用短短的一节叙述出来，对学者来说仍然稍嫌冒犯，但为了对该国连基本的历史认识也没有的读者服务，相信这是可以原谅的。孔子曾经认为对事物的认识可以举一反三，而对某个国家之认识又何独不然哉。

这个曾经被一些人称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又被一些人称为“世界最古老的连续性悲剧场”的舞台，是一个面积达三百七十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多民族国家，其面积比美国还要大九万平方英里。几个世纪以前，中国已经达到了目前的疆界（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过去，当中国还处于帝国的状态时，面积还不止此。然而，人民共和国的三分之二土地属于山地，沙漠或不宜耕作的地区。据一九六〇年统计，只有百分之十二弱的土地被用作耕种。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还有很多可怕的困难将要被克服（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山地和沙漠。若除去上述三地区，中国的耕地面积占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和中国的情况相反，美国目前耕地面积是百分之十七（按一九五九年计算，即三亿九千一百万英亩），另外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二面积的土地，大部分可用于耕作（这部分土地目前是草原牧区）。中国养活几乎是四倍于美国人口的

人民，而耕地面积却比美国少百分之四十。因此，如果耕地面积不变的话，中国要把农业产品的产量相等于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就要把目前的亩产量提高到美国亩产量的六倍左右。

假设我们把一张透明的中国地图置于美国地图之上，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纬度和大小颇为对应。两国都主要坐落于北温带。在南部，中国可以到达墨西哥北端和加勒比海，在北部则可伸入加拿大。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岛）可能落于海地之上，西端地区（新疆）会稍越于三藩市之外。上海的位置将会在杰克逊维尔附近，华盛顿基本上和北京对称，纽约则对应于沈阳，而洛杉矶则会在西藏的西部。至于地形方面则差别甚大。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中国四周全是陆地。世界最高的山脉和高原是她西部和西南的边缘，北部则是蒙古的戈壁沙漠，另外还和苏联共有一条冰封千里的国界。

在十九世纪以前，太平洋不但没有把中国和外边的世界联结起来，反而是把她和外界分割开来。中国是一个内向的陆地强国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强国。山脉和沙漠使她和内陆的邻国隔绝起来。她和西方的接触是存在的，但对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来说则影响甚小——根据重叠显示，这条河流发源的地区约在丹佛附近，出口处则约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左右。所以，中国的发展几乎是完全和西方隔离的。中国两个字——中国人今天仍然这样称呼他们的祖国——意思就是处于正中的国家。

据传说，中国的历史始于五千多年前。到目前为止，商朝和周朝的建立和灭亡的确切日期尚有争辩，但是甲骨文和竹简的出土，进一步提供了商朝末期（公元前一五二三年以后）的真

实记录。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能够将其独特的文化流传到今天的是周朝(公元前一〇二七年——公元前二四九年)，而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公元前四七九)则是这个时期中最特出的人物。他的理论后来为各个朝代采用而成为国家的理论；在后汉(公元二十三年——二百二十年)以后，儒学统治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形式和风格几达二千年之久。

老子据传是与孔子同时的一个富于传奇性的人物，他提倡一种和儒家学说敌对的哲学——道家学说，讲述人和自然的调和，和孔子的理论极少有相同的地方。老子的理论包括一条对立和辩证统一的概念，这和柏拉图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和印度教和佛教两种哲学都有共通的地方。老子并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学者，但是他的思想后来和传统的占卜术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道德经”里表示出的辩证性质，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精华(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真实性到现在仍然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老子更被很多人认为历史上不可能真有其人)。

孔子和老子一样，也不是一个宗教讲师。较为保留地说，中国并非是一个以宗教为主导思想的国家，而是一个由道德、伦理、习俗和哲学来统治的国家。据称孔子和老子在一次会谈之后说：“敬鬼神而远之。”他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把古人遗传的智慧编纂起来，他是一个仁爱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编纂家。他致力于“改革”每一个人——自天子以至庶民——成为“圣贤君子”，虽然他对改造贵族皇孙的兴趣低于平民——根据著名的孔学家和孔子列传的作者赫尔利·格莱斯纳·克里尔教授的引述。孔子本人则希望成为一个圣贤，他说过：“若圣与

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孔子生存的时代正当周朝分裂成“战国”，周天子的权力只能达到五千个面积甚小的管辖区，后者类似希腊的临时城镇国。中国的学者们尊崇孔子，因为他删定了中国的古代文学著作，并且修订了编年史《春秋》，这是一本和圣经之在西方的有影响力的作品，而其历史的绝对真实性也是同样可争论的。孔子生存的年代比伯里克利的希腊约早了三十年，他亦同样地致力于人类关系的问题。孔子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以道德、仁爱、传统、现实主义和服从主义为主，因此就不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所赞成的理想共和国的物力论和其他抽象论。然而，各人都同样地关心统治者的德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大同世界），但孔子所得的答案却不同于希腊的哲学家。

他制定了一套行为法则，限定了在家庭中，女性应服从和尊敬男性，弟服从兄，子服从父，下级服从上级；每个人都应服从天子，因为他被认为是孔子式道德观念的化身，并且是整个大家族的首脑。随着朝代的灭亡及兴起，孔子宣扬的忠君思想却仍然保持不变。帝王之下的治理权落在一小撮孔子的信徒士大夫阶级手里。想晋身到统治阶层，只有理论上的民主化——即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这种“公开”的机会，就代表了所谓“平等”的理想。事实上，这种制度使士大夫阶级得以独霸权势，高踞于农民群众头上；其组织制是以大家庭的形式存在，靠宣扬愚孝，崇拜前人及忠君等思想以巩固其地位。

儒家思想给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稳定的官僚统治制度。故此，过去中国人自然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处理人类关系的方法，而使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高人一等”。直到近代，中国未尝

受到任何其他进步文明的影响；虽然有时会被文化较落后的部族所征服，但最终还是以她深远的文化同化了他们。中国的文明造成了文艺、科学、工业和农业的发达，欧洲诸国也从中吸取了她很多的发明与创造。但是由于以往中国将邻近的国家看成其藩属，故中国人也将世界各地称为“蛮夷之邦”，就象当年罗马之看待匈奴一样。

保守的中国历史使人不可避免地留下这样的印象：在周朝和汉朝以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过。这和肯定在伯里克利之后到哥白尼诞生之前，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情一样错误。巨大的变革、改良和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性贡献不停地发生着，虽然异族人的侵占曾引起长期的中止甚至退化。由于实例的作用很大，我将会在下文中提出一部分以资讨论。现在先提三个由于和中国脱离联系，引起西方损失的三个例子：在欧洲本土发明水钟之前六百年，中国人已应用了制作精密的水钟；中国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发明后三百年，哥白尼才造出同样的东西；中国的印刷术也比哥敦堡的活版印刷早了约五百年。但是由于隔离的关系，中国也蒙受了损失：例如，欧洲在十四世纪已发明了机械钟，但到十七世纪才传到了中国；此外，虽然中国发明火药较欧洲早几百年，但她未能发展和利用她那奇妙的炮竹的威力，来避免受天主教徒长期性的侵略。

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已有几个世纪的接触和交往，但是她的商人和旅行者回国所作的报告，总是离不开“欧洲落后”的结论。中国的皇帝也许会接见偶然而至的外国使者，但却视之为藩属国的代表而已。在清朝统治期间，一些耶稣会的团体之可以存在，只是为满足好奇心，而非视作文化平等。中国和西方

的隔离终于在十九世纪被打破了，但当时她是被西方诸国从海上侵略的时期。从一八四〇年开始，英国、法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迫使后者准许鸦片及其他商品的输入。英国更攫取了香港和九龙，同时将她的控制范围伸展到缅甸和尼泊尔境内，这两个国家从前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一八八三年，中国在印度支那为法国所打败，因而结束了她在该地区的宗主权。十九世纪下半期，日渐衰落的清政权不断地受到外力的侵略，同时，由于中国较大的海港和河港都落在外国控制权的手里，她变成了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半殖民地，而是所有大工业国和海上势力强大的国家的半殖民地。一系列领土和政治上的让步使列强足以控制中国的贸易，所以，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她似乎将会象印度和东南亚一样为列强所瓜分。

十九世纪中叶，发生了太平天国的暴乱事件，这是一股企图推翻清朝和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的巨大力量。领导这场直指北京城的暴动的是一个中国的耶稣教传教士洪秀全，自称为天帝次子，耶稣之弟。今天的天主教团体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而采取的冒犯神明的炫耀可能会容忍，但对十九世纪的耶稣教团体来说则太过分了。他们认为洪秀全是亵渎神明的骗子，他对天主教的改革更使他们震惊。到目前为止，虽无确切证明太平天国的领袖究竟有没有听过马克思其人或他的《共产党宣言》，他们是有共同点的。远于孔子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就曾经宣布要组织一个最早期的平等社会(见“周礼”)，土地公有，收获均分。太平天国的领袖亦计划建立这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土地平均分配了，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有优先权。奴隶制度，贩卖妇女与小孩的行为以及缠足、娼妓、盲婚、一夫多妻制等完

全被禁止。鸦片的输入也在禁止之列，苦工和残酷的刑罚据称也是不准许的。军队要参加生产劳动，并且要帮助耕作，这和新中国的军队要在国家农场里工作一样（国家农场就是以此来别于一般的人民公社）。

经过了十四年损失了四千万人的战争之后，太平天国的暴动最后被湖南的文人将军曾国藩所打败。曾国藩得到了英国政府支持的西方雇佣军所帮助，这批雇佣军开始由美国冒险家华德所率领，后来则由查尔斯·戈登将军及其他正规海陆军军官所领导。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因是因为领导人的腐败，不能遵照他们所制定的原则行动所致。但是太平天国的镇压成功却是中国人（而非满清）的“胜利”，自此之后，清朝政府就变成了反动的地主士大夫阶级的傀儡而完全同化于中华民族中。这个“胜利”亦加深了满清政权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驯服性。直到一九一二年，由于外侮加上更严重的内部腐败，清朝终于被推翻了。

在上述的一段时间，日本也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一八九五年，日本打败了中国，掠夺了台湾省并且结束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由于得到了美国财政上的帮助，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东北地区和俄国作战，并且击败了后者。作为战利品，她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海军基地据为己有，并且取代了俄国在南满的铁路权和割让地之管辖权——当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也要求收回上述诸权利。沙俄保留西伯利亚的主权（在上一个世纪霸占中国的），北满的铁路权和蒙古的保护权——虽然北京的满清政府仍然保留着对蒙古名义上的统治权。

然而，在这些年代中，太平天国的改革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却继续萌芽、播种，形成了种种形式的地下革命活动，后来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期也不断发展。一九〇〇年，秘密会社为狂热反对外国强权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领导力量。当义和团被击溃后，由欧洲列强、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了北京，并且向清朝提出了巨额的赔偿，使它最后的威信也完全失掉。就在清朝衰落的时刻，不单是强大的国家，甚至连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等小国也在中国占有统治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美国虽然没有取得任何领土的割让，但是它享有全部不平等条约所订下的制度之行使权，使它的人民享有“最优惠国家”的特权——当时还由国务卿海约输出名，发表了一项开放门户宣言，使列强在对中国的贸易和剥削中得到机会均等的利益。在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下，外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自由居住和贸易，而只受他们本国法庭所管理。

在满清政府宣布退位后，中国人便意图组织一个议会共和国，但当时全国都未有充分准备。一度流落外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英雄孙逸仙(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共和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他未能掌握兵权，所以又被迫让位给前清军元帅袁世凯。当袁世凯实行称帝时，很快又被敌对的军阀推翻了。各省的军阀争权夺利，列强则争着控制他们，一句话，当时中国就是处于不团结和动乱之中。与此同时，孙中山及其创办的国民党实行和各军阀结盟，企图组织一个稳定的基础来代替那个软弱、腐败、半傀儡和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但他接连遭到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孙中山是被列强所鄙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

参加了协约国。中国原来希望德国战败后，它在山东的殖民地将会还给中国；但是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协约国列强却透露他们已和日本签订了秘密条约（除美国未参与之外），答应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痛苦地觉醒了。这些人中包括了那些自愿来欧服务的中国青年，以及一些被派到欧洲当中国工会领导的人在内（当时中国人被认为是不适合当兵的材料）。在这些工人—学生运动的成员中，包括有后来成为红色中国出色领导人的周恩来。毛泽东本人帮助招募这些半工读生，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刻决定——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自己留在中国。

凡尔赛条约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其中马上产生的后果就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改革了根深蒂固的文言文，摒除了孔子学说的残余势力，此外还引起了重大的政治结果。为了唤醒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团结一致抵抗和打败日本化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见诸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学生和知识分子显示了惊人的士气和政治力量，并且预告了军阀统治的终结。五四运动还揭露了凡尔赛宫列强的伪善和自私自利的本质，并且使苏联十月革命的反帝和革命的精神得以传入全中国。在这个时刻，孙中山转而向列宁求助，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刚从反动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便向中国提出了慷慨的让步。这里包括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归还割让的土地，并且提出和中国共同合作，管理东北铁路。莫斯科一方面保持和受外力控制的北京政权的关系，一方面，列宁给孙中山

的复信为中国打开了新的局面。它最后使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促进世界革命。

迟至一九一九年，列宁的首批著作才以中文发行；一九二〇年，《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才在中国出版。在中国内部的巨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激动起来，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根据孙中山和布尔什维克（当时由越飞为代表）一九二三年的协约，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当时，它的纲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所谓民族，民生和民权。一言以蔽之，他们表示民族解放和统一；恢复中国的经济独立和改善农民的生活；普及教育和启迪全国人民为准备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人民的政府而斗争。

孙中山以广州为基地，苏联则送来了金钱，军备，军事顾问和具有革命政治组织和宣传才能的专家。共产党人准许具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资格。在孙中山行将逝世之时（一九二五），指出所谓民生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他还将曾经留学日本的蒋介石送到莫斯科接受特别的训练。孙中山逝世后，苏联顾问将蒋介石捧成他的继承人。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内取得了胜利，军队的最高领导权落在蒋介石手里。同年，蒋介石破坏了和共产党的联盟，并宣布具有共产党党籍的人犯叛国之罪。

到一九二八年，五分之四的共产党人被蒋介石所杀害。共产党被迫转为地下活动，它的城市领导人仍然受着莫斯科的指示，当时斯大林领导着共产国际。但是几次企图搞工人暴动都遭到严重的失败。这时候，毛泽东深入内地，到湖南开始了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活动。从这年开始，国共双方展开了十年内

战，其激烈程度和当年太平天国革命一样——有人仍然称之为历史性的继续——席卷着整个中国南部。敌对两方都宣称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人把它发展成为进行彻底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而蒋介石却死硬地坚持私有制是三民主义的不变基础。

在满清政权的衰亡到这个期间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进行着持久的分化。蒋介石的企图是用一个军事专政的资本主义的中国来替代之。故此，如果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的斗争焦点看作是为了恢复或毁灭传统社会的斗争，都是错误的。传统社会事实上已经被外国工业、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冲击撞成粉碎了。因此，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目的可以说是：究竟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由基础薄弱的资产阶级垄断私人企业去完成，还是由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动员全体人民和他们强大的劳动力去完成呢？

蒋介石和他的官僚政府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但是却掌握了全国的统治权。在日本侵华之前，国民党(一九三八年约有二百万党员)控制了所有城市，用军队、警察、和外国人的帮助来对付共产党。当提到农民的多数时，“政府”只是指那一小撮国民党指派的官吏，他们和古时的官吏一样，串通地主阶级和地方武装来镇压农民——这些人顶多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二十。

在斗争中，时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入侵及广泛占领中国城市(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的行动，严重打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且摧毁了国民党的士气。因此，中国共产党得以深入农村动员农民，组织农民。日本的

侵华战争本来打着“铲除东亚赤祸”的旗号来进行，但其结果却是：（一）摧毁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势力；（二）使毛泽东能组织广大的农民力量进行一个新的“太平天国”式起义——这次由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而不是由基督教徒所领导。

早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就预见这些结果是必然的，而我曾经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概述过他的预见：

“如此……一场规模巨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将会使亚洲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武装，锻炼，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和使国内警察力量严重的削弱，并为革命势力取得力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照这样看，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自掘坟墓”的预言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都已实现，因为那里两次大战已破坏了整个旧社会。乔治·凯南这样提出了他的看法：

“它不是……共产党的势力摧毁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本身的旧秩序，而且使东欧落在共产党人的手里；这事实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同样地，在东亚，不是莫斯科，更不是华盛顿，把中国送到共产党人的手里，而是日本人自己……”

毛泽东当时并没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的力量，但是他对他们本质的了解，使他能掌握了领导权，并且掌握了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一切力量，从而赢得一场伟大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了准备。

包 头 回 顾

在北京时，我被邀请参加一个鸡尾酒会，会见一些多年不见的旧朋友，他们之中有教授、作家、军人和其他阶层人士。酒会的主人是廖承志，我和他曾经一起在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华同盟中工作，当时中国和美国是同盟国。廖承志是廖仲凯的儿子，他父亲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助手。廖承志现在是中国侨务委员会的主任，一个相当于部长级的职位，又是中国和平委员会的顾问，这个组织又可称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委员会。

在和旧朋友们欢谈中，我发觉我正在和一个瘦削、背有点弓的客人谈话。他一双无睫毛的眼睛在厚边眼镜后向我凝视着。他头发蓬松，穿着一套蓝色的棉布工作服，是全个酒会中打扮最简单的人。如果他不是一手拿着点心往口里送，另外一手持着一杯酒的话，我真会怀疑他是误会地闯进来的。但留意细看，这个人却似曾相识；由于我认识大多数的客人，因此我想我应该能记起他。

“你现在干哪一行？”我试探地问道。

“我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系工作，我专长于热带花卉。”他回答道。

“啊，你是一个园艺家？”

他能够说一些英语，所以一定明白我的意思。但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通过一个翻译员，作起自我控诉：“我的罪行引致千千万万人民的死亡，是死有余辜的。但是政府却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我十分喜爱我的工作。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有意义的工作。”

这个人真是，整天把自己改造思想的过程挂在口边，我想。

“斯诺先生，”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国人看到我感到迷惑，不禁笑着向我解释说：“你是和前清宣统皇帝谈话呀。”啊，原来他就是孩儿皇帝——溥仪。他现在已五十四岁了。在他八岁那年，坐上了紫禁城的“龙位”，三年后便被第一次国内革命推翻了。其后他被流放到天津。后来又被日本人诱骗到沈阳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康德。一九四五年被苏联人俘虏，前几年才被送返北京。我一直以为溥仪是被日本人绑架去当皇帝的，所以我问他现在是否真正感到自己有罪。

“噢，当然啦，”他对我说道。“当时我是心甘情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因为家族的权力失去了，我感到很羞耻，我梦想日本人会助我恢复权势。为了这样，我夺取了数百万人民的生命。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都会判我死罪。但是人民政府却让我干我最嗜好的工作——园艺。”（溥仪因患癌病，已于一九六七年在北京逝世。他所著的书——《从皇帝到平民》（From Emperor to Citizen），即《我的前半生》——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出版，一九六七年以“The Last Manchu”为书名在纽约出版）

“那么，今天你支持社会主义吗？”我问道。

“对，绝对支持！”他说道。“社会主义就是好。”他接着提议干杯，那天每一个人都响应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快上车！时间不多，现在火车很准时开的哩。”

当我进入计程车时，路易·艾黎向后挪动他巨大的身体，让出一点空位来，汽车马上向新北京站飞驰而去。车站的顶部是一个半透明的圆顶，由强有力的羽状钢架子支撑着，里面有中国第一部自动扶手电梯，还有很多创新的部门：公众浴室，阅览室，托儿所及专为母亲而设的洗衣设备，各种类型的商店，一家戏院，电视，中式饭店和西餐室。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里的饭店和其他免粮票饭店一样，食物是较昂贵的（约三至六元人民币一餐），但对支付得起的人来说则是有用的。几个月后，由于粮食大幅度歉收，大多数免粮票饭店都关了门。虽然在大城市的车站里，旅客们仍然可以用特别的粮食供给证购买较差的饭餐（这个时期需要凭票购买的东西包括粮食、油、糖、肉类、布及另外几类。限额购买的物品价钱便宜，人人有能力购买。免粮票饭店供应的粮食则价格高昂。一九七〇年再版按：目前，肉类、粮食、糖、油和其他食物自一九六四年后已大量供应，但布——较大的出口品——和粮食仍然按额分配）。

在一部全卧卡火车绿色的车厢外面，写着几个黄色的中国字和拼音字母：北京——乌鲁木齐快车。这段长达二千五百公里，横跨整个内陆到达新疆的路程，现在只要四天便可完成。当我从前住在北京的时候，到新疆去的唯一方法就是骑骆驼，往往几个月的时间才越过戈壁沙漠。

艾黎和我并不是要到新疆去。我们只是到离北京四百五十公里的包头市，这个地方从前就是这条铁路线的终点，现在则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城市。还差一年就是我到此地的三十周年纪念了。当时中国西北部地区（即指甘肃，陕西的北部及蒙古草原）正闹着大饥荒，我和艾黎就是在那一次夏天的旅行中在包

头首次相遇的。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我用了很多时间帮助路易·艾黎等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的发展。我的主要工作是从海外筹款给艾黎，组织起战时手工业生产单位(艾黎是首席技术顾问)，“工合”后来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游击战争的发展，成功地提供了财政支持。最近之前，路易·艾黎还在他自己于甘肃组织的山丹技术训练学校里当技术指导。这个学校现在由他所收养的儿子亚伦主持(亚伦是三十年代大水灾所造成的中国孤儿之一)。路易出版了很多书，同时还不断地写作和翻译诗集。

火车缓缓驶出北京，我们经过了正在成长中的石景山钢铁公司。环绕着它的是一个现代化市镇，在玉泉山也可遥遥望见。北面是八大处的古老寺院和清朝皇帝的狩猎园。一条环绕北京的新铁路线正在建筑中；这条石景山支线就是其中的一段，主线则一直伸展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边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敷设双轨铁路工程，要在太行山脉开凿很多隧道和架设不少桥梁。数以百计的工人们在青蓝色的永定河畔搭起了一个个帐篷，白色的篷顶上红旗飘扬。远处的一些红旗则是表示这个战役当天的进度。暮色刚临，他们就燃起了熊熊的篝火，远看就象花朵般闪烁在河岸上，有些人甚至向我们挥手致意。

中国铁路的长度现在达二万四千英里，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公路则增加了五倍，达二十七万英里。但是这两个数目对这样一个巨大而生气蓬勃的国家来说，仍然远远落后于需要；特别快车的座位通常还要提早预定(一九五九年，美国的铁路总长是二十五万九千英里，郊区和市区的公路总长是三百五十一万英

里。)。中国的铁路属标准轨道，中国的工厂现在都能制造各种铁道机车。所谓头等、二等、三等座位实际上是软席卧铺、硬席卧铺和硬席座位，最后一种是简单的木椅座位，中等座位供应窄长的三层式卧铺。“软卧”是设在一间备有舒适家具的房子里。车费比美国便宜了一半，服务质量和精神更好得多。

我们的房间以蓝色毛绒作为布置主色，内有一张可摺叠的餐桌，玫瑰红丝罩着的台灯和壁灯，还有风扇。火车上的广播器不停地播送中西音乐，中间还点缀着精神讲话和教育性节目；广播器可以随意关上。晚餐包括有四个热辣辣的中国小菜（人民币三元五角），由一个梳着马尾头的女孩子送进来，她也象其他人一样，拒绝接受任何小费。当你离开这些豪华的火车前，列车长总是拿意见簿来，要求提意见或批评；如果你写下几句赞美的话，他就会满心欢喜地微笑。

“它比我当年乘搭的旧卡车好得多，记得我和你第一次相遇的情况吗？”路易问道。“那年夏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国民党矮个子现在怎么样了——他叫拿破仑·李还是什么的？”

“吴——C·T·华盛顿·吴！”

吴先生是当年国民党铁道部的“技术专家”。那时候我在上海一家报纸工作，并且正在编写有关铁路的材料——那是蒋介石定都南京两年之后的事了。交通部派华盛顿·吴帮我的忙。但他对铁路事务的知识贫乏得很。他是一个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由于裙带关系，得了这份闲职，当上国民党的“干部”。如果说他对本职技术缺乏精通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却可以说是某些事物的鉴赏家。

如当一天紧张的游览完了，他便走向旅馆的房间里，连声

吆喝。这时候，满场奔跑的杂役便会给他端来热水和热毛巾。他一边揩脸揩手，一边向管房颐指气使，后者只得“是，是”连声而退。几分钟后就有人来敲门，进去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有时或者两三个一齐来。他逐个端详，将一个或两个留下。

三十年代初期，张家口娼妓群集，贩卖妇女竟成了“生意兴隆”的行业。在长期旱灾为害的西北地区，饿殍数以百万计，大批男童女童被卖给人口贩子，充当各种契约劳工。长得漂亮的女孩子马上会被买去作姨太太、茶馆侍女、甚至作普通的街娼。最聪明及身体较好的则去当歌女，有时变成鴿母。大多数女孩子由于变成嫖客的廉价娼妓，或成为其主人的奴隶，都很短命的死去。

苛捐杂税及过度的田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把贫苦农民驱离土地。在上海的外国人会这样说：“这些中国人太残忍了；他们将孩子卖掉看作如卖掉一头猪一样。”但是在一处“公共租界”里，公共掩埋队要不停出动，每年总要掩埋数万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从街头及运河里检起来的。——大部分是杀婴——这就是比被贩卖更为恶劣的命运。

在张家口，吴便提出结束我们的旅程，但我坚持到包头去；我一心要亲眼看看灾区。在离张家口不远，火车便进入一个炎热而多尘的露天火车站，站边停着一列拖着几个货卡的火车，车头还在喘着气。车厢里挤满了衣不蔽体的孩子和妇人，个个都显得很苍白而且面有菜色。那时候，这条铁路上没有客车行走，我们的车厢是加在一列西行的货车上，这列货车后边还连上一两节无篷车厢，临时用来载人。在一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红头发的外国人崭露出来。他就是路易·艾黎。

当时，路易受雇于上海公共租界当工厂视察员，他把该年度的假期用于巡视灾区，和他同来的还有几个外籍人士，他们搞起了一些派粥所，供应食物和住宿地方给仍然有能力在归绥附近“下套区灌溉运河”工作的人们。我向艾黎作了自我介绍，跟着和他拉开了话匣子。我要求吴让他睡在私人车厢未被占用的床铺上。吴马上拒绝了，说不喜欢“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传教士”，他误以为路易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谈论中国的落后”。

到包头了，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我不顾吴的厌恶，花了几天时间和艾黎骑马到几个“鬼”镇里访问，并且深入到一度是肥沃平原的沙漠地区。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数以千计的孩子死于饥荒，直到最后，这场饥荒一共夺去了五百多万人民的生命，但在西方却甚少人注意到这点。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它是我经历过的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中最令我震惊的一幕，直到十五年以后，我又看到了纳粹的毒气室，纳粹因不耐烦看着别人慢慢饿死，竟然把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毒死于室中。

在这场大饥荒中，只有国际救灾会搞了一个运河计划——由O·J·托德和罗伯特·英格拉姆医生主持，前者是美国工程师，后者是医事顾问，他的主要工作是扫除工人居住的帐幕中的虱子，以杜绝斑疹伤寒和疫症的发生；除此之外，实际上就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去救助那些衣衫褴褛，身无分文，涌到城镇里找寻食物的人们。在灾区里，我亲眼见到数以百计的垂死的人，坐在或躺在街道或门槛上。亲友们都因饿到发慌，无力掩埋他们，但在晚上他们就无影无踪：被饿极的野狗及耗子啃掉

——也有人说——是被生人吃掉的。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那个冬天，及其后连续三年同样可怖的大旱灾中，二千万人民受到严重的影响。在黄河流域以南到淮河流域一带，广大的土地都转落到高利贷者和在外地主手里。在其后十二年中，中国广大的土地没有一年不受饥荒，水灾和战争的蹂躏。在各种情况下，同样的经济没收在进行，同样剥削人的悲剧在无限制地发展，农民的地位同样在下降，无地农民不断增加，最后为不可避免的革命作了人数方面的准备。

次年夏天，艾黎在长江大水灾的难民中收养了一个孤儿。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迈克，并送他到上海接受教育。在我记忆中，我曾三度和他会面，第一次他是一个眼神严肃的小伙子，第二次他已是圣约翰大学的名誉毕业生，第三次他成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和艾黎一道创建“工合”，支持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次到北京后，我曾和迈克会面，他和往常一样恳挚，由于工作过度以致稍露疲态。他对自己聪明的妻子，有前途的儿子和漂亮的女儿感到十分自豪。目前，他在中国科学院中主持一项重要的计划。

当我和艾黎在追忆往事时，暮色已经来临。眺望四周，煤炉和小型溶矿炉的炉膛发出的火光，在黑夜中清晰可见。在掩映的火光之前，物体的剪影在迅速移动。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我看到巨大的高压电线杆，伸出象“千手如来”一般多的臂膀，一直架向宽阔的草原。

十点钟，火车上的阅报灯照例熄掉了。路易·艾黎早已进入了梦乡。

蒙 古 的 钢

在过去十年中，到中国访问的人很少到包头这样西入大陆的地方去。由于此地最近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国西北的主要重工业基地，同时这里也是蒙古政治中心，所以是值得详细报道的。

张家口是到包头市的咽喉，并且可通往一个占地一百万英里的高原——那就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了。直到清末(从一六四四年——一九一二年)，蒙古是一个处于中国宗主权下而成立的完整国家，当沙皇扩张主义者在其北部或“外”部建立起一个名为“外蒙古”的半保护国时，蒙古才分裂为两部分。在俄国大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追击白俄领袖，到达 乌 尔 戛(即今之 乌兰巴托)，帮助蒙古人推翻了喇嘛和成吉思汗后裔的统治，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积极地”把南或“内”蒙古吸收在中国的版图上，把它分成宁夏、绥远、热河及察哈尔等省份。人民共和国形式上取消了国民党企图在人文地理上取消蒙古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述几个边疆省份，加上“西满”的一大片地区，组成了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它的面积相当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人口(约一千万)则是后者的十倍多。

因此，就地图上而言，内蒙古自治区使 乌 尔 戛市仍然赞成和南方兄弟联合的蒙古人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内蒙古的新城市及其他先进的农业区，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汉人，目前，在整个自治区的范围内，汉人与蒙古人的数目最低限度是六与一之

比。辽阔的草原和高原仍然是蒙古牧民牧畜的领域，同时，在蒙古人较多的地区，他们在本地选举的行政委员会中就占有较多的席位。当然，即如在其他自治区一样（包括西藏在内），他们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但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党组织。就“自治”一词而言，行政是超于政治的——少数民族并非独立——但目前正在进行的蒙古人的经济革命现代化显然不能避免，如果这个民族不想被消除的话。

内蒙古的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住在北京包铁路附近地区。张家口之西就是自治区两个最主要的城市：归绥——现称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其西一百英里，伸展着包头市的旧城和新城。现在，呼和浩特和包头被一条（经过集宁市）通往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铁路连接起来。在中国和美国的复合图上，包头的位置约相对于德莫因，但它的气候却类似北达科塔州，而在中国发展中的经济计划表，它却更似芝加哥或匹兹堡。

经过张家口以西的古老土地时，我数过约有十四座中小型新建的钢铁厂，四周都兴建了电力厂和工人宿舍。其中一个工厂叫石宣华（译音）第一钢厂，它是一座新型工业城的圆心，该城市已沿着铁路二英里的地区建设起来。沿途我看到不少小铁路从北伸展而下，将新发展的矿场的煤及铁矿运到此间。在呼和浩特市附近，一座现代化的大型辗铁厂的厂房正在兴建中，其范围几达半英里。在这个冶金工业区的周围，一座座钢筋三合土厂房屹立而起，此外还有为数极多的砖建房子。旧式泥砖建筑已很少采用；只要你留心观察，砖窑触目皆是。

在我记忆中的旧包头，只有几千间破烂的房子和一条尘土

飞扬的大街。这个地区现叫东包头，新的包头火车总站在其西五英里。两者之间的土地上已迅速地被工厂、住宅和街道所填满，新旧城之间由一条碎石路相联，这条路将来可能成为包头市的通衢大道。地平线上升起了数十支高大的烟囱，告诉人们旧城将要迈开步伐迎头赶上。

在十年期间内，包头从一个饱受战火蹂躏，饱受饥荒威胁，到解放时只剩下九万人口的边防市镇，摇身一变而为拥有一百三十二万人口的大都会。

我们下榻于昆多仑，那是一间新酒店，建在市区中心。它包括一座五层高的主要建筑和一间附属建筑物。当中是一个面积宽广的花园，里面设有喷水池和游戏场。从我住房的露台往外望，一边是排列整齐的红砖屋；路的那边是散乱的泥壁茅屋，上有粘土制的烟囱，屋与屋之间点缀着丛丛的向日葵（路旁随处可见——取其种子及油）和绿油油的蔬菜。两英里之外，在新建的大道尽头处，耸立着已完成大半的、规模宏大的包头钢铁厂。大道两侧密布民房，政府建筑物、学校，还有一座歌剧院，一座医院和很多以第一批内蒙制的玻璃画装饰起来的商店。在一座新桥的附近，一个体育场已经竣工。城外竖起了无数的帐篷，我获悉有十万多人住在那里。在这些帐幕居民中，一万七千名是建筑队工人，他们为包钢建筑附属厂房，并且为包钢的六万六千名工人建筑宿舍。

给我作报告的是包头市市长李志（译音）。他邀请我们吃午饭，出席作陪的有包钢副经理——一个名叫乌利其那仁的蒙古人，以及一些官员。李市长是一个壮健的湖北人，约四十五岁，身材健硕、肌肉发达、光头、头部和面部的皮肤晒成紫铜色。他

的样子使我想起尤·布林纳。不用开口询问，我便可以猜出他一定是八路军的老游击战士（一九三七年，当国共停战后，中国红军改组成为八路军，以陕西北部的延安为根据地，深入华北，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我确实捉摸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自信而非骄傲，亲切的态度，通常加上幽默感——这些特征马上可以把经过战火锻炼的共产党人和呆坐在办公室的官僚区分开来。

“是的，这里每个人都曾经是游击战士，”李说，他的眼睛扫过桌旁的每一个蒙古人和中国人。“起初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我们又乘胜追击国民党。胜利后，我们在座的人一放下武器，又马上拿起工具了。”

李志于一九五一年起便担任包头市长。他说日本人和国民党只给他留下一个发电量只有五百瓩的电厂和一个年产二百吨面粉的磨坊。今年，全市共有二百七十三家国营和市营的工业企业，同时拥有一千多个“公私”合营的生产单位。包头市的工业产品包括铁路装备、机床、重型机械、各种电机、各式各样的建筑材料、加工食物（包括罐头牛肉和羊肉）和纺织机械。一九四九年，李市长报告说，全区的输出额低于人民币一千万元。一九六〇年的指标是十二亿元（约五亿美元）。“我们一定能超越它，”同一个领导人这样说（这个数字表示每人每年的输出额约一千元人民币，折合美金四百一十六元官价——在地球的这一角落是相当高的）。在一九六〇年来说，他们极有可能达到了；但于一九六一年与一九六二年两年，却不能有此成就，原因在下文将有所详述。

扩大了包头市现划分为七个区；和中国其他的新工业中心一样，它拥有郊区农业，周围又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目前，它

的目的是实现市郊完整的自给自足。蕴藏量丰富的新蒙古铁矿中心区白云山亦隶属包头管辖，有长达八十英里的电气火车直通包钢。其中有一个区完全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整个地区的制糖工业集中于远郊的一间现代化的大工厂，也是由市政府直接管理的。但是李市长接着告诉我们，连续的天旱和一种当地采用的农药所不能消灭的新害虫，严重地摧毁了该地的甜菜生产。制糖厂被迫暂时停工。

“关于粮食问题，我们仍然未能称为自给自足——虽然我们在肉食方面的供应较诸大部分地区为多。即使天气条件良好，粮食产量仍未能满足人口的膨胀。农业方面确实缺乏人手；新‘包头——黄河’运河的建筑未能按计划进行，该运河建成后可使生产倍增。在整个夏季里，未曾真正下过一场雨——加上我们每年只有四个月解冻期，故只能生产单造农作物。今年的冬天将会是困难的一季，但绝对不会有人挨饿了。你于一九二九年在这里目睹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生产农民所需要的一切，并以工业制品换回粮食：如钢、电机、机械、农业用具等。我们也将制造火车头、起重机、货车、拖拉机……”

象其他地区一样，包头市对于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都已施行了严格的配给制，但我看不到乞丐，饿得半死的人民，衣衫褴褛的顽童，或集体饥荒的任何迹象。此外，在全国范围内，钢铁工人、矿工和重工业工人当然比其他人民享有较优待的配给品。

包头面对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住屋问题，这对应付包头的长冬是极其重要的。

“对，我们在住屋问题上也落后于形势。”李市长继续说：

“一个城市在十年内扩大了十四倍面积，你想想应怎样走在发展的前头呢？国民党溃败时，只留下九十万平方码的泥房子，到处害虫密布。自一九五二年迄今，我们已建设了五百万平方码的清洁砖屋，全部都有水电供应。我们消灭了鼠、蚤和虱，并且扫除了一切流行病和性病。但是，目前我们每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十五平方英尺——尤可虑者，我们准备在两年内吸收四十万移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管理新建的工厂，扩充灌溉工程，在草原上开辟新的农场。贵国政府不是整天对人民宣传中国要打仗吗？噢，这种情况我也知道。但是，好了，斯诺先生，我们实际上没有时间去进行任何的战争——除了争取在祖国生存的权利以外。当然，如果帝国主义者胆敢将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将给予他们想不到的还击！”

外表轩昂的包钢蒙古族经理带我们参观了整个工厂：五平方英里内烟囱林立，喷着滚滚浓烟，管道、运输铁路支线、起重机等占地达几英亩，还有各种各样的钢铁产品加工厂。包钢是中国在苏联援助下进行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之一，是在苏联工程师监督之下建成的——这些工程师现在完全撤走。一九六〇年初，包钢便已投入生产。按目前产量算，每年产钢一百万吨，铁七十万吨。一九六一年的指标将使铁的产量增到一百五十万吨，钢则达二百五十万吨，这样包钢便跃升为中国五大冶金中心。最大的钢铁基地目前在东北的鞍山，一九六〇年该处约产钢五百万吨——这是包钢一九六五年的指标；其他主要的钢铁中心包括长江流域的武汉，安徽省内阵容庞大的新建的小钢铁厂群和上海钢铁公司，据报后者一九六〇年钢的产

量超过二百万吨。

管道、墙壁、建筑物上漆上巨大的标语，引用毛泽东及党的号召，策励工人们奋斗。在一条输送管上，一行巨大的白色标语吸引了路易·艾黎的注意，他马上翻译如下：“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当我们注视着钢水在高炉中滚滚奔流出来时，外面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一群穿着白色工作套服的男女工人走进厂房，向操作起重吊车的女孩子送上一面红色的锦旗，我把她摄影下来。据称她完成了一千件任务而没有任何差错。

不知何故，上述的情况虽然令我耳目一新，但使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那千千万万欣欣向荣的果树和林荫，它们栽种在道旁，工厂四周，和密布于附近小山上。我不能忘怀那些快要枯焦的树木（一九二九年同样在这个地方），一棵棵全无叶皮——已经给饿得发慌的人民剥下来充饥了。

晚上，在进入梦乡前，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今日整天时间只能参观一个钢铁工厂，对公社、对路上经过的工厂仍然一无所知。在中国任何地方，一天所能学习到的当然有限。我睡意朦胧地想，一个农业基础较薄弱的城市，一旦增添了一百万新居民，怎样解决它粮食的问题呢？市长曾说本地区农产量只能满足百分之六十的粮食要求。那么，每天起码要运来的五百吨粮食从多远运至呢？此外，这条西到新疆，南至兰州铁路线上，发展迅速的新兴城市及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民的粮食又如何解决呢？这条新筑的单线铁路只怕连运输主要的工业物资及产品也未够用吧。迅速的城市化及工业化，供应和运输的能量之间的不均衡必定会扩大的——我这样推想。

白云铁矿

市长派了陆初增(译音)伴同我们到深入蒙古草原一百英里的地区访问。陆是一个高瘦的湖北人，曾在八路军著名的游击根据地——山西省的五台山——和日本人作战。他的头颅剃得如鸡蛋般光滑，而且实际上就象一只蛋。他经常露出亲切的笑容，显示出洁白的大牙齿。他精力充沛，本地知识广博之极。他是包头市外事组的主要负责人，曾任支援朝鲜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主席。但是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苏联顾问又已撤走，所以他目前暂时担任——说句笑话——“欢迎美国老朋友委员会”的主席，全个委员会的成员有限得很：只有他一人。

我们坐上一辆“伏尔加”牌轿车，沿着一条长约十二英里的碎石路向北行驶，两旁尽是新建设。之后是一条砂泥混合的公路，逐渐进入花岗岩山区。在一条干涸了的河流岸边，工人们正在建筑一条新的公路，数以百计的工人用双手传运石块。越过一片旷野之后，我们来到一个满布帐篷和新建砖屋的地区。一切事物都披上红色的尘土，包括一些在狭窄山谷底部的溪涧中搬运货物的人和骆驼队。那一边，工程师们正在指导着建筑水坝和新电厂的工程。

“铁矿之乡，”路易·艾黎凝视着破裂的铁质土壤说：“这些山到处都是铁。”工人们好奇地望着我们的车子。看到我们两个外国人向他们露齿微笑时，他们挥动红色的臂膀，表示欢迎。“过去，这个地区经常有盗匪出没，截劫来往的骆驼队。现在，这里就象城市中的大街道上一样安全。”在这个地区两天的旅程

中，我们没有看到武装部队。在我的整个旅程中，我没有任何的私人护卫员，而且一个也看不到。

突然，我们从多石的小山和溪流地区，进入一片起伏的草原，有点象我们的（指美国）达科塔乡村。这片灌溉良好的地区，才是蒙古草原的真正边缘，这里牧场和农田此邻彼间，种植着荞麦、燕麦、大麦、高粱、玉米和小麦，空气清新凉快。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里面大部分的工作都用拖拉机和摩打泵进行。在整个华北，古老的水轮车已普遍地迅速被淘汰。这里，我记起一幅错过了的照片：一个面色红润的妇女，骑在一匹黑马上，穿着漂亮的外套和红色的裤子，马尾辫子飞扬于背后，一边膝上放着一个大菜篮，另一边坐着一个孩子，正在左摇右摆地平衡着身体，从菜地里奔驰出来。在远处的道路上，我们看见一匹蒙古小种马，拖曳着一辆满载生产品的车子，上面还出人意料地缚着两辆红光闪闪的新单车；这幅照片我也错过了。今天牧民也骑上了脚踏车。

紫色圆顶的山峰逐渐下降，成为开阔的牧畜区，平顶的村屋也陆续减少；在几里的行程里，我们只见一群群的牛、绵羊和山羊，屋宇则全然不见。之后，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央，我们看到在公路外数百码的地方，有一个村子，里面的房屋全是新建的砖房子，呈半圆形地环绕着一座两层楼的会堂和学校，建筑物上有一颗巨大的红星。车子停下来，我取出我的“保勒殊”摄影机摄了一个全景，然后再用远摄镜头摄下了这建筑物。一个强健的青年人从村里缓步走出来，他脚上穿着蒙古靴，站在附近颇有兴趣的注视着我。他告诉我们，这里是星火人民公社一个生产大队的所在地，这个公社是由汉族和蒙族农、牧民组合

而成的。从此地计算，它的范围一边到四十英里以外，另一边则到二十四英里以外。

“你们以什么作口粮呢？”我们问他。

“白面和蔬菜。”

“你的配给额是多少？”

“不够。”

“怎样不够呢？”

“只得五十三斤。”

我们都不禁相视微笑，而他都好象有点莫名其妙。这表示他每月将近有六十磅口粮，几乎是北京平均配给额的两倍；似乎没有值得抱怨的地方。我没有追究这个问题，但后来我想起未曾听他说完整个故事。这是一个肉食区，如果他吃不到羊肉，任何数量的面粉都抵消不了。

陆先生催促我们上路。白云铁矿还在几英里以外，我们将会迟到了。午后，前面出现了雄伟的景象：烟囱高耸，移动着的起重机在忙碌地工作，自动化的铲泥机和平路机在矿山上来来往往。这里有电气火车直接服务。在宽阔的草原上，这幅景象有点象海市蜃楼，但来会见我们的矿山经理却是无比真实的。他名叫王荣寿(译音)，外表看来只有二十五岁，但他也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他说自己快四十岁了。从前未曾见过矿山的他，三年前才被派来此地，白手起家，建设这个机械化的城市。

“我们来时，这里连一个帐篷也没有，”他说道。

“你怎样学会矿务管理呢？”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他露齿而笑着说：“我们有些苏联同志作技术顾问。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矿务管

理。现在他们都回国了。”

市委会主席是一个叫吴隆(译音)的蒙古人；他从前也是游击战士，矿山开建时便来这里。他自豪地领我到处浏览。白云铁矿共有人口一万二千人，已建成了一座戏院，可容纳一千人；一座两层的学校，一座规模宏大的工人俱乐部；各个建筑物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还到饭堂、电力厂、医院、新宿舍和我们当晚休息的小酒店中参观，并且到铁矿里转了转。王经理指出白云的丰富矿床以前从未开发过，这里的铁矿加上附近的矿藏足以供应包钢一个长时期。一九六〇年输出定额是二百四十万吨，“一定能够超额完成”(我参观的许多矿山和工厂中，没有一个预言“不能按额完成”的)。

白云铁矿的进度显然不错。这座现代化的工厂对于分配给它的指标可以绰绰有余地应付，各处的建筑也似乎尽可能地利用了，虽然石路和渠道现在才进行铺设。

在中国，矿山技工的工资较高。白云铁矿的工作大部分在地面上进行，每天工作分两班进行，每班八小时，工人的工资最低是三十六元，最高达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和其他国家企业一样，白云矿的工人享有免费医疗和进工余学校的权利；工人们筹募了一些基金作为失业保险、养老金计划和其他福利之用。租金是微不足道的，食物则较平常人好。工作服由矿山免费供应。这里，冬天的温度常在摄氏四十度以下，冬季用的皮帽、羊皮外衣、厚衬衣和长靴都是免费供应的。

路易·艾黎以前也未到过白云，但他和我一样，都认为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革命后，中国建设了一百六十五座新城市，”他说：“还有一百四十个城市象包头一样重新建设。去

年，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到各省去，但未到过的为数也不少。”

我看到了蒙古人的情况，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的领导和管理中他们享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了他们掌握了过去永不能掌握的现代化企业，这一切都令我感到非常满意。当晚，在晚餐桌上，我祝贺了汉族和蒙族的年轻官员，并向“欢迎美国老朋友委员会”的陆初增“主席”表示祝贺。饮酒进食之余，主人们禁不住向我讲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指出它那明显的和平目的，对全世界的好意，继而询问我为什么美国人民能忍受“帝国主义政府”的压迫。由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对华政策上犯下了昭彰和重复的错误，我是倾向中国人民一边的，但面对这个问题，我发觉自己的处境颇为尴尬。中国人民其实和其他人民全无分别，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指美国人）不愿谈论事实而喜欢莽下结论而已。

当问及一位老记者他的邻人是否继续鞭打他的妻子时，他总是感到浑身不舒服的。“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正属于这种情况。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美国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不知是什么样子”的国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是如此。所以，想在三言两语之间使人明白一个“不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除非他曾到过该地。

在白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一件范围以外的事情：美国的生产过剩和中国暂时生产不足原因的比较。主人们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述美国解决上述问题的愚昧性——发出特别奖金要求农民少种些粮食。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出特别奖金鼓励农民多种粮，原因他们当然都非常了解——如果说我当时尚未明白的话。这时候，一个曾在苏联集体农庄工作过的老战

士(我曾到该农庄作过访问)向我举杯祝酒,我提议大家干杯,这样就满意地结束了我们的宴会。

“为一切对人类有益的事业的胜利,”他说。

“干杯!”我们同声高呼。

蒙古公社来去

早上六时,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火腿、鸡蛋、土产的乳酪(颇有巴尔马乳酪的风味)。七时,我们已是在去新百利溪的路上。新百利溪是内蒙古自治区百灵庙地区的一个蒙古人民公社。

在白云以外的几里地方,我们看到汉族农民开垦了不少处女地,种植口粮供应这个铁矿(现在仍然主要靠外地的粮食)。陆初增告诉我,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已有千余万亩土地(约一百六十六万英亩)种植了小麦。现在,平均每个农民的产量是五分之四吨。大部分的耕地在包头之东。在条件适合的地区,蒙古人的经济都已实行了土地化;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定居务农,或成为定居牧民,因为养牛事业和乳酪工业已取代了放牧骆驼、马群和绵羊的游牧经济。除了出口牛肉和羊肉之外,蒙古现在还向华北源源供应更大量的牛奶,牛油和其他乳酪产品,大部分被托儿所、医院、疗养院和酒店采用。

但是,我们不久便发现,在包头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开阔的草原。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奔驰在绿色的草原和低丘之上,那里放牧着一群群的马和羊。皮制帐篷则三五成堆,他们的篝火之上仍然余烟袅袅。远望地平线外,突然现出一个圆

形的塔尖；不久，我们便到达一座叫“西拉吐鲁”的喇嘛寺院。我们经过了四个骑在马背上的喇嘛，驶过了一列牛厩，最后在一堵白色的泥墙前停下。这就是公社机关的所在地。

闸门口，年轻的社长仁科金·诺努(译音)欢迎我们，他是一个个子矮小、肌肉发达和壮健的人，穿上一件绿色的棉布长袍，脚下是一双黑色的长靴，头上带着一顶灰色的风帽，帽舌几乎盖过了他那微笑的眼睛。其他欢迎我们的公社委员都穿着短袍，并且用色彩鲜明的腰带束在腰上，袍下是柔软的裤子，裤管插在黑皮制的马靴筒内。一位中年的蒙族妇女(也穿着长靴)，被介绍为公社副社长。她那饱经风霜的面庞就象马鞍皮一样黝黑、浓密的头发束成辫子绕在头上。在建筑物的一边，有三间类似蒙古帐篷形的白色建筑物鳞次排列，中间一座开了一道门。一个穿着长靴的蒙古姑娘在门旁含笑伫立。她身上穿着一件色彩明丽的绿丝长袍，腰间束上一条浅粉红腰带，浓密的短发上结着另一条粉红色的丝带，翻起的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巾。她站在门口欢迎我们。

“我们的秘书。”仁科金·诺努说。

我们走进帐篷内，在其中一个室的中央，围绕着炉床坐在铺有垫子的矮凳上。地板上铺着洁净的兽皮，我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张涂上红漆的小台，上面摆满蒙古的珍馐，“都是公社的产品”。这些食物包括有切成小粒的乳酪，油炸果馅麦饼，黄糖和高粱饼。进食时，这些物品和一些不知名的作料混合在一杯酥油茶中，女秘书宝春从一个大铜壶的长约一尺的壶嘴中，斟下了一种和暖而甜的牛奶状液体。只要你稍为沾唇，她又马上殷勤为你添上新的。这种小食品的尊贵名称已不能记忆，但当

时我(要求主人加以原谅)不想再添了。蒙古人对甜品的极端嗜好,以及他们在服饰上不同的色彩——就象他们待客的热情和诚恳一般无异——使我想起曾在阿拉伯遇见过的游牧阿拉伯人。

三种语言的互相翻译,使我们逐渐明瞭新百里溪是一个牧牛公社,属百灵庙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管辖,该地就在东边五十英里。一九五八年,此地五个“牧牛业高级社”合并成为今天的公社,现在分为四个大队,共有十二队牧民,还有为数较少的农民。出乎意料之外,此地人口极少:成年人只有二千二百名。畜群方面:九万头绵羊及山羊,一万二千头马和骡,七千头牛,二千头骆驼。畜牧区约四百平方英里;公社还耕作了三千二百英亩谷物,主要供应本地牲口群的需要。

国家的贷款使畜牧业得到重新建立,并使牧民住上新的帐篷。牛群及其他牲口群的拥有权归于各生产队,公社统一管理兽医站、人工受精站、人工培育站、气象站、一个医院及一些卫生所,一个戏院,一条电话线和一个小型拖拉机站。社办的牛产品工厂出产牛乳及乳酪。公社还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一个砖窑、一个制革厂及一间铁匠店。

和其他内蒙古地区一样,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十岁以下的蒙古儿童,都已进入初级小学读书。新百里溪还送了二百三十名毕业生到呼和浩特和包头进修,学习培育牲口的方法及内燃机的应用。在旧社会,蒙古人中有机会学习的只限于喇嘛及贵族,这些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据《北京周报》一篇文章透露:内蒙古现在有二十所高等学校——包括医学院、兽医学院、工程学院及其他普通学院;在一万名注册学生中,有一千四百名是

蒙古或其他游牧民族的子弟。为数不少的蒙古人(包括男子和妇女)，已经被训练成为技术工人。我在包钢获悉有一千五百多名蒙古人在那里学习冶金技术。

“去年，我们公社诞生了二百五十二个婴儿，”当仁科金带我到村子的里里外外参观时，他这样对我说：“在革命前，有一年整个族生下的孩子，只有一个能活到第二年。过去，我们说此地女多于男、喇嘛多于孩子、老人多于青年，而且常常死于生。畜群的生长率比人类高，但炭疽热等传染病往往会把整群牛羊杀死。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有新的医药和医疗设备，孩子们都长得健壮结实，炭疽热也完全受到控制，传染病及梅毒已完全扫清。”

仁科金是一个党员，当然啦。一个汉族的副社长也是党员，他为我们翻译了大部分的蒙古话，因为仁科金所懂的汉语很少。以下就是我所记载有关仁科金的故事：

“我们的族以前是由一个叫金迈德·仁清·高尔罗的王子所统治，我父母是他统治下的贫苦牧民。那时候，王子在他的土地上拥有无上权威；我们都是金迈德的臣民。他是一个抗日的王子。当他拒绝与日本人朋比为奸时，日寇把他绑架到百灵庙去。他受到严刑迫害，最后被杀死了。金迈德变成一个蒙古英雄，我们的人民至今仍然称颂他。当然，我们现在再没有贵族了，但是金迈德的子孙仍然在此地生活，并且与其他人民一样参加工作，受到人民的尊敬。

“金迈德王子死后，人们更仇恨日本帝国主义，更多的人被劫掠，遭受毒打及杀害。抗战结束前一年，那时我才十五岁，祖父被日寇逮捕，说与八路军有关系。我祖父曾经收藏过

几个八路军战士，日本人对他严刑逼供，但是什么情况也得不到。最后，日寇无可奈何的把他释放，祖父已被他们打成残废，不久便因心脏衰弱而含恨去世。他死时，我站在他身边，眼中滚动着仇恨的泪花。日本鬼子烧杀抢光我们的牲畜，使我们家无隔夜之粮，贫无立锥之地。父亲、长兄、母亲相继死去。最后，全家七口只剩下弱妹，老祖母和我三人。

“这时候，我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参加了八路军。我被编入红色蒙古骑兵连，一支由曾到延安受训的老八路率领的队伍。当时，我年少力弱，背上步枪后跨不上马，还要同志们拉我一把。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取而代之。两者对人民的态度均如出一辙，而国民党的无道较诸日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人倘仍保留一丁点财物，便被指为内奸或共产党，并必然受到劫掠，毒打甚而杀害。这个地区当时要养活百多个国民党士兵。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重返八路军队伍，再一次过游击队员的生活。一九四七年，我们终于把国民党赶走了。”

返回公社办公室，我们发觉在多才多艺的女秘书宝春亲自指挥之下，宴会已准备完善。桌中，在一盆白饭之上，端放着一只烤熟的羔羊(蒙古式烤羊)。然而，当我看到盆边围放着更多的“公社土产”时，心中不觉为之惴惴不安，因为觉得这些食物颇使人反胃。但我内心明白，这种稀罕的宴会主要是因我的“光临”而设的，因此，也丝毫不敢轻视它。话得说回来，那只烤羊确实使人垂涎三尺。宝春还准备了一些不知名的有色饮料，我推测是染色和加糖的伏尔加酒。仁科金开怀畅饮，面不改容，颇有游击队员之风。他频频与客人举杯，其真挚的感情，溢于言表，丝毫也没有做作——包括对他所见的第一位美国人

在内。由于路易·艾黎滴酒不沾，只喝汽水，我只好负起和仁科金对饮的义务。凭着举杯这种古老而尊贵的语言，人类的友情被紧紧地联系起来，仁科金就这样对客人们表示了衷心的祝愿。

“为蒙古族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他毫不保留地说：“干杯。”

“我谨代表全体，”我回敬他道：“向蒙古族人民致以衷心的祝愿。”

整个宴会洋溢着热情和兴奋的气氛，而结果则未致如我所想象那般严重（两人都未曾作滚地葫芦）。下午，我们尚有精神到附近参观幼马群，观看骑术表演（由仁科金亲自率领），以及蒙古人的套索捕兽的绝技——在长杆后加一绳圈而进行。

一个较仁科金年长十岁的男子骑着马到我们面前，据介绍是一个大队的领导人。他唇上长着一撇小胡子，头上戴着一顶毛边丝帽，帽顶还镶上一颗巨大的珊瑚钮，显得威风凛凛的样子。据说，这粒钮从前为贵族所专有，现在则用来代表大队领导。

当我们参观公社建筑时，我听到了迅速发展的报告：牛群等牲畜十年来增加了五倍；和一九五八年比较，公社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这些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贷款和能以信用贷款购买畜群和设备而达到的。“医院、学校、戏院、兽科专家、电话等等！”坚强的女副社长说：“在旧社会，这里有谁听说过呢？”

毫无疑问，蒙古确实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好的发展。同时，全面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汉族人移居此地，这种说法也是

毫无疑问的。在这个公社，蒙古族的成年人共有一千三百二十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但在二千二百成年人的总数中，汉人占了八百八十。后者全部是农民及建筑工人。据称他们享有一切居住权利。仁科金解释说，建筑工人只是暂时居民，但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汉族农民将移居此地。

黄昏将至时，我们驱车前往喇嘛寺院参观(因我曾询及其情况)。附近的村落仍然有六个喇嘛居住，但寺院已经关闭。当我们等候一个喇嘛启门时，我获悉该公社共有五间寺院。我向随同参观的人群询问，是否有人信仰宗教或参加宗教仪式，他们都以微笑及否定的摇头来回答我的问题。

“那是属于老人家的，”他们说。

“那是属于‘一些’老人家的，”女副社长纠正他们。

一个长着长胡子、穿着蓬乱的黄色长袍的和尚走来，替我们开了门，并且曲意奉承地向我们裂口微笑。庙内一切事物仍然保持原状，里面墙壁上封满尘土的经文高至天花板下。祈祷时用的烟火轮，锣，漆金神像及四周围以纸花的宝莲灯架也原封不动。在我的要求下，那和尚拿起一个铜喇叭走到殿外的坛上(搬这个喇叭要仁科金帮助他)，并吹了一声长号。号声使一匹马惊叫起来。喇叭手还是个年轻人，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能够当起喇嘛。

“有什么不能呢？”社长回答说：“他自孩子时代起便是什么都不懂的。”

“但是，今天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

“当然不会。现在再没有孩子会相信由僧侣编造出来的神了。人们以真理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僧侣是不能帮助人们解

决困难的。”

“那么，这是一座博物馆而非活的寺院了？”

他耸耸肩，回答说：“如你所见，我们并没有干涉仍然奉教的人呢。”

当我们开车离开时，他们都跨上了马，跟着汽车奔驰了几百英尺路，然后突然勒缰停步，挥动着帽子表示再见。在他们背后，那和尚静悄悄地关上了寺门。

中国为什么会变红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

目前，有大量的书是用来“解释”中国的，而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变红？”这个问题，最有启发性的答案是领导中国走到今天地位者的谈话，他，就是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倾向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倾向民族资本主义”？在毛泽东亲自向我讲述他本身的故事，以及后来我收集的其他红军领袖的历史中，已经提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见《西行漫记》一书）。只要留心研究这些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发表的

消息，就不难预见：整个中华民族的经历使共产党的胜利必然达到，除非国民党能实施奇迹一般的改革。这些改革应该是深入而富有革命性的，并且应在抗日爱国战争中，以重新分配土地为其开始。

促成这种现象的简单事实是：在中国，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着令人信服的权威（在欧洲和美洲，由于受到“费边缓进主义”，“和平演进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影响，此种权威未能确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中国的年轻人阅读到马克思有关武装起来的鼓动性号召时，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是一八四八年二月时欧洲情况的分析，而是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密切环境的描述。

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劳动者不但没有随着工业的进步而站起来，反而随着他本阶级的存在而越沉越深。”甚至以美国为例，较为开明的劳工法例也尚未够一代的时间。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儿童及妇女奴隶般的劳动，存在着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劳动日，存在着养不活命的工资制度；而疾病、工伤、失业及年老各方面毫无保障；并且还存在着绝无集体谈判的能力等等情况。因此，到一九四七年止，人们又怎会对马克思的预言产生疑问呢？

由于家族及行会制度的传统安全已经崩溃，身无长物的劳动者本身的“价值”，实在并不高于他在市场中悬在身上的标签的价格，“纯粹是一种生产工具”。劳工之所以沦至毫无保障之原因在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旧的农民经济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机械产品引致手工业生产的彻底破产。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由于主要税项的征收不断上升（有些甚至提早

六十年预收),加上盘剥重利,以及盗贼般的官僚和军阀不断掠夺公共财富,使稍有财产的自耕农的数目,降到最低点。尤有甚者,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争的影响,这个崩溃了的经济使衰落的农民家庭中的几百万剩馀劳动力被抛进了继续膨胀的失业劳工市场中去。多年前,R·H·托尼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中,早就预见地分析了这种情况。我所遇到的红军战士中,差不多每一个人都透露他是这种农村集体经济破产的直接产物——这是我在这里提出来需要特别强调的。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至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上述有关童工的情况,我在外国人势力范围下的上海中国人的商店中也可看到)。此外,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在其担任了外国警察力量的角色,及保护以暴力夺取于中国的“权力与利益”这几方面;因此,人们也无需仔细研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伪善所作的藐视性的抨击。

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地;欧洲列强和日本之间的敌对状态,使任何一国都不能独自主宰中国。但是,各国都把中国看成是次等的国家,同时对中国都不负任何的义务。在通商口岸里的任何外国人——即使是一个酩酊的醉汉也好——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比最好德行的中国人还要高;在自己国家的土地被外人视为下等人的侮辱,多年来使中国人感到无限痛苦。

基于上述各种原因,加上内心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希

望中国象古代一样，重新登上强国地位”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在有知识的中国人中，首先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比在苏联的影响更大。

按照列宁的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采取了一个分为两阶段的革命方案。第一阶段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进步的资本家与工农结成统一战线。这个阶段将结束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赢得完全的独立。在中国农村，它将取缔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平均土地所有权；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它将把帝国主义的同伙、反动的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只有在这两项目标完成后，革命的力量才能进而为第二阶段打下基础，即建设社会主义。

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计划和目的，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个革命中，爱国主义的观念，阶级战争和在当时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步骤。必须记得，在斗争初期，党的创建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和孙逸仙博士在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接受苏联的直接援助也是相符合的。同时，由于反帝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口号变得使人更易接受。根据事实显示，为数尚小的本国资产阶级集团，包括和它有关系的大地主阶级，毫无疑问确是依赖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凶阶级。因此，中国人就更容易信赖莫斯科，因为苏联首要的敌人也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后者同样也是亚洲和非洲独立运动的直接敌人。

中国最著名的共产党人在理论上都是国际主义者，但他们在爱国主义的程度上，却毫不逊色于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国

民党人。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在几百万拥有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中，他们大多数来自只占了少于百分之五的一小部分。我所搜集的传记表明：在共产党和红军的五十个首脑人物中，只有两个到三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即指既非农民，亦非知识分子。到一九四五年时，无产阶级的代表增多了）。当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早已经是具有极好才干的知名人士。撇开真实的历史而言，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国民党阵营中，他们很可能最后成为它的领导。

那时候，年轻的爱国者之所以和蒋介石决裂，并非因为他们在国家独立的目的是上产生基本歧见，而是他们确信：没有深入的、内部的革命性改革，那些目的将永远不能达到——而这一切，蒋介石和国民党保守派是决定要阻止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现代世界史上的实行，就象他的唯物辩证法一样，对中国是一种新的内容。

他们发觉情势非常危急。他们本身的经历，加上对欧洲和美洲历史的学习，使他们痛苦地认识中国的衰弱，落后和面临着被整个瓜分的迫切危险。为了国家的新生，他们在摸索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斗争中，具有积极性和智慧的中国青年人趋向一个有权威与革命性的理论，因为其他的方法已经尝试，而且还遭到失败；因为他们相信时间排除了缓进主义的实施；同时，因为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革命是救亡的好方法。

国民党从未向共产党提出过一个清楚的，合乎道理的选择，而只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与他们竞争。对于已加入了共产党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只不过要作出一个实际的判断：究竟

他们的方法是否唯一可行的——即既能解决个人问题，又能迅速弥补中国与世界上先进国家在工业和科学上惊人的距离。早期便深信这个可能的共产党人发现了一个事实，无须城市或无产阶级暴动，他们便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权力。

毛泽东相信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从客观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是苏联人所没有的。在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之间，城市暴动遭到严重的打击，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革命运动便被迫转移到农村去。毛泽东在农村中建立了第一个农民根据地。自此之后，革命的风暴使农民真正地成为他们主要的物质与人力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后能取得国家的权力，其主要力量就是来源于农民。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毛泽东在保安告诉我：“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

共产党人从不认为土地的重新分配就是事情的终结。他们只是把土地改革看作是争取农民战斗同盟的方法，并且最后赢得他们对主要目的的支持。因此，除了在理论上仍然保留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之外，共产党实际上代表了占农民人口三分之二的贫苦农民。国民党由于和地主阶级一鼻子出气，事实上是不能代表这部分人口的。

从实际观点看，共产党人已成为了一支机动的、武装的、到处出没的“十字军式”的宣传队，在亚洲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传播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给农民带来了现代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他们给青年和妇女（共产党人历来都尊崇妇女）展视了他们闻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重要性。他们给农民许下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并且决心把农民从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

和家散人亡的火坑中拯救出来。他们答应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没有贪污，全心全意为普通人民谋幸福的新国家，人人机会均等，把国家建设在“天下为公”，“分工合作”的哲学思想上。共产党三字按中文的直译就是“分享财产的党”。

革命的火焰初期散播缓慢，成为后期不能扑灭的原因。又由于不便利的交通——公路、铁路和桥梁的缺乏——使共产党能够在现代工业中心(先后为西方列强、国民党和日本人所占据)之间的广阔土地上，建立武装斗争的根据地。举国上下的农村地区对当权政府的不满，使共产党人在内地取得了领导权。他们提出了斗争的目的，鼓励和唤醒了人民的新希望，同时建立了一支军队，为实现其理想而斗争。当他们真正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一些最不平等的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而自己又不从中取利时，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二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欢迎他们，并且最后和他们结成一个整体。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二千二百多年前著名的哲学家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我们是水中的游鱼，”今天的共产党人说：“人民好比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我们绝不会骑在人民头上，我们和人民之间的感情是鱼水之情。”就这样，他们提出了农民所能理解的口号。

坐上总理的特别火车

中国人似乎喜欢出人意外地安排重要的约会。一天深夜，新侨房中的电话响起了一个长而迫切的讯号。我被邀请准备好于翌晨到首都北面作一整天的旅行。

在约定的时间，我在战前和战时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在一号月台等候我。他现在是外贸促进会的顾问，但这次会晤却不是为讨论商业而安排的。他领我进入一列特别火车——正在等候着一个特别的乘客。周恩来总理那天预定了它。总理邀请我与他结伴同游最近才竣工的密云水坝，这是华北最大的水库，水力发电与防洪计划的所在地。它坐落于长城以内，近历史上有名的古北口。

秋日的朝阳照耀在新北京车站大理石墙壁之上的琥珀色瓦檐上，总理和他的夫人从横门驾车直抵火车旁边。在新火车总站的路基之下，就是我在外城附近贵家厂的旧住址所在地。那间房子原来是司徒雷登博士的住宅，他是革命前美国驻中国的最后一位大使。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位勇敢的妇女——邓颖超，到贵家厂寻求我的帮助。现在，她是今天旅行的女主人，周恩来夫人。

火车只挂上三四个车厢。周总理及夫人走到另一边，暂时看不到。我被带到瞭望卡上看看，然后走进我自己的空气调节的单人卧室中。这辆火车可作为新中国的展品。它完全是本国制造的，地地道道的中国火车。地板上铺盖着北京地毯，窗上挂着一张刺绣的窗帘，窗下是一张麻栗木制的书桌，旁边是一张安乐椅，房的那边摆着一张足度的睡床。

“这是写作的好地方，”我的一个主人微笑着说。

单人卧室还附设有一个浴室，内有一个绿磁盆，便缸，及一个有玻璃间格的花洒。

我们走到瞭望室，那里铺上更厚的地毯，四壁嵌上美观的嵌板，而且挂上丝幕。这个车卡上还设有小食部和酒吧，无论

椅子或梳化都装饰得很华丽。

火车无声地开始滑行，我留意地观看我旧居附近传说有鬼的狐狸塔，但它在新建筑群中已无踪影可寻。我在这个区域曾住了五年之久，以前一草一物都了如指掌，但现在只能认出几个目标；甚至当年农民早上放鸭的护城河也不见了。我不禁想起我们最后的一个厨子老金，他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也想起那位可敬的满族管家老韩；当年七月，他满腹怀疑地领着一个带黑眼镜，披着长发的中国妇女进入我们的屋子里。她就是邓颖超。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日本人制造藉口，引起芦沟桥（外国人或叫马可·波罗桥）事件，进攻并占领了北京，引起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当时，邓颖超因长征患上肺病，所以秘密养病于北京郊区西山的一座寺院里，身体已逐渐康复。当日本人围困西山时，周夫人连忙穿上草鞋，扮成农妇的模样，逃出包围圈，在城门刚要关闭之前赶到北京城。

一九三六年当我首次赴红区访问时，我曾经和邓颖超会面，当时觉得她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女性（国民党警察和日本人都极力缉捕她）。就在一年之后，她被带到我家里。带她来的是我一位朋友的活跃的妻子，她丈夫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就是这个教授替我写了一封会见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让我带到红区去。若干年前，我曾在《远东之战》一书中描述了周夫人逃出北京的情形，当时数以百计的“赤色分子”或“嫌疑赤色分子”被逮捕了。捉到她可得一笔丰富的奖金。由于我是拥有治外法权之利的外国人，所以我能够带着她和教授的妻子（打扮成我的女仆人）顺利地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乘搭尾班火车到达天津，

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安全脱险，乘船直往当时所谓自由中国的地区去了。

二十三年后的这个夏天，我们却坐上了一辆绝不相同的火车之上。我们的行程没有宣布，所以无论何处也不会遇上欢迎的人群。在整个旅途中，包括在密云湖上的两小时泛舟遨游，我看不到任何的武装卫兵。在去密云途中，我们参观怀柔水坝。在爬登石级时，我曾向周提及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的火车停在一座横跨一个深谷的桥架之上；孤立而且很易被破坏。

“当我住在北京时，此地是盗匪出没之区，”我说。“那时，到此地的官员必定要由荷枪实弹的军队来保护。”

“我们的卫兵到处都有，只是你看不见罢。”周用左手指着一些在不远之处的一堵墙边工作着的泥水匠，以及一些在山边耕作的农民。“在中国，每个身体强健的人现在都是战士。我们不需要职业的卫兵。”那只是极微小的夸张，却也不失为事实。

我们的随行者人数适中，除了冀博士及其妻子以外，还有外交部长陈毅的夫人，龚澎（当我在燕京大学暂教时，龚是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是周恩来的首席秘书，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以及几位北京和延安时期的老相识。

火车驶出北京市后，周恩来走入客室。他肤色黝黑，精神奕奕，只是两鬓稍觉发白，比他实际年龄（六十一岁）看起来年轻了十年。他脚上穿着拖鞋，并且穿上长裤和白色的运动衣。回忆起第一次会见的情形，我想到“弱者”是如何升起，“强者”是如何降沉。

周是我在一九三六年越过“红区”边界之后，所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那时候，他是驻守延安以北一个小窑洞村庄的“东线红军”的司令员。我刚进营地，一个穿着旧棉布制服，身材纤瘦的军人走出来欢迎我。他“刷”地一声，合拢穿着布鞋的双腿，手触已经褪色的红星帽，向我行一个漂亮的军礼。他眨动着浓眉之下的一对大黑眼珠，热诚地向我上下打量。他的面庞上长着中国人少有的大胡子，露出洁白的牙齿向我微笑。他就是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周恩来，当时，蒋介石悬赏八万元收买他的头颅。

在那叫做白家坪的前哨，我和周恩来举行了两日的长时间会谈，然后才继续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保安会晤毛泽东。周告诉我共产党人要结束内战，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但这并非表示放弃革命，而是把革命往前推进。“抗日战争开始之日，”他预言：“就是蒋介石走向灭亡之时。”

一年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内战暂时结束了，周在谈判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他离开共产党地区，成为八路军在南京、汉口、最后在重庆的代表团团长之后，我曾经多次见过他。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绝少中国人能象周恩来那样在美国官员的心目中留下那么良好的印象。他是清朝一个显赫官吏的孙子，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优等生（他在该大学认识邓颖超），并曾留学欧洲，通英、法两种语言。我第一次和他会面时，周已三十八岁了，虽然脸上长着大胡子，但仍显得有一点孩子气；他的言行具有令人心折的吸引力，他文雅而又具有坚强，随机应变及具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头脑。

周解释说：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的问题，现在已完全系于

中美间就美国政策一手造成的大问题的会谈(美国政策使台湾沦为美国的保护国)。这个海岛之“属于中国，尤如夏威夷之属于美国一样清楚。”周宣布，直到华盛顿认识那事实之前，美国记者将不被欢迎到中国来。

“我们不是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周继续说：“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绝不是记者。”

“那有何分别呢？每一个优良的史学家就必定是个优良的记者，无论你从都西第特或司马迁开始，情况也是一样。”

“尽管如此，你的旅行不能成为一般美国记者的先例。我们把你看成作家及史学家、而非记者。”

史学家，作家，记者——谁理会呢？主要的还是故事本身。

有了满意的腹稿之后(如果应该这样说的话)，周便开始和我作马拉松式会谈，讨论我向他提出的问题。不久，我便发觉他在把我看成史学家的问题上，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态度。三小时内，我们都是围绕着历史来转；直到我们的谈话被中断时，我们已经到达密云了。

“不要把照相机忘掉了，”离开火车时，有人对我说。我可以随意摄影任何事物——但不是以记者的身份。

古山成新岸

在密云的展览馆内，我们凝视着一张巨大的挂图，它显示了密云的前景——成为一个旅游区及葡萄产地，使中国在增长

中的酒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专为休养而建的房子和幽静的家园遍布湖面；此外，沙滩、泳池、供游人划的小艇、植物园、公园和露营地点等适当点缀其间。它的格调颇似北京的夏季行宫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但密云的面积却百倍于前者。以上种种，目前只不过仍是纸上谈兵，唯一已经付诸实行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岛屿散布的内海，山坡上种植起了大面积的胡桃丛林。

“他们说我再活十年就会吃到这里出产的胡桃，但我想不会这么容易。”周耸耸肩膀道。“要使整个梦想变成事实，需要三十年，最低限度也要二十年。我可不能活这么久呢，但是，”他指着秀美的陈毅夫人说：“她一定可以。她的儿子更肯定可以哩。”

周表示他可能又估计错误了；这里的人民单是在建筑大堤坝一项工程上，已使他大为惊诧。原定于一九六五年才完成的堤坝，现已提前五年竣工。北京市及近郊的农村，工业发展出乎意料地迅猛向前，造成了增加水力和电力的新需要。附近的公社由于受益最大，在工程中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说，在召开紧急会议时，各公社委员答应提供足够的工人，连同工具、食物和工资，投入整个计划的建设中。他又指出，整个计划的重要性，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地区的二十一个县中，共派来了二十万个义务劳动者——比实际需要的多得多。

我们驱车上了主堤，怡人景色尽收眼底：宽阔蓝色的大湖在风景秀丽、群峰高耸的山峦怀抱之中。整个水库的面积达七十二平方英里。眺望西边，雄伟的长城如巨蟒似地盘绕于群山之巅，五个瞭望塔也历历在目。自秦始皇动员一切人力去完成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后(长达二千多英里)，二十二个世纪的历史在它们下面发源、消逝。作为抗拒北方凶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它是一个胜利。但在这伟大的兴建者死后不久，秦朝(公元前二五九——二〇六)也就崩溃了。

“若把建筑长城的石头拿来应用，应该可以筑成数以百计的密云水坝呢，”我对队伍中的一位工程师说。

“或许它们将会被如此利用，”他回答说：“在西面较远之处，有数十座小堤坝就是用长城崩塌下来的石块筑成的。”

密云及附近区域就和华北大部分地区一样，遭受着干旱及雨季中突如其来的暴雨所造成的严重灾害。在遭受水灾蹂躏的年代里，汇于今天密云水库所在地的白河和潮河，往往淹没了一百多万英亩的农田。在受干旱袭击的年月中，同样的土地也蒙受其害，引起连年饥荒。现在，密云水库的十一座新堤坝储蓄了四十一亿立方公尺的水，为上述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提供了随意调节的供水量，使大部分的土地都改变为稻田。

与其他新建的水库一样，密云也属于一个新的纵长运河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运河体系最终要将北京——经过中部的几个省份——和一千三百英里以南的广州连接起来。它将和旧的大运河平行，后者经过东部沿海的省份。一九六一年，密云——北京运河接通了北京——天津运河，造成了一条可使五百吨船只从长城直航至中国海的河道。除了主要作储水和灌溉之用外，密云水库还可以发九万千瓦的电力，促进附近地区的电器化和工业化。一九五九年，密云水库已经成功地防止了一场严重水灾的发生。一九六〇年，当一场严重的旱灾打击着整个华北时，它又局部地使灾情减至最轻的程度。

密云大水库的整体(包括巨大的盆地与十一座拦河坝)，在两年内便完成了。在开始的十五个月中，主要还是靠双手去劳动。一九五九年三月，重型的开土机运到工地上，约有八千名农民学习使用。在最后几个月的工作中，一师解放军开到工地，支援水库的建筑。整个密云工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政策的具体表现。它那数以里计的坝墙、溢洪道、内部设计、水闸和运河等，都是由北京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学生和教授设计的。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为工程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工程蓝图，并且都在建筑过程中实际采用了。

密云的确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和我稍后参观的黄河三门峡水坝比较，它只是小儿科工程而已。另外，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长江水力发电系统，已在设计中。

周转身和水务工程师谈了一会，然后又掀动他的浓眉。

“今次我又落后于时间了，”他说。“工程师告诉我附近有四个规模较小的水库已在施工中。这个县刚派了一万二千名义务劳动者到邻县去，支援他们建筑水库，以答谢他们去年对怀柔工程的帮助。”

在随便的谈话中，我问周中国有多少耕地。他回答的数字是一亿一千万公顷，约等于二亿七千五百万英亩。

“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多少呢？”

“没有增加。相反，减少了二百万公顷。”

见我露出迷惑的神情，周解释道：

“原因你已约略可见：新公路，水坝，水库，运河；大规模的城乡住屋与工业的发展；新街道，学校，医院，实验所；新铁路和新铺设的双线行车路轨；大型的新机场等等。”

中国的可耕面积曾在外国农业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个问题值得作简短的评论。周的数字表示耕地面积为全国总面积（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的高山和沙漠在内）百分之十二。一九六〇年的耕地面积极有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小；报章也曾几次提及可耕地面积是一亿七百万公顷（即二亿六千七百万英亩）。农业部一位负责人给我的数字也是十六亿亩，即约二亿六千七百万英亩。

除了上述诸因素之外，耕地面积的减少仍有其他原因可以找出。在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中，官方政策鼓励各公社推行深耕、密植、灌溉、施肥等措施，增加粮田产量，并且在优良的土地上增加为两造种植，对贫瘠的土地则弃置之。这些建议包括在当时政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这些措施如由有经验的农民实行，固可获得良好的收获；然而官僚主义及不分青红皂白而勉强推行，大概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次，在一九五八年，一些公社管理突然削减或甚而中断农民小面积的自留地，使这些土地陷于荒芜之境。原因之三，一些公社把农业劳动力分散去进行非农业的计划，时常疏忽了可资利用的土地。最后一点原因，很多公社没收富农的土地为公有而不予以赔偿。私有财产最后的一点痕迹也被删除去了，但当时却缺乏积极的诱导因素去鼓励有意走自发道路的农民联合起来，开发新的田地。

三十年前，O. E. 贝克认为“从气候，地形和土壤的基础上看来，（中国）最后适宜耕作的土地将达七亿英亩”，但乔治·巴布科克·克雷西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断定贝克“极度夸张了中国农业的潜力”。当时，中国的耕地面积据推想有二亿七百万

万英亩，平均每人约零点四英亩。近年来，耕地面积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但按人口计算则所差无几。农业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中国可以在十到二十年内，把耕地面积增加一倍，同时在克服极大困难后，可以得到二亿英亩的边区土地。然而，在工业化达到一个先进的水平时，利用目前可资利用的方法，究竟可以开发得多少土地，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由于目前的可耕地超过半数都是两造田，因此，每年实际上种植的面积，就达到了五亿英亩以上。由于不同因素的影响，二十到三十个中国人的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才等于一个现代化农场中的美国农民所能生产的粮食。所以，集中力量搞好目前所有耕地的生产，较诸分散力量搞大面积的低产田为佳。

虽然如此，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两年期间，在山区，高原，在内陆的沙漠，到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拓土运动；特别是沙漠地区，由于推行植林运动，开展新水利工程，使土地可利用于耕作。此外，拓土运动还在南部沿海地区大力展开，那里通常有充足的雨量。沼泽地带兴建了排水工程；在浙江、福建和广东北部，人们克服种种困难，在高山上开垦了大量的梯田。一九六二年，为数颇大的正规部队开到上述地区参加劳动，他们的出现却引起台湾的极度恐惧，害怕受到急迫的进攻。这些新开垦的土地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使生产得到平衡，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分配及材料的分散，本地的粮食需求往往大幅度地增多。

周恩来继续向我发表他的意见：“我们现在并不急于迅速增长耕地面积，虽然这个目的每日都在进行。你可以见到，”——他指着密云水库——说：“我们首先要对现有耕地进行有效的控

制和充分的利用——在很多方面都要实行农业科学化。”

他的谈话表示：（一）中国在将来的化肥总产量要比一九六〇年化肥总产量多二十倍——而该年度之产量已比一九五二年度提高了十五倍；（二）机械化也要比目前的水平提高二十倍。在任何一方面来说，农业科学化表示要实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与护土工程，选择良种，改良插秧与耕种的方法。它表示要将零零星星的小型农场合并成为大规模的“农场—工厂”大企业。但所有这些问题，加上人民公社，及公社希望加速达成结果，都要较后才能解决了。

当时，就在八月下旬，周已预言跟着到来的一年将是艰苦的一年。据报道，长时间的旱灾，西北地区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南方的夹雹暴风，以及其他种种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受到严重的灾祸。早造作物的收成远比预期要低。在我所能记忆的从前的岁月里，这种情况表示饥荒与几百万人民的死亡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但中国的食物来源和供应制度，现在已有完善的安排，即使秋收仍然是严重的失收，也将不会有饥荒发生——周向我强调说。以下我们将看到当灾祸降临时，人们怎样对付它。

“对我们而言，”周凝视着湖面，沉思地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是在长征时期，二十四年前的事了——特别是当我们横越西藏附近的大草地那个期间。我们的情况已濒绝境。我们不但无物可食，而且无水可饮。然而，我们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

我觉得：当回想起长征时期，一切事情对周来说都是好转而非变坏。“你一定认为余下的全国性问 题 比较容易解决了，”

我对他说。

“容易！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周简略地回答。“千万不可引证我曾讲过这里的事情是易办的。十年前，全中国开始了第二个长征。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们乘坐的游艇由一艘机动轮船拖动，优游地横过这个大湖。夕阳逐渐往西沉下，峻峭的山壁呈现出一片深紫的颜色。不久，一阵狂风突然刮起，并且下了一场小雨。但很快便雨过天晴。

“这些骤雨在这里是很常见的，”周说道。“有一次，我在湖畔散步时，突然遇到一场暴风雨。我赶到最近的一间屋子里暂避。主妇请我吃炖银杏——十分可口呢。该处是一间新盖的房子，清洁而又舒适，我获悉她的家庭是因为建筑水坝而迁徙到此的。她家在原地已住了很多代了。她说，初时很多农民反对徙置，但目前人人都喜欢这新的转变。既不用怕水灾，亦无旱灾之忧，新地良田，电力——湖中还盛产鱼类，供应食用！那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他似乎是说，过去的长征和面临的长征都值得去奋斗。当他坐在他妻子旁边的甲板上，舒适地休息时，一阵清劲的微风从年轻的胡桃林中吹出来。高大的浪花拍击着古老的山边，这里曾目睹过多次洪水泛滥，但却未曾尝试过山腰变成了岸滩。当我们在九松岭村靠岸时，我在客人留言簿上写下了我脑海中最适合的一句话——“今天我看到了古山成新岸”。

周恩来和美国

在和周恩来同游密云之前，我曾和他见过一次面，在他的要求下，我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建议举行一次会谈。当时，我提出的问题，总数超过了四十条。在火车上的会谈，以及在我将离开中国时和他举行的会谈中，周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会谈了约十二小时，这个数字不包括“餐桌旁的谈话”在内。在正式的会谈中，我们是通过翻译员来交谈的，因此，直接对话的时间只有六小时左右；在会谈中，我写下了约一万一千字的记录（两次会谈分别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和十月十八日举行。详情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展望》杂志）。除了偶然要查阅笔记之外，周的所有评论都是随意说出的。我将两次会谈的记录提出来，在周的要求下，作了一些修改，以符合官方的记录。后者是据周的翻译员陈辉（译音）的语言写出来的，他是斯沃恩莫尔大学毕业生，他坚持要我把TAIWAN STRAIT（台湾海峡）一语，改成英国的惯用语TAIWAN STRAITS。在其他方面，我们两人的记录本上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在一次公开的会谈里，周向我广泛地透露了中、美两国间的问题，以及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我们也讨论到西藏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周表示美国在新德里的影响力，使得该问题困难重重。周还和我讨论了“中苏大辩论”的本质——这种会谈是中国或苏联的官员唯一公开讨论上述问题的谈话。我允诺把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否则一字不提”地出版。后

来在《展望》杂志刊登了出来——一字不漏地！当时，《展望》杂志却受到了抨击；抨击者所持的理由是：中国的报刊绝不会刊登有高级美国官员参加的会谈。稍后，北京作出了相互的反应——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的女婿会谈的详情。

有一点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即周的理由完全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出发。海外的人大概最不理解的问题是：中国人（甚至反共的中国人）支持北京政府究竟到那一个程度。那些处心积虑，阴谋推翻共产党的美国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个事实：即美国在十年来推行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已使从前亲美的、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上威望大失，并且反而为北京在反帝的思想斗争中大大增强了力量。

以下我将发表我个人的观感——有关中国的政策对中美悲观的关系，作了何种的贡献。这里，我只是站在记者的立场上，正确地记录问题，而非领导一支辩论队。

周总理认为我的前七条问题互相关连，所以他说首先要对有关的中美问题的背景来一个总讨论，然后再谈解决的办法。我将这七条问题稍为浓缩如下：

（一）中国会不会主动建议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无核地带的建议？

（二）这样一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哪几点？

（三）如美国总统邀请周到美国讨论此一条约，他会接受邀请吗？

（四）中国会欢迎美国总统因此而任命的特使访问北京吗？

（五）若美国和台湾政权的（防卫）条约一天存在，中国有可

能签订这个条约吗？

（六）若中国决然反对世界核武装扩张，为什么她还千方百计制造核武器？

（七）据传中国认为只有中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后，方能和美国达成协议。请评论之。

“你是一个关心我国政治发展的人，”总理说：“你一定注意到中国已和很多国家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一月份有缅甸联邦；四月份当我访问尼泊尔时，和尼泊尔王国也签订了这样的条约。八月份，当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阿富汗时，和阿富汗王国签订了友好及互不侵犯条约……（较早时有）和也门王国订立的友好条约，以及和印度、印尼、柬埔寨和锡兰（斯里兰卡）共同签署的和平共处联合宣言。

“今年签订的三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完全赞同这五个原则。如你所知，这五项原则是：（一）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一条有关亚洲国家及太平洋沿岸国家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牵涉到中美关系的问题，牵涉到中、苏、日、美四国关系的问题。

（注：本文内旁有·的句子是对周恩来总理谈话的解释。……表示一些原句被省略。）

“很明显，若中美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约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中国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争论若不达成协议，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也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两个重要的事实。这是我为什么说要实现这个建议，还需要持久的努力。既然要付出持久的努力，为什么我们要反复提出这个建议呢？它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同时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但我想首先引述一事以证明之。中国解放后，美国政府宣布它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宣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如此声明，后来杜鲁门也承认了。事实上，在日本投降后，台湾已于一九四五年回到当时的中国政府手中。它是由当时的台湾总督陈仪将军接收和管理的，后来陈将军被蒋介石杀死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当战争在朝鲜爆发后，杜鲁门改变了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个侵略中国的政策。在派兵往朝鲜的同时，美国政府又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并且在台湾实行了军事控制。从那个时间起，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新侵略。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不久之后，在朝鲜的美国军队表现出要横越三八线，进逼鸭绿江的意图（即中国疆界）。为此，中国政府迫不得已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横越三八线，进逼鸭绿江的话，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这个警告通过印度大使转到美国去。美国政府对 这个警告置之不理，而美国军队真的越过了三八线，进逼鸭绿江。

“中国人民只好采取行动，支援朝鲜抗美救国的战争。但是这个行动一直到美国驻兵台湾海峡和在台湾实行军事控制之后四个月才采取的，而且是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时才采取的。……

“经过两年的谈判后，一个停火协定终于在朝鲜达成。到一

九五八年，中国的军队已完全撤出了朝鲜。但是，直到现在，美国军队仍然留在朝鲜，尚未撤走。尤有甚者，美国仍然控制台湾及其陆、海、空三军，而且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仍然在台湾海峡活动……

“虽然美国对中国犯下了这些侵略的行径，我们会用军事力量和美国解决争端吗？不！我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已经声明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在谈判桌旁，讨论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争端，虽然两国尚未互相承认，也未有外交关系。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了英国的帮助，结果使中国和美国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日内瓦展开了大使级会谈。

“中—美会谈自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到现在已过了五年。开始时，我们提议：中国和美国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争论，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应采用军事力量或施行武力威胁。美国政府封锁了这个提议的一切消息，但中国后来把它公布了。为什么杜勒斯要拒绝它呢？因为杜勒斯明白：一旦达成了这个协议，就表示第二步要讨论美国怎样和在什么时候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

“我们坚持中美两国有关台湾地区的争论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军事行动，则是内部问题。美国政府主张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坚持：他们是可以并且必须分开来处理。由于中国和美国能够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可以和蒋介石集团举行谈判。前者属国际问题，后者则属内部问题。双边会议可同时处理，而解决办法可分别达成。

“在中美两国的会谈中，在具体问题能够解决之前，首先就要达成原则上的一致。而原则上要取得一致的两点是：

（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论，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应依赖采用军事力量或施行武力威胁；

（二）美国必须同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至于什么时候和以何种方式撤退的特别步骤，则属后期讨论的事情，而美国政府停止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以及停止依赖武力威胁，则这是唯一可能达到的，合逻辑的结果。

“这是中美争端的关键性地方。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活动目标是在制造‘两个中国’。在这方面而言，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这个计划大概不但被中国大陆反对，并且会被台湾的国民党和台湾的中国人民反对。这样的一条道路将不可能导致任何成果，而只会将解决中美关系的事情打成了一个死结。

“我们相信，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它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美国政府不放弃其侵华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任何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可能。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将会让他们的政府无限期地去推行这个政策。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友谊则是长存的。”

问：“听说，美国政策坚持：若非中国政府宣布在台湾地区避免采用武力，没有协议可能达成，是吗？”

答：“美国政府所坚持的是：美国和蒋介石在台湾地区有着‘单独和联合自卫的固有权’。换言之，它将使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合法化，使其‘两个中国’的目的实现。这是被中

华民族举国上下一齐反对的。假设有人占领了夏威夷群岛，并指派一个舰队到美国大陆和夏威夷群岛中间的水域去巡逻，又或有人占领了长岛，并派遣舰队到长岛之北的海峡去，美国人民对这种情况将有何感想呢？推而想之，你就可以联想到中国人民有何感受。当日本人侵略珍珠港时，美国人民不是起来反抗吗？……”

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服务员在客车门外，默默地徘徊了几分钟。当周说完后，四周望望，见到了他。

“饿了吧？”周问我道。

这最低限度是我们可以马上解决的一件具体事情吧。我跟着他走到餐车，里面已准备了一张桌子，可坐二十个客人——还有一个历史学家。

餐桌旁的谈话

在餐桌旁，我问总理能否非正式地或正式地讨论以下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军事基地方面而言，中国可否允诺在美国撤兵后的一个预定时期内，不派遣军队或武装力量到台湾去，以保持台湾暂时的中立。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苦心作成中、美、日、苏寻求达成一个太平洋互不侵犯协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同时安排在朝鲜、越南两地解散军事同盟而作出的前提（实际上这也是解脱的程序），并且促使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美、中互相承认。

周回答说，这些问题实在属于外交范围。

“你，”他说：“并非美国国务卿。而我亦非中国的外交部

长。”

“我不是国务卿这一点将无人争辩，”我回答说。“但你这句话的下半截的真情，我却不信服。”他笑起来。

“谁敢肯定呢，你将来可能成为国务卿的。”

“不，”我说道。“在我一生中也不会。”

“你是一个悲观论者。”

“非也，先生，一个乐观派才是真的。”

我们的会话转到闲谈的题目上去。我们谈及游泳。周可不能追上毛；多年前，他折断了右手，到现在也未能妥妥当当地接好。我们谈及他妻子对摄影逐渐增加的兴趣，对这种艺术，她已颇为熟练了。她保存了一张我在一九三八年在汉口为他俩拍摄的合照，就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家”里。然后周告诉我有关改革语言的一些问题。

汉语拼音——即用拉丁文字母拼写中国字——只限于打破群众文盲和帮助儿童迅速掌握文字这两个尝试上，他解释说。当他们认识了文字之后，他们便放弃“汉语拼音”。这种新语音法并没有印刷品出版，而且亦不需要。然而，在为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而创作的语文课中，却采用拉丁文字母。

汉字的简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很久以来，人们已写着简化了的字体，但是并未曾系统地编辑起来。现在已经有一套标准的简化字体，包括了一千个基本汉字。一些老学者拚命地反对汉字的简化；他们认为简化会破坏书法艺术。周却认为即使仅有字形轮廓的象形文字，都可以美观地写出来。我不同意他的讲法；我是一个保守派呢。

我欣赏地称赞中国对西洋交响乐和歌剧音乐的广泛兴趣，

这些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周谈及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尼克松先生，肯尼迪先生，及各种各样的人的事业和特质，包括切斯特·鲍尔斯在内，他对后者的评价比我更有影响力。我怀疑鲍尔斯先生有关台湾独立的提议，只不过是他的个人意见。周纠正我说，鲍尔斯先生是共和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点我倒不曾注意，但这事实却未改变我的判断。

对于杜勒斯先生而言，周说他们对他的去世颇感遗憾，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由于他的表现是如此明确，因此毫不困难的预期他的“反应”。

周认为杜勒斯政策的遗产，把美国置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地拥有二百多个空军基地，“美国现在就象一个满手持着鸡蛋的人。他不能移动，否则全部都要失去。”（美国后来宣布清除了一些小基地）美国的手伸得太长，因而失去了集中优势去完成可得到的目标的机动性。

“拳头打跳虱是打不着的，”周引用了一句中国人的警句。他将手指散开，按在台面上。“你看，你一只指头也不能动，否则跳虱便逃去。这样的一个人对其他未入他陷阱的跳虱，基本上是毫无抵抗力的，这些跳虱可以随意移动，择地而咬。”周突然将两手用力一拍。“这样，”他说，“才是捉跳虱的方法。”

那是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来抵抗蒋介石拳头打跳虱的策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毛说，“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这个关系上，他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是他的第一个例子。后来，他把它应用于“美帝国主义”身上。在西方，这句话被过分简略，以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氢弹的毁灭性力量不认识。事实上，他是象列宁描述老帝国主义为“泥塑

巨人”一样，都是运用抽象的意思。

毛的原句如下：“……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周关于跳虱的譬喻的界限也很明显。在美国方面来说，这些手不但按在跳虱上，而且按在无数百万吨级的致命核武器上。由于彻底毁灭核武器存在着极端困难，因此，提起一只核手指将会引致巨大的威力，不但会毁灭受跳虱困扰的美国，而且牵连到所有的跳虱，包括陷阱之内和陷阱之外的。一个已按低了手指的人——如果他的手指已按下了——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刺激呢？

第二篇

在浪涛冲击的地方

巨 变

二十四年前，在中国人民悠久历史的发源地，黄河河套以内的陕西省境内一个土山的窑洞里，我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的总机关就在一个已成废墟的城镇——保安，那里距长城不远。当时，他是人数少于四万的“赤匪残余”的领袖。为了追捕他们，蒋介石已在中国进行了万里追踪。

在庆祝革命胜利十一周年的大会上，我和其他客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与毛再度相逢，那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观看了五十多万人组成的辉煌的游行队伍，毛主席是队伍中的第一号英雄人物。在全中国，人们享受了两天的节日和庆祝活动。

“不见很久了，”当毛和我握手时，他说道：“究竟

有多久呢？”

“二十一年了，”我对他说道。说着我环顾这宽阔而古老的宫殿，脑海里重现出当年的情形。“自那时起，你窑洞的面积已稍为扩大了昵！”

他微微一笑，道：“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他邀请我去探访他。在后来的访问中，我们畅谈了约九个小时，内容是有关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是尚未发生的。

回想我和毛最初见面的那一个年代，他的国家被称为“纯粹是一个地理名词”。当时，东北是中国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但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在长城之下，日本还占领了她最重要的城市和沿海各省份；中国的其余地区处于衰弱、不团结和破产的状态。自那时起，旧中国便正式宣告完结。“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毛在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扫除了一切外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控制，并且是在帝国崩溃以来，第一次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

要了解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必须认识毛泽东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领导地位。他是一切国内斗争的核心人物，也是中苏争论，中国对美国及西方态度问题上的核心人物。

二十六年来，毛连续担任革命的领导人。在争取国家免受苏联军事干涉与保持独立的斗争中，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策略和路线。

毛在政府部门中没有任何官职。长久以来，他便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作为中国国内最重要的工作。但直

到一九五九年，他还兼任了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后来他退任国家主席，据官方宣布的原因是为了把更多时间和精力集中起来，研究“党和国家在方针、政策和路线方面的问题”。

保安掠影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长城以南的陕北山区步行了两天之后，我进入了那个零落的村庄——保安。中国红军(解放军当年的称号)剩下的大部分战士，在完成横跨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后，最后到达这里。红军的另一支分队当时亦已挥军北上，战斗在西藏草地上。

一群好奇的群众挤在街道的两旁，街道上只有几十间破旧的茅房和商店。红旗上斧头与镰刀互相辉映，旗边还添上了红军最近的称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几条写上英文和中文的标帜高高挂起，内容是：“欢迎美国记者到苏维埃中国作调查访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万岁！”街道尽头处，站着一堆欢迎者，包括大部分当时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在这里，我第一次会见了邓颖超(周恩来夫人)等。

那天晚上，毛泽东到来与我们一同吃晚饭。当时他很瘦削，但身材较大多数中国人高大，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唇厚而阔，前额高耸，下巴上有一粒突出的黑痣，黑色的头发浓密而长。“委员长”为取得这个头颅悬赏二十五万银元。

我被安置于一间新建的泥砖屋，毛泽东就住在路下不远的一个山边的窑洞里。窑洞只有一只窗和一道开在小巷里的门，由一个警卫员负责保卫。不久之后，我发现我的每一天都

在这个窑洞里结束或开始。毛定期邀请我到下面吃热辣辣的胡椒馒头——或由毛夫人用本地出产的酸枣制成的蜜饯水果等。之后，我们便开始作数小时的谈话，有时一直谈到黎明将临才暂时结束。

那时，由于战场和政坛上都出现了暂息的情势，毛泽东得到了一些闲暇的时刻。我那青年人无穷尽的兴趣可能引起了他的共鸣。况且，在多年的消息封锁之后，我这个媒介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得闻共产党人被隔绝多年的中国城市的情况。他特别希望能广泛地宣传党的缓和的新政策，即寻求与国民党重建统一战线——在其后一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被迫作出了这一抉择。

在他解答了数十个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后，我终于有机会了解他出生四十三年以来的事迹。

毛泽东于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村，此地 在长江上的汉口市之南。他的父亲叫毛顺生。家里是下中农出身。

在农村的生活中，使他了解到封建的罪恶，他要把封建的家长制送到坟墓里，让贫苦农民得到机会，让妇女得到平等的权益，争取建立在新自由之上的友爱（这种自由只有经过艰苦的斗争，只有经过保卫低层阶级的利益不被上层阶级所占有的斗争才能取得）。毛泽东的早期生活使他和许多觉醒中的青年分享了这些思想。

自那时开始，毛泽东就决定致力于进行改造世界那件貌似不可能成功的工作了。毛泽东开始写他的首篇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时候，已是我和他相遇之前十年的事

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形容贫农是夺取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半无产阶级。他把贫农阶级和富裕农民清楚地分别开来，对后者他作出了以下的评述：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小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

毛泽东相信这种在即将崩溃的社会里还拚命往上爬的人，是不可能给予他任何帮助去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贫农，象他母亲那样受压迫的妇女，他的弟弟和思想一致的同学所组成的同盟军，是“绝大的多数”，这些都是他的朋友——亦即革命的朋友。

毛泽东读书的时候，是最贫苦的学生中之一。他节衣缩食，终于完成了五年的中学生活，并于一九一八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在这段期间中，甚至尚在中小学时代，他便目睹了无数次的饥荒，暴动，劫掠和杀人。

自少年时代开始，他便把描写“战国”及其他动乱时代的传奇性文章牢记在脑海中。他博览群书，尤爱《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等。他喜欢和老农们讨论这些典故，并听他们回忆太平天国起义的英雄事迹。老农们对这些英雄深表同情。毛和他的同窗只能隐蔽地阅读这些颠覆性的禁书——在老师走过时，便把它们放在古文书之下。这些历史文学详尽地记述了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公元前五世纪）著的

《孙子》一书，更概括地总结了许多军事经验。在毛的后期生活里，这些伟大的著作使他在进行革命战争中，初步掌握了防守与进攻的艺术。

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改革家的文章，孙中山发表在《人民的力量》上的著作，都被偷偷地带进课室里，毛阅读过这些著作后、胸中翻腾的革命火焰越燃越旺。一九一〇年，他在思想上，在内心里都已变成一个反君主制者。在长沙时，他目睹造反者的头颅被统治者挂在竹竿上，使人民产生恐惧的心理。这并非是他首次目击这种血腥的报复性行为。在童年时代，他曾看到贫苦农民在饥荒的年代里，被饥饿所驱使，集体打开地主阶级的粮仓。当暴动群众的带头人被捕获时，他们的头颅也一样被钉在木柱上当众示警。但是，在这个时刻，它已完全理解到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应付的代价。不久后，学校的校长大胆地邀请一些革命家来校为学生们演说，以唤醒悲愤，激起爱国心，“救中国于肢离体碎之中”。为了表示献身这个事业，毛亲手剪去他的长辫子（此乃表示对满清皇帝屈服的象征），而且还帮助热心较低的同学割去长辫。一九一一年，当长沙被共和军攻陷后，他报名参加过这支军队。六个月后，他“辞职了”。

然而，事实很快便明朗起来，封建皇朝的统治转为军阀独裁，并不能使中国的衰落告终。毛将他的有限现款用来购买报纸，以便追上本地及全国的政治形势。一个法国归来的留学生陈独秀主编的一份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在毛及其他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着，毛泽东和一些朋友在湖南组合成一个“讨论组”，他们的目的非常严肃。在某些意义方面来说，它就是“书社”的前身。

在学校的讨论组内，毛泽东成为学生们的领袖，这是他首次奠定了他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们的一切言行“一定要有的放矢”，他告诉我说。他们绝不浪费时间交谈恋爱或浪漫史的事情，大家都一致认为时局紧迫，急于追求知识，实无暇讨论女人或个人的事。

“除了对女性的魅力从不讨论之外(通常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的伙伴们还拒绝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我记起有一次在一个青年人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猪肉的问题，并且把仆人叫到面前，当面谈论这件事。我很不耐烦地走了，以后也没有和他见面。我们喜欢谈论大事情——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整个宇宙!”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逐渐成为热心于体格锻炼的运动家，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是很不寻常的。为了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他们经常跋涉长途去旅行，携着最小量的食物，露宿荒山之上，十一月里还在冰冻的河流中洗澡，并且常常赤足“到乡村里开眼界”，“过穷人的生活”，考验自己，“建立起健全的体魄”。一年夏天，毛和一个同学走遍了湖南省的五个县，“一枚铜板也没有用过。农民们招待我们食宿；无论到了哪一处，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招呼。”毛注意到能够慷慨地以仅有的东西招呼他们的，总是贫农。和他们讨论生活和困难时，毛认识了他前所未闻的艰辛和不平等。

就在这几个县份里，在为他提供过住宿的贫农家中，毛泽东在十年后回到这里，发动了农民运动，为红军提供了第一支队伍。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代表的资格，第一次到北

京去。在那里，他首次试行踏上了国家政治舞台，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在这个时期，中国各省的教育情况可以用“粗枝大叶”和“极端混乱”来形容，内容从儒家学说到西方世界初探不等，但毛在长沙图书馆时已博览群书，对西方情况作了广泛的研究。

在自学时，他最敬爱的教师杨怀中(英国留学生)，曾给他指导。他称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杨教导毛首次认识了一些英文生字。在北京时，毛泽东再找到杨，这时杨已是北京国立大学的教授。经过他的帮助，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那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始创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时，他还认识了杨怀中的女儿杨开慧；两人于一九二〇年结了婚。

几年后，共产党党籍构成了严重罪名，李大钊和毛泽东的年轻妻子遭到杀害。

抵京后，毛泽东与杨教授的门房同睡一炕。稍后，他“和七个友人同居一斗室。当我们全体躺在炕上时，实在连吸气的余地也没有。转侧时，首先要警告两旁的人。”他们连买木生火的钱也没有，只能挤在一起，互以体温取暖。八个人只得一件大衣，晚间出外时要轮流穿着。

但是，“旧都的美丽可以完全抵销这种肉体所受的艰辛，”毛泽东回忆说。“在公园，在古老的宫殿，我看到北方的早春；当北海还是白茫茫的一片银色世界时，我已看到梅花吐艳。看到北海湖畔的垂柳挂着一串串晶莹的冰块时，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描写北海之冬季树木形状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艰苦的生活并不能阻挡毛泽东的革命意志。俄国(十月)革命风暴使毛摒弃了议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渐进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等信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八年，他首次阅读了一些马克思著作。

“其中《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使我牢记于心，”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并且使我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当我认识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历史最正确的学说之后，我便永远站稳这个立场，没有丝毫的动摇。”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翌年，他组织起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之后，毛泽东的生活大部分也就是党的历史，直至一九二六年之前，他的领导权在国内尚未受到较大的注意。但若回顾历史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在湖南省组织农民协会的经验对革命的重大影响。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势力已达到长江流域。就在蒋介石夺取了南京之后，他便下令消灭一切有共产党影响力的队伍。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的工会领袖已夺回中国人管辖的那一部分(非外侨区)。四月上旬，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开抵上海，在他的支持下，上海的帮会匪徒进攻工会并把工会解除了武装。之外，蒋介石对工会开战，并彻底破坏了他们的城市群众组织。在农村，特别在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处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对历史研究者具有高度重要性。这篇报告及其他有关改变党的政策的提议在最关键的时刻，催促政治局不要吓怕了资产阶级。报告中的农民协会占了湖南人口的二分之一。他们

都是暴徒吗？毛列举了他们所作的“十四件大事”。这个报告明显地透露毛心中认为什么对中国来说是“好”，什么是“糟”，并且提出了有关土地革命目标，后来果然如此执行。毛的报告几乎集中一切火力，强调推翻地主阶级压迫是把农民自“封建主义”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的要素。

在诸般“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贫农终于实际上组织起来——可称奇迹——对抗“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其余的好事包括已粉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威风；清算他们经手的地方公款；要他们捐款救济贫民；要“最残暴”的压迫者戴“高帽子”游街；禁止高利贷，囤积粮食，投机倒把及滥收田租；接管地主武装；肃清盗匪（让会党加入农民协会！）；推翻封建的富管贫族权；要土豪劣绅缴交罚款，并且拉队到他们家里吃饭；蔑视迷信的习俗；推翻丈夫的男权；广泛宣传“三民主义”严禁赌博，吸鸦片，丰盛酒席，过度浪费的婚礼及丧葬仪式；积极支持群众性的扫盲运动；组织起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强迫地主“捐款”修道路，修塘坝等。

“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毛泽东在报告上提出。在实行中，农民们发觉“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毛还提出在他的家乡湘潭有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绅曾经“谋杀了五十多人”却“美其名曰‘杀匪’”。

以上就是毛泽东对农村中好和糟的看法。

在汉口事件后，党的路线继续依赖无产阶级与城市暴动。广州及南昌的武装起义相继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毛泽东曾批判

当时的书记陈独秀，因为他对农民协会，农民武装和分土地等问题发出犹疑和消极的指示。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五月会议上，陈把毛的报告搁置起来；在四个月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才能亲自宣读它。

反革命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国，并且对群众组织施行暴政，使该等组织急剧减少；湖南地区遭到特别残忍的暴力镇压，那里无数的农民领袖和知识分子遭到杀害。蒋介石独揽了大权，共产党被迫转为地下活动。

毛泽东的一九二七年的报告是他到湖南省湘潭等五县作了三十二天实地考察的结果。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旨在说服陈应看到全中国的农民即将“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宣布中国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在教条主义者眼中简直是异端之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毛在报告中指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他更指出：“这个贫农大众……乃是贫农协会的中坚，……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泽东现在和今后始终是他们拥护者。

党内的批评家（那些不耐烦听他解释的人）将农民协会称为“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这种错误见解后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至一九三二年，蒋介石与列强统治的租界已使城市成为即使最小型的共产党机构也不能立足之地。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逃到农村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恰是毛泽东与其他相信“贫

农阶级是先锋”的人所创建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陈独秀下台以后，毛泽东重返湖南。在那里，他展开了一个以农民运动为基础的政策——早在他被忽视的报告中阐明了。他将分散的农民协会集中起来——他们的领导已被国民党所摧毁——发动了第一次农村武装暴动，这就是著名的“秋收起义”。到九月，这支农民武装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团。除了在已经四分五裂的农会中招募的新兵以外，毛还在衡阳的工会中带来了些矿工，以及一些起来反抗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军队。

在贫农中的老朋友帮助下，毛泽东集合了一千人左右，向险要的井冈山进军，建立了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当朱德（本是国民党公安局长）带领着南昌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时，两支革命军队会师了。毛告诉我道：

“由于秋收起义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由于第一方面军曾受到严重的损失，而且由于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个行动注定非失败不可，于是，中央委员会断然将我排斥出来。政治局和党的前线委员会都解除了我的职位。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称我们是‘冒进行动’。虽然如此，我们坚决把军队集结在山冈山，我们深信我们正在执行着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我们走对了。与此同时，部队不断补充了新兵，第一团再次得到了扩充。……”

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的冬季，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期间及之后的行动最后赢得了赞许，毛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职位恢复了，但他的领导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得到承认。

长 征

自一九二八年起，农民战争迅猛发展。长江以北，其他游击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并且按照江西根据地的形式向前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北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国焘，他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并且同是在上海一同建立共产党的始创人之一。

有关毛泽东亲自讲述红军成长的故事，已在《西行漫记》中详尽地加以讲述了。简而言之，红军完全是自愿参军的，以巨大的政治觉悟为基础，而辅以官兵之间兄弟般的平等为建军原则——在中国内，这完全是新的观念。至一九三四年，长江南北的六个苏维埃政权共拥有九百万人口。最大的红区在江西省境内，并且已在瑞金组成了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但他当时还不是党的主席。

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工农联盟的组织上，主要角色则由共产党领导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掌握，争取着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它所采取的激烈政策包括完全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一无所有的农民，并且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改革项目”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贪污及不平等之纠正。有效的领导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高尚的品格和随时准备分担农民的艰苦。

“红军的群众工作逐渐得到改善，”毛泽东对我说。“纪律性加强了，一种新的组织技巧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期，军队中已“实行了三条最简单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

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此外，还有八项注意也列为应守的规条，并且编成歌曲，使部队能随时唱诵及牢记之，当时的八项注意如下：

一、上门板（中国农村的木门只是用木钉栓起来，易于卸下；放于木凳上便成临时床铺）。

二、捆铺草（铺草用以睡眠）。

三、说话和气及帮助人民。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注重卫生：建厕所要远离民居。

“红军还学会了三条主要的任务：一、誓死和敌人斗争到底；二、武装群众；三、募经费支持战争。……此外，撇开运动和政治基础而言，红军的策略也足以说明了军事发展的成功。”所有上述的基本纪律对中国士兵来说，都是创新之举——以往当兵的总是习惯轻视人民，被人民当作为不可避免的灾星（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红军很早便施行四句简单的战略性口号：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通常，当红军离开了这些策略时，便不能成功。

“我们的力量薄弱，”毛泽东解释说：“敌军人数往往比我们

大十多二十倍；我们的给养与作战物资有限得很，所以只有通过策略的灵活运用和游击战争技巧的结合，才有希望打胜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武器和军需品，这是红军唯一的“补给基地”。“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略就是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来进攻敌人，并迅速分而击之。这表示避免阵地战，并尽量争取在敌军行动时进攻他们、消灭他们。”在这些战略基础上，红军充分发挥了它的能动性及其近战的力量——即在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灭敌人。

自一九三〇年起，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大“围剿”。但其结果却只有进一步武装了他的“敌人”。一九三三年底，他动员了九十万大兵进攻红区，并分散了三十万最佳装备的部队对红军“围而歼之”。这次他眼看成功了——但由于毛的努力，以致后来还是功败垂成。在前四次“围剿”中，红军的攻防计划完全建立在游击战的优良战略与战术上。在第五次为期长达一年的“围剿”中，蒋采用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法；他听从以纳粹将军西克特为首的普鲁士顾问团的计划。这次他再没有盲目地闯进为他准备好的陷阱里，而是建筑起一连串的炮台，扩建公路，将“受感染”的人民驱往他方，建立更多的堡垒，逐渐将红军困于钳形的包围网中。

对蒋这种新战略，红军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不管朱德，毛泽东，和大多数有经验的本地军队领导的判断和意愿，掌握了党的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命令红军（约十八万人），与敌方展开了几场大规模的阵地战。他们过度重视城镇的得失。他们“失去了主动权”，并遭到严重的失败。

由于敌人的包围圈缩窄缩紧，加上蒋的疏散人口的策略动

摇了“人民根据地”，红军领袖终于作出了决定。在七年的战争之后，他们放弃了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将尚存的主力部队撤走（约九万人），只留下几千名“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断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将所有装备和补给品放在牲口背上，红军开始了战略上的大转移，凭着它——历史上的奇迹——红军最后“再次取得了主动”。

直到这个时期，毛泽东终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值得注意的是：领导怀有早日胜利希望的人与领导面对挫折困难的人（即如红军当年战败后所遇的）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事。当时红军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区（那里的人受到反动的宣传，害怕他们，不了解他们）；但生存却完全依靠人民；经常后有追兵；天天准备打仗；临时定计，策划，往往还要来回往返，以免被敌军纠缠；不能肯定何时再开伙爨或何时会筋疲力尽而倒下；这些战士的生命完全系于士气之上——以及对领导的信心。有不少的人被遗弃于后或倒于道旁。

包围圈的最弱一环是在西部，因贵州省的军阀不能阻挡红军主力部队的突破。

进入了饱受鸦片荼毒的贵州省后，红军很快攻占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并打下了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确立毛的领导权。他承担了拟定策略的最高责任。博古（原名秦邦宪，于一九四五年飞机失事中丧生）及其支持者作了让步，并承认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之中，包括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赞成并执行“左”倾路线的高级领导。现在，毛的战略（总的来说，就是占据农村，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被一致认为是正确的。

毛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起来，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成了党的文献。它和另两篇文件（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论持久战》）合成毛有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斗争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科学”的思想与理论的中心。

虽然（暂时）仍然存在着政治分歧，红军开始进行最大的历险（长征），这个经历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得比我们时代任何政治团体更紧密。前途上满布着不知名的危险，勘探，发现，人类勇气的试验，喜悦和忧愁，胜利和失败——数以千计的青年人（大多数只有十来二十岁）满怀热情和乐观，向西方地平线进发，开始了军事史上并无前例的长征。

毛泽东告诉我这个严峻的考验（他当然已安然度过了）叫做“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前进与撤退，从最东的福建到崎岖的藏东以至到达戈壁沙漠的边缘，这就是长征的全程。大概有一部分人走毕全个路程。准确的逐段路程计算的路线，显示第一方面军的主要路线长达六千英里——约为美国宽度的两倍。这个步行的远征跨越了一些世界上最险峻的途径，地球上最高的山脉的一部分，横渡了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长江）。

第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是横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当红军自贵州撤出后，便进入云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金沙江真是曲折急湍，两岸尽是几千英尺高的峭壁悬崖。几条仅有的小桥已尽为“政府”军所据，渡船亦已拖往北岸。蒋介石满心欢喜，一心以为胜券在握。他对红军展开四面包围，梦想把红军永远消灭于狭道里。深入云南后，红军在江上开始架设竹桥，吸引

敌人的注意力。同时，一支突击队却在晚上往原路急行军，在二十四小时内，赶了八十五英里的山路，并且不动声色地逮捕了驻守于一个渡口的敌军。他们穿上了敌俘的军服，说服对岸的敌人送来渡船。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横渡了金沙江，打下了炮楼，占取了一条重要通道，使整个部队不久便能继续西进。

跟着，红军又要渡过一条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河流：这就是四川西部的大渡河。就在这个地方，汉末“三国”的英雄遭到战败，太平天国最后的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及其部众被围歼。毛泽东与朱德对这两场战役均深有研究。他们明白英雄的败绩主因是时间的延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梦想，他们进入了傈僳族土人的禁区——那些从未开发过的森林地带。傈僳族人传统上憎恨汉人（因汉人曾压迫过他们），但这种人又分为白傈僳和黑傈僳两部。红军对黑傈僳人说，他们的敌人是白汉人（即白军）；他们红军则是傈僳人的朋友，并且为他们的自由而进行战争。为什么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呢？一个熟悉土话的红军领袖技巧地和该族土人展开谈判，最后成功地签订了条约，全军安全地通过蒋介石认为是不能飞越的地区。

红军敢死队的英雄们，在飞夺大渡河上最后一条桥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本身已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倘使他们失败的话，红军队伍就会被迫进入地势高峻的西藏，那么全军都免不了要冻死于雪中。但在几位勇士英勇献身之后，他们成功了。渡过大渡河，前面是四川西部的大雪山中一个高一万六千英尺的隘口，翻过之后，又是重重山岭。红军一往无前，往上爬！“只是在保东冈顶，”毛泽东说：“有一个部队失掉了三分之二的运输牲口。数以百计的畜牲一掉在地上，便永远爬不起来。”数以

百计的长征战士，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七月份，红军部队终于来到富饶的茂汶姜地区，并开始向松潘进发。这里，他们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军会师，这支军队自长江中游的江北红区远征抵此。他们退却的路线上阻力较小，故队伍的数目反而有了扩大——当时估计约有十万人。由于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与分裂主义几乎使整个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都向我描述这场尖锐的斗争为党的整个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刻。

这个危机被两个客观因素消弭于无形之中。其一是因蒋介石于四川迅速布置重兵，并自北向南推进，威胁插进两个红军队伍之中。其二，四川省内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水位突然暴涨，在地理上将两股队伍分割开来。张的队伍被隔于河的南岸。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江西红军的主力部队继续北上。重上征途的部队只有三万人。

红军开始进入了好战部族聚居的荒芜地带，并屡屡受到他们的攻击；出入于浓密的日月无光的和瘴气弥漫的森林中；横过了一个又一个无边的沼泽地带，那里很多同志们无声无息地下沉、消失；深入无数深邃、狭窄的隘口，那里时常受到满怀敌意的少数民族所袭击——他们不受“共产党的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政策”所影响——但是，红军以坚强的意志，向前进！毛泽东说在几个星期内，“一头羊的代价要换取一个同志的生命。”

到九月，他们已深入了大草地；十日之内不见人迹。在这个高原沼泽地区内，滂沱大雨，连绵不断，到处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只有高地的当地人才知道草地上迷宫似的落脚点，红军只得请他们来带路。更多的牲口失去了，人，亦遇上同样

的命运。很多人畜沉没在不可思议的湿草地之下，惨遭流沙灭顶。草地上连一块可生火的干木也踪影全无。粮食已尽，唯一可吃的只是一些野生植物和菌类。稍可遮身的树木也无法可寻；晚上，人们只能挤在缚在一块儿的矮树丛下。但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找到可供饮用的食水。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红军终于到达甘肃平原，但他们的人数只剩下七千人。然而，在红军能进入肥沃的黄河盆地之前，前面还有几场激烈的战争等待着他们。稍事歇息之后，他们便击破了回族骑兵的薄弱的封锁线，并从而得到了休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他们终于和陕北地方红军胜利会师。

在整个长征的三百六十八日中，他们日间行军共二百三十五天，夜间行军共十八天。官方的军事报告显示了在长征途上，他们平均每天一小战，每半月一大战。除了在松潘地区的较长时间停留之外(共五十六天)，他们总共才休息了四十四天，而长征路程却达六千英里——即每行军一百一十四英里才得一次歇息。每天行军的路程约为二十四英里。

总计他们翻越了十八条山脉，其中五座终年积雪，并且一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他们行经了十二省，每个省都比欧洲大部分国家还要大。他们击破了十省军阀布下的包围网。他们避过、智取和打败了逾三十万国民党军队。他们进出了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且穿过了中国军队多年未有到过的地带。

我们可以拒绝接纳甚或藐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信仰，但却不能不承认(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以寡敌众，以人力战胜自然的伟大胜利之一)。虽然红军毫无疑问是被

迫退却的，但是，凭着他们空前坚强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理想和意愿，这批顽强的老战士达到了他们计划的目标。他们宣布并且确信他们正在进行领导一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救国战争——对全体士卒而言，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因素。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一支本来可能士气消沉的溃散队伍，转化过来而踏上胜利之途。历史已经证明毛将红军转移到战略性的西北这一行动，是无比正确的。他老早就看出这个地区在决定中国、日本和苏联的直接命运中，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延安，当毛把他目击的详情向我讲述完毕之时（这次严峻考验的经历，对他来说仍然历历在目），朱德将军和张国焘（当时在西藏边缘受着严冬的折磨）在西面带着他们余下来的军队刚刚越过大草地，即将到此和“贫农先锋”再度会合，后来并真正实现。想着这件愉快的事情时，毛抄下了一首诗赠给我，在他的英语秘书吴亮平的帮助下，我把它意译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今天，我看到在北京新开放的革命博物馆内，特辟了整整

的一层楼来宣传这些业绩。现在看来，这些奇迹就象是东方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一样。每隔十五分钟，展览场内一幅巨大的地图便亮灯显示当年英雄的长征每一段的路线。一个扎了马尾装的女讲解员为年轻的观众或眼界广阔的外国游客重述当年的故事。

实 力 人 物

毛泽东幼年时代对现状的不满集中地表现在对专横及愚昧的合理抗议上，但我们只是从他的讲述中得以知晓。有关他的后期活动却有较多的资料。一句话，若想把毛成年时代的活动和著作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史实分割开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一个民族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剥削、欺骗、鸦片荼毒、掠夺，侵占和瓜分，而其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将他们与容许这种侮辱存在的衰弱社会赶出门外，难道是患了神经错乱症吗？如非这样做，会不会被称为精神分裂呢？

毛泽东在他的事业中奉行非改良主义，但毛却要求其国家进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他永不会将他的软底鞋拍在桌上以引人注目，如赫鲁晓夫以苏联皮靴在联合国大会上击台一样，但他当然不会完全不露锋芒以影响其他实力人物。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最低限度也会反映国人及外界的舆论。

毛泽东的能力在于能分析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普遍经验——而不只是他本人的经验——加上对自己总结这些经验的正确性具有信心，这是他和那些后来成为他的追随者的爱国分子的分界。

毛泽东的立场既非中立，亦非被动，他更绝未有赞成侵占外国的纪录。他的概念认为革命战争主要是抵抗侵略的行动。当人民受到武装的压迫者征服时，他们自然会以暴力反抗。在以“斗争”的方式“解放”了中国之后，毛将世界看成为两个阵营，但他认为在更多斗争之后，公平和真理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战争的烽火继续到处燃烧；他们以帝国主义战争来威吓人类，而此种战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将它防备于无形或击溃之——毛这样看。由于他生活于饱受外来侵略与不停的内战蹂躏的土地，况且他本人更是反革命暴力的准受害者，生活的经历使他合理地认为所有革命的行动都是“和平的冲锋号”。

“战争——”他在日本侵华时写道：“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他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几个年代以来，西方在亚洲所占的优势并没有带来和平，而只是侵略。毛泽东为他的国人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摆明，直到中国学会有效地运用现代化武器之后，西方才开始尊敬她，“害怕”她。所以，中国不可能首先放下枪杆子。

对那些预料中国会发动侵略战争征服别国，以致自取灭亡

的西方观察家，毛泽东将他们喻之为伪君子或傻瓜。“不久之后，”他说道：“这些先生们要打开地图看看。那时，他们将会注意到中国并没有侵占任何的西方领土。也没有用军事基地去包围西方国家，而且事实刚好相反。”

对一个真心实意相信革命是“和平的冲锋号”的人来说——这个人还真正看到革命给中国带来内部和平——他对战争及其动机这个问题的看法，肯定会不同于那些相信反革命是“和平的冲锋号”者。不论毛泽东的政策在这个无限复杂的世界里取得哪些实效，在我心目中，我绝不怀疑他是希望避免战争而恐其不能者。毛的神智清醒得很哩！任何曾和他作过几小时会谈的人都可以看出：毛，这个年迈的战士，深知自己不可能长生不死，并且将来便要弃下这座未完的大厦而去，而他只是为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石而已。他以为这个创举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他相信它会永存于世界上。即使没有核子战争的灾祸，这件艰巨的工作也需要多年才能完成。五十年吗？一百年吗？他问道：在一个国家的生命里——特别是在中国的生命里，这又算得什么呢？

事实表明，毛泽东比现世中任何一国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但他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先进的国家近两百年来的锐变，这种改革中国今天才开始进行。同样地，那些肚满肠肥的美国议员始终不能理解，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那些饱受饥饿的一无所有的大多数人，决不能等足二百年才让他们的孩子得到饱食和教育。

那么，毛泽东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吗？“教条比牛粪更没用，”他说。他强调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

分析的重要性。毛在《矛盾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西方评论家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坚持着极端教条的地位，更无其他逻辑可动它分毫。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一旦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全部党员都要一致服从，故此表面上看起来就象缺乏个人思想与志愿。但路线却是要跟随着新旧情况，不停审核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子说明在很多的问题上，策略、或至战略都有改变或取消的可能——时常伴随而来的是“整党运动”和清除一些不能跟上形势的“反党”分子。毛泽东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要转化的。虽然在修改观点以适应较小的改变时，他们行动得比那些缺乏基础的，偏重临时利益与实效主义者的政客较慢，他们却可以进行突然的、戏剧性的政治改动。他们可能完全摒弃一条已废掉的路线，使一部分为着本身利益而不了解其暂时性质的党外同情者处于无限的尴尬中。然而，对那些经验丰富的党员来说，接受一条新路线——可能会与旧路线对立的——完全不是一回怎么样的大事，他们对党的忠诚使他们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树立起这条新路线，和执行旧路线时一样热情和服从。

在过去几年中，基于世界形势的转变，世界共产党人曾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这个题目进行了新的估价——这是列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被指责为落后的教条主义者。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中国累积的经验给

予他的观点逻辑性的支持，这是那些居住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外国批评家谴责毛泽东对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受涂炭的核子战争无动于衷。据说毛认为他的“蓝蚁”(指穿上蓝色工作服的中国人)足可应付战争的消耗。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在毛的政权领导下，他们实施了大规模有系统的努力去保存和延长人民的生命，并且教育人民为有建设性的工作而努力奋斗。

个别的人说毛泽东顽固、急躁、利己和残暴。但是说这般话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是那一小撮所谓“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人”。外国人称毛的虚荣心较诸斯大林更重。但让我们重视历史，当赫鲁晓夫为取悦斯大林而为他跳舞的时候（根据他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找寻新河流为他的领导人命名的时候，毛泽东却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禁止以他及其他在生领袖的名字去命名省份，大城市以至小镇，并且禁止为他的生日搞庆祝活动。

“没有人能不犯错误地进行统治，”圣西门说，遑论那些为争取时间而斗争的人们了。在革命斗争里，杀人的数量是和反革命的强度成正比的，在中国来说，那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蒋介石当权的二十二年中，无数的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人被屠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杀害了五分之四的共产党员。在同一意义上说，毛泽东对反革命的镇压却不会比蒋来得缓和。在革命中，毛准许对首恶者执行必要的处决。虽然如此，从他反复地劝戒人们要经公平审判才开杀戒，以及经常强调“杀人越少越好”的指示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虐待狂或嗜杀狂

的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五年前在他和暴动农民相遇时，毛泽东就发觉这一点：“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刽子手。他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领导，以及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在“百花齐放”时期，显示了毛是有敌人的，但他是唯一敢将报刊及论坛公开给民众反映意见的共产党领袖。

人们对毛泽东这种英雄的崇拜表达了一种民族自尊心，就象英国人当年将维多利亚女王奉为偶像一样，那时不列颠帝国主宰着整个白人世界。在中国，没有一个公共建筑物，公社，工厂，妇女宿舍落成而不竖立起毛庄严的塑像或半身石膏像。在接待室中，这类塑像与绿色的台布和茶杯碟一样，是不可缺少之物。在四川，我甚至看到一个用漆皮制成的，巨型的毛的全身像，髹上赤铜色，由于全身的重量实在很轻，在需要时，连一个女学生也可轻易地将它移至另一处。

毛泽东是他自己的政策最佳的宣传员，因为他实行了“以身作则”。看看这段寓意深长的文章：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

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已了解那些将会使他夺得权力的明显的却被人遗忘了的事实：（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贫苦的文盲；（二）中国最大的创造力的泉源埋藏于这个大多数中；（三）能成功地赢得了它的信心并且能有效地组织它的人，将取得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四）在这股强大的劳动力量中，蕴藏着使中国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所必需的“资本”。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相反，毛泽东不但没有将他们国家这个巨大、无知识与及繁殖迅速的人口看成是一种负担，反而把他们这种“经济贫穷”和“文化空白”的情况看成是中国最大的资产。他说，由于人民是这样极度贫困，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坏的情况了；故此，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能为他们作出最轻微的改善，便可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赢得他们的忠心。由于他们如此“文化空白”，他们就象一张新净的纸一样。任何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作出努力的人，将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鲜明，清新和历久不灭的印象。

“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毛时常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他和从前的中国领袖(孙中山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主要区分于：他并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权力，所以才去利用农民阶级，然后把他们扔于污泥之中。这位曾任教师的领导人提出，要结束在农民生活中因无知识及无意志而引起的悲剧和愚昧，给予农民高等教育，并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提供了途径。

先说服农民坚持斗争，取得耕者有其田的成果，然后再将这种认识进一步转化为积极参加主宰他们命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这是毛及其追随者认为最不可轻视的工作，其结果现在则受到考验。

毛泽东的家

在中国，每一个学生都熟知毛本身历史中的大事。但今天普遍的年轻人对他过去及现在的私生活，却不如老一辈那样清楚。毛从来也未曾写过自传，除了他曾对我讲述过他的生平事迹之外。我在书中透露的许多情况，已不在中文书中看到了。在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甚少人知道他的行踪。报章上也往往长时间没有提及他的行动。凡此种种，都成了外国外交家胡乱推测的题目，有时候，这些人便放出“病重”的谣言，以促使他再次露面。但是，这个曾步行了二万英里横过中国的人，是仍然喜欢到处活动的。

在我第一次进入皇城拜访毛那一天，我们自新华门入城，那里我只看到两个卫兵在值班。新门之东就是宏伟的天安门，坐落于宽阔繁盛的通衢——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那一边就

是以大理石柱支撑起来的人民大会堂。毛常常带着几个便衣人员，从家里步行到大会堂去。进入皇城之后，一条柳荫婆娑的马路绕过宫殿外的人工湖，经过一丛丛的剑花和菊花，直到那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之前，沿途再也看不到任何卫兵。这座房子是宫殿里的建筑物群之一，这些宫殿以前先后被清朝贵族及国民党官员所占据。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也住上类似的房子，彼此间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主殿的大宫室和厅堂，现在成为博物馆或游戏场所，在北海的一角还建起了一座模范托儿所。

毛泽东的家庭包括了他的夫人——江青，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毛岸青，是前妻杨开慧所生（杨开慧，一九三〇年为反动派所杀，“罪名”是共产党员）。毛还有另一个儿子，岸英（杨开慧所生），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他仅存的儿子岸青，据说是一个工程师。

毛泽东的客厅宽敞舒适，家具全部是中式的，装饰得很别致。客厅旁是一个小饭厅，他的书房和几个睡房。他奉客和自用的饭餐，属于湖南式烹饪的家常便饭。为了庆祝我们的会面，他和我对饮了少许贵州出产的烈酒“茅台”。他还拿出中国红酒奉客，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数量不限。

毛泽东的体重较前大有增长；食量中等，吸烟数量却较前减少了。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人，时常被报道“猝然去世”；但他“经常保持现状”——他这样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患过严重的疾病。他穿着一套企领的黑灰色便装。自孙中山提倡以后，这种服装已成了一种官式制服。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已经

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双绵布袜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

我认为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不是象台湾抨击家所描述的那样奢侈。他的所谓舒适，充其量不过等于一个成功的长岛保险人，在牧场有凉台的平房中的享受一样。不错，毛泽东曾经有过很多秘书，但那是在延安窑洞时代的事情了。公园对面就是清朝皇帝的宫殿，其光辉确实远远盖过白宫，但这些现在都已成为“人民的宫殿”。政治局委员对个人的所得绝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可以随时应用汽车和飞机，并且可以在可宴请五千名宾客的大会堂里招待国宾。那里，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常被邀往参加丰盛的宴会。

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在简陋的房子居住过，吃过最简单的军队伙食，而且时间都在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他们确实捱过不少苦楚。但在目前，他们仍然一同生活，每天仍然工作十二至十五小时，并且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他们的夫人只是穿着平凡而不昂贵的衣服，并没有象当年旧中国的统治家族那样拥有副业的银行或生意。他们没有利用公共基金进行私人的投机生意，或操纵黑市的市场。但他们人人都拥有实权，并且喜爱在毛的领导下。

毛泽东现在已不能再骑马或作长途的步行。他以游泳进行身体锻炼。这是南海和其他内城湖泊现在以淡水灌入的部分原因，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西山的昆明湖现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游泳场所。游泳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各城市，学校和公社之所以大举兴建优良的游泳池，其原因也部分由于此点。一九五七年，毛宣布他准备于武汉横渡长江，这使整个政治局大吃一惊。国务院甚至派总理出面劝他撤消这个想法；长江上

到处是危险的暗流；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呀。

出发地点旁竖起了一句毛的号召“敢想敢干”。一个青年的游泳冠军请缨先试，并成功地横渡了长江；跟着一个女孩子也成功登陆对岸。毛泽东在他们之后下水，他用“游击战的方法”使整个游泳变得非常容易；他随着水流而游，在水中作Z字形前进。刹那间，江上塞满了游泳的人们。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泳的人数极为踊跃，外间又传起中国准备攻打台湾的谣言。毛对一个客人保证说那个报道太夸大了；中国决不会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的。

毛泽东经常说渴望到美国一游。在保安，他告诉我说很想亲自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这次我见着他时，毛说希望能在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他认为华盛顿不可能同意他到波达麦河，但大概会乐于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去游泳。“在河口而已，”他附加一句，那里有五十英里宽呢。

蒋介石常常都是一个极度紧张、吝啬的小人。毛却仍然很潇洒，行动也很从容不迫，敏于分析说话中微细的差别，眼睛充满智慧。他笑起来会令你受感染，而且对别人的俏皮话也衷心的表示赞赏。他还有开朗的性格。

作为一个解释历史并且负起改造历史的重任的领袖——事事要从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利害出发——真是不简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对我表示，他感到“真正自由”的一刻是当他“站在高山之巅上”。毛泽东在六十四高龄第一次横渡长江后，写下了一首词，表面看来就象一个如尼赫鲁般渴望“和平”的逃避现实者。词中云：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馥。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句中的“子”是指孔子。论语中说孔子望着滔滔江水，有感而发。全文如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明乎此，再深入玩味毛这一首词，则可发现本词与毛泽东其他的诗词一样，都有政治上的含义，而非思想上的退却。即使“风吹浪打”，毛发现他本人正处于基本变革的宏图之中；由于他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完全“宽馥”与自由的。

毛泽东往往喜欢自己作采访记者，要亲眼见到事物的发展过程。目前，他平均每年只有四个月在北京，而且随意在中国境内旅游——即使尚未能到美国去。他按时到大城市去视察，与各省党的领导人甚至低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突然到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里去，并说他曾视察过一些劳动改造农场。他往往出其不意的现身于本地农场或工厂，和农民们促膝谈心，并亲尝他们的食物。在我和他的谈话中，显示了他对每个成年人和孩子所吸取得的卡路里（热量）也了如指掌；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那一段时间中，他清楚地知道人们的食物和正常时期差了多少。

毛泽东很多次长时间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是为了独自进行学习和研究。有时他甚至会花上整个星期阅读书籍，这是他青年

时代所养成的习惯。当他上中学时，他曾中途离校，因为“它的校规诚堪反对”，他花了半年时光，“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他对我说：“每天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便进去。午间，我只暂停片刻到外头买两个炒米饼吃。……那里，我首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研究它。我曾读过亚当·史密斯的《国家的财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本有关伦理学的著作。我还阅读过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学》，以及一本由孟德斯鸠写的有关法律的著作。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较早时，他还“被尧、舜、秦始皇和汉武帝等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事迹所吸引”。

通过阅读翻译著作，毛对西方文学的知识比任何其他西方统治者对中国文学的知识要高得多。他也没有将他的学习局限于政治知识方面。他对玛格丽特·高捷(法国女作家)著作里的角色金美花夫人(法国古代美人)性格的讽刺，最近曾使一个法国访客大表诧异。

毛泽东以前从未离开过中国，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〇年初，才首次离国，到苏联和东欧访问。他从未到过任何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即使近如印度和日本也未去过。到一九六二年，政治局中只有董必武等二人见过“新世界”……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叫做“垄断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而言，美国的大银行和大资本集团经常被举作经典范例。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帝国主义必然竭尽全力，用尽手段，谋求支配世界，而传统的殖

民地制度只不过是其中一法而已。列宁主义者认为，那些操纵帝国主义政府的财团，通过压迫、剥削、奴役及在国内外盘剥重利地抽税，所取得的效果比采用直接军事或殖民力量来得更大。

对毛泽东来说，美国力量在台湾既符合了旧式殖民主义的定义，也是不折不扣的新帝国主义侵略。

本章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却不能不提出以下的事实：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袖对美国都存有一个直接而消极的印象——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和驻中国美军打交道的经验中。在日本侵华时期，美国运用它的影响力，（表面上）阻止蒋介石发动新内战；但当其时，共产党领导着抵抗日本人的敌后战，而美国政府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一支枪，一粒子弹，甚至一条绷带；全部美国装备都是赠给蒋介石，蒋却用来封锁和袭击共产党的后方基地。美国在内战中对蒋的慷慨援助，她最后和蒋介石在台湾所缔结的联盟，严重阻碍中国国际贸易的禁运，领导仆从国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保持东亚的美军基地等等因素，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巨大的爱国性的反感。

目前介绍给广大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既可以说是复杂，也可以说是简单。它之所以为复杂的原因，在于它要求有政治认识的中国人学习用辩证法来想问题，来理解毛主席的意思。它之所以为简单的原因，在于毛的著作中运用了针对实际的论述，本土的警句和绰号，以民间故事作讽刺——如以纸老虎喻帝国主义，以及其他人所共知的常见例子。人人都要学习他的教导的真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毛这样说：“就等于没有灵魂。”

对任何一个在中国街道上的人来说，接受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他是跟着党领导的光明和进步的力量走，证明他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革命阶级的利益这个高尚的目的而生活。对于代表黑暗势力的敌人，他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毛这样解释说：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这段文章写于一九五二年，五年后，毛在一篇重要的政策报告中自己加以引述（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和“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仍然继续展开，“专政方法”也如是。这个矛盾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以研究；另外，在我印象中，毛对外界的观点以及什么才是他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也将会进一步探索。

第三篇 社会主义建设

钢 的 十 年

在新中国，集体生活是一切改革和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旧的力量与新的力量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相互结合，常常产生前所未见的事物。去年的贫民区明年可能成为一座新学校，或成为中有花园，四周环以砖建平房的住宅区。天气则未能驯服，洪水、天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在短短的一季之内，可能会使一个兴旺的公社最低限度会遭受暂时的挫折。你首次参观一个生产队时，会发觉它全无现代化机械，但五个月后，可能已有电力供应和拖拉机了。食物，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变化很大。以一个地区的几个例子为基础所得的“好”与“坏”的总结，很可能不适于其他地区。

加速建设的战役，除了因要“巩固”时稍降速度以

外，根本没有停止。昨天的错误迅速更正，为了更好地解决明天的新问题。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要经常进行整顿，自我批评，接受再教育和再学习运动。除了马克思主义——不可改变的“历史法则”——之外，任何事情都要修正。但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和所有有生气的道理一样，是按照它本身的历史而发展出来的。

中国并不单纯是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它正以惊人的速度来追上历史的车轮，希望(不但在人口方面)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国家，这对那些认识过去消极的中国(那时时间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的人们来说，确实是惊人的。在赢得权力之前，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地连续进行了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战斗和斗争的情况也就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由于共产党人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以绝少数击溃大多数才取得，这些老战士自然会认为全国都应该走同样的道路——辅以高度纪律，忠诚，加上坚毅不拔的精神，并且将未来的壮丽事业作为奋斗的最终目标。群众方面的想法可能没有这么“自然”。但这是钢铁战士所领导的钢铁年代，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战争”，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一切的障碍都肯定会被扫除。由于这些领导多出身自农民，并且深信他们所作的一切事业都是为人民大众利益的，因此，他们可能会比旧统治阶级对人民提出支付更高干劲的要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日本和德国所受的损失，大概和中国相若，但当这些国家(工艺上远较中国为先进)恢复元气时，中国还经历了三年严重的内战，直至一九四九年才开始

复兴。在印度方面而言，它欠下英国的国债，实际上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笔勾销了，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受损。德国和日本也从美国方面收到数十亿的战后援助，苏联最低限度也可以从德国，东欧，和中国东北收集了赔偿费。人民中国却要从一穷二白的基础开始，从一个全面崩溃的金融开始（蒋介石逃走时连最后一点的黄金储备也拿走了）。

当时，中国只有一万二千英里铁路，四万八千英里可资利用的公路，兼且情况紊乱，急需重建。牲口群和载重畜群的数量大减，运河和灌溉工程陷于无用之境。一九三六年比较，与产量最高的工业产品减产五成六，农业出品要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一九三六年的产量也是虚报的）。与此同时，人口数字却以千万计增加，总数约为五亿五千万。即使“理想的”一九三六年的最高产量能在一九四九年收获，而以一九四九年的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只得钢三点三磅（比较：美国每人约一千一百三十磅，日本人一百一十磅，印度十一磅），铁六点六磅，十分之一吨煤，十度电和八尺棉布。化学肥料的产量平均每人每年不到一磅，糖每人少于一又二分之一磅。

在中国，生活上最主要的难题一直都是人口和粮食供应两方面的不平衡。虽然有无数勤劳聪敏的农民展开了大规模的人力耕作，中国过去的小麦产量从未能达到每英亩三点五公担，而英国的小麦亩产则是八点五公担，丹麦达十三点二公担，上述数字是J. 洛辛·伯克研究所得。还有，在中国要养活一头拉车的牲口每天要花三十四分，但要雇用一劳动力却只需二十四分。自十九世纪以来，即使按人口平均分配，中国的农产罕能养活她的整个人口。中国已输入粮食五十年了，饥荒已是

司空见惯，从前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是因营养不良和缺食而致死亡。

革命前，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二十三万英亩；在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平均超出一千三百人。在农村人口中，平均每人所得的耕地面积远远不足一英亩。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指出每人平均有零点五英亩（见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北京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六〇年，美国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是三亿一千一百万英亩，即平均每个农民的耕地面积为同年每个中国农民耕地面积的六十二倍，该年度中国的耕地总面积仍然只有二亿七千万英亩左右。以这一年度计算，美国若有四百六十万户农家和五百万真正的农庄雇工，便有能力生产远远超过整国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而休耕地面积竟较实际利用的耕地面积更大。

一九四九年之前，处于原始状态的中国农村经济既无国家管理或支持，而这种“豆腐块”状的农田耕作更谈不上有使可资利用的资源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前景。重新分配土地是为了展开革命而动员农民斗争的一种手段，将土地分成小块农田，分给破产的农民，只能起着巩固政治局面的作用，为创造和利用一切新的手段来解决粮荒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需要真正实行的是：一方面将小块农田合成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工厂——农场”，一方面进行上文提过的几项有效的方法：大量增加肥田料，大力发展灌溉工程、河流管制和电力供产，建筑新路和扩大交通以开发新土地，并进行合理分配，选择良种，准备深犁和深耕的工具，最后并将设备机械化。中国的确很穷，她不能幻想大量输入这些工具。不但如此，她需要设法自己动手来

制造。但水利、电力厂、铁路、桥梁、货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厂等等都急需机器，并要机器来制造其他机器。统而言之，就是需要钢和铁。一九四九年，中国全年钢产十五万八千吨，占世界第二十六位。

中国要建设基础工业，而且要迅速进行：这里面包括钢铁厂、机械制造厂、各种类型的电力设备、煤矿、电力资源、石油、化工、交通及运输等工业。与此同时，付出劳力来创造这一切的人民不用说也要有粮食、衣着、住屋、教育，并要说服他们这种努力是有价值，而且如果中国和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孩子需要争取生存的话，是不能避免的，更何论还有争取现代化生活水平这个目标了。

革命的方针使中国脱离了美国资本及各种外国的投资与援助。共产党人与旧中国领导比较起来，其新的一面就是他们强调自力更生。西方观察家一向认为造成中国贫穷的主因是：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了；但共产党人却在这方面看到了他们创造新财富的最大动力：十多亿劳动的巨手。他们的任务是使这些手参加劳动，通过劳动创造资金，并积极开发那些不毛之地，开发蕴藏在祖国大地下罕有发掘过的天然资源。

长久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为首的外国经济家曾不断争论：究竟中国境内有没有足够的天然资源以供应重工业的发展？然而，在一九六〇年，美国地质调查报告不得不承认：中国，“在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地质学家的努力之下，展现了广阔的前景”……“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天然资源主要蕴藏库之一”，她有“巨量的煤……在中国中部的山西地区藏有七十亿吨铁矿”，在河南则有三十亿吨“含铁量百分之五十的氧化铁矿”。据报道，中

国还藏有极其丰富的钼，“蕴藏量为世界之冠”。

另外根据一九六〇年三月 美国内政 部煤矿局一个名为“丰富矿源推动共产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报告称：“(中国)资源的广袤程度，以往大部分未曾探知。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展开了广泛的地质测量，加上几年来在积极的矿物开发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知识，证明了这个国家是有足够的各类矿物的基地，支持她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强国。”报告续称：

“看起来，在大多数矿物来说，中国目前和将来都决不会止于自给自足这个地步。她的煤和铁的基地十分雄厚；铁矿已证实比前想象的更广。……(目前)，石油尚未够用，但近年来广泛的探测显示这个国家这方面在五年到十年期间内，将会取得杰出的成就。”除了发现中国在煤、焦煤、铁矿、钼、锡、铋、水银、萤石、石墨、磁铁矿和一些不甚重要的金属方面，居“世界一流地位”，以及在铜、铝、铅、锌、金和银、化学和肥料物质方面拥有“重要的”藏量之外，煤矿局的报告书还指出中国蕴藏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钨和铌。“在共产党的政权领导之下，在工业上取得了进步。在这十年之内，该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已逐渐转化成一个工业渐趋发达的经济。”

综观上文所述，中国不足的不是“资源基础”而是“资金基础”(这个时期)。中国除了有人力加上资源之外，还有另一种特别的资产——倘非如此，这个政权本应会受到巨大的障碍。苏联在有关资金方面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但初期(直至一九六〇年)，中国能充分利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强国有关建设一个有计划的工业国，管理一个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技巧。中国要在出口方面等值地偿还她所收到的一切机械和技术援

助，但却可以自由地吸取苏联在科学和工业上的知识，特有的方法，蓝图和样本，使她节省了几年的尝试和失败，使她节省了不可估量的时间和金钱。我将在下文进一步说明：在那一年中，粮食问题所遇到的特大自然灾害，工业需求与农业生产方面的不平衡现象，苏联技术援助的撤退，援助合约的突然撕毁这几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形势使中国共产党对它自己“最雄厚本钱”的创造力的信心，遭遇到最严峻的考验——这个“本钱”当然就是指中国人民，中国第一个钢铁的十年里的真正英雄！

数 字 问 题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人民政府碰到两个问题：国际上，她与重要的盟国发生思想上的辩论；国内，她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及与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作斗争。

一九五八年，北京宣布由于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结果，中国取得了空前的收成，这个宣布震惊了全世界。一九六二年，北京政权的敌人却欢喜若狂，认为这两种努力皆是巨大的失败，并已成泡影，同时认为中国已陷于大饥荒之中，面临着全面的崩溃！这种有关中国覆亡的报告是吹牛皮。

一九五九年开始，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连续几年较低的农业收成，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而言，农业的歉收造成了经济倒退。即使天气良好，也要几年时间来克服缺粮现象。非到那时，不可能期望展开大型的新的工业攻势。

一九五八年以前，外国已广泛地存在着有关中国统计数字内容的辩论著作。对于那些热衷于弄清那个世界的真相的人

来说，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无趣味的答案。若跟着辩论来转，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都会被吸引过去，而所得的结论却不外是对消耗、混乱、丑化和嘲笑几个问题特别加以注意而已。

然而，在所有音响与风暴底下，确确实实的惊人发展却是存在的！那些真真正正到过中国旅行的人，很容易接受中国的统计数字是工业进展的主流，这些都是基于亲眼目睹的无数事实，是那些无此方便的人们较难了解的。不可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如新工业、科学、居住环境、水力控制、农业器械、以及交通等等，都对我影响很大。我还目睹人民在健康、衣着、教育、儿童护理等几方面的改善。还有其他方面的种种进步，都不是未曾身历其境的我国人民，甚至大多数海外华人所能相信的，比我本人预期发见的也大得多。

（中国人）是有理由感到乐观的：一九五八年必然是工业上昌盛的一年，因为由苏联物资与技术援助建成的一百五十六个巨型工业计划，特别在冶金工业方面，已首次开始投入了生产。几年来进行的辅助工业、灌溉和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工程，加上异军突出的主要重工业，已为夺取高产作好了准备。尤其是去年全国的天气很好。同年，大跃进的口号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创办，起着巨大的心理推动作用。整个党、以及大部分人民都卷进群众性的热潮中去。

一九六〇年后期，计划机关重新修订计划，恢复不足够的农业生产与调整工业、贸易、商业和人民消耗飞速增进的需求之间的正常关系。“农业是经济的基础”成为全国性的口号，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工人到农村支援生产。

十年来，中国培训了一批统计和计算人才，而一个有计划

的经济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准确。国家统计局是一个巨大的全国性机构，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同在一座办公大楼），两者对履行一个巨大的、不一律的、摸索着的、复杂的和“跃进的”经济负起了极大的责任。这些组织内的工作人员，包括有一些受过高等训练的专家，运用十分现代化的工具来进行工作。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间的工业跃进是无比真实的，进展十分可观。一九五六年的农产也是丰收的。要了解中国经济成功和遭遇到严重问题，有需要回顾她自一九四九年来所经历过的道路。

有关跃进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中国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如若缓慢地重复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即将私人产业累积成为现代化文明的资本基础这个历史，中国将无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曾经计划用国家资本主义制来发展中国；当时国家拥有众多的公共事业和交通。不论外国的“自由”援助也好，抑或公然的殖民主义也好，都不能满足地给中国提供她所需求的投资额，该数目到一九六〇年已增至每年一百亿到一百四十亿美元，并且仍然未足以维持平衡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久已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它的领导人深信，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使生产率超越人口发展率，可以使人民迅速地从落后和贫穷提升到繁荣兴旺，经济独立和

具有力量。当该党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中国领导权后，马上实现这样一个计划。

党的领导人预算自一九五二年起，需要实行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一切努力和资源的引导以发展重工业，并为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下基础。”

到一九六七年，国家应可以制造应付无限发展的将来所需要的一切。这样一个目标不可避免地要集中于基本的生产手段，并集中生产能造其他机械和农具的机器，集中于科学和现代化生活水平。要成功地实现工业化这个宏伟的计划，整个国家在近“两个十年”的期间内要厉行节约。看来，大约要十五年——或者说是革命后要十八年——人民才可以开始享受这个巨大努力的果实。

中国的经济发展于是可以分为这些阶段：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复元期”；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一九六二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当中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运动。在第一阶段中，战争的损失得以重新弥补；国家的财政崩溃与通货膨胀克服过来；土地改革得以完成，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群众基地；国家企业重新投入生产；同时，对私人银行和生意建立了控制。（在这个期间），中国还参与朝鲜战争，这个行动加速了经济国家化，并且带来了苏联的一些特别军事援助。一九五三年起，政府便采取了一个有充分计划的经济措施。到一九五七年，基本的目标据报道已经完成。农业大部分集体化了，其余的商业与贸易都已收归国有或公私合营。在第三阶段，即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一九五七——一九六二年，大跃进的推动力使主要的工

业生产目标在一九六〇年便可以完成——即比计划时间缩短了两年——但结果尚未能完成估量出来。

整个计划的雄心可以从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看得到。国家投资代表了利润或储备——这种资金是由管理当局将超时工作的等值现金聚积而成的，而农场和工业部门上的工人的薪金，或购买力，和它们在消费品上的等值也是其存在的形式之一。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之间，中国在新建设的投资额约为一百九十亿美元。换句话说，在每百元国家收入中，有二十三元被用作上述投资。到一九五八年，投资额达每百元三十元。若美国用同样的百分率作新建设的投资，每年几达一千五百亿美元。北京希望在十年内，每年都能将收入额（该额正逐年递增）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拨作上项投资之用。

但事实却不能这样。一九六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农业上的歉收，中国的投资额下降了。在此之前，她的发展率大大超越资本主义在早期工业化的速度。只有苏联在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投资率，才堪与中国比较。

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总值只不过是一百九十亿美元。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每年投资额已等于这个数字。在一百九十亿美元的总额中，每一元中有五十六分投资于工业，而其中五十分投资于重工业。农业方面的投资额只得千分之八十二。结果，钢与切削机械的产量显著增加，而轻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只能恰好应付人口的增长。

波士顿市国际研究中心的W.W.霍利斯特教授估计中国在新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在一九五二年达全国产品总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九，一九五四年为百分之十七点六，而一九五七年已达百

分之二十。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属下的经济调查部秘书在北京正式告诉我，在中国经济里的“资金聚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有百分之二十三”，而且“自当时开始已继续显著上升”。

当我们详细研究霍利斯特教授所作的结论时，有关中国总产值，它的增长率等怎样和西方国家经济对比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了。霍利斯特教授指出：“将中国的产值伸折美金来与美国相对产值对比，便会夸大了中国的总产值，而以人民币来计算，则会说少了中国相对的产值，但是我们没有可能去量度这个理论上的夸张和不足的程度。”他发现在一九五二年，中国的“消费”若用美国的价钱来计算，表示了“总值是五百四十亿美元，即每人每年的消费是九十四美元（一元人民币约等于零点三七美元）”。按这个基础来看，美国人平均消费为中国人的十五倍。但是，在一九五二年，若一个美国居民以中国的价钱来支付他的日常消费品——如汽油、汽车、冷凝器等——他就要付出四千八百三十元人民币才能平衡他在美国的平均消费——也就是中国人平均消费的五十五倍！转过来看，若将中国人放到美国去（保持他的消费品项目和本质不变），他要比在自己国内多花三到四倍。将消费按美元或人民币作直接比较，免不了“使人对两国的相对生产力留下颇为曲解的印象。”

现在，让我举几个例子。中国出产的货车、拖拉机和汽车的价格，似乎比美国产品贵两倍。但电动起重机价格较低，大多数类型的建筑和工程价格较低，食物和住屋——这方面中国远不如美国来得充足——两者都要便宜得多，教育和基本的生活项目更便宜多了。中国平均每人每日数餐只需二十五个分，

而美国一块牛排已要一元。中国的一个大学生每年只要国家花不足一百元，美国一个大学生每年要父母花二千元。中国电工每天工资一元，而美国电工每小时八元。那么，你又怎能照数值来比较中美两国的产品总额呢？以上所提的各种“价钱”是与各种不同的因素成比例的。美国所“浪费”的东西不知要比中国多了多少倍，但中国“节约”的方法在美国看来却“殊不经济”。

霍利斯特先生计算出中国在一九五〇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人民币五百五十亿二千万元。一九五二年则是六百七十八亿六千万元，他并推算一九五七年将达一千零二十四亿二千万元。以一九五〇年为基数一百，他指出一九五七年时，中国的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已提升了百分之六十八。然而，中国发表的数字并没有提供她的GNP的统计，而只是提出生产量 和价值，并且隐藏了几项西方经济学家沿用的重要项目，这些数字一旦加起来，就会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的总数。据中国报道，一九五九年的总产值是二千四百一十亿元（人民币），按官价折算，即每人约一百五十三美元。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的GNP，当年接近五千五百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人超过三千元——但这样比较仍然存在着说少和夸大的现象。

事实似乎可以这样说：按不同水平与不同速度来变化的经济，只能很接近地以GNP来比较。经济学家们对有关中国的消息的意见也不尽同，而且在本文里，我不能将西方消息提供的数字融合起来，而极少叙述中国政府的数字。

中国宣称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间，中国的总产值——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数——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各种西方经济学家却主观地以一九五三年为基数，故将增长率降至

每年约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康奈尔大学的刘大忠教授(译音)认为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八，而霍利斯特教授估计每年的增长率该为百分之八点六。好了，让我们简单地说：年增长率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九，或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一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比率。然而，若和中国最后所宣称有关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增长率比较，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一九六〇年四月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指出，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年间，已经完成了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所定下的工业指标。当时，全国正在按已修订的农业计划工作。直到一九六一年，苏联经济学家——这些人曾经密切地与中国的工业“一道工作”——也明显地接纳中国有关几项主要工业的产值数字报告。这些继续显示了非常的进步。

钢是中国在重工业或基本工业上的第一个目标。过去被称为“中原”的长城以南的省份，一九四九年所炼出的钢不足为每个人打一口锅。在旧中国，钢产最高峰的一年约有九十二万三千吨，但有八十万吨以上是在东北鞍山的日资钢铁厂内生产的，一九四五年鞍山钢铁厂给拆掉了。一九四九年，全中国的总产量为十五万八千吨，约为印度产量的十分之一。一九五一年，鞍山恢复了生产，其他地区也陆续建起了新的钢铁厂，但中国的钢产仍未超一百万吨。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的产量增加了六倍。在苏联的援助下，大型的钢铁厂在安徽和上海、武汉建立起来，随后一年，较小型的现代化中国高炉开始了生产。到一九六〇年，

朱

中国宣称几个大型的新高炉——包括现代化的包钢在内——以及七十三个中小型钢铁厂生产出一千八百五十万吨钢，而英国钢铁局也承认中国最少生产钢一千七百万吨。两个数字都没有包括用“土法”——即后院高炉——所炼出的钢在内。

这个成就值得大加重视，当人们记起在珍珠港事件时期，日本每年的钢产量也尚未能达到一千万吨。

到一九五九年，中国的煤产可能已经追过了英国。一九六〇年，中国宣布煤总产量达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差不多九倍于印度），地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西方观察家说，这些煤很多是未经冲洗的劣质煤。那倒是真实的。然而，中国目前正在建设机械化采煤的全套设备，我在大型的露天或地下煤矿都见到这种设备正被采用。

在一九五八年，中国已可制造五万多部金属切削机器。据报道，一九五九年已能生产七万部，而一九六〇年则达九万台，这样即明显地表示两年内机械制造厂扩大了两倍。中国已在自己制造货车、汽车、拖拉机和“尚为数甚少”的喷气式飞机，但更制造大量的重型电器用品和火车——事实上，制造了百分之八十的“用来制造各种坚硬的和消费的物品”的机器。

中国的纺织工业（从前多为日本人所有）将产量从革命前的高峰二十七亿九千万公尺棉布，到一九五九年增加至七十五亿公尺——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中国往昔所发的电力最高峰是五十九亿瓩/时。一九五三年增至九十二亿，一九五九年已增至四百一十五亿。一九六〇年，中国的总发电量在五百五十亿瓩/时以上，较印度多三倍，而仅稍逊于法国而已。

“六〇——六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将现代化工业的比率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到一九五九年后，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是百分之六十七对百分之三十三（按〔一九七〇年〕；从一九六一年起，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已得到改正，这时，农业被认为是经济的“基础”，而工业为“主导”）。

一九六〇年度的国家预算使工业投资额达到农业、林业和水利的七倍。但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征收了农民的储备金，后几项的投资额达到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其结果之一是使中国水浇田的面积，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间增加了两倍以上，约为总田地面积的五分之三。这当然也表示：通过了双造耕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了。

植林运动的飞跃发展令人从心底里感到惊讶，它的范围极其广阔。到一九六〇年，新铁路网将所有地区的首府（除拉萨及昆明外）贯通起来。话虽如此，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仍然远远落后于需要。铁路总长度的倍增，使上了年纪的海外华人比西方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前者的记忆中，祖国的内陆只能骑驴子或乘船才可到达。然而，中国的铁路长度仍然少于二万五千英里。运输仍是她最大的弱点。目前，全国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都有电话联系，内陆航运的长度也增加了两倍，其他公共事业也有显著的发展。

没有苏联的帮助，不可能有这样迅速的发展。但直到一九

五八年止，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及援助计划总额平均每人每年不超过二分之一美元。比较一下，据A·多克·巴尼特(汉名：鲍大可)估计，到一九五八年止，美国对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所发出的非军事援助，达到当地人口每人三十美元(引自一九六〇年纽约出版，A·多克·巴尼特著的《共产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第四〇二页)。中国并没有自苏联方面得到无偿的经济援助；苏联的贷款(除贸易协定之外)总计只有四亿三千万美元(即十七亿二千万卢布)，并且全部是要偿还的。美国同期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超过了这个数字，而美国对印度的贷款更是该款项的四倍多。在朝鲜战争以及后一段期间内，苏联在军事装备上对中国的贷款和(可能有些)“无偿军援”，据各方面估计，约达二十亿美元。由于周恩来告诉我，中国未有自苏联方面收到任何的“无偿援助”(设计图则、发明品等除外)，因此苏联的军事援助显然是用来抵偿(最少是一部分吧)中国在朝鲜的战斗力。

根据美国一位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李卓铭在他所著的《中国的统计法》一书中指出，苏联的全部贷款“只够支付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业及其他计划里所需要的装备、物资等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一”。中国就是环绕着这一百五十六项主要的工业项目来制定她的发展计划。但苏联的贷款只占了“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七这八年间中国的总进口额的百分之十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用于新投资的苏联贷款(人民币十五亿七千万元)只占了全国投资总额(人民币四百九十三亿元)的百分之三。到一九五七年尾，苏联的贷款已经用尽，而从这期间起，再没有宣布签订任何的贷款协定。……”这就是说：百

分之九十七的基本发展的投资来自中国人民身上。

若按中国在轻重工业(约共有七百个大型计划)和为此而兴建的工厂两方面的总投资额计算,表示了中国人在十年的时间内,自己制造或生产的机械与苏联进口机械的比率为二十到三十对一之比;从这点看,上述数字的重要性不是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吗?

中国工人的现金收入到目前仍然只占全国利润的一小部分。在这革命的十年中,各方面的总产值比前增加了四倍,但到一九五九年止,工人的薪金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据称,农民的工资(以谷物及现金合并计算)的增加额比工人还要少一点。和西方国家在较早的资金积聚时期比较,这个增长率大概属于相同等级,但必须记得,中国的生活程度远较当时的西方国家低得多。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改善了这个情况。其一,中国的工人与农民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退休金及工作保证等),这种种福利在私有制国家里要很迟以后才能实现。其二,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深切明了他们不能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的利润的原因,他们并且满意于看到:没有任何个人或阶级凭借着他们的努力而发财,所收集的资金又是投资于对整个社会有利益的事业中去,特别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的利益。

中国每年的资金积聚率发展得极为迅速,因此,一九六〇年度的国家计划预算,当年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额将是三百八十五亿元人民币——约一百五十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分配给市区及农村人民公社的六十亿元。这表示一九六〇年度的总数较诸一九五九年度的实际投资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也是中国在一九五二年的投资总额的八倍。这个数字超过了苏联

到一九五九年为止，给予中国的公开和贸易贷款总数的五倍，也接近印度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一——一九六六）里的全国预算投资额的五分之四。

中国预算的投资也假定了中国的收入，包括了国营企业的六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四十亿元。然而，由于政府完全控制了价格，贷款和贸易，从农民的劳动中间接积聚的资金，比以上提过的数字还要大得多。这项预算被官方宣布为“继续跃进”的一部分，为“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打下基础”（以上数字转引自李先念和李富春的报告。见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北京周报》）。

事实表明这些期望并未能实现。一九六〇年这一年并未能经济上作全面的大飞跃，而只是一个小跃进，并且是由一条腿——工业——所作出，至于另一条跛掉了的腿——农业——则被拖在后面。

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间的农业倒退，强迫中国几乎将她的全部外汇用于购买粮食进口，而不是用于购买机器。农业生产的危机更严重地瘫痪了她出口纺织品和棉花的计划——这是她与苏联最重要的贸易——并且还妨碍了其他加工的农产品。中国被迫暂停偿还中苏贸易协定中规定于一九六〇年应还给苏联的债务，并寻求延期付款的五年分期付款法。虽然莫斯科答应将时间延长（对这一点，中国人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但赫鲁晓夫对减轻中国粮荒的“贡献”却局限于“捐赠”一点儿糖之上（换取了五十万吨茶叶），这是在两国思想大辩论之后。此问题另文讨论。

由于一九六〇年度的农业衰退幅度极大，所以中国这年度

的总产值大概要低于一九五七年的总产值。

对资本缺乏的中国经济而言，那表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会遭到令人苦恼的经济倒退和投资浓缩。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委员会预见了要有“两年到三年的巩固时期”——这几年来要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采取“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政策（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周报》）。一九六〇年后期，党显然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稳打稳扎，发展经济”的政策。这个新指示表明在一九六三年或一九六四年之前，工业战线上不会再实行大型的新攻势，而要进行这一点，当必在农业基础能应付未来的自然灾害之后了。

从姚伟谈到私人企业

中国国际旅行社委派了一名叫姚伟的翻译员和我结伴到东北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姚是一个山东大汉，在上述的几次会谈中，他曾给我不少帮助。

姚伟身高六尺，是可以当我的保卫员有余，有一两次我真怀疑他也把这回事当作是他的责任之一。若说他对我如影随形，使我感觉受到过分呵护，并且减少我练习讲中文的机会的话，我却不得不承认，他那魁梧的体格在我危急的时候，定能敏捷地给我援手。在他那个小型的手提旅行袋里，带有一个钢丝弹簧拉力器，每天早晨，他就用来锻炼肌肉，以保持健美的体格。他梳耶鲁水手装，行动也象耶鲁人一样。虽然他承认每个省份都会诞生好人，但他高兴出生于山东。想想吧，一个山东人和一个耶鲁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呢。

如果姚伟和他的朋友们对统治当局有任何批评的话，我可未听到他们提出。他对这些事情很保留，就象香烟公司发表有关香烟会引起肺癌的广告稿一样。旅行结束时，我们已交上了好朋友，虽然我未能从他口中探到任何的内幕消息。或者他真的不知道。他还不是个党员，但他渴望争取入党——不管道路上还有多少障碍！

我真正从姚伟处知道的是有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遭遇。姚伟的父亲原来是学习当中医的，他有一个姐姐，在山东军阀统治时期，被一个姓高的有钱官员看上了。在她当了高的二姨太后，高就使姚伟的父亲去当国民党的上海交通局长。山东人是颇有生意头脑的；“医生”很快就积蓄了一大笔钱。一九三〇年，就是姚伟出世那一年，他的父亲退休了，他们举家迁往北京。

当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侵占了北京之后，他们就开始对学校施行管制。为了避免接受敌人的教育，姚伟的父亲把他送到一间美国学校去，所以他从小就学习英语了。他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包括美国使馆官员的子女在内，但珍珠港事变后，学校被关闭了。家庭又将他送往天津，进入玛利亚教团开设的圣路易学校肄业。在那里，他学习中文、英文及教义；到一九四七年，当内战的烽火蔓延到天津时，他又回到上海去。

当时，他已经十七岁了，因此他决定找工作。一个父亲当国民党财政部长的朋友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在机场当讯号员，后来，他被调往南京。在内战时期，他发觉自己要在控制塔上给轰炸长江北岸共产党军队的B17和B24型轰炸机，发出降落和出发的讯号，并且要帮助陈纳德将军的中国空运司令部，运输

人和物资给被陈毅将军的部队围攻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部队在这次最后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包围并击溃了蒋介石的队伍。

姚伟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卷入漩涡去。但他讨厌国民党，并想破坏一些轰炸的任务，然后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去。但他连一个共产党人也不认识。南京解放后，他混进当地的人民中，最后返回北京。抵京后，他又开始找工作，后来被分配加入一群师范学校教师的队伍中去工作。这时候，人人都要写个人历史，并要求对各样事情都要坦白。姚伟为谨慎起见，自称在内战时期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不幸得很，那群人中有些曾真正在那里学习过，因此，他的“策略”很快便被揭穿了。

“事情怎么样了？”我追问他。

“没有什么。我坦白了。其中有些人也有这样做呢。当我讲出我的整个历史时，人人都只是笑笑而已。战争时我只是个孩子，但这也有助于证明我是自愿回来的。”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姚被分配到一家中学去教英文。这个时候，他和一位旧同学结了婚，后者正在学习当一名俄文翻译员。他拿出他们的结婚照片给我看，照片的他打扮得颇入时，穿上反领的大礼服，她带上一张新娘面纱——一个漂亮的女子。

“你父亲怎样啦，姚伟？”

“噢，他依旧是个资本家，一切都很好。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退休了，住在他置于北京的一所房子里。他的钱多得不知用来作什么。”

姚说他的父亲本来以为一定会失掉一切，并变成一个乞

丐。事实却不是这样，他被共产党划为民族资本家和进步资本家。政府按照他过去在地产和工业上的投资额分配红利给他，足够他舒舒服服地过活。因此，他能够光顾目前依旧营业的几间价格昂贵的餐室，请朋友们上剧场，而且，套用姚伟的话，“享受人生”。

仍然从国家处收取租金和红利的家庭，主要局限于几个大城市里。在这些收租人中，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女作家韩素音女士，她的早期作品包括有《生死恋》(A Many-Splendoured Thing)和(较激烈的)《青山不老》(The Mountain is Young)。当我在北京停留时，她也住在新侨饭店里，和她的会面，丰富了我的旅居生活。

“我想将房子交给政府，”她说道：“但他们却不肯接收。”政府对她如此仁爱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她的父亲从前是劳动英雄，死后并被葬于革命烈士公墓里。基于上述原因，韩素音成为最引人注意的劳动英雄的女儿——并且是她的祖国在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传译员。

由于中苏间存在着不同的情况，由于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历史与苏共的历史存在着差异，中国政府在处理资本家和经营阶级的问题上，并没有追随苏俄革命史上那一套破坏性的，整个阶级的清算法。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进步资产阶级的支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类政策可追溯至抗日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当时毛泽东答允在一个过渡时期内，保护“以正当手段取得的私有财产”和“爱国的”资本主义。在人民共和国初期用以指导建设的“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再次重申了这个诺言(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建

立在共产党和它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大联合的基础上的)。

党按实际情况将农村的人口划分为大、中、小地主，和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也将城市人口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仍然坚持：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与“爱国的”——在多种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段时期中，将会担任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官僚资本家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以及他们在银行界、贸易界和政界里的同伙，这种人在政府和商业上组成了连锁的管制网。解放后，这几个家族的成员，以及外国大商行的买办、代理，投降了日本的汉奸，高利贷者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都逃往台湾、香港或其他海外地区。他们的物资彻底地被没收掉，并且不予补偿。

其余的私人资本家和商人(人数上占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据一个消息来源称：单是上海一地已有二万六千家商行经营“工业”，另一个消息则说有“十六万五千个商业单位”——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大西洋月刊》)则受鼓励继续进行搞生产，并且受到国家的保护。除了日本人的资产以外，其他的外资并没有遭没收，但却要抽重税，有计划地吸取他们的利润和资金，不准在国内取得原料和市场，即实行间接充公的经济政策。对于采取这种手段的原因，共产党人所持的道理就是：“外国帝国主义”长时间剥削中国的劳力和资源，而没有支付过任何税项，他们早已赚回了他们的资本和投资的不知多少倍的利润。就这

样，中国收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外资。

自一九五一年始，所有中国人的私营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以及利润的分配都统归国家管制，而那些有耐性追阅毛泽东的著作者早已可预料到这点。一九五一年后期，政府展开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即“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暗示了“过渡时期”比乐观的资本家所预料的要短得多。

其时，检举案无日无之，而罚款则甚重。由于这个运动适逢朝鲜战争，它对于征集各种所需基金大有帮助。为了支付罚款和以往的税务，一些有罪的大工厂主要将工厂卖掉，而国家却是唯一的买主。有部分则寻求国家援助和领导；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一时大增。

数月后，运动停息下来。商人的贸易和经营才干仍然是需要的；政府一方面继续在思想上“改造”他们，一方面向他们提供贷款、原料和市场。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召开了工商业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了他们的命运：在整个国家经济里的私人资本将会全部吸收——分阶段进行而不是无偿的。

从一九四九年起，私人资本便受到由政府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所控制，以便在“达到公私兼顾”的同时，并“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到一九五五年，私人资本的工业生产已降至全国工业总产的百分之十六（一九五二年占百分之三十九），而这些产品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要依赖国家市场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证实以前私人拥有的企业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和国家合股经营。

到目前为止，利润分配的控制已实行了好几年。一九五六

年六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支付“红利”的政策：不论盈亏，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息为现存资金的百分之五。六个月后，政府宣布这种付款法将于七年内有效，也就是说，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末的一年——一九六二年止（按〔一九七〇年〕：实际上，“起码”有些“民族资本家”到现在还继续得到国家的补助）。从前的店主或厂主若继续当联合企业的经理人或技术指导员，除了分得百分之五的红利之外，还可支工薪。但由于国家取得了直接控制权，有关贸易上的真正决策以及通常的管理，将由国家雇用的人员和管理员执行。在很多情况下，旧的企业通常被分割开，或完全被吸入较大的国营工厂或公司里。因此，到现在为止，“资本家”一词已成了谥语，而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是工人成份。很多过去的私人资本家开始希望改变成份的时间缩短。报载有些人自愿请求将仍属他名下的资本转给国家，而不要任何补偿，这是可以相信的。在北京和天津，就有数以千计的商店、生产单位和住宅在一星期内转给了政府。

在我访华这个时期，工业和商业上的私人资本已按实际情况全部取消了。然而，据商业部的一个负责人在北京告诉我说，当时尚有“约一百万人”从事小型的私人企业（时为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他们只占了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的一部分，实在是很小的‘商人’而已。事实上，他们大都是单独的谋生者：手推车夫、挑夫、小贩，和一些手工艺者，分布的区域很广。即使如此，这些人也逐步被吸进社办工厂，或一九五七年组织的手工业和小商合作社里。一九六一年，为了减轻粮食不足的困难，城市里的剩余人力根据号召都回到农村里去，这个工作出现了反复。

据商业部的负责人说，“约有三十万”商人仍然从商业部辖下的组织收取百分之五的利息。他们占全部资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些人（包括工业家在内）都从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支取这类款项。

“那么，除了自行谋生的人以外，”我对商业部的负责人说道：“中国的前资本家共有一百万人，是吗？”

“不是‘前资本家’，而是真正的资本家。”

他们将会于名义上继续保留这个名称——原因是为政府的上层建筑提供某种经济基础，因为目前该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仍然在名义上承认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从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出发，这一点对一些自以为建设国家而努力的资本家来说，是一种无情的命运——保罗·格蒂先生，洛克菲勒的家族，以及一切大、小资本家都会这样想。然而，在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进行的革命的胜利之后，逻辑上的目的就是消灭资本家这个“不必要的阶级”——除非领导上要叛变使它取得权力的思想。中国对资本主义的逐步消灭（与农村地主阶级的迅速被消灭有着显著的不同），绝大部分是由政治上的手段而不是以暴力进行的，故此能为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留下了一条通道，并保存了国家所需的许多技术。在一些事例中，这种方法甚至赢得接受改造的资本家真心的，热情的接受。

东北——工业的心脏

姚伟和我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旅行了二十三天，这个地区就

是西方所称的满洲。日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霸占了这个地区后，便在这里建立起伪满洲国。东北人民受日本人压迫达十四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后，黑龙江省的部分地区改属内蒙古自治区，但满洲的面积仍然相当于整个西欧(除西班牙外)。此地曾一度为游牧民族的满族人民的故乡，他们在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原。直到他们被推翻之前的一段短暂时间止，他们一向禁止汉人移民该地。到一九六一年，满洲人口估计约有六千万，在中国来说，这个人口数量显得比较稀少。这个人口的增长主要始于一九一二年，所以也可以给人有关中国往空旷领土移民的速率的印象。然而，人们也可以感到很多世纪白白地溜过去了，中国人才往那块辽阔的、资源丰富的、肥沃的土地扩展——比一下美国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移民的速度便更明显了。

满洲的工业化主要是被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铁路发展所推动的，当时这两个殖民地帝国在满洲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一九五〇年，当苏联和人民共和国缔结同盟时，斯大林宣布放弃苏联在满洲的联合铁路和工业企业上的历史性的利益——在苏联和蒋介石签订的一九四五年协定上，这一点是被承认的。北京重申确保外蒙古的独立——也是蒋介石政权在一九四五年首先承认的。苏联在旅顺港和大连市的海军基地本应同时撤销，但却因朝鲜战争而拖延下来。然而，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签订的中苏新协定中，苏联完全放弃了她在满洲的地位，并且将她在新疆的中苏联合牲口公司的股份也让回给中国。

一九五一年，迪安·腊斯克胡说什么：“中国的领土完整只不

过是一句讽刺语罢了。”(当时此人任助理国务卿的职位。)他又说:“中国将辽阔的北方(满洲、内蒙古、和新疆)拱手奉送给这个欧洲帝国,后者最少在一个世纪前便向这些地区伸出了贪婪的巨手。”他以为北京政权不能“通过第一场试验”去作中国的政府;这个政权简直就是“非中国人的”。已故国务卿杜勒斯也有着相同的错误概念,多年以来,他就是将他的政策建立在“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短暂的名称”的信念之上。但是,就在一九六〇年——最近一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的东北边疆地区早已完全脱离了外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控制。这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唯一能拒回俄国人的压力的强大政府。

十七世纪中叶,由于内部的颞预无能,朝政腐败,明朝天下四分五裂,中国结果便被长城以外的满族王子(在明朝叛臣的帮助下)征服了。他们建立起大清皇朝。在这个干戈未息,天下大乱的时期,俄国人迅速自贝加尔湖向东推进。一六八二年,彼得大帝称帝,俄国人已推进到黑龙江流域地区,并在东西伯利亚建筑了坚固的堡垒雅克萨城。一六八三年,康熙皇帝在平定了台湾最后的一个明将后,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北方以抵抗帝俄的入侵。

当时,在北京的满清皇朝中,一个比利时籍的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凭着教导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特别是先进的欧洲军火学,取得了传教的方便。一六八五年,由于南怀仁神父教导有方,一支人数约一万五千名的清军,携着按这个传教士指导而制成的一百五十门野战炮和五十门攻城炮,进攻并摧毁了雅克萨城。俄国人逃到瑗琿河以西的尼布楚山脉里。沙皇最后决定在尼布楚城与满清谈判,当时,康熙派张诚担任

了重要的谈判角色，他是继南怀仁神父之后于中国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一六八九年，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中文，满文，俄文与拉丁文书写），划定俄国的边界到尼布楚城为止。满洲和西伯利亚仍为中国人所有。

一百多年后，沙皇再次向太平洋海岸推进。一八五八年，俄国人（乘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为英军所败）强迫北京将黑龙江左岸以及黑龙江以北到河口的土地割让给他们。两年以后，苏联再强迫北京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并在那里耀武扬威地建筑了一个新的太平洋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Vladivostok这个字在俄文上表示“征服东方”。

我在满洲踏上了许多当年走过的旧路，从接近西伯利亚的疆界到大连之外的海洋。我参观了七个大城市以及六个市郊和农村人民公社。我察看了许多重工业（包括钢、轴承、电机、机床、电缆、起重机、火车头等），大连的造船业，长春制的火车、汽车和卡车，以及沈阳的一间手表厂。我参观了露天及地下矿场，电影摄影厂，到黑龙江上作了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旅行，还在那里的泰岭森林木材站以及一个接近蒙古边缘的石油中心过了几天。我每天将十二到十五个小时花在看和写两方面；我真象在于“苦工”一般。单就我所写下有关满洲的人民和地区的笔记已可填满了一本书；只有“苦读者”才会耽时间来阅读它，所以我将不会这样来描述它。虽然如此，我只是观看了整个机械化的巨大基地的一小部分，那里人类的努力是永不停止的。满洲的潜力比鲁尔区还要大；事实上，（虽然不那么发达）它是中国的“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混合区。

在整个旅程中，我过得最快乐的一天就是沿着哈尔滨市风

景优雅的滨河区公园，在松花江上泛舟遨游的时刻。我还在哈尔滨市内和儿童们及“北京——莫斯科”儿童游乐铁路的管理员一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我的笔记指出学徒的工资每月由二十五元至三十元不等，熟练的技工平均每月有五十到七十元。薪级制分为八到十二级；每级还根据所做的工作再分级。国营工厂的工人享有免费医疗服务；他们的亲属则收半费。工会会员的福利包括有意外保险和占工薪五成的退休金，男工人六十岁退休，女工人则在五十五岁。一个房间的租金和杂费平均由三元到六元，伙食费则较南方便宜，成年人每月约八到十二元。

我所参观的工厂都办有托儿所、诊疗所、医院、疗养院和业余学校；每个工厂都有俱乐部、剧场、文艺演出队和乐队。居住环境有宽达数以里计的、砖建的，收费廉宜和有自来水设备的新房子（其中一些有私家厕所和花洒浴室），也有些人仍住于破旧的集体住宅区里。“俱乐部”和剧场有时设在特别为此目的而筑的建筑物中，有时则因陋就简，将旧屋子或车间改建而成。在还未有福利基金的工厂里（如在国营工厂那样），托管婴儿的费用（包括一餐午膳）每月约六到十元不等。有时，托儿所和幼儿园设于从前的有钱人的住宅里；也有些设在泥建的茅屋内。

在大工厂里，我见到一些可以称之为“喂奶站”的地方，工人母亲们每日按时在这里喂哺他们的婴儿——下午下班后便将他们携返家里。当母亲们在附近的厂房里操纵着机械时，他们的婴儿就由几个护士或保姆代为照顾。母亲们都享有五十六天产假，并有额外的食物供应。我所见到的妇女都精神奕奕，

健康良好。部分工厂还自办了养牛工场，配额供应牛奶；大多数工厂都辟有菜园、养猪场和鸡鸭栏等。

工人们按他们的“薪级”支取工薪。在我参观的大多数国家工厂中，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一星期六个工作日。工厂每日分为两班制或三班制。在市营商店或工厂工作的家庭主妇照例每天只做四到六个小时“板凳工作”，并在工余学校上两到三个小时课，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所有国营及市营的工厂里都有党支部委员会，它的干部负责一切管理事务。行政人员都曾学习过工厂管理法。我所参观过的大工厂中，大部分是由工程师和党的行政人员联合管理的；工艺操作方面由前者领导，人事及管理问题则由党支部负责抓起来。

工人们组织起的“工会委员会”仍然存在，工厂和党的负责人在定期的会议中要与他们共同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如此，生产指标，帐目和所有重要的决策最后都是由党委会决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每年要下放到车间参加一或两个月的劳动，时间长短按情况决定；实际上，这表示他们每月要劳动四或五天。在大的工厂里，行政人员就是各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当他们下放劳动时，他们的职务就由副主席接替。

满洲人口与全国人口的比率是一与十之比，但它在工业化道路上的重要性却是一比三左右。本世纪末，这地区的人口可能会增到西欧目前的人口总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他今天有雄辩之才的信徒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指出，它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中最后所作的贡献，必不会低于在美国史上西部对整个美国的影响。但是，我对这个地区所

花的篇幅却要较它应得的地位为少。

在我个人的观感中，虽然满洲——作为中国大举移民的领域来说——尚处于初步阶段，但在整个地方的工业化而言，则是一个已知历史的继续。我将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长城以南的一些较古旧的地区，那里的变化显得更新和更重要。坦白来说，满洲的工业化部分可以说是沙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遗产。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首次见到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几个城市，时为一九二九年。那时，这些城市都已比长城以南面积相若的地区远为先进。他们训练出许多中国技术人员。现在，满洲地区各方面的规模都较前扩大了很多，但是，无论那一个政权重光中国的领土，这种变化也是可以想象差不了多少的。因此，发觉鞍山目前比日本侵占期生产多五到六倍的钢这一事例，也比不上在偏僻的洛阳市看到农家妇女装嵌拖拉机那样使人感动。由苏联协助建成的长春汽车厂，不错，是满洲的新事物；但我在昆明市中国人自建的工厂中看到的吉普车（越野汽车）、公共汽车和发电机等，却使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昆明市在云南省的群山环抱之中，那个地区在战前什么机器也不能生产）。我在延安窑洞里所看到的电灯，在重庆一个工人家中见到波蒂切利（BOTTICELLI）的作品“维纳斯的诞生”的一张复印品，都比我见到在大连制造的一百五十吨的多用起重机来得有意思。同样地，我在陕西北部见到的森林带，在黄河流域上蔚为壮观的水利工程等，完全出色地代表了三百年纪以来，中国与大自然斗争的新胜利。

两条腿比一条腿好！

使用军队的力量来进行建设，是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创造力的手段之一。“两条腿走路”在中国的变迁中 占了重要的一页。

用麦迪逊大街英语说来好象有点孩子话的味道，但中国到如今仍有部分被缠的“脚”。缠着的脚一定会使自由的脚移动得更快。在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共产党就已经学会利用两种脚了。我记得当时陕西的女人划分为“放脚”和“缠脚”两类，两种人都分配了适合的工作。“缠脚的”多做点缝缝补补的工作或在田中施肥。

一九五八年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当然不同上文所指的意思)，是指要开始建造数以万计的小型砖砌炼铁炉或叫做“后院”高炉的东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懂得了熔铁矿的重要性。西方报刊乘机嘲笑这种努力，因为当时出产的确实是质量很低并通常不可用的生铁。它还引起正常规划的脱轨和扰乱了农业。结果，许多炼铁炉在第二季度便被弃置不用，但有一小部分由于经过改良，继续产铁给本地制农具之用。一个更实际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许多在这些原始的炼铁炉旁受过训练的工人，联合了大伙的力量，广泛地开始建设小型的现代化炼铁厂。两年后，这些铁厂竟然能够出产颇为可观的生铁了。

另一个有趣的后果是培养了一大群冶金工人，他们对建设一个新型的中、小型的平炉或电动化高炉网起着强大的助力。一九六〇年，中国已拥有七十三个中小型的现代化炼铁厂，利

用能量最低为一吨以上的转炉炼钢，它们的年产量由二万五千吨到二十万吨不等。

在郑州郊区，我访问了一间炼钢厂，建设时预定的生产指标为每年十万吨铁和钢。经理带我到厂房里参观，我们距离炼钢炉很远便站定观看，车间中三个炼钢炉合为一组，沸腾的铁水正自其中一个炉中奔腾流出，这三个炉的日产量为一百二十吨。经理没有向我解释生产过程——“技术秘密”乎？这是郑州的第一间钢铁厂。一九五八年，厂址原是一块菜地。在大跃进期间，公社各村的农民建起了二百二十三个土炉，在试办的过程中，数以百计的人初步掌握了炼钢的一些技术。合作社选出五百人送到安徽学习炼钢法。那时，国家又分配了一个北京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到来帮助建设一间市营工厂。

对一些资金短缺，交通不便，而又想迅速建设重工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小厂办大事的方向是意义重大的。小厂的建设时间只是大厂的四分之一，却可以即时结出果实。巨型的高炉需要巨大的投资，虽然它的好处（当然的！）是可以最后获得更高的产量和节省生产的经费。

象中国内陆这样一个落后的地区，（中国人）这种新的技巧确实是了不起的。它使轻、重工业能按地理环境平衡发展——即使在交通尚未充分发展之前。目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和自治区都有它自己的钢源。这种“工业上的”分散，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

“两条腿走路”运动还唤醒了许多农民中采取观望态度的人，这些人本可以提供发掘一些他们长久以来便知道的资源，他们隐瞒在心底的原因，主要是迷信或恐怕失去他们的土地。

从前，地质学的调查罕有接触到中国广大的土地。一九六〇年，中国的“地质研究人员”为数达四十二万人，而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多也不超过八千人！

“两条腿走路”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大量文物的出土。为建筑十八万英里的新公路和一万二千英里的铁路，为建设无数新建筑物的地基所进行的挖土工程，附带地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汉学家做了大规模的翻土工程——倘非因利乘便，此等工作非要多年后才进行不可。一九五九年所公布的数字说明：自一九五二年以来在所有的水利工程中，挖土、挑土和泥水等等的工作总量相当于建造九百六十条苏彝士运河或四百条巴拿马运河。即使上述数字有所减少，数量仍相当于通过地球中心挖一千多条升降机道自上海通往纽约！

在每一个地方，我都看到人们以各种各样的代用物来进行现代化工业的工作。长春和北京的大型现代化工厂用流水作业的方法来制造货车和汽车；在清华大学的机械厂里，学生们自己动手制造小型汽车，我也见到昆明和上海出产的车子。一九六〇年，中国制造出了她的第一部喷气式飞机；同时制造了一千万辆胶轮手推车。中国有两条腿，一条仍然被缠着，另一只却穿上了有翅的草鞋。现在举一实例：在哈尔滨，我参观了一个极为现代化的火车厢工厂，在其中一条流水作业线的末端，那些美丽的车内装饰——竟然由驴子来运输！

在满洲和其他地区，我见到一些发电力达七万五千瓩的电机正在成批生产；高精度的仪表和X光机；由微型到巨型的轴承；二千五百吨水压机和电视机；一百五十吨的起重机；全自动的织布机；竖立机床——大到可以驶救火车自下面通过；整

套的机械化开矿设备；和八千到一万吨的巨轮也在大连制造出来了。

然而，百分之九十四的中国土地仍未能用机械化设备耕作，搬运工作仍以人力为主。事情本身已可由上述一千万辆手车的生产说明了。注意它们现在是胶轮手车。中国已成为一个较幽静的国家——当街道的广播器在晚上关上之后。胶轮的生产使手车工人的辛劳大为减轻，此等手车工人可能是从前的人力车工人，以至按时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学教授或公社的负责人。

在经济自体力劳动跨往机械化的道路上，工人和农民贡献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建议。在农民们发明的众多插秧机中，最广泛被采用的是一种由两个人操作的机器，据说这种插秧机每小时所插的秧相当于十个人以手工操作（中国将这种机器的制造权给予柬埔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的国家）。电力和电动机的较大供应量鼓励了合乎实际的革新。在很多搬运泥土的工程里，原始的、省时的运输带也英雄有用武之地。

在洛阳附近一家工厂挤满了人的附属制绳店里，我看到一些由摩打带动的机器完全是用木制成的。在其他地区，我看到一些杀虫药喷筒、脱粒机、播种机和撒肥机也完全是用木制的。农民们还将小型的柴油机头嵌在板车上，以拉动小火车能沿木轨行走。在延安附近，我看到一条小铁路已换上硬轨，并且利用耐用的机车将公社的产品送到镇里。

在一个大型的家禽农场里，一个职工发明了一种填塞食物的机器，将鸭子成行地排列在踏车上，自动将食物塞在他们的咽喉里，然后再将它们滚向前方，鸭子会感到晕眩，但却会欢叫不已。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鸭子肥到可以制成著名的

北京填鸭为止。上海一个厨师成为全国劳动英雄，因为他发明了一种制面机，另一个银行女书记发明了一种数钞票的机器，获得了同等的名誉。

这类的小型工业的劳动生产量，有许多是很低的。若处于一个竞争的经济中，很多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对于可以在国内用闲散的劳动力和散碎的材料制作的物资，中国都不会花钱进口的。不论生产费用多高，它们总比不事生产而坐着白吃为廉。当然，资金积聚起来时，便会购置较好的机器，劳动生产量便会改观。目前的发展仍属较低的水平，但总比停滞不前好得多。

上层社会

返抵北京后，当我曾与毛泽东及周恩来会谈数小时的消息一旦传开，在节约期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款客习惯的外交圈子，开始对我有了点兴趣。外交圈就象一个正方形一般。一角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西方国家的几个代表；另一角是东西方的中立国；第三角则由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所占；第四角是通往中国的一堵门，但常常是关起来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旧北京的战前外国社团——的末期，那些外籍贵妇——指外交界人士或退職外交家以及外资商行现任和退職的头头的太太们——习惯上认为：当他们邀请经慎重选择的中国淑女和绅士参加宴会时，实际上已给了他们天大的面子；而接受中国人的邀请也作如是考虑。现在，什么都转变过来了。西方外交家再也不会被邀到中国人的家里，而

他们本身对三、四级的官员所发的邀请通常也被拒绝或无回音。

西方外交官的确会被邀请前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宴——欢迎来华访问的反帝人物，如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哈特·阿巴斯等。他们与中国部长级（或其他等级）人物唯一的另一种社交活动就是在大使会或庆祝本国国庆的招待会里。然而，究竟总理或其他政治局委员亲身参加，或派遣代表参加，都被认为是北京对这位大使和他领导的使节团满意程度的“气压计”。

“西方”的主要代表就是指英国人、瑞典人、芬兰人、荷兰人、瑞士人和丹麦人。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尚未承认中国，但它们的人民都以游客和商人的身份到中国去；英联邦的成员都分享了英国对中国承认的利益（如马来亚可为一例）。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成为加拿大和澳洲谷物出口的最大市场。英联邦各国的工会和知识分子代表团络绎不绝的来华访问。中国与西欧的贸易陆续进展。除了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南朝鲜及越南南方之外，所有东亚的国家都有外交代表驻在北京。中东的国家亦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例外的是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但也和中国有贸易协定——唯有伊朗与中国尚无任何接触。

北京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她也和摩洛哥、几内亚、突尼斯、苏丹和索马里交换了外交使节。承认刚果的计划由于卢蒙巴的被害以致拖延下来。在中国和古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之后，北京在整个南美的活动迅速扩大，到北京的拉丁美洲访客和定居北京的拉美人士也增添不少。

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除了在印刷品上之外，就极少和中国人接触。西方观察家绝不能从中国人的口里知道有关中苏共处的
问题。但他们自己作观察；和中国人以外的共产党外交官交换
意见；他们闭门作文章；其他问题则几乎一概不谈。外边很多
有关中苏“冷战”的臆测，追溯其源，殆出自北京的外交圈子，
那里东西集团的人物都有所“贡献”。

在某天晚上的鸡尾酒会里，我们谈到了氢弹问题。有一位
可信赖的西方物理学家曾估计：当时世界核子武器的储备约等
于活着的人每人有四十吨TNT炸药一样。我在酒会上提到我曾
向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发出以下的疑问：“那难道还不足够吗？如
果真有人能成为原子战争的胜利者的话，世界上的民族能活多
久呢？”“不，恐怕仍然未够。可能要再过十年——直到每个人
平均有四百吨TNT为止。”我跟着还复述了当时该高级官员所
给我的答案。

聆听着我谈话的外交家，这时突然抛下我去和他的幕僚讨
论一番；然后他们拉来了其他两个国家的外交官参加我们之间的
谈话。在几天晚上后的另一个招待会中，原子弹的问题再度
被提起，我询问一位亚洲外交官估计中国何时能制造出来。

“他们已很接近了，”他回答道。“一个中国高级官员不久前
对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在十年内决不会参加任何禁止核武器
的条约。她要等到自己所制造的核武器量达到每个活着的人平
均拥有相当于四百吨TNT炸药时才谈论禁核的问题。（以讹传
讹，莫甚于此矣！）”

能够得到中国人抽出更多时间接待和吸引中国人更浓厚注
意的（包括和最高领导人物的群众性会见在内），不是发达的西

方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而是落后的、发展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国家的外交界人士。在新侨饭店中，代表着工人、作家、和平委员会、律师、科学家、教师、学生、商人和造反派的领袖等各阶层人士的短期访客络绎不绝，竟日光临。他们通常来自伊拉克、约旦、阿富汗、印度、马里、利比亚、肯尼亚、埃及、乌干达、坦噶尼喀、刚果、博茨瓦纳、马拉维、尼日利亚、尼日尔、几内亚、黄金海岸、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古巴、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及其他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挤满各种肤色的人群的饭厅里（从黑色到金色和棕色都有），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和戴上各种发饰，欧洲服装往往显得很例外。饭店里还有来自苏联、蒙古和东方国家的游客团，以及身材健硕的乒乓球、篮球和田径运动员——包括有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波兰人和朝鲜人。那一年，塞古·杜尔受到了最盛大的欢迎，约有一百万挥动着旗帜的人们，从飞机场一直列队至天安门欢迎他。其次为缅甸的吴努总理。在拉丁美洲的客人中，古巴人列为首位；当时造访中国的拉丁美洲人中，还有由一位将军率领的墨西哥人；有加拿大人；还有为数较少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典人。可以说，基本上每一个地区都多多少少有人到中国来——除了美国，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外。

但是，即使东欧人也抱怨难以接触和认识任何的中国人；他们之中很少人能说中国语。在大学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学生和中国人很少通婚。

在新侨饭店的芸芸旅客中，我从一个瑞典工程师和一个瑞士手表商处听到了一些东西。年轻的瑞典人曾在满洲北部的伊

春市监督建造一间大型的现代化纤维板厂。这个厂需要自瑞典进口值八百万元的机器来制造一种特种的硬板。

“自大战以来，我的公司已为苏联建立了二十二个 这类型的工厂，”他说道。“所以你可以说苏联在这个项目的出产，最低限度是中国的二十二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我观察满洲的工业所知，我可以说中国已基本上可以用我们的装置，来仿制苏联工业部门目前可以生产的夹板生产机械。中国不需要从苏联进口这些机器了。”

瑞士手表商说他和各地区的购物商，做成了一单很兴隆的生意，但只限于一个款式：便宜、实用但外表美观的手表。他不能再推销好的钟或最便宜的手表；中国人已能自己制造，并开始有出口了！

“那么，你在这里的市场还会有多久呢？”

“五年吧——但也不错了。之后他们大概在各方面都可以和我们竞争了。有何不能呢？”

科学与教育

中国在教育应用技术专家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间，一共培养了二十三万个工程师。在先进科学方面的进步，则远未能与上述进步并驾齐驱。回顾一九五〇年之前，拥有各种科学的博士名衔的中国人不足三千人，而在中国本土的更不足半数。当新政府成立时，登记为自然科学家的人数只有八百六十二名。

一九五五年，北京政府首次严肃地对付迅速训练先进的科

学家这个问题，当时，在一大群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她拟定了一个“十二年科学计划”。这个计划使中国到一九六七年末，将可以培养出一万零五百个(博士级的)科学家和二百万个工程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已送出七千七百零五个学生到十四个国家留学去；大部分学生留学于苏联。这个“十二年计划”的目标是为了在“对我国国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赶上世界水平。在科学理论或“纯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则未受到过分的重视。中国按需要分配了五百名顶尖的科学家和八百名工程师，进行最受重视的原子能计划，这说明了在今后数年内，她在新理论的贡献方面仍将会较为落后。

中国拥有现代化的研究设备——多由苏联输入，并且能够制造精密复杂的仪器，包括核子研究方面的设备在内。她还从其他国家处获得了多种科技书报。但是，目前主要还是强调设立与工业和交通有连带关系的研究院。据报在一九五八年，这种学院的数目达四百一十五所，共有研究生及技术员一万四千七百名。一九五九年，中国科学院辖下设有一百零五所研究院，而苏联只得八十七所，但中国科学院只有七千名研究员，而苏联却有一万四千名。

中国严重缺乏高级科学家的情况，大概将会持续一个长时间，特别是在原子能建设的需求这一方面。即使到现在，她的一百八十名主持高级部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中，有一百五十名是在外国受教育的，而在这一百五十人当中，有八十人是美国的留学生。

大众科学或“群众路线”科学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这个机构为代表，该协会包括有四十个学会组织，上至高级科学家，

下至一个名为“农业机械学会”的组织，后者最近才吸收了三十六个“农民发明家”为会员。在较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传播科技知识会”(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的范围更大，它的会员人数达三十万人，里面包括了教授、工程师、研究员和技术人员等。它还出版了几份流行于群众中的受欢迎的科学杂志。单在上海一地，它的会员在一年内便向群众发表了一百六十篇有关人造卫星的演讲。

在革命前，中国没有作过系统的户口调查，而有关文盲的详细情况也无可稽考。官方估计文盲人口从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五不等，但大概来说，农村人口属文盲的远远超过百分之九十，而在少数大城市里，该数字可能是百分之七十左右。就在日本侵华之前，国民党的统计数字表明了小学生的人数大约是一千三百万，即相当于适龄入学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或百分之十五。在抗战时期，这样低的水平还要直线下降。一九四九年，在十个成年人中，大概也找不到一个人能阅读和书写的。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事业机构的增长和人民群众间阅读及书写能力的发展，肯定会使任何的访客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访问了许多高中、初中和小学校之后，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中国在把广大人民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在为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灌输一些科学和工业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取得了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进步。虽然，过程的重点还是以量而不是以质为主，但是，可以比美苏联及西方的标准已在所有先进的学术部门中逐步实施。

我在北京最获益的日子之一是用于和一位教育部的负责人会谈。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现在五十刚出头，能说一点点英语，不幸患上了眼疾症。他告诉我说他每天要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在我第一次到(中国)西北时，他是在西安工作的一位年轻教师。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游击队；自此之后，他多年来都是在农民中从事着教育工作。

如在苏联一般，中国的国家预算也是将“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支出列为一条总数，在一九六〇年，这类支出达到人民币(下同)八十六亿二千万元，亦即全国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十二。在一九五三年，国家在教育和科学两方面的预算已达十八亿六千四百万元。该负责人指出，到一九六〇年，专用于教育和科学的款项增至六十四亿元(约二十六亿美元)，或比直接的军事预算多百分之五十。各工厂、公社大约也将它们本身的预算中相等的比率用诸教育事业上，因此，该项投资的总数，实在已达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在一九六〇年，美国的各级教育费用少于全国收入的百分之四，较美国人在烟酒方面的消费(约一百八十亿美元)略低。然而，这个比较的重要性却因以下的事实而受到了限制：在中国，国家教育预算既包括了教育管理的费用，也包括了用来建设教育机构的投资。比方说，在一九六〇年，“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和科学”的费用较诸一九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在这个数目中，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七”——这是财政部长李先念的报告。美国议会图书馆的利奥·奥林斯在一篇精心杰作中指出：“不可否认，共产党的中国人在扩展该国的教育系统的工作中，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他们的

观念中，教育“是和灌输思想，宣传和鼓动分不开的”。这段话也相当值得重视。

经过了总的考察之后，这一位教育部的负责人将过去十年来教育事业方面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重建教育事业的经济基础。当时，从交通事业到教育事业，哪样不是一个个烂摊子呢？国家实在已陷于破产的境地。解放时，所有的学校都关了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教师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不论在国立或私立的——后者大多数由教会办理的——学校里。”

第二阶段——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这个时期刚好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同时。这时候，我们开始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好了系统性的准备。当时，中国共有二十一所教会书院和高级学院，超过五百所私立中学和一千二百所小学。很多学校还采用法国、英国、日本的教材，教授与中国无关的东西。因此，大有必要将它们收归国有，引导它们与国立学校的课程需要汇成一致。在这期间内，我们设立了不少高级的专门院校，而特别强调科学和工程的重要性。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将高等教育制度分散和普及。从前，我们的院校学生约百分之七十集中于华东的沿岸地区。现在，我国的研究院和学院遍布各地；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的学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已在内地读书。

“在本阶段中，我们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哲学和道德来训练教师与学生。这件事本身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进行得很顺利。”

第三阶段，一九五七年迄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即一九五八年，我们实行‘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我们努力使学生们成长为劳动人民，并在劳动人民中选择学生。我们还强调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在过去，我们的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八学习技术和工程，而研究艺术、法律、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却多达百分之三十六。那个倾向是错误的。今天，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专门研究理工科。他们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合起来占了大专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我们更创办了多种工程学的分支——总计共十五条。原先只有一系的地质测量学，现在分为八系。在一些学院里，我们有些学生正在专攻一些四到五年课程的前所未有的学科：采矿动力学，冶金学，工模学，电子学，电机学，重型机械学，轻工业学，以及合成纤维学，测地学，运输学，交通学，飞机制造学，原子能学，计数机工程和先进的数学工程等。没有人能够样样皆精的。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必定要分科进行专门研究。”

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中，中国培养了十八万五千名高等学校毕业生，而在“解放”后的头十年中，已毕业的高等院校学生已达四十三万一千名。

在新教育制度的组织中，中国曾聘用了六百九十四名苏联讲师和专家，十七名德国人，十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以及五个印度人。到一九六〇年，留在中国的外籍教师的人数已少到一百名——大多数任教于工程系和高级物理系。外语在高级中学中属必修科，但到进入专上学院之前，这种学习还是很初级

的。在一般高等学院里，外语课统属俄文和英文的天下，在英国文学课里，教材除选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外，还采用毛泽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作品的译文，作为主要的教学资料。一切科学系的学生，当然都以外语来学习科技教材，专家们则到外语学院上课。

一九六〇年，完全中学的学生达一千二百九十万人。一九五九年的小学生人数足可组成一支巨大的儿童军队，因其总数几达九千一百万人，在七十三万七千所小学注册，教职员工也达二百五十万（小学生的人数有可能包括了成人学生在内）。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说，除为数极少的偏僻与落后的地区外（最显著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是强制性的。一九五三年，中国的人口调查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四岁以下的孩子共有八千九百五十万人。预计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间，登记入学的儿童将达二千一百万人。

一九五七年时，周恩来总理曾经估计全国的文盲人数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经过种种努力之后（包括成人学校在内），这个数字到一九六〇年时已减低到：农村——百分之六十六，城市——百分之二十四。如果目前这个群众性教育的进度保持不变，到一九六七年，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人，便罕有目不识丁者了。

在整体上来说，大学教授是最高薪的阶层之一。在一九六〇年时，他们被划分为十二个等级，最高一级的教授月薪高达三百四十五元，最低级的学生指导员也有六十二元。一位教师的等级由教学能力、教龄和一般地位（如政治因素等）来决定的。很多人还靠写稿，有收入的演讲，著书的版权费等方法增

加收入。一般的中小学教师分为十级，月薪从幼儿园助理员的二十六元五角开始，到高中教师的一百四十九元。

在海外，有关中国“工作——学习”结合的教育制度传说纷纭，颇有疑窦。针对这种情况，这位教育部的负责人特别作出以下的解释：“这种‘工——学’结合的制度有三个不同的处理法，皆按学习的性质，种类而定。一个农业系的学生耽在农场的时问，显然要比一个搞理化研究的学生为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三种处理法大致如下划分：一、假期一个月，实地劳动四个月，课堂学习七个月；二、假期一个月，实地劳动三个月，课堂学习八个月；三、假期两个月，实地劳动一个月，课堂学习九个月。我们将这三种安排分别略称为“一——四——七”，“一——三——八”和“二——一——九”。

“实地劳动实际上就是实习。工程系的学生参加堤坝、桥梁、发电厂的建筑工程；地质系的学生要进行勘探或土壤分析的工作；医科学生到卫生院和医院去实习；化学系学生可能要协助建设化工厂；其余学科的学生的实地劳动可照此类推。不少高等院校管理及经营本单位的农场，果园和养牛场。有些甚至设有钢铁厂。

“在一般中等学校而言，学生每星期要劳动八到十小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们很早便开始这种学习结合劳动的制度。一般的小学生每星期都要到校办小工厂去劳动四到六小时，或做些由他们的教师指定的工作。”

“政治学习是随时进行的吧，我的意思是——不分课外与课堂？”

“差不了多少。在教室里，每十小时学习中就有一小时专用

来作社会主义教育，内容包括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以及讲义。”

“总的来说，一个学生在大学的学习时间(除了劳动和政治学习之外)的百分率大约是多少?”

“约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不少于百分之六十。”

所有的学校都是免费的，包括高等学校在内，而且也不用收取寄宿费。大部分的大学生还从国家支取津贴费，足可支付他的膳食费用，并可留作零用钱。

过去，很少农民或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能进大学；到一九六〇年为止，曾经到高中或学院学习过的党员也只有百分之二十。这种情况已经大大地改变过来了：一九五九年，“占百分之五十强”的大专院校学生来自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家庭的——有别于其他来自“脑力劳动者”或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倘若上述情况属实，这确实是一个革命的改革，其结果恐怕在十年后，西方仍未能彻底了解。成年的农民也受到鼓励，热切争取在国家帮助下，接受高等学校教育。若他的学习能达到学院级的程度，他们的一切费用便统统由国家负担，此外还每月发给他们四十元津贴费，足够在他们学习期间养活家庭。

“除了眼疾之外，什么是你认为最头痛的事呢？我的意思是：教育部目前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在整个教育事业中，最大的难题大概是使教育出来的人才同时满足科学、工业和农业的需要。我们尚未能赶上发展的需求。几年前，我们极端缺乏工程师，这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外国顾问的主因。上述几方面的需求，我们已开始逐步赶上，

但在自然科学的教师和专家的人数方面来说，我们还远远落后于需要。

“到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时，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将明年度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培养成哪一方面的人才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方面得到密切的指导。但在今天来说，订下的计划在一年后便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需求了。各种各样预测不到的一些问题涌现出来。故此，我们只好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将某条战线上的学生重新教育，用以弥补某些突然出现的新漏洞。既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又不会搅乱和使整个教育制度脱轨，确实是一件微妙的工作。”

“那么，大学考生岂不是不用自己选择职业与专攻科目了吗？”

“情况倒不是一定如此。当然，投考范畴的限额都在高中公布出来，而学生们很早便可以准备选择其中一两项。他们人人都要作选择，但要由学校当局按国家的需要来作出决定。”

在这十年内，每年报名读小学的人数增加了四倍，中学生增加了十倍，高等院校增加了七倍左右。小学生进入高级中学肄业的机会是七比一，高中生进大学读书的机会则是十六比一。这个机会率已经是真真正正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是，由于等待接受教育这个金字塔的基层委实扩展得太大，所以，争取在初级中学或高级中学取得学位的竞争是极端激烈的。学业上的成绩不能作为取得成功的保证。在两个成绩相当的学生中，根据下文所述的官方标准，肯定是“政治上最进步的”将会取得优先权；

为了保证新学生的质量，各地高等教育的负责当局和机关应该按照统一条例，严格检查新学生的政治背景，学业程度和健康情况，并按照这个基础来决定录取的先后。在新学生被录取之后，高等教育机关还要重新审查他们的“政治和健康标准”。如果发现他们不能在这两方面适合要求，便应取消其继续学习的资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新华社消息）

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期间，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大学生在接受当教师的训练。土木工程次之，占百分之三十一；农林学又次之，占百分之六点九；医科与其他各系的科学排第四位（到一九六一年，医科学生超过了百分之十）。文艺系的学生列于榜末，人数更少。高等教育机关每年的招生人数从一九五二年的六万五千九百人，跃升到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八万人。虽然学生们要进入指定的学校，但如这位教育部的负责人所述，他们可以选择出自己的爱好——学科任择其三，学院则任择其五——这些选择将得到上级认真的考虑。

“你认为在这十年的新教育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我向教育部的一位姓崔的负责人提出了以上的问题。

“我们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正竭力改正。我们曾企图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群众性教育制度，但却没有和生产需要完善地结合起来。今天，我们有九千一百万个儿童进入了小学，明年度肯定会更多。从逻辑上看，我们应该预料到在十年内，将有五千万或更多的孩子进中学读书。但是，我们的经济显然不能让这么多的劳动力抽掉出来。

“因此，从现在起，初级和高级的教育都要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地解决人力分配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在将来，必

定会有更多的‘劳——学’结合，而决不会少于现在。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的基本概念。”（最后的一段话是按教育部门负责人讲话精神由作者加上去的）。

五千万个高中生！美国于一九六〇年度注册的高中学生人数约相当于同年度中国的初中学生。然而，如果中国在五十年代的学生增长率保持不变，到一九七〇年，她的高中学生与大专院校学生的人数将是美国的五到六倍。谁来养活他们呢？现在总算弄明白，经济的增长率尚未足以支持这样将劳动力大规模地牺牲在一个完全靠别人供给粮食的教育制度上。

过去十年来，由于实施了全国性的强制小学教育，于是在（一）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二）国家继续需要农业劳动力及工业技工人数量日益增加的需求这两个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矛盾。在旧中国，能够接受小学教育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所以小学毕业生便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如今，很多新毕业生发现他们一定要回到农场和工厂去。

大概在海外最被人误会或曲解的事情，就是有关中国将实际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企图，以及使教育适应这个致力于从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真正需要的做法。虽然，在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句口号时，确实曾发生过谬误和愚昧的情况。例如，我有点怀疑，将一个我所认识的微生物学家送到农村挖厕所究竟有什么好处。但是，在我所见过的一些（毫无实践经验的）中国官僚的手里，地心吸力的法则真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错误定律呢。总的来说，在中国，尊重劳动和将书本知识与有关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原理，是

健全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它只是为了防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知识分子高于一切的社会复活，这种努力已经是很有价值了。这种对劳动和农民阶级的侮辱广泛存在于国民党中国的统治阶层，在孔子的信徒中也很普遍（印度的婆罗门教人也是一样），它也说明了这个国家为什么会一度濒于灭亡的大部分原因。

（新教育的）目标并不是想将知识分子完全转为工人，而是教育他们认识劳动的意义。“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个口号的意义，是将工人阶级提到人人都可以掌握知识及它的实际用途的地位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存在着一条平行的学校制度——到目前为止尚属试办时期——称为“业余教育”，这种新事物在外国还未有所闻。

注（一九七〇年）：本章内容及以下对科学、学校与教育活动的评论似应限于一九六六年中期之前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有组织的教育暂时停顿下来。所有的大学及中学校都被关闭，使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开始是由新生的红卫兵组织领导）和其他造反派能进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进行教育改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及一切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影响，都要由包含纯正的无产阶级内容、方法、和思想的教育所代替。那表示将中小学重新组织，将教学及管理责任直接放在工、农、兵组成的委员会的手上。学校教育于是分为结合实际的工厂教育，农村教育和课堂教育。在选择工农学生接受更高等教育时，政治因素较学习能力占更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七〇年，这种新的教育制度仍属试验期——教师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

业余教育“部”

“美国的工会头头可能会告诉你们，我国的工会是由共产党操纵的，它们是共产党的工具。是真的吗？对，它是绝对真实的。我们是共产党的工具。在美国，我怀疑没有任何的工会领袖会这样谈及他的工会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副主席笑着打趣说。

时间已是晚上八点了，地点是在北京长安街五巷的宏大的总工会会所。这位工会副主席已接近五十岁，身材健硕，穿着一件黑绒上衣，同质的裤子，黑皮鞋。一位妇女坐在我们一旁作记录，一边还做着其他工作，直到我们在午夜结束谈话为止。他在这间布置简单的办公室吃过晚饭。他注意到我正在注视着邻房的一张帆布床。

“今天晚上我准备在那里过夜，”他以手指着帆布床，说：“通常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包括指定的办公室工作，然后就是一切会议。今天我和某些省份的工会领袖谈了整个下午，在晚餐时间，我们结果达成了协议。现在他们都回家了。”我获悉他是延安学院的老兵，二十多年来一直搞工运工作。

他继续往下说：“我们的工会之所以受共产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工人党。如果美国的工会领袖坦白说出真相，他们就要说他们是由资本家领导的；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即使真正的同业工会，最多也只能搞些争取暂时小利益的斗争，那可分毫损不到资本家；他们会同意增加工资，但却会提高物价，把整个社会变成牺牲品。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经理、工人和政府统统属于劳动人民，他们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互相合作。”

“我明白这种理论，”我向他说，“但是，譬喻说，倘若一个鞋业工会在为军队制鞋时想争取较高的工资，举行示威，那会有何后果呢？”

“你明白了理论，但却不明白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工会的主要工作是教育性工作。让我来谈一谈吧。我们管理的学校差不多有教育部那么多。事实上，你可以将总工会称为业余教育部。我们办的学校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给工人提供政治教育，包括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毛泽东主席的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并包括了国家政策与目前工作的教育。第二个目的是给工人提供技术与文化的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在政治上，技术上和文化上适合管理国家经济的男女工人。

“我们还有两件附带的工作：组织工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支持生产运动，保持士气和热情。在这件工作中，我们的四条指导原则是：与他人比较；不断学习，永不停止；赶上比自己先进的人；帮助落后的人。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哲学，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力求做到的。

“我们另一个任务就是在物质与文化两方面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我们向政府提议调整工资，并且一起订出工资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人们的工资在十年内已提高了两倍。”

他断言在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日报》所发起的运动中，暴露了在一些国营与私营的工厂内都仍然存在着劳动榨取制度的现象，这件事引起了重大的改革工作，包括八小时工作日的规定。

“当经理的人真的是工会会员吗？”我问道。

“主要决定于他的行业。在某些情况来说，在国家部门的人，每一个都是工会会员；例如，铁道部长和他属下的职工们都是工会成员。”

在其后两小时内，我们再未有提及有关鞋匠罢工的事。这位副主席——显然是一个具有巨大精力与细心办事能力的行政人员——进一步解释他的主要问题：业余学习。

解放战争前，所有的工会都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有如今天之由共产党所控制一样。一九四七年，全国工会的会员总数约为五百万。一九六〇年，全国的工会“约有四千万会员”。那包括了四百万的城市手工业工人和一千七百万重工业工人和国营工业工人——用以有别于办公室职工及雇员。约有二千五百万人（约为百分之六十）正在工会学校内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使城市中有组织的工人中的文盲大为减少——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八十五降至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五。

（在工人学校中）最低级的是识字班，工人们学习读报纸所必需懂得的一千五百个中文字。他说，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合格。很多要经两次进修，超过五十岁的人时常觉得困难重重，难以成功。考试及格的将继续以下课程：

（一）初级小学：目前有一千三百万人正在进行着流水作业式的学习课程——文学，数学，自然科学，地理，历史和政治（马克思主义）。“没有时间唱歌，舞蹈，音乐和运动，”他严肃地说。快者两年可以毕业，慢者四年。按国家规定，每个工人和农民学生在全年的学习中，最低限度要有二百四十小时作上课之用。

(二) 初级中学和技术中学：四百万工人正在学习着 基本数学，科学，工程及政治。这段课程持续十八到二十四个月，毕业了的学员要继续进入：

(三) 高等学校，再接受十八到二十四个月的教育。这个阶段的课程有：数学，科学，工程学，会计，工厂管理，加上历史的讲义和马克思主义。这类学校招收了一百五十万工人，并准备派人升入：

(四) 业余大学：目前入学的有四十万人，有能力完成整个大学水平的课程的学生，要进行五到六年先进的学习。这些人当中，有些成了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工厂经理，数学家，计划专家和先进的共产党员。

业余教育计划始于一九五一年，但目前既接纳工人，也招收农民的制度则始于一九五五年。该年度，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总工会召开了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计划，期以十年，扫除文盲。一九六〇年一月，国务院设立了一个业余教育委员会（代表教育，文化，科学，经济，国防等部门；工会；党及其他组织），将全国范围内的类似活动统一起来。在我与总工会负责人会面之前六个月，据报已有一亿三千万农民报名，加入识字班和业余小学，主要是由新开设的公社群众教育福利部门推动的结果。

“你认为这一类的业余教育制度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吗？”我向他提出疑问。

“我们曾经研究过五十个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阶级背景，”他这样回答说：“他们之中有四十个——包括你们的爱迪生和福特在内——出身于劳动人民的阶层，并且大部分都是自

修生或业余学校学生。”

当然，在现代世界里，推广教育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但是，其他地区相信再不会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规模了。学生们每天花二到四小时进行课堂工作和学习，加上在厂房里干活的时间，表示每天要干十到十二小时，每星期工作六天——需要消耗颇大的热量呢。教师们的工作时间，最低限度也一样长，极可能更长一些。整个业余教育计划只有三万名专任教师。全中国都闹教师荒，工会学校从教育部借来了七万名职业教师担任科任教员（支取额外薪酬）。我参观了很多业余学校。习惯上，它们利用俱乐部或工厂的饭堂和休息室作上课之用，但车间也常常是上课的场所。我看过工人们在机房的角落里召开会议；学徒们围在他们学习操作的车床边，聆听老工人讲课；在新工厂周围绿草如茵的园地上，一群群的工人聚在一块儿，交换有关设计图样的意见；而党的领导人则在新桥梁和堤坝的建筑架下，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每个工人都随身带笔记本和铅笔，你还常常可以见到一本教科书从他的袋中突了出来。

对那些不及格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在小学毕业年龄十三岁，初中毕业年龄十六岁，及法定的全工年龄十八岁三者之间，还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半工读的学校继续让这些年轻人接受教育，除学习外，他们要在工厂或田地里工作半天。此等学生也可以隔日作整天的学习或工作，或者三天学习，另三天进工厂或拿起锄头。

此外，在总工会的赞助下，另外两类试验中的学校也办起来了——主要是为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人而设的：“学校——工厂”——四小时在厂房工作，六小时学习；和“工厂——学

校”——六小时在厂房工作，四小时学习。在六小时工作日的工厂里，不设午饷休息时间，但工人们可得全日薪酬。总工会的负责人指出：“生产额并不比八小时工作的工厂低，效率却较高一等，热情是最高涨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试验只限于十万名工人，学习高级技术水平的工业。”

总工会的活动还包括了开设和管理数达三万二千个的“文化宫”或俱乐部。其中有些设在货仓里，但是所有新的卫星城里(指工人新村)都有着这一类的俱乐部。在旅顺港，我走访了一个海员康乐中心，里面设有一个二千座位的剧场，一座大图书馆，一个自助餐室和一间大堂。在哈尔滨的松花江畔，我看过一座作此种用途的建筑物，红墙绿瓦，壮观异常，真可以称之为宫；里面设有划艇，游泳，乒乓球，跳舞，及其他含有各种教育性吸引力的娱乐设备。各工会还组织了三万九千个戏剧及歌剧团；这种努力主要重于量的一面，尽量吸收更多人参加。各地工会还组成了二十万个运动组织，有三百万人参加，并设有约达三万个工会图书馆，共有藏书八千四百万本。工会也开办了二百一十个工人休养所和疗养院。我在大连市海滨参观过一个矿工休养所，舒适地坐落于过去一个专为日本军官而设的妓院里。另一个休养所则设在从前一个日本富人消遣时光的俱乐部里。

工会会员重要的福利包括有免费医疗，业余教育，意外保险及养老金和疾病补助等。工会的财政来源靠国家支持，办法是将各企业单位总工薪额的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的比率拨作工会经费之用。会员们则按薪额支付二角五分到一元的注册费，会费则为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工会的一切活动都与共产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紧密配合起来，用以唤起并保持完成生产指标和组织指示的热忱。各工会及分会都特设有委员会，随时准备好旗帜、标贴、墙报、图画及漫画等，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从宣传“工业战线支持农业战线”的政策，到目前最常见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美帝纸老虎侵略台湾的口号。他们组织队伍在工作时间内，敲锣打鼓的到车间赞扬和祝贺劳动英雄们。他们详尽地记下每个人的进步速率，并标贴布告和张贴创下生产纪录的工人的奖状。他们使整个工厂都充满了音乐和标语，他们是不倦的组织者和联络员。

工会是按人民共和国的工会法组成的。选举方法以国家选举法为蓝本。只要有十个或十个以上工人或雇员的地方，便可以设立工会，并选举主席和小组委员会。各工会的分会选举代表参加当地的总工会，后者再选出代表参加地区或市的总工会，如此直到最高级的代表会。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管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事务，并且拥有极大的监督权，可以解散和重组任何的工会。在每一级的组织中，工人们都受干部的领导，他们合起来成为一个管理部门，权限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劳工部的官员。总工会的领导人和劳工部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我又旧事重提了：鞋业工人罢工又怎么办呢？我所得到的答案可浓缩如下：

罢工的权力是受法律保障的，解放初期也确实偶然发生过一些局部的罢工行动。在中国来说，劳工的争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一个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罢工或怠工时，完全是由于基层领导的错误，而争论往往由上一级

便可解决了。全国性的罢工是不可思议的。“为争取较高工资而引起的罢工是不会发生的，若工人们受过正确的教育，理解到工资是由国家按生产价值的标准而定的话。当然，国家决不会从中取利，而只是为人民而工作，为争取人民未来的幸福生活而将国家的余款投资到有用的事业中去。”但万一鞋匠们仍然要提高工薪呢？在工薪总调整的时刻来临时，他们的意见一定会受到考虑。与此同时，鞋匠们可能要接受较多的政治教育。他们也可以更努力工作，或参加业余学校学习较高级的技术，这样或能够争取去干一些较高工薪的工作。

“各工会不能为争取某一同业工会的狭窄利益而置全民族的利益不顾。”工会是共产党的“工具”——如这位总工会的负责人所说的，党则代表了“全国人民”。

但教育工人并不是一条“单行线”，如毛泽东经常强调：教育者必须先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指出了有关上述的情况）：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的、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

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访钢铁学院

中国各省份都有其独立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北京仍是众所公认的“中国的雅典”，她吸引了逾十万名大专院校学生，即约目前全国注册的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他们有些仍然趋向于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旧北京共有十一所学院，约有学生一万名，从前最首要的就是国立北京大学，那里培养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创造者。到如今，北大还是雄心勃勃的艺术和科学系学生以及已毕业的研究人员向往的目标。单是北大注册的学生现在已有一万一千名。在京城外近颐和园的地区，就是那“有钱人的大学”——燕京大学，由教会团体所创；附近还有清华大学，当年也是由外人撑腰的。燕京大学现已被吸收为北大的一部分，并且大规模地扩充了，学生人数已超过了七千名。我重访了这两所大学，并到城北的新学院群参观了一番。

这座最近才发展而成的大学城的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它拥有气象学，经济学，地球物理学和物理学，语言学等学院。周围就是占地广阔的各大学、各学院、各高等学校的新校园，专科学研究医药、石油工艺、航空、农业、采矿和冶金、音乐和艺术等；此外还有颇为重要的师范学院。为了说明它们的密度，

现特举地质学院为例：该学院现有学生人数较诸一九四九年以前毕业的地质学家总数还要多。

在我访问的钢铁学院里，一位姓胡的干部既是主要的行政负责人，也是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方式据悉是受欢迎的。我觉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负责接待的党员是名副其实掌有权力的，而不是象秘书一般用委婉曲折的说话与客人周旋的，我的工作就能更顺利地、更迅速地完成任务。党的负责人有时可能不会将我的问题全部解答，但他的位置使他较易作出决定。由于他对我非常合作，所以我第二天再到学院去拍下一套学生的生活照片。

胡是在煤都抚顺出生的，受教育于沈阳师范学校。战时，这位年轻的教师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初时只不过是一个爱国者——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稍后，他逃进山里参加游击队，成长为共产党员，并且与游击队一起打到胜利。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派往北京协助建设钢铁学院，在这里工作直到今天。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们都是职业工程师，但胡是这里的总领导。胡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一件蓝色的棉布衬衣，在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中会见了我们，厅里以半现代化的中式家具装饰，壁上是宋朝与明朝的字画，窗上垂下上绣金色蜜蜂的丝帘。他给我斟上了一杯又一杯由一位学生助手捧出来的热茶。

学院里，风景甚美的校园占地三十英亩，它的工厂包括有四十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另有十一座在建筑中。它有六千名学生，其中九百一十六名是女性。该学院是全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共有教授、助教和指导员七百名之多。它开设了五十七座实验室，十多个试验工厂，一个内有电动炼钢炉的小型现

代化钢铁厂，男女学生都在此接受训练。该厂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指标是十万吨。校园中央的地段是宽阔的运动场和游泳池，都由学生业余劳动所建——在很多大学中，这是很平常的事。

“我们的课程包括有二十三个科目，”胡指出：“还有各种类的钢铁生产法。我们培养出专家和教师。整个课程需五年完成，我们还提供一到两年的毕业后继续研究的工作。学校中有三十多个学生活动组织，如摄影，广播，跳舞，歌剧，戏剧，乐队，合唱队，中西音乐欣赏——”

“有烹饪吗——在集体膳食的时代里，这种艺术是否会失传呢？”

“啊，有的。我们有一个烹饪组；也有一个缝纫组。”

他继续指出：学费和住宿费由国家代支，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还领取国家津贴，足够支付膳费——每月十二元半——而未毕业的学生每月还有零用钱三元，毕业生每月则有五元。其余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他们来自收入每月超过六十元的家庭——大多数农民不在此列），要全部或局部支付自己的膳费——“按情况而定之”。学院的学生包括有四十三个蒙古族人，约五十名挑选入学的回教徒，新疆的维吾尔人，广西的壮族人及云南的傣族人。

“要进入一所这样的学校学习，一定要经过激烈的竞争吧！学生是怎样挑选的呢？”

“那倒是真的。目前求远过于供呢。高级中学每年都有二十到三十万有投考资格的毕业生，但我们的学院一年最多也不能招收超过一千五百名新生。投考者要以成绩，德行与健康水

准来判断是否会被取录。”

“以前的地主家庭的孩子也有吗？”

“对，是有一些。但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我们也录取有限数量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入学——举例来说，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都属这种情况。他们将接受特别教育，或与我们一道多工作一两载时间。一个出身于革命家庭的有前途的农民，或老战士、老革命的儿子，自然有被推荐的机会。”

“由党推荐吗？”

“由党——也可以由学校当局推荐。”

“你们的教师平均年龄很年轻吧？”

“大多数四十以下。少数毕业于苏联。我们约有六十个‘老教师’——超过四十岁——是在战前受训的。”

“你认为你们的教育方法是追随苏联的，还是独立发展的呢？”

“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它们是一致的；我们采用了很多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教材。但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则是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将它称为‘三结合’的技术学习。它将教学，实际的研究工作和真正的生产结合为一体，级级如是。学生们人人都要在我们的工厂里干一段时间，我们在厂里制造一些建筑材料，利用于目前在这里建筑的工程上。我们自行设计和协助兴建我们的钢铁厂。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会儿让我们到那里瞧瞧吧。我们现在正进行着百多项研究计划——各种工业上真正遇到的、令人兴奋的、实际的问题，不断交给我们研究、解决。我们也将学生送到外面的工厂去学习和工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时期，我们派了二千名学生到外面协助搞小型炼钢铁的建设。”

“你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物质和金钱的事吗？批评家说人民放下正常的工作去搞钢铁生产，而后院高炉的产物却是毫无用处的，整个事物都已经放弃了。你对这件事有何意见呢？”

“你应该记着两件事。首先，我们在一九五七年的钢产量还比不上今年的指标四分之一。这个运动是在农村展开，那里，人们对工业的了解是很低的。很多农民将炼钢看成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对炼钢真有点儿怕呢。运动结束时，千千万万的人民都懂得了炼钢的原理。你知道怎样熔化铁和钢吗，斯诺先生？”

“从未接触过这门学科哩。”

“那么，我们的农民很多已走在你的前头了。你本人没有必要认识它，那倒是真的；但在一个正迈步走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重要的是，让人民知道国家正在干什么，以及他们自己是为什么而工作。”

“但贵国政府承认了该运动中生产的三百万吨生铁，是不适宜作工业上的用途的。”

“不错，浪费是有的，但不是全部都是浪费。请你不要忘记，中国常常连废铁也大加利用哩。我们实在太缺乏了。这个运动并不单只产生教育的结果。我们派出的二千名学生协助建立了二万五千座炼钢炉——”

“六十万座中的一部分吧？据我所记忆，官方宣布的总数应该是六十万。”

“大部分都是小型的砖炉，目的不外作演示教育之用。利用我们的学生建设的炼钢炉，我们训练了六万七千名技工。然后，

我们将最好的炼钢炉联合起来，并加以现代化的设备。去年，中国的小型高炉共出产了五百万吨可用的铁和钢。这个数字比我国几年前的全国总产量还要高！”

胡带我走马看花似的参观了一些教室和实验室。他们的内部却不及外边那样吸引人；多是草草粉饰了事，课室的设备如果足够的话，也是平平无奇。实验室里却有精密的仪器；中国现在可以制造大部分的科学仪器，包括显微镜和一些精细的透镜在内。图书馆内有三十万册书籍，也有一些外文的书报。

男生宿舍是两层高的砖砌建筑物，学生们住在狭窄的房子里：四到六人一间房，房内是双层床，没有多大的空间以为工作之用。花洒浴室，洗衣间，饭堂和厨房很洁净，简单朴素，与军营的气氛相去不远。

以下为学校的日常生活：五点三十分，沐浴和更衣；六点到七点，体操(集体的)；七点三十分到八点，早餐；八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上课；进实验室或入厂房去；十一点三十分到十三点三十分，午膳，午睡和学习；十三点三十分到十六点三十分，上课或进车间学习；十六点三十分到十七点三十分，活动或学习；十七点三十分到十八点，晚饭；十八点三十分到二十二点三十分，学习，俱乐部集会，政治课；二十二点三十分，鸣钟熄灯休息。星期六与星期日两天用于自由活动，主要包括有学习，俱乐部活动，运动，看戏或特别的组内活动。每星期六晚都举行一个交谊舞会。

“你喜欢到女生宿舍看看吗？”当我准备离去时，胡先生向我问道。

自从离开苏联以后，我便未有机会和女工程师谈话了，我

更从未与中国的女工程师谈过话呢。因此我马上回答说：“当然啦。”第二天的访问使我能与“小电光”以及她的同房同学们会面。

翌日，胡带我走过一条柳树成行的小道到女生宿舍去，那是一列长形的砖建房子，金字顶、两旁开满镶上木框的窗户。两个穿着茶褐色长裤和白色棉布运动衣、头上扎起辫子的姑娘，正在把刚洗净的内衣晾在没有油漆的木制楼梯扶手上。她们抬起头，看到我们，不禁尴尬地笑起来。学生宿舍室长走上来，带我们上了三楼，一些刚洗完澡、头发还未干的女孩子，在我们身旁跑跑跳跳地走过。

“象我们这样走进来方便吗？”

“她们正等着我们呢，”胡先生说。宿舍室长大声宣布我们的到来，并跟六间相连的房间中的女孩子打了个招呼，叫她们作好准备；她邀请我，说随便到那一间瞧瞧都成。我走过两三间房子，打里头望了望，室中的人都颌首请我进去。这时，一位梳着两条马尾辫子，脸上带着盈盈微笑的姑娘对我叫道：“我们请您到里边来”，她后面三位同房的也连连点头，表示欢迎我去访问她们。

走到房子里，只见面积约为十英尺乘十二英尺，放着两张双人的两层床。在几只法国式窗子之下，在两张双层床之间，放着一张工作台，上面盖着一块白台布，台上有一盏小台灯，一个暖水壶及一尊毛泽东的小雕塑像。床下空位仅可堆放女孩子们存放自己用品的帆布袋或木制的旅行箱。此外还有两张简陋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在用白灰草草粉饰过的墙上，挂着几件衣服，裤子和外衣。头顶之上还吊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

我回头打量一下与我点头招呼的那位女孩子，她面上有几点痘痕，长得并不很漂亮，但充分表现了她的性格。她有一双明亮、愉快而勇敢的眼睛——但尚未致能直接注视别人那般勇敢。她的家乡(河南省)的妇女都是不会害臊和畏缩的，相反，她们是以她们的独立能力闻名于国内。大多数河南妇女的动作也是大幅度而缓慢的，但这位姑娘却很利落潇洒，她的名字叫蒋楚杏(译音)。

我向六个拥进房内的女孩子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以下是我引自笔记本的答案。

第一位(蒋)：出生于河南省郑州附近，二十二岁。贫雇农女儿。双亲都是文盲；母亲现在刚能读小蒋写给她的信。家中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童年曾到地主家当厨工。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上过一年学，那时她已经是十一岁了。“解放”对她来说，显然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自出世到解放时，她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她回忆起在闹饥荒的一年中，她家要以树皮充饥。那时，她连一件象样的衣服也没有(现在有三套了)。她的父母分到了一些田地和用具，她被送到学校去念书；生活完全变了个样，“象走过了通往天堂的桥一般”。她努力学习，得到了党的支持。现在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较她班中同学的平均年龄大了三岁，将于二十六岁毕业。她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第二位(何)：生于河北省，十九岁。父母是小地主；战时背离乡井到河北海岸的矿城唐山去。土地被充公，他们留在唐山。目前，双亲都在那里的工厂工作。“他们很热爱他们的工作哩！”

第三位(林)：湖南省出生，十九岁，长得很漂亮，也是小

地主的儿女。土地被重新分配——由村里的合作社接收了。父母接受了六个月的“再教育”之后，参加社会活动。对她没有歧视吗？（那时她还是小孩子。）完全没有——她回答说。完成了正规的小学与中学的学习后，她凭着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学院的学位，现在读三年级。

第四位（宋）：生于江苏省，二十岁。父亲是“知识分子”，中学教师，非党人士，但支持革命，现在扬州教书。有三个弟弟。她是二年级学生——也是共青团员。

第五位（王）：山东省人，二十岁，三年级学生。父亲是铁路工人。两个哥哥也是铁路工人，并且都是党员。

第六位（许）：河北姑娘，十八岁。父亲以前是天津市的清道工人，也挑煤球（以煤屑搓成）沿街叫卖。解放后，当上了技术工人。父母现在都在工厂工作，住在一幢有三间大房的新建筑内，生活得“比梦想还要好”。

“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当工程师呢？”其中一些回答是：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我们要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并且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那些答案都是依书直说而已，”我说道。“在你们听闻重工业，社会主义或帝国主义之前，你们一定曾经有过一种野心吧。最近，我在某医院里遇到一个护士。她告诉我说，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一个妇女穿着一件凉爽、新净而洁白的制服时——‘看起来就象仙女一样’，她便开始期望长大能当护士。你们还记得，在你们认识到国家需要工程师之前，自己有想当工程师的欲望吗？”

“小电光”急促的声音响起来了，她是整堆人中最能言善道的一个。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有一回，我见到在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部货车。我说：‘我真想能驾驶那部货车。’我的哥哥听到我这么说，都不禁笑起来。在后来的一段长时间里，我决心成为一个货车司机。解放后，在上学和放学的途中，我看到了无数的货车、拖拉机和铲泥机在一座堤坝上车前倒后，忙得不亦乐乎，但我又看到是工程师告诉他们应做什么，在那里卸材料等。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和这些驾驶铲泥机的男子汉竞争，但我可以运用我的脑筋，当一个工程师。”

“很多男人说女性不能当工程师，”我煽动地说：“特别是钢铁专家。这种工作太艰巨了。研究工作，划则工作，建筑设计等或许可以，但女性真能干重活吗？”

她们全体都热烈地保证男同学干的她们都一样干了。初时曾经存在着让她们干较轻便的工作的趋势，但她们人人都到炼钢炉旁工作，做着同样的重活，冒着同样的危险，她们要求在工作分配上取得完全的平等。我知道在三门峡兴建筑水坝时，第一个自愿带着钢缆横渡急湍的黄河的是谁吗？是一个女工程师！

她们越说越激动。这时，我抱歉地对她们说，我也曾听很多厂长和工程师说过，妇女们操作起重机要较男性为佳，而且在一些需要精确地掌握时间的工作中（分秒之差与生死攸关），女性确是较为可靠的。这样一来，我便迅速地使自己成为记录上一个拥护女工程师的人了。

“我希望你们都会承认，”为了使自己站上较有利的地位，我

扭转了话题，说道：“两性共处总比一性独存为佳。举例来说，男女同校的学院较单独的男校和女校好吧？在一间九男对一女的学院中，身为女学生的总是多占一点利益的，是吗？”

这次没有人否认男女同校是一件好事。“较女校好得多哩。”“十分好！”“性别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是工程师！”“我们这里没有性别上的歧视。”

“有很多女孩子在学生时代结婚吗？”

“很少的。通常我们都是毕业后便结婚。”美丽的湖南姑娘林小姐说。此语刚落，其他女孩子们便纷纷取笑她。“哦，你是说你快要结婚啦，”她们说道。现在，学生婚姻是绝对不受鼓励的。虽然合法的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但这些姑娘们都认为“正确”的结婚年龄应该是：男，二十三岁，女，二十一岁。（按〔一九七〇年〕：在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一九六三），国家和党促请男子在二十七岁，女子在二十五岁之前不结婚。节育宣传也与该通告同时发表。在早婚与多产遭到劝诫的同时，目前受欢迎的“理想”生育数目是每对夫妇两个孩子。）

胡先生不知到哪里去了，因此我征询翻译员对以下问题的意见：若我向她们问及对节育的看法，会不会冒犯这些姑娘呢？他认为我可以提出来试试看。

“你们之中有人反对计划生育吗？”

“当然没有，”蒋小姐说。其他人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让我这样说吧。结婚后，你们想有多少个孩子呢？”

“那不单是我的决定，也要听我丈夫的意见——并且要看社会主义的需要。”山东姑娘说。“个人来说，我想两个便够了。”

“两个!”“三个!”“两个!”小家庭肯定是较受欢迎的。

“如果你们生了两个或三个都是女儿,便怎么办呢?难道你们不是最少要一个儿子吗?”

“那是封建思想! 我们不会分得这样清楚了。”个子细小的河南发言人说。她们全部都参加批判男性至上的旧观念。

多提几个问题之后,我探出以下的消息:节育的技巧是人所共知的,她们经常分组讨论社会卫生。她们也指出,“生活的真相”在电台的节目中也常有讨论,并用最精确最详细的语言,向各种年龄的听众解释避孕的方法。我很想问问她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意见,但这并非一座卫生院。我早已听说过这种问题,常常被人认为是太露骨并太使人吃惊,即使对一些完全成熟的成年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将这个问题留待另一机会再提出。

“我们这样谈话太一面化了,”我说道:“你们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你们要向我提出些问题作交换吗?”

她们同声叫好,一齐举起了她们的手。

“你说你曾在北京居住,并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新中国的事物使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穷人们的机会无限地增加了,那是十分明显的。一个贫农女儿能进大学念书,肯定是前所未闻的。过去,大学主要是为上层阶级而开设。”

“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你们的学校里,妇女们能学习工程学吗?”

“她们能够,并且也有人学习,但我要指出,情况对她们是不利的——我的意思是:对这种做法,社会上存在着极大的偏见。”(注:在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美国颁发了一万三千

六百零二个工程硕士学位，七十六个颁给妇女；一百四十六个女性和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九个男性获得工程学士的称号。一名女性和七百一十三名男性接受工程博士的名誉。——见美国教育局一九六九年度《世界年鉴》)

她们全体都微笑了。这是她们所希望听到的。

我问她们：“你们是否认为你们比美国学生快乐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嘲笑的嘘声、笑声和充满诧异的叹息声。“多么古怪的问题！”她们问道：“除此以外，在你的国家中只有富家子女才能进大学念书。贫苦农民有机会吗？”

这倒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怎样解释(一)美国的农民永远不会把自己看成是贫苦农民的呢？(二)只要五百万个农民便可以养活整个美国的人口呢？(三)按百分比计算，只要二千万个农场工人，便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整个中国(而不是象中国现在要二亿到二亿五千万农民)呢？唉……

“是的，农民们也可以进大学——对，他们也进大学的。”

“贫农也能进大学吗？”

“没有那么多贫农呢——我的意思是穷苦的农业工人。当然，进大学是需要钱的——”

“分别就在这一点。在我们这里，教育是免费的，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在美国，大学主要是为有钱人而设的——是为了赚钱的。”

“不，较正确地说，美国的大学是为教学生怎样去赚钱而设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其他国家实行免费教育之前很久，美国已经有免费教育的制度了。我们有免费的小学和中学——在大多数地区是强迫性的。但在较好的学院和大学里，学生们

要付学费，住宿费，膳费，及一切费用。那就是有利于有钱人的地方。”

“自然啦，”“小电光”说。“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教育就是资产阶级统治。那是旧中国一贯的教育制度。”

“很高百分比的美国人——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能够凭借着助学金和课余工作完成大学的课程。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你们都相信斗争吧，不是吗？”

“斗争是重要的，但是，只是有觉悟的阶级斗争才是有意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奋斗只不过表示：成功者便可以加入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去。”

正常的晚膳时间已经到来，并且又过去了。我被她们强留下来一同用膳。她们每次开口邀请我时，我已拒绝了，因为我晚上我还要参加一个宴会，但当我起来告辞时，她们都坚决挽留。她们真是好奇得很，大概她们对我的好奇心比诸我对她们还要大；她们之中有三个人从未见过美国人呢。在离别之前，我更进一步知道她们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很好。

“有一件事可能会使你们觉得惊奇，”我对她们说：“这就是很少美国青年相信他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制度之下。多数美国人认为帝国主义表示拥有殖民地，而美国人却认为自己并没有殖民地。历史学的学生会向你质问：如果美国真是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在世界大战时，它会帮助苏联对抗希特勒。胜利后，美国占有了世界财富的一半，一千五百万未受损伤的精锐部队，最强大的空军力量，最佳的海军，并有人控制了十二个国家和殖民地。为什么美国不霸占它们来建立一个殖民地帝国呢？”

“帝国主义者害怕苏联。”

“苏联当时元气未复呢。同时她不能抵御原子弹。”

说到这里，房子里沉寂了一会儿。然后，一位说话较少的年轻姑娘思索着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这样一回事的。”

“小电光”却不让问题就此了结。“当然，帝国主义不会只走攫取殖民地的老路，”她说道：“它要将经济上隶属于它的国家的生产资料与资金独占。它也代表了要取得庞大的利润，要将经济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去鱼肉人民。在一些国家中，人民的革命力量越来越大，而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却要制止革命、支持反革命，它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持它的控制权。”

“美国并没有真正自这些国家中撤走。它妄图扑灭中国的革命，但它失败了——除了目前还控制着台湾以外。它企图在朝鲜扑灭革命，但又再次遭到惨败。它也在越南和老挝搞同样的侵略行动，但肯定也是会被打败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中，还留有美国顾问和幕后指挥者，并提供金钱给尼赫鲁以打击社会主义。美国在国外有二百个军事基地，从德国一直到日本，将它的力量与本地反革命串谋合计，保护美国的投资与利润，同时压服当地人民。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学生能容忍这一切——包括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极大危险？”

“为什么？他们之中有些可能同意你所说的一部分，但大部分人会说，这些基地是防卫共产党侵略的危险所必要的——”

“共产党侵略！中国的舰队占领了夏威夷吗？还是中国的飞机飞到美国上空呢？中国军队进驻了加拿大还是墨西哥呢？没有！我们没有一兵一卒驻在外国的土地上。美国人不是在台湾，日本，老挝，越南吗？是的！”

朝鲜的情况又如何呢？是的，应该怎样来看它呢？多六小时才讨论得完吧，但时间实在太晚了。我所听的已足够使我认识到：这些年轻人，准备接上一代的班，在政治上已受到国家充分的教育。

我答应在星期六再来时，继续和她们讨论，但那天活动太频密了。“小电光”在我拍摄的有关学生生活的照片故事中当上了主角。她的确是一个好演员：起床，吃早餐，在实验室工作，与朋友到公园中散步。她穿上了一件夏装，脚上是一双轻便的布鞋，头发扎在头上。下午，我们到炼钢厂去，那里她换上一套白色的工作服，带上钢盔和太阳眼镜，并且在沸腾的钢水倒出来前作了六次的试验。稍后，我与她走到泳池，那里挤满了学生。最后，我为她与她的另一位朋友拍了几张照片。

我告诉她与学校当局，所有以上的一切都会使美国的青年大感兴趣，并有助于改正那里有些人对中国学生的生活的错误印象(谣传中国学生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我所拍的照片相当不错，但美国的杂志老编们却认为不值得采用。

在北京看到的天鹅湖

各种表演艺术家在中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很多年轻的艺术家的更应感激新中国，因为她欢迎人们的才能，并且给予广泛的机会，使它得到发展。超过八万名职业艺术家和音乐家保证有足时的工作，工薪较一般人高，并有些特别照顾和得到不断深造的机会。

当然啦，中国内各种的艺术方式都已有了古老的历史，而

中国共产党给予各种艺术新的内容，并使一些旧的(好的)内容得到了新生。外来访客可以反对其他的事情，但很少人会对这个说法产生争论：那就是戏剧，舞蹈与音乐和人民群众间的接近是前所未有的。

不论大小的国营工厂都组织了业余戏剧俱乐部，甚至大学和中学都是一样。在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中，每个公社平均有七队业余演出队。数以百计的剧场在中国建筑起来了。北京有六个剧院，许多一流水准的剧团都到剧院裏，或者就在街头上为群众演出。基本上每个省份都维持有一个以上的剧团，以本地区的形式、方言和传统搞戏剧演出。这些剧团有时会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如云南及东北等地演出。话剧这种形式发展得很快；若考虑它在中国只是新兴这方面来看，舞台技巧都可以算是上乘的。目前，致力于新戏剧方面的宣传，较旧一套传统的戏剧来得更显著和更热烈，因为观众对后者太熟悉而难以接受过度的改变。

然而，本章主要是谈谈中国芭蕾舞的一些情况。

我首先对北京舞蹈学校的副校长陈小姐表示歉意。“很感谢你能在这么急促的通知后，便让我来此参观。”

“老实说，通常你是要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来的，”她神情肃穆的对我说。“来访的客人实在太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适量节减一些。”

陈校长高度中等，年约四十上下，身材纤细，剪短发，外貌颇为严肃，橄榄色的皮肤紧紧地拉在高高的颧骨之上。大概以前是一个美貌的姑娘，现在却已成了领导。她是民族舞蹈家，但在这里，她是党的负责人。

“到此之前，你们从未在中国搞过芭蕾舞演出的，是吗？”

“对西方的芭蕾舞剧来说，是的。当然，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舞蹈团，但本校是第一所芭蕾舞专门学校。我们也教其他形式的舞蹈。舞蹈是一种艺术；而艺术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按群众的需要，除训练艺术家外，也训练舞蹈教师。”

自一九五〇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来，陈小姐便一直在此工作；她本人直接来自延安，当时她还到全国各地招募教师。他们在一九五四年开始教授芭蕾舞。芭蕾舞的主任教师是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其他部分教师也曾在该处留学。到北京来协助该校的几个苏联教师已离开了北京。目前，该校共有学生三百四十人。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度的新学期，约一百个新生被录取，其中六十个准备专研芭蕾舞，其余四十个研究民族舞蹈。该校录取的学生约等于小学生的年龄，即十一到十三岁。她们在学校度过六到八年的寄宿生活，学习艺术和一般的知识课，以及舞蹈和舞台技巧等。学校管理严格，学生们每天要埋头苦练十到十二小时。

最近我曾经观看了她们表演的“天鹅湖”，有几点情况使我颇感迷惑。演出地点是北京的一间新剧院——硬座位，装饰简单而够用，乐队相当好，灯光和舞台特技甚佳，服装色彩华丽。从技巧上看，她们的舞艺已臻化境，跳跃及单足尖旋转与我以前看过的表演一般灵活。然而，与波尔塞舞剧团(苏联)和中央舞剧团(英国)的表演来比较，这场演出不知怎的总是缺乏力量，情感与召唤力也未处理得完善。这些缺点大概应归于首次演出吧。到如今我才知道全体艺员都是在学学生，她们的平均年龄只不过是十七岁。年纪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岁而已。

听到我提出的批评，陈小姐不禁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她们当然尚未成熟呢。我们的艺员学习芭蕾舞只不过六年时光——波尔塞舞剧团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当我们的舞剧团有所改进时，我们可以环游世界旅行演出了。到时，我们希望能改良一些我们目前在预习中的全中国式的芭蕾舞——一些较接近本国人民和革命的新事物。”

如其他国家一般，中国内也有无数的男女青少年，渴望自己能取得该学院学位的资格，当一个舞台艺术工作者。有些甚至从家中出走，跑到陈小姐的学校，恳求录取。

“通常我们教育他们一番后，便将他们遣返家中。但也有些是例外的。”好呀！我想道。“那位指导二年级的教师就是其中一位。她十五岁时从四川的老家跑出来，一直来到这里。她真是个好人才，我们不能拒她于门外。”

一般来说，该校学生是通过全国各地的体育指导员引荐而招收的，他们主要留意培训一些面形端正，双腿修长，腰力好，肩膀灵活的孩子。事实上，中国青年人越来越强健的体格和身材，确实使一些外国访客大感震惊，因后者往往以为经过多年的“缺食”后，中国人必定变成身材矮小的民族。有几回我凑巧与中国女子篮球队同车旅行，站在她们身旁，我看起来就象个侏儒一般。他们的平均高度达六呎左右。

陈小姐要求我明白一点，即培训青年艺员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使少数职业演员达到完美的境界那么简单。它是为了训练大批的教师，并通过他们培养中国广大的年轻人——自童年起——通过实际的舞蹈训练，增强身体的质素，养成高度的纪律性。

“除了将技巧与高度的纪律性贡献给集体的艺术事业以外，好的舞蹈还是什么呢？”女校长问道。她接着指出：“舞蹈也是良好的社会主义训练。”

北京及各省市培训舞蹈、戏剧和音乐的教师和艺术家的学校都响应这个号召的哲学观点。“艺术为人民服务”，并且为社会主义服务。

喜晤马海德医生

在京期间，我与马海德欢聚了几天，他是一位文静、温和的美国医生，我和他曾一起冒过一次很大的危险。

马医生——一九一〇年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原名乔治·哈特姆——对红色中国及其领导人的认识较诸尚存于世的任何外籍人士更深刻。

Ma的意思就是“马”，这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回教徒——中一个常见的姓氏，但马海德却是一个叙利亚人后裔的美籍人。Hai的意思是“海”，而teh则表示“德行”。他的名字因而可以表示“大德大贤”的意思，但在他这个情况来说，“海”加上“德”大概是暗指“来自海外的贤人”。这两个字也可能是他原来的姓氏Hatem一字的近似音。为什么哈特姆医生在上海会被人贯以“马”的称号则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的小名是Shag，（英文上的字义为“粗毛”），此外，他的头发浓密而乌黑，颊上的一把胡子怎样剃也剃不清，加上他那双乌溜溜而温暖的大眼睛，确实使人想起一匹蒙古马，大概这是他中国姓氏之由来吧。

在一九三六年炎热的六月里，当我在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与乔治·哈特姆相遇时，他正开始一个完全转变他的人生的旅程。若非这次旅行，他根本就不可能遇到周淑辉——中国内最美丽、最吸引人的女性之一；同时，他们今天也不可能有一子一女，“小马”和“二马”了。

我曾在《西行漫记》与《方生之旅》两书中详述了当年我在北京与红色工作者的接触情况，当时他们给我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持着这封信，我抵达西安，并在宾馆中住下来，我被通知在那里等候一个“王牧师”来与我接头。他会安排好让我悄悄越过国民党的警戒线而进入一百哩以北的“红区”。在我到达西安不久，乔治·哈特姆便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已知道我的来意；他也是在那里等候王牧师来与他接头的。

“粗毛”（马海德）到上海两年了，但在这次旅行之前，他从未有机会目睹中国的其他情况。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我与他谈得很投机。他希望我俩能一同“进去”，而我也抱着同样的期望，但我们又怎能预知未来的变化呢。

足足等了两个星期，我俩真是度日如年，心情焦躁，只得整天玩纸牌与倾谈以消磨大部分的时间。当时，除了一些教会的传教士外，很少外国人会到西安这内陆城市来。为了满足酒店老板的好奇心，我们托词说我等将会到青海省进行科学探险，目前只是等其他团员到来。我倒没有完全“生安白造”，哈特姆医生确是一位摸索着真理的“传教士”呢。

“粗毛”是一个身体健硕，品性单纯的王老五，虽然只有二十六岁，却具有无比敏锐的观察力，早已看穿社会似是而非的

一面，对其丑恶的一面也洞若观火。表面看来，他的性格象有点儿讽世，但他对一件事的态度非常严肃：他要找出他当医生这项工作的意义。希特勒将他送到西安来——就象“他”令我到来一样。在希特勒主义统治的地区，年轻人发觉世界再也不是个美丽的地方；在东方，日本人正在沿着希特勒的老路，并威胁着蒋介石跟着他们走（蒋当时已雇用了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的顾问为其助手了）。那时候，共产主义看来是唯一有兴趣与法西斯主义作战的力量。既然希特勒与日本这般仇视共产主义，“粗毛”认为它必定有好的地方。他对上海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我父亲扎着肚皮，供我念书，并不是希望我干目前做着的工作，”他告诉我说。

“此话怎解呢？”

“即用豆枪来与V. D. 作战（V. D. 是性病的缩写）。现在，性病已经能很容易预防，而即使患上也不难治疗。当时上海这个社会的存在，就是要成为培植与传播性病的温床。在警察力量的全面保护下，上海的外国租界与国民党管辖区里，治疗性病可以说是一种大生意，但都是由有组织的帮会包办。干这种行业的医生都可以赚大钱。我往后本来也可以在那里单靠诊治硬性下疳症和梅毒便发其大财的。事实上，我也混得相当不错。但我决不能花掉老父的血汗钱成为一个歹徒社会的黄绿性病医生。可能这些北方人会有兴趣结束这种肮脏的事情。我要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

在哈特姆医生到中国之前，使他变成激动的极端派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生活的经验。

在世界进入二十世纪的时期，黎巴嫩的一个负责征集劳动力的代理商将一小笔金钱付给一个一贫如洗，全家人人目不识丁的家庭。作为交换条件，乔治·哈特姆的父亲——当时只得十四岁，也是个文盲——被运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一家纺织厂工作。在付清了他父母的欠债以后，老哈特姆成为一个独立赚钱的徒工，后来成为技术工人。几年后，他积蓄了足够的金钱，回到贝鲁特找到一个媳妇。他带她返布法罗市，自己到一个纺织厂工作，组织了一个美式家庭。

“当我们有足够食物的时候，生活好象是美好的，但当家中有人失业时，生活却象恶梦一样。我姊姊变成一个永远残废的人，因为极度缺乏营养，而我家也没有钱为她的病提供医疗护理。大概这是老人亟欲我成为一个医生的原因吧。我姊姊和我是十分友爱的。二十年代初期，我家境况较有起色，父亲储蓄了足够的金钱，让我进入医科学学校读书。三年后，我完成了医预科阶段，并考取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期后，我又考到了日内瓦大学的奖学金。我没有足够的金钱买火车票到瑞士去，但我自己有一部单车，因此我就从黎巴嫩踏单车一直去到瑞士。”

除了学习医药之外——以拉丁文、希腊文、法文与德文为工具——“粗毛”还有很多兴趣。在暑假期间，他到游客酒店里当侍应生，侍候客人饮食，赚到费用后，便与同学踏脚踏车环游欧洲。一九三三年，他与另两位在日内瓦的年轻美国医生决定到中国实习。为什么选择中国呢？从日内瓦大学的东方学生口中，“粗毛”听到很多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个国家对他起着强大的吸引力。他要到一些需要基础的医疗帮助的地方去。他的

同学中有一个是有钱人的儿子。他代支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及用经济援助他们在该地开设一个联合诊所。

“我们发现挂起性病专家的招牌，是使年轻医生在上海起家的捷径。我们的业务果然发展得很快，但我的一个合伙人不久便因家庭纠纷回家去了，跟着第二个也回国跟一个有钱人的女儿结了婚，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大医生。我独自留在上海，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察总部当长驻医事顾问，负责检验妓女的情况，并定期给她们配药以保持“清洁”。很多警察也常驻在卫生院里，他们需要‘他们的’娼妓干干净净。”

“粗毛”协助写了一本有关上海健康情况的小册子，通过这本书，他认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者当时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美国造反派，是唯一下葬于北京全国革命烈士纪念公墓的美国妇女。《大地的女儿》一书是她年轻时代的自传，现在成了美国文学作品之一；她有关中国的最主要著作是《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涯和时代》（中文译名：《朱德传》）史沫特莱小姐逐渐与中国的红色地下工作者建立了接触，通过他们，她比任何人都知道更多有关内战的消息。一天，她介绍“粗毛”认识一位年轻的“红色”工程师刘定，后者使他认识在禁止进入的共产党地区内人民平等生活的大量事实，并使他“如梦初醒”。他也知道了那里极端需要医生。他本来已准备告辞回家了，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他决定到西北去，看看那里的人民是否真如工程师所说那样：正在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当我们等候进红区时，我们发觉自己处身于一个“冒着浓烟”的城市里。那时，西安是西北“剿匪”势力的总部，受辖于

“青年元帅”张学良，他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副总司令。“粗毛”和我不久便获悉在张学良的私人保护下，很多高级的重要的共产党人秘密地在西安居住。在我等离开西安北上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一次叛变正在酝酿和发芽中。不到六个月，果然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元帅领导了一场兵变，逮捕了到该市访问的蒋介石与他的文武官员，并且将他们软禁了两个星期。（“事变”后，张元帅亲身陪蒋介石飞回南京，但马上被蒋逮捕并成了他的个人囚犯。详情见拙作《西行漫记》。）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事变”的结果，蒋介石被迫将他的“最后‘剿共’计划”延期，次年，日本就发动她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国民党被迫再与共产党结成盟友。

“粗毛”和我带着这些外界所不能知道的秘密进入红区。我也同意将“粗毛”本身的去向完全保密，即使对他的老家也是一样。在一段长时期内，我也不能泄露我们是怎样坐着一部国民党军用卡车偷渡北上，怎样在无人地带被抛下，怎样步行横过它，等等。

今次，在北京故宫北面的后湖旁，一间有两进庭院的古老房子的小会客室里，我与马医生于某天下午坐在这个他喜欢称为“马厩”的地方，品尝着中国出产的白兰地。几小时慢慢过去了，我们一直谈着彼此间的经历，听他讲述了自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那一年的夏天分手以来到今天的情况。马夫人就坐在他的身旁。

“我一生中，内心最感颤栗的一刹那就是进入红区后到达第一个中国农村的时候，”他对我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那里干啥。我们坐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

旁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农民。他们只顾望着你的照相机和手表出神。当时，我觉得他们真有点象‘匪徒’呢。”

“他们是‘匪徒’呀，”我说。

“对，对，他们被称为‘赤匪’的。但他们却称自己为‘红色的种子’。那里周围都是有白匪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碰不到周恩来派去迎接我们的警卫员的原因。”他向淑辉解释道。“他们在路上遇上了一些白匪，所以要赶跑他们。这也是后来才听到的。”

“令我最感烦恼的是那些农民们不断说Hai-p’a(害怕)，据我所知，Hai-p’a是表示‘害怕’的意思。真气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这件事你对我说过了，”“粗毛”说。“后来我们与一个赶骡子的继续往前走，晚上，他把我俩留在树林中的一间破庙里，然后自己出去，整晚踪影全无。天刚亮，他便走回来叫醒我们两人，告诉我们要迅速行动。当时，我实在有些担心。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已将生命交付给那些我们全不认识的人的手上。可能我们最后会被人杀掉制人肉包子也未可料呢。幸好几个钟头后，我们便碰到第一个红军，从那时开始，什么都OK了。”

“我也是后来才晓得在陕北的方言中，Hai-p’a是表示‘不明白’的意思呢。”

淑辉也不觉笑起来。她说初到延安时，也和我一样被这句方言所愚弄了。

“现在，我仍然常与农村的人民见面，”“粗毛”说道：“他们看了我一眼，认为我是不懂中国话的，便都不理会我对他们说些什么。有时我要一再向他们叫道‘我说的是汉话！是中国话呀！’

他们才开始留心听我说话。”

“粗毛”与我同行两个月，他也参与了我与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会谈。我们每人获赠一匹马，一支自动手枪和一套棉布军服。

“在那里所有的人当中，你是唯一能使毛泽东戴上帽子的人哩，”“粗毛”回忆着说。“那时他头发很长，又不肯戴帽子。”

“我忘记这回事了。”

“是这样的，你在为他拍照，并坚持要他戴上帽子。他自己的帽子已经不知道放在哪一个地方去了，于是你便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戴在他的头上，因为你那顶帽子是唯一象样的军帽。那帧照片是毛照得最好的一张。多年来，它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报章上，现在原照片则放在革命博物馆里。”

我们随着红军，一同骑马上陕北，甘肃和宁夏。然后，“粗毛”继续往西边迎接红四方面军——经长征后自四川突围而出的，而我则回保安去。路上，“粗毛”教会我怎样使用皮下注射。我利用带来作防疫用的疫苗和伤寒菌给他注射，作为实验。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你戳在我身上的第一针。哼！你在我身上留下一个象鸭蛋一般大的肿块呢。”他这次对我说。

开始时，没有我从旁帮助，“粗毛”要求要一碗水也不可能，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他便开始会讲一些中文了。他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善于掌握它。他差不多立即便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他在年轻的红军的“小鬼”群中极受欢迎，这些“小鬼”——勤务兵和通讯兵——很喜欢围着我们，听我们说话，等机会模仿我们以蹩脚方言讲错的话，然后来个哄堂大笑。

“不知商志鹏(译音)的情况如何呢?李可隆(译音)那个衣着整齐的勤务兵——记得他吗?”

“哦，当然记得啦。他们故意把他的名字错误地发音，来戏弄他，使它听起来真是有点那个。”

“他要求我写作提及他时，要把他的名字准确地拼出来——好象他就是个将军一样。”

“我也没有听过他现在何方，但我可以告诉你戴群智(译音)在那里。记得他吗?一个聪颖的孩子，医护勤务兵。他的样子象婴孩一般，但那时他一定有十四、五岁了。你还替他拍过一些照片哩。”

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戴。“噢，他怎样了?”

“现在他当医生了，就为本市的皮肤科医院和我同事。职位并不低于我，也是副院长，并且是一位著名的皮肤癌专家。你将会见到他的。”

那一年夏天，在我与“粗毛”分手时，他已立下决心说那是他所需要的生活。他的来临使西医力量增强了一倍!那时，全军唯一合格的医生是一个江西省监理会教团医院的产物——一个姓傅的医生。因此，“粗毛”肩上的担子一直很重。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自海外筹募了足够的基金，协助办起了延安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一些中国西医和几位外籍医生来到延安，增强了医护力量。一位医术高明的加拿大心脏专家——诺曼·白求恩医生，为八路军组织了前线流动医疗队。(白求恩医生的生平和工作的详情，见特德·阿伦和悉尼·戈登合著的《手术刀与长剑》。毛泽东主席曾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人们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一个人做二十个人的工

作，但后来抢救伤员时因伤口感染，缺乏盘尼西林救治，患上败血病而牺牲了。很多年来，伤员的肢体切除和其他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就象当年美国内战时期一样。“粗毛”对我说，有很多次战争是为了夺取日本人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而战的。

“粗毛”有时也骑在驴背到前线替伤病员治病，但是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和建立军队的基层医院和医疗训练系统。他是在延安碰上他的妻子的，当时她志愿去到延安。在抗战前的上海，她是一个电影演员。

他说道：“当我第一眼见到淑辉的时候，我抛下了手上的一切工作，叫道‘那就是我的妻子了’，并且立即跳上马去跟着她。当时，她负责训练舞台艺术工作者，又怎会注意到我呢。连续几个星期，我作了种种努力，但也毫无进展。老实说，延安每个王老五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而我，只不过是丑陋的美国人。我变得心灰意冷，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她最要好的朋友竟然来我的医院生孩子。由于难产，所以我要亲自上马。淑辉亲眼看着我将婴儿安全地接下来，这使她对我的印象大为改变。她一定想我到底是有些用处吧。”

“我想不到外国人竟然也会那样温柔的。”淑辉红着脸，笑着说道。

“那次接生是在我纪录中最有代价的一次。当时，淑辉对我说的中国话明白不了一半，但不久之后。我们便结婚了。自那时起，她一直教导我学中国话——还说我的发音仍然是令人喷饭的。”

“你怎样称呼他呢？”我问她道：“海德？”

“不是，我只是叫他做马。”

“只是——妈？”

“不，不，”她纠正我的发音，并且用“去声”再说一遍：“马！”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处了差不多两年，谋求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送来了救济物品和药物，原定是要两党公平分用的，但是却要由国民党控制下的驻中国UNRRA负责分配。马医生再度暂时回复哈特姆医生的名字，当时他代表解放区八路军救济组织参加分配工作。

“我们自UNRRA处得不到什么好处，”“粗毛”继续说：“有些美国人想帮助我们，但国民党控制了大局，他们或霸占了救济品，或拿到黑市卖掉。在北京搞了一年，我所得的救济品有四百吨，但领取时一看，有三分之二的救济品却是厕纸。厕纸！我们的人民中仍有人因缺乏盘尼西林而失去生命。六百个UNRRA的工作人员抗议这种可耻的贪污行为，并抗议将他们供应的物资在黑市出售。这件事的始末见诸纽约市长的报告书，当时他气愤地辞去UNRRA署长的职位——但他的报告书在中国却起不了作用。停战破裂后，我回到延安。内战再度爆发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事了。当年三月，延安被围，我们被迫撤退，并且要再度开始驴背医疗。毛泽东向我们剖示了蒋介石的策略，也说明了他本人的一套。我们已失去张家口，并且正从大部份城市和铁路撤走。国民党利用他们的英国飞机对我们施行疯狂的轰炸。我自然替淑辉和孩子们忧虑。在毛部署完我

们准备要放弃的地区后，我觉得前途好象一片黯淡似的。

“‘我们正在取得了胜利!’毛指出：‘若蒋继续这样倒行逆施，他将于三到五年内便要完蛋了。’

“毛的话真是无比正确的。到一九四八年冬，我便坐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等候傅作义和平投降。我们不发一枪便解放了首都。喏——我们就定居于此了。”

“粗毛”没有再回过美国去，他心中充满了疑问。虽然他也看过一些最近出的书籍，但也不能解决他的全部问题。人民怎能仍旧容忍种族主义？麦卡锡主义又怎样？为什么国家将数以十亿计的款项拨给农民，要他们不种粮食，而忽略了教育和公共卫生呢？年轻一代发生了什么问题？青年犯罪呢？颓废派青年呢？没有诱导他们向善吗？劳工们怎能够容忍美国的对华政策呢？

我看到他的小书柜中有一本C·赖特·米尔斯著的《权力的精华》，于是我问“粗毛”看过没有。他说已经阅读过了。

“那本书对你提出的问题列举的答案，较我的更胜一筹。无论怎样，你离开美国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粗毛’。我相信你的兴趣只是在理论方面而已。我猜你已入了中国籍了，是吗？”

“当然不是。”他走到书桌旁，拿出一本鲜绿色的美国护照走过来。“一九四七年，在我离开北京赴延安前领取的，”他说道：“是在马歇尔将军总部领取的。一个名叫沃尔特·罗伯逊的人经手发给我。”

我翻开这个护照的封面，看到里面并没有盖着“禁止”往中国旅行的印章，因为这是在杜勒斯先生发出该敕令前批出的。

我微笑着打趣地说：“没有人可以说你不是这里的合法居民了。”

“我在这里是合法的，而且还是个美国人——除非扫除梅毒是叛国之罪吧。”

哈特姆医生要说的还不止此呢。

普及医疗的成就

第二天，我直接到皮肤性病治疗所走访马海德。该所各个实验室及附属医院共拥有六百名工作人员，在全国性成功地普及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战役中，哈特姆医生曾一度是全所工作人员的总指挥。目前，他任副所长，并正从事对抗皮肤病及疟疾的运动。

在治疗所门前，我被介绍给一位个子高高，黑头发，相貌堂堂的，穿着白色制服的中国人。他热诚地凝视着我，并且连连摇头。

“不可能，我决不可能认出你来，”他对我说道：“当我在宁夏见到你和马医生一起来时，你下巴上长着一丛大胡子的。”

“我的记忆力也不能胜于你呢，戴医生。那时你只不过来到我的肩下。你的军服大了两个号码，你头上戴的帽子把耳朵也给遮盖着了。”

戴群智医生目前也是治疗所的副所长，也就是昨天“粗毛”向我提及的那个长成的“小鬼”。在傅所长及其他工作人员领我走马看花似的观看了全所的各部门后，我听到一些有关戴医生的故事。

他是地处中国南部海岸的福建省人，是一个贫雇农家庭的

四个孩子之一。当红军于一九三三年急攻下他的家乡时，戴家过着冬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的贫困生活。红军一来，地主都闻风而逃，农民们都分得了土地和粮食。无论什么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突然间变得“生气蓬勃，充满希望”。当红军撤走时，戴和一些孩子跟着他们离开了故乡。

“在生活好转时，我父母送我到学校念了两年书，因此我认识了一些字。所以我得以被送到瑞金根据地的医疗学校学习，接受几个月的训练，成为一个救护员。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干了一年换绷带和皮下注射的工作后，我再回到瑞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学习了基本的解剖学，生物学和病理学。后来我们被包围，结果开始了长征。长征胜利完成后，我遇到你时才十五岁。当时，我已经是傅医生手下一员毕了业的医护助手了。你还记得他吗——那位前监理会医院的学生呢？现在他已经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了。”

戴继续说，自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止，他完全没有再接受班级训练的机会。他也曾自修，看过一些书籍，但他的知识大部份是从战场中学来的，因为在战场上，他要治理各种各样的病例，也要担任动小手术，并且也需要参加战争。他获得了“代理医生”的光荣称号，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来没有下过火线。“我算是幸运的。你在西北见过的勤务兵，多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九四九年，他终于被送进东北沈阳市的一所医护学校中念书，在那里，其他几位幸存的“小鬼”也首次真正接受医学教育。

“当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我与一些接受过完整的医学预科的同学一齐学习。开始两年，我想自己每晚睡

觉不足三小时。我要学的实在太多了：生物，药物，数学和物理。但我却有两点优于别人的地方。”说着，他自己也不禁微笑起来。“我不用花太多时间上政治课。同时，两年后，我们便开始到病房实习了，这方面我比别人优越很多。即使老师们也时常向我征求意见。”

戴在医 校学习时便结了婚。“较马医生迟了十年，”他说道：“但在生育孩子方面，我却比他多了一个。”当治疗 所于一九五三年开幕后，马、戴两位医生便并肩工作，而自那个时间起，他们的故事便一起流传了。虽然，在几年前，“粗毛”还协助展开消灭性病的战斗。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扫除主要的带菌者——娼妓，”“粗毛”这样说道：“我们先自‘京津地区’开展，全队工作人员包括有一百名医生和助手。女党员先开入妓院中解释本计划的意义。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便赢取得人们的支持；妓女们大多数都是被卖身于妓院的奴隶。在个别情况中，女党员进妓院中和她们共同生活，取得她们的信任。病情沉重的马上被送到医院里去。其余的仍准暂时接客。年轻的女孩子们都被组织起来，准备好烧掉她们的卖身契。她们说出各自的身世，并讲出自己的愿望。人人都保证没有罪名，而且也不会受刑罚。

“当各方面皆准备妥当时，我们在一个晚上便关掉了全北京市的妓院。妓女们全部被送进特别为她们而设的招待所中，接受全面的检验和治疗。大多数的妓院老板和鸨母都逃去了；很多先逃到上海，然后再往香港。留下来的也被关起来接受治疗和 处理。在京津地区七万名娼妓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染上了性病。我领导的医疗队每两个星期便处理和治愈一千二百个

病人。整个工作需要巨量的盘尼西林：要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单位才可完成任务。善后的工作当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已经不属于我们的责任了。

“这些妓女们的结果怎样呢？”

“有些回到家乡务农，有些到工厂工作，有些实在年纪太小，便被送到小学里念书。我们还挑选了一些较聪明的出来训练，培养她们成为医护工作人员。有几个更被我们训练成为十分出色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员。没有人查究她们的过去，她们身上也没有标记。很多并且已结婚了。”

该运动不久便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照样展开了。在这次运动的过程中，医护助手们受到诊断和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技术训练，消灭性病的力量迅速扩大。在短短的两年内，中国城市内的带菌者绝大部份清除了。这项工作扩展到农村去，扩展到全国去。

“我曾经看过一位改造过的歌女的故事，”我对他们说：“她现在成了上海市的劳动英雄，是一个街道卫生组的负责人。听起来与她从前的职业有点儿不相称呢。”

“你太天真了，朋友。我可以打赌那位姑娘曾患过性病——那就是为什么她要调往卫生组工作的原因。她们之中大部份人的肉体与灵魂，都被妓院老板操纵了。极少的高级歌女，或被有钱的商人用金屋藏起来的较为例外。那些人与妓院老板逃到香港后，便又重操故业了。”

“金赛博士所谓男人必须有‘性发泄’，那些未婚的单身汉到那里作这种‘发泄’呢？未婚妇女当然也不会而且也不准胡乱杂交吧？”

“杂交吗？少之又少了。婚前性行为也是极少的。社会纪律是不准这样做的。新旧社会有关男女之间最大的分别是：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结婚——包括那些以前被称为‘苦力’的搬运工人在内。你也知道，在过去，‘苦力’和贫农是绝对没有能力娶妻的。他们只有将几个星期所赚的铜板储蓄起来，然后到妓院中作十分钟的所谓‘性发泄’。现在你会发现超过二十五岁而尚未结婚的男女确实很少。结婚前，他们再没有想那回事——他们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象以前的人那样去胡混，他们的身心都被好的事物吸引过去了。”

“当我们消灭了性病之后，”“粗毛”继续说：“卫生部又组织了群众性的个人卫生运动，以及除五害，消灭流行性传染病的运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现在已控制了蝇，蚊，木虱，大小老鼠和蚤的繁殖。我们还展开了预防天花、瘟疫、霍乱和伤寒的群众性防疫注射。我们多年以来都没有发现过一宗瘟疫症——据我记忆，一九五一年是发现疫症的最后一年——而天花和霍乱也是极为罕见的。疟疾也大为减少了。”

“寄生虫病和皮肤病仍然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本治疗所最急需对付的。”

我们察看了所内最大的主要医药图书馆，里面藏有很多西方的科学刊物；跟着我们到中药研究部参观。只见数以千计的箱子一行一行的排列在架上；标签上写着各种中药的名称：种类多至难以胜数的木耳、蕈类，野生的香料植物和草药，晒干了的果实和叶子——无疑还有蝙蝠耳、黄蜂刺、红雀心、虎骨、蛇粪，及其他各种中国传统（有些是传闻的）处方中常见的药物。在这些中草药中，西医们已发现其中一种罕见的大枫子

树的果实所含的油，是长久以来唯一可治麻疯的药品（治疗麻疯是该所的拿手好戏），此外还有一种植物可以提炼盐酸麻黄素。

当我等参观完毕，再度会谈时，“粗毛”继续他那未完的故事：

“在一九四九年，”他说道：“中国只有四万名接受过正式训练的医生。这包括了象戴医生这样的军医，以及一些战时在医学院只受过三四年训练的医士。如果局限于受过六年或以上的学校教育的医生来计算，解放初期则少于一万名。四年后，我们仍然只有五万名医生，但已有七万名受过二至三年医疗训练的“中等医生”或助手，并有六万名护士。那一年，宁都县各村都组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而各社中都有类似医疗队的组织——大约来说，每五千人有一两个医生或只是医生助手。

“我们所内的医生设立了一个流动教练中心，将宁都地区的医疗队集中辅导。我们利用讲义，幻灯片及活动影片来说明这种疾病（性病）的病征、发展以及治疗之道。我们还将训练及再训练的过程与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要求每个村的医疗队将十二到十五名男子和妇女——包括医护人员与非医护人员在内——到训练中心接受常规的检验与治疗过程的学习。

“我们将医疗技术深入浅出地教导医护人员，使平均只懂得一千五百个基本汉字的人，可以在三天内学会全套过程。这包括要学会验血，验尿和诊断性病。当然，我们是得到当地农民的领导，妇女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各党支部书记的通力合作的。妇女和男子分成不同的组别；妇女们自然不会当着男子面前讨论病征啦。我们还要克服人们不愿接受检验的情绪，到最后

再也没有人感到丢脸。好了，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在四十天内，便将二百万人口的检验工作完成了。”

“乔治，我想你这个报告在西方将会引起很大的怀疑。即使如性病那样容易诊断的疾病，业余医护人员所犯的错误一定相当多吧。”

“开始时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再花了四十天在整个县进行抽查工作。我们先对‘学生们’进行考核，继而复查结果。我们确实发现这个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因为每一百人中便有十五人是‘漏网之鱼’。然而，在这群人中，接近百分之八十的都是隐性带菌者。故此，除了由性病专家直接检验以外，其他地方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检验成功率。以我们的发现为基础，我们将整个训练过程再度进行。自此之后，我敢说宁都已近乎象牙牌肥皂一般纯洁了。大概最多只有一两宗隐性症状未被发现吧。”

该所属下的医疗队迅速在广大的地区重复试验，其他的医疗组织则派出观察员随队学习。在各省卫生部领导之下，治疗所的分所在全国各省建立起来了。这些分所目前正培训更多医护人员，对各农村医疗队进行辅导，直到该运动普及全国。他们也充分使用了数达三十万人的中医这股巨大的力量。

“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的国家及省属医疗队遍及全国，只有西藏是唯一的例外。基于宗教理由，达赖喇嘛反对检验及治疗藏人；他声称西藏并无性病存在。去年，我们的队员首次进藏工作，他们发现梅毒流行得很广泛。”

傅所长接着他这位美籍同事的话，往下说：“对，现在大概已经没有性病的难题存在了。马医生的工作干得好极了，医学

院的教授们却对我们抱怨连声。他们说自一九五七年起，他们便找不到一个活动期的性病患者以供授课研究之用。我们要从西藏进口哩！”但他继续严肃地说：“我们还有多种疾病等着要征服。其中一些要多年的不断努力才成。叫马大夫告诉你吧……”他边说边离开我们，声音渐趋沉寂。

我那位来自布法罗市的朋友继续说：“一九五七年，我们带了一支庞大的医疗队重临宁都县，准备展开一个扫除六种常见皮肤病的群众性治疗方法。这六种皮肤病包括黑热病，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十二指肠虫病，钱癣和麻疯病等。运用治疗性病上的技术，我们搞出一套容易分别这些寄生虫病的方法。我们采取上次的分阶段教授法。这次人们组织成家庭小分队，每十二户为一队，选出一个引导讨论的负责人，然后进行诊断工作。这样，各队之间便掀起了一种竞争的精神，看看那一队首先全部痊愈、人人健康。他们就这样展开了比赛。

“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在其他地方是否可行，但这里则颇见成效。在一个月之内，我们便可以诊断和开始治疗数达三十万的病人。”

“你们能治愈多少人呢？”

“除了部份血吸虫病患者与麻疯病者尚在治疗中之外，我们基本上扫除了其他各类皮肤病。麻疯病者为数很少。我们的调查结果指出，麻疯病没有我们从前想象那么流行。全中国的麻疯病者不超过三十五万人，并且基本上都是已知的病人，已经接受着治疗。我们已制止了这种疾病的扩展。血吸虫病和黑热病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但要将它们彻底消灭——如性病那样——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怎样使诊断的时间缩短，怎样更快地进行更多试验，以及怎样更有效和更迅速地控制这些疾病。这就是我们响应卫生部贯彻‘医药上的群众路线’这一号召的时刻。我们又搞出一套十分简化的寄生虫病基本诊疗法，将复杂的方法缩成‘十二条问题’。我们将这组问题作为基础，将治疗所变成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新的训练与试验中心。

“所谓‘医药上的群众路线’，表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对公共卫生工作获得了初步的了解，并明白每个人在这项工作中都担负着重要的任务。由于得到了农民们的充分了解，我们取得了以前绝不可能有的合作。现在，各农村都可以对血吸虫、沙蝇、寄生虫和疟蚊展开猛烈的攻势。血吸虫横行的运河和池沼里的水被抽干，然后再注入干净的水，所有的厕所都常常加以卫生整理，保持清洁。新的病人一旦被发现便马上接受诊断，并且强迫要放进隔离营中接受按时的检验，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健康都有关系。

“麻疯病人的情况也是这样。过去，他们总是要躲起来，或者被别人藏起来。现在，他们知道不会象从前一般受到惩罚，或者被视作流氓。我们处理麻疯病人的方法是将他们集中起来，使他们过着有用的集体生活。我们帮助他们在生产队的中央地区建筑清洁的新村。在接受治疗期间，他们管理自己的集体，并参加农务与其他工作。”

以上就是来自布法罗市的乔治·哈特姆发展摧毁性医药的整个故事(如要控告他犯叛国罪的话)，他的罪名最低限度包括服务中国，参加消灭梅毒，白浊，疟疾，黑热病，钱癣，钩虫，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和麻疯病等。至于他自愿为中国骑兵队贡

献两匹壮健的“小马”，则更不待言了。

和乔治·哈特姆谈话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是难以用寥寥数语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他帮助我了解中国一些令我迷惑的事物的本质。他清楚地知道新政权的错误和失败，但他也知道旧中国的苦难以及旧政权穷凶极恶的滔天罪行。由于他是一位美国人，二十五年来切身地分担了那些以使中国站起来为己任的人所面对的严峻考验，因此，他目前对他们事业的信心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注意。

“中国永不可能以另一个方法站起来，”他说：“差不多每件工作都是必需的，而差不多必须做的工作都已做了。总的来说，这一切都是成功的。”

这句话分析起来可圈可点。在遥远的他方，中国的失败看来比她的成功更明显。在海外的一些人看来，中国是一个被饥饿、超时工作、错误的公社，狂热的崇拜，对“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深信，反映苦恼的领导的恐惧与紧张的宣传，强迫劳动，洗脑和迫害个人自由等罪恶充斥的国家。美国的冷战宣传政策更故意夸大了这些“罪状”。

在哈特姆医生住宅内的小花园里，在这平静的后湖边，我感觉着无比的安详。乔治提出一些往往被那些将中国目前的缺粮现象，误作为整个革命的结果的人所忽视的情况。这些简单的事实就是：在所有宣传的后面，有着几百万不为人知，以及沉默地埋头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成功地并且忠诚地进行着把数亿人民自无知，迷信，疾病，文盲和贫困等不幸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这件工作当然远未能称做完毕，但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已打下了基础——没有外援，更冲破了美国“贡献甚大”

的人为障碍。这个基础是永存的。由于这个政府一直是为中国而工作，因此它能够争取得很多反共人士的支持。中国现在的政府比任何一个政府更伟大。

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

在重庆访问时，我参观了市郊的四川艺术学院，里面有一条巨大的红柱，上面用白油大字书写：“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句口号剔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观点。

学院分为两个部份，“创作艺术部”和“实用艺术部”。在这个密植蔬菜的校园中，有八座主楼，住下了四百多高中艺术学生，和二百多个注册读四年艺专的大学生。毕业后，他们成为学校或国立学院的教师（薪金从五十到六十元起），包括到有举办业余艺术课程的工厂内当教师。北京长久以来已有很好的艺术学校，但在目前，各省都已设立了一所以上艺术学院，而这间重庆艺术学院是享有很高名誉的一所。

传统艺术的课程包括有中国画，油画，木刻，石刻，地板木刻，金属雕刻，还有雕塑艺术。实用艺术方面包括有：各种物质的设计，漆器，陶瓷器，装饰与民间艺术，设计和制造家私。中国现在出产的瓷器可以比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产品。身怀上色及制作绝技的老技工大受尊崇，并且广泛地、毫不保留地传授他们的本领。我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城市都看到极品瓷器展览。大多数制品或输出国外，或供国家建筑物作款客之用。漆器制品，象牙制品以及其他实用艺术，都攀登上优良

质量的新高峰——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华丽，辉煌的内部装饰，可见一斑。

“画”的发展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众多以“新思想内容”为题材的作品中，尚未涌现出很多“杰出作品”。然而，中国画家的绘画技巧，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超越的；拖拉机与水电站可能是有点沉闷的主题，但他们绘出来的图画常常显示了卓越的技巧。仿齐白石风格，临摹他那些令人赞不绝口的花卉草虫画的画家，大不乏人；徐悲鸿生动活泼的马儿，也是学画者临摹的对象。在北京的艺术之路——琉璃厂的一家印画店里，我获悉该店在过去十年来，曾八百多次将徐悲鸿最享盛名的一幅马制版，进行复印。

“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号召，不可避免地在绘画方面高度地表现出来。今天中国的宣传画艺术，表现了无比的气势，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无与伦比的天才。传统的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需要高度的知识才能充分的欣赏。但是，这个国家目前还未能完全自文盲中解放出来，人们学习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这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所表达的神秘主义和旧哲学观点无半点关系的。反映现实的创作——如诺曼·罗克韦尔的作品那样，真正比抽象的形象更迎合人民大众的欣赏力，这是值得惊诧的吗？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大同社会还未实现，但那些为达此目的而建设通往这个社会的“楼梯”的人，很少欣赏抽象的艺术。建筑楼梯是极端实际的工作。“抽象艺术有何意义呢？”周恩来曾向我这样问。“假如它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它对人民又有何价值呢？”

“你们研究哪几位现代欧洲画家的作品呢？”我向一位油画老师问，那时他的学生正在为一位老农民造像。

“少之又少，”他回答说：“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艺术经验，我们正在努力发展我们自己在油画方面的技巧，自成一家，创造新的一套方法。但我们也很佩服毕加索。”

“哪一个时期的呢？”

“我们喜欢他的和平鸽，”这就是答案。

我曾提出要求，到军队里参观和摄影，但这要求在北京一直未被重视；直到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位高级官员，于是我对他说：“在你们每两个或三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人人脚上只是穿着草鞋的年代里，我曾与老红军队伍共同生活了四个月。我想现在准我到军队中瞧瞧，不会对你们有妨害吧。现在，你们有更多东西可以给我看了，为什么又不让我去看看你们的军队呢？”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说：“好吧，你说得很对。为什么不可以呢？通常，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是不会让外国人到军队驻地去的。但对你来说——就破例吧。”接着我被通知准备到军队中作两天的访问。我表示自己的兴趣是访问一支机械部队和(或者吧)一所普通的军校。十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四个官员在七时便到新侨饭店找我(这使新侨饭店的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头的是外交部联络官李信恭(译音)上校，以及一个外语学院毕业、能说英语的郭巩(译音)上尉。

当上级下达了决定以后，军队便有礼地，甚至热烈地欢迎我到访。多年来，我是第一个获准在中国军事机构中拍摄照片和电影的西方人。除了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之外，多数的

军人从前都未见过美国人。对那些老兵来说，我是他们在敌对战场外首次见到的美国人。

在每一个场合里，当我有足够时间发言，消除了彼此之间拘谨的礼节后，我发现他们当中——自将军而下——对美国真实的情况所抱有的好奇心，比我遇到的普通人民来得更大。此外，他们迫切地要我明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反对美国人的军队，并且不会寻求和美国进行战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坚决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侵略的严正立场。他们（这里不是指政府）似乎坚信：倘使美国人民一旦明白美国应自台湾、日本、朝鲜和整个南亚撤退其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世界和平便有保证了。当然，他们认为这些要求绝对合乎道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所见的这支军队——若暂时不将核武器计算在内——代表了很多人认为是世界第三的陆军力量。

即使在我自己记忆中的中国，这种不平凡的变革老早便开始了。在三十年代，在美国的芸芸军事观察家中，只有埃文斯·卡尔森和约瑟夫·史迪威两人相信中国的战士“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良的队伍”，两人的说话都曾记录在案。蒋介石一直企图利用军事手段来统一全中国。在他与各省军阀的斗争中，与所谓“共匪”的斗争中，以及后期与日本人的斗争中，蒋介石都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武力主义者。他永不能控制自己内心的政治独裁观念，因此他既无一个真正拿破仑的政治修养，也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基于此，他徒然虚耗了美国在金钱与武器上的支持，也不能使其属下军队与一个现代革命化的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

上述诸因素造成了蒋与红军以及与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对峙

时最棘手的问题。自一九二七年在井冈山建立游击武装开始，共产党军队中的军事领袖便服从于政治上的领导。军队的司令员朱德和党的领袖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多年来，所有命令都由他们二人一同签署，报刊初时由于对“共匪”还缺乏了解，因而将“朱毛”当作是红军的“总司令”；很多人也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人了。在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中，每个军事领导之旁，必有一个党的政治领导，而“朱一毛”这一对诚堪称为典范。

由此之故，军事力量便被认为只是几种手段中的一项；只有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党的领导上广泛的策略性安排，它才可以收立竿见影之效。一切军事行动的观念和原则，战争的总命令等都由党的领导人发出——虽然它们实际上是军事与政治专家联合思想的产物。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毛泽东——军队真正的总司令——从来也未拥有过军衔。

在这个基础的关系而言，一九六〇年的人民解放军与三十年代红军并无差别；它仍然是由政治指挥的军队。虽然如此，这种合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也不是全无内部“矛盾”的。

我到人民解放军部队访问的首天，是往芦沟桥附近参观一所坦克学校，这座桥就是中日之战爆发之地。部份军营的建设可追溯上日本人入侵的日子。该校已将范围大大扩展，校内现设有坦克训练场和试炮场，附设有一所农场，为学校提供了部份粮食。假若一位军事专家到此参观，他必然会了解更多的东西；我自己只能从一个记者的非专家眼光来报道，并按我在很多国家的军队中参观，而取得的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评论罢了。

他们大概没有将最新式的武器表演给我看。我能看到的都是中国制的各种标准训练装备，这些武器，苏联与美国在飞弹时代来临后便停止使用了。军队使用的坦克现由中国自行制造，是仿照苏联的T三四型制成的，车身長而低，两边是宽阔的双孔轨，具有四十五度的攀斜能力。据说有一种最新型的坦克（T一五四？）业已在生产中。演习中的坦克似乎都很有威力。

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并没有坦克指挥学校。芦沟桥军校建成于一九五〇年，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完工。中国的现代化坦克炮与喷射式飞机工业，俱始于一九五四年，也是由苏联人提供设备与协助。在这所坦克学校与后来参观的步兵团里，我也看不到苏联的顾问。

在这里的一千二百名学生中，既有排级与连级的中等军官，而实训部中还有三班是纯军校学生。另外的两个部门是指挥部与政治部；学校共有十二种课程，包括战术、射击、讯号、机械和军械。当然还有文化课。全体学生都已有实战经验，但他们的“机械与文化知识水平”却很低——他们这样对我说。我看到砖砌建筑物内是一个个异常整洁的课室；战术课使用的阵地模型造得很精细，而且还有电力控制；此外，供拆卸与安装练习用的武器与各类军火的横切面的详尽模型，也分门别类地排列得很好。

这里的校长，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副校长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如其他解放军部队一样，该校学员每年要抽出两个月或三个月时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以及在校办农场服务。官员们一般也参加这种群众性的体力劳动，但我未能获悉多少是象征式的劳动，而多少是实际的劳动。

参观中，突然接到北京挂来的电话，通知我回京与周恩来举行第二度会谈，于是我在坦克军校逗留的时间被迫要缩短了。会谈翌日，我与李信恭上校和郭巩上尉到驻在北京以东九十英里的一个步兵团访问。我们驾着汽车奔驰在一条碎石路上，沿着北京城外围的大运河，行了约三小时便到达天津郊区。路上，我简略地获知了一些有关人民解放军的消息。

直到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大部份仍是非正规队伍，军械的来源主要还依靠卤获的美日装备。队伍中有许多是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兵士，这些人只是接受过很少的理论教育，很多则还未能吸收新的道理。朝鲜战争使中国军队接受了严峻的战争洗礼，他们对抗了以最新式武器装备的西方第一流的军队。这时的装备和前国民党的队伍得以扩展。人民解放军中可靠的干部都接受了现代化军事技术的训练，军队也以最新式的武器重新武装。东北的战争工业与运输也恢复过来。

到一九六〇年，中国的军队已拥有自己优越的军事工业，来维持常规战争基本武器的供应，并且还不断使武器现代化。援朝战争的军队主要依靠志愿从军者，征兵制则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实行。据官方宣布，目前的正规陆军总数约为二百五十万；外国军事观察家相信所差不会很远。空军估计约有二十五万人，海军人数也约略相等。现时，由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公民都有义务当兵，而且除正规军外，还有数百万作为后备军的民兵。陆军服役期为三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

据廊坊地区驻军负责人对我说，在十八岁到廿五岁的年轻人中，服兵役的极其量是每十二人一名。中国每年有五到六百万人达到十八岁这个年纪；军队从身体最棒的、有文化的、以及

合乎智力标准的青年人中，挑选其表表者当兵。在中国，服兵役者本人及其家庭都享有很多优待。“被选中的”常常受到全村人民真诚的羡慕和祝贺，而当兵被认作一种光荣而不是牺牲。人民解放军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与赞誉，队伍中的领导更受人民的尊敬。这种尊敬在美国只有象侍应领班、牧师，伊利莎白·泰莱以及《华尔街日报》等才享有。

就在廊房地区一九六部队驻地的司令部外面，我们碰到了一列长长的胶轮军用马车，载满刚收割下来的小麦，并由很多风帆帮助推动——这是我在中国内看到使用古老的陆地风帆的仅有机会。机械化的供应显然是远远未够完善的。接着我们进入一片宽广的田地里，只见四通八达的公路旁，点缀着汽车旅馆式的兵营，也有官员及其家属们居住的小房子。不久后，我们便到达驻地的外围闸门，在那里遇上了欢迎我们的五八七步兵团的司令员李上校。李上校接替了款待我的工作，以主人的姿态出现。

一九六部队的总人数“不超过一万二千人”，组织如下：团——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营——一个反坦克营，一个医护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特种连队——一个搜索连，一个反毒气连，一个化学战连，一个车辆训练连，一个炮兵指挥连；还有一个训练组。

这是一个正规部队(师)。中国曾尝试过将坦克与炮兵两部独立指挥，但终于都要回归师部。海军与空军也是由最高领导统一指挥，即直接隶属于军部的作战中心。

访问的主要纪录如下：

(一) 在循环劳动的制度下，该部队耕作了约近一千七百英

亩的土地，并建筑了一个水塘，蓄养了一千万条鱼。在正常的情况下，部队中每人每年要到田间劳动一个月，另一个月要到部队开设的工厂中劳动，或协助国家的建设工程。部队食用的全部蔬菜与肉类以及“部份口粮”是由它本身的劳动出产的，这中间还有几千名长住此地的农家帮助。

（二）部队中每人每天保证可获三千二百到三千四百卡路里的粮食，也就是较全国平均的粮食配给额多了三分之一。每天配给的粮食包括了一点六磅谷物和一点六磅蔬菜，但肉类每月只有半磅，油每月只有六个格兰姆。新兵入伍时平均重一百二十磅，服役期满离部队时，体重多增加十到二十磅。士兵的平均高度为五英尺七英寸（较中国人的平均高度为高），昂藏六英尺的大汉大不乏人，通常的体格足以媲美西方标准。如他们的食量可以作为代表性的话，我的计算表明要供应全国军队足够的口粮，大约需要四十到五十万英亩土地。

（三）元帅和将军是政府雇员中最高薪的阶层。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份月薪表，可以用美元折算如下：一般士兵初入伍时由二点五元开始；下士四元；上士五元；少尉二十元；中尉二十四元；上尉二十九——三十三元；少校三十九——四十四元；中校五十一——六十元；上校六十二——六十四元；少将六十二——八十四元；中将一百四十四——一百六十元；上将一百九十二——二百三十六元；元帅三百六十元——四百元。一切食物，军服，宿舍，和交通费用等当然是免费供应的，将官级官员更有汽车可用。军队现在已不是游击战争时期绝对平均的军队了，但在官员们与战士一同劳动的那个月中，红军的传统仍然保持下来。（按〔一九七〇年〕：所有的军官官衔，自元帅

而下，都于一九六二年被取消了*，肩章及其他表示官阶的标志都一并除下，每个单位的领导人只是称为“首长”，就象在解放前的红军里一般。改革后，薪金与优待的差异大大地减少了）。

（四）在整个廊房地区都没有一座原子弹辐射微尘隐蔽所——在我所去过的中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来说，人民共和国与欧洲是同样落后的。

参观后，我向四个身材健硕的士兵（十八到二十岁）和一位二十五岁的上士提问了一些问题。我向他们逐个询问其家庭背景和教育情况，然后向他们几个人一起问了些有关军训的情况和他们的抱负。他们人人都出身于贫农家庭，父母为文盲；他们自己都上过小学，被选入伍感到非常“快乐”；并且对他们的家庭在公社中得到很好的照顾深表“满意”；为在队伍中较在家中得到“更好”的教育（政治上，技术上和文化上）而满怀“感激”。他们都喜爱运动并深信“社会主义就是好”。人人都记起童年时代的饥饿与贫穷。我问其中一个，如果他童年时代营养不良，为什么他的牙齿会那样好和那样洁白（他们几个的牙齿都是挺好的）。他小孩子时吃些什么呢？“高粱”。他所能记忆的就是这些。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获悉从前的地主的子女是不许加入军队的，但前资本家的子女却不受此限。女性军人不需要接受战争训练，除了作跳伞兵之外（原因何在呢？这点尚未知道），但也有小部份要干辅助工作，就象W·A·C·（美国的“陆军妇女队”）一样。

* 据查资料，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编者注

“你们有赌博吗？”

他们不明白赌博是什么意思。翻译员要费力地向他们解释，才使他们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对的，他们也玩纸牌戏，但他们从未闻过可以利用纸牌来赌博这件事。

“我知道你可能不会相信这件事，”外交部联络官李上校对我说，他显然比这里的任何人都要老练。他微笑着继续说道：“当我参加板门店停火协定谈判时，我看到美国士兵当众聚赌。当其中一个赌输时，他便会破口大骂，怒容满面而且闹至面红耳赤。我们的司机看着他们赌博，但又不明白他们干啥，只是认为很有趣而已。我当时向他们解释，美国军队与我们的军队是不同的。美国士兵对自己将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所以希望赢得一大笔钱，好等将来有机会回国时，搞点小生意干干。我们的军队就不同了，每个战士服役期满离队时，都保证有好的工作可做。”

听着他的描述，我不禁笑起来。但我对他们说，在我所认识的美国士兵中，他们大概会说较喜欢用骰子来定他们成败的机会吧。“在整场战争这样大的一场赌博中，难道有些较小规模的赌博也不可以吗？”我冒昧地说道。他们用措词适当的话来提醒我：一个优良的指挥员永远也不会用战士的生命来博彩的。共产党的领导不象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不是赌徒或冒险家。

“女人的问题又怎样呢？”我继续问道。这个问题在我所见过的军队里都有存在，包括苏联军队在内。在这里，士兵们也有与人民交往——既在田中共同劳动，也一同参加其他活动。这样，如果一个战士与一个本地的女孩子“搞出麻烦”时，其后果又会怎样呢？

我这个问题引起了突然的寂静，这几个没有性经验的小伙子个个目瞪口呆，流露出一片愕然的神态。几位官员交换眼色，好象刚发生了一件猥亵的事情似的。

这次又是李上校回答这个问题，他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神情却很肃穆。他说：“你可能又会发觉难以置信了，但这个问题在我军是绝不存在的。我国的男子到二十岁便可以自由结婚。婚前他会忙于工作而不会想那回事的。任何企图玩弄女性的人都会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在我军中，战士们学习一套严紧的道德条例；我们今天仍然执行当年老红军的“八项注意”，那是你所知道的。（重行颁布的八项注意如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已编写成歌曲，现在仍是一支很受欢迎的歌）。每个男人都希望与一个纯洁的妇女结婚，他不要别人伤害他的妻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军队决不会遗害人民。我不是说这种事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但事实上真是罕见之至。”他转面望着该团的司令员，后者字字铿锵地说：“在我到任的五年内，此事从未有发生过。”

在这里，我进一步得到证实：这些年轻的士兵们从来也未听过“反战”（Conscientious Objection）这种情况。一位军官花了很长的时间，费尽唇舌来解释C·O·的意义。我听到他说这是在旧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位士兵惊诧地交换眼色，好象互相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差到这般田地。

我问他们曾否听过以下一句话：“我的国家，不论正确与错误，还是我的国家。”这又需要一番解释了。跟着我又说：“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国家是犯了错误吗？若然，你们还会为她而战斗

吗？”

这个问题显然是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政治讨论会和“自我批评”会中从未提出过的。他们全部都默然不语。毛泽东，这位党与军队的领袖，在任何的战争中怎会犯错误呢？中国决不会发动战争，但中国永远都能够打败侵略者。怎样说明：即使一个C·O·相信自己国家是“正确”的，他也会拒绝为他的国家作战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

家庭：事实与幻想

午夜，我与李上校坐在一部新型的小轿车内飞驰在回北京的长程旅途中。我们刚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一起喝了几杯茅台酒：为和平，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恢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干杯。“茅台”是一种酒力很猛的烈酒，质量最优的来自贵州省；茅台酒盛在很吸引人的瓦瓶子里，外国的订单与日俱增。由于喝了酒，大概也是由于秋夜月明的关系吧，我们越谈越熟落，于是话题转到私人问题上去。

“你有多少个孩子呢？”

“五个——四女一子。”

“我想儿子是第五名吧？”

李点点头，笑了笑，对透露自己尚有传宗接祖这种思想感到有点儿尴尬。“你有多少个孩子呢？”

“一男一女。”

那是最理想的！”他竖起大拇指叫道：“你真是幸运呀。若我的儿子早些出世，我也会生两个便算了。”

“你现在还想要吗？”

“不，不！我们已采用了安全无比的预防法，”他说道：“双重保险哩。”

李身上穿着一套手工很好的制服，肩章上饰有醒目的绶带，仪表出众，他对外交军事要员的职位显得很称职。他对自己游击战争时代的历史感到无比自豪。他出身于山西省的一个富农家庭，一九三七年报名加入八路军，那时他只有十七岁。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肄业；随后，他加入了聂荣臻将军的指挥部里工作。

“十六岁时，家里强迫我与一个较我年长十四岁的女人结婚。那是一出骗人的把戏。那个女人是我的表姐，她的母亲，即我的姨母，拥有不少田地和金钱。这位姨母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人；她害怕遇上那些财色骗子。她认为将女儿嫁给我是最安全的，我母亲则认为这件事对我家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我自己则拒绝与这个妻子同居。这个强迫结合是我离校出走和参加游击队的部份原因。战后，我与一个由自己选择的对象结婚，她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们的结合是相当圆满的。”

“倘若这次结合不成功，你会和她妣离吗？”

“怎会失败呢？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对象，我们并不是被迫结合的。它当然是成功的。”若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回答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假设了一种情况，他明知其结果是不正确的话，这是使他难以作答的。

“强迫婚姻在过去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社会和经济的

压迫，”他解释道。“父母们尽早找机会将女儿许配给他人，也是为了不想看着她们成为老女。现在，女孩子们的合法结婚年龄是十八岁，所以在她们自己决定之前，是不用急着要嫁人的。过去，贫苦农民为了要清偿欠下地主的债项或筹些现金，被迫将他们的女儿卖掉。在我的故乡中，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若父母亲太迟也不将女儿许配出来，可恶的地主就会要夺去她们的初夜权。一旦如此，又有谁会要娶她们呢？然而，将她们卖给有钱人作妾也比让她们去做妓女好些。因此，过去的许多婚姻是为了得个好价钱，为了得到一些田地，为了清偿债务，为了家庭的地位，为了使儿子免服兵役，而没有考虑过被摆布者的感觉，不理年龄上极大的距离，不管品性上的分别——这就是引起家庭悲剧的原因。这一切，现在都扫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总会有些男人变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 he 可以和妻子离婚吗？”

李絨默了一会儿，然后十分严肃的说：“法律上，只要双方一同要求，解除婚约是可以的。如果一对夫妇已生有孩子，而又没有达成双方面同意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你刚才所提出的那种离婚是任性的，是不受欢迎的。我知道有时可能会发生，但那可是罕见得很。它会被视作通奸或婚前性行为一样严重。后者你不是提出过了吗？这些情况会有发生，但在我本人所认识的同志中，我尚未闻有此例。”

“我记得过去在中国的西方人曾经说过，提早订婚与早婚可以防止同性恋及其他性变态行为，很多例子是特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做的。你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呢？”

“今天，未结婚的男女较从前少许多。由于妇女们不再被

看成是男人的财产或商品，由于人人都有能力娶妻，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结婚。不结婚的男人会被人看成是不正常的。人们会为他忧愁，并会帮助他找到一个妻子。现在的社会是新社会，人们都有新的道德观念。我们人人都受社会主义理想所影响。我们反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

“孟子曾经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提醒李说：“过去，人们都赞成当妻子不能生育时，多娶一个妾侍或平妻，而且大多是由他的第一个老婆提议的。这也是离婚的合法理由吗？”

对这个问题，李感到有点不大自然，并且有些局促不安的感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待孩子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即不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私人的财产，而是整个社会所有的。爱孩子并不一定要自己生有孩子；我们爱护别人的孩子就象爱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遗弃她，并不是离婚的理由。”我也认识很多没有儿女的党员夫妇，他们的婚姻都是历久不变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对。话虽如此，李对自己本身的矛盾焉会不知；他的儿子对他不是很要紧吗？不论党内党外人士，维持父系的意识仍然很强烈。

自一九五二年中国通过改革的婚姻条例之后，海外纷纷传说中国共产党“破坏大好家庭”和“摧毁大好的旧家族制度”。然而，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角度上来看，始自十九世纪的整个中国革命就是儿子反对父亲的革命——也就是反对族长专制而引致的各种罪恶，并将它归于“孔子的先人崇拜”观念（现在尚无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孔子对所谓大家庭感到兴趣）。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接受恩格斯有关家族起

源的阶级分析，即将家庭看成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而父权和母权两者都是基于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而得以确立的。然而，那些有关“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毁灭同姓家族和夫妇关系”或“强令夫妇分离”等的谣传就象当年传说苏联要实行“公妻”一样无稽。如李上校所说，共产党只不过教导人们要首先忠于社会（国家和党）而已，岂有他哉。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博士批评一些带有浓厚家族观念感的人，缺乏中国人的尊严，对他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施行贿赂方法和利用裙带关系向上爬。“从现代的目光看来，”他写道：“孔子的主张缺乏了人对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应尽义务，而这种缺乏的结果遗害极大……结果，如事实所显示，家族成了壁垒森严的碉堡，外面的东西便成为合法的掠夺品了。”在美国受教育的社会学家H. D. 方下了这个结论：“这些碉堡”是“工业化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之一。”

如果希望了解半个世纪以前还存在于中国的“大好旧家族制度”的话，人们应该阅读一下巴金在他的小说——《家》——中对大家庭中的专制和愚昧所作出的零零碎碎的描绘。即使较远期的文艺作品——《红楼梦》——也有描写一些“女英雄”反抗盲婚哑嫁而宁肯出家为尼的事例。十九世纪中，由于女孩子们反盲婚的风气甚为广泛，政府甚至被迫要建立一些隔离的房子，供拒绝盲婚的处女们居住。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家庭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夫妇及儿女一起的独立家庭；父母与未婚儿女，以及不超过一个已婚儿子及其妻儿组成的支系家庭；最后就是由父母，未婚儿女，几个已婚儿女及媳妇、孙儿等联合组成的大家庭。在一些扩大的大

家庭里，成员可能包括第四与第五代的子孙，或者是同祖的支系后裔，由族长统一管理，有时则由长子负起这个责任。

这种扩大的大家庭，基本上已于两千年前消失于中国境内，这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封建时代之末，当时秦朝取缔了贵族阶级，没收了大庄园，将土地分给了耕种人。自此之后，虽则富有的家庭再度兴盛，并有大于贫户之趋势，人口特多的家庭已较为罕见，通常的独立家庭与支系家庭人数约为五、六人，超过八人者已甚少。

如在大多数国家之中，中国内的家庭是以独立家庭为主；支系家庭为数亦很多。当然，同村同姓者之间多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血统关系。从前，乡村中一些松散的氏族组织，多由土豪劣绅所把持，后者剥夺了前者对祖庙(现已不存在)的控制权，作为专制的手段。即使在目前，在数以千计的以远祖姓氏命名的村子里(相传中国古代有四百七十家大姓)，多数的居民都有着同一个姓氏，虽然他们早已不能追寻直接的血统关系。无疑，这种同宗的传统在大自然灾害与外力侵略时，有着保存文化与后裔的效果，但在帝国主义与机械侵略的冲击之下，他们这种地方性的观念受到了削弱甚而瓦解了，因此要由更广泛的团结观念所代替。

自一九一一年以来，整个革命进程大大地提高了农村五亿多人口的政治觉悟水平。回顾太平天国所作出的改革，我们可以认识到有关结束父母专制，解放妇女，以及用高于家庭的观念来代替孔子提倡的旧观点等几方面的努力，在共产党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一世纪，已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权首先颁布了使这些目标具体化的第一组现代法例，当

时，有关家庭的整个合法结构名义上已有改变。先人崇拜、男权等已被取消；妇女们得到了财产权，承继权，离婚权等权利。然而，即如国民党的其他法例一般，“新的法例……对传统的旧家庭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法律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见纽黑文市中美学者座谈会纪录下的反应（择自纽黑文市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刊物：《中国——它的人民，它的社会，它的文化》）。

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家庭法例（称为婚姻法）更加深入，而且更极力（倘非全面的话）执行。它完全没有取消家庭的存在，而是更明确地指出它的基础是建立于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民之间所自由缔结的婚约之上。婚姻法严禁盲婚哑嫁，媒人，纳娶妾侍，一夫两妻制，童养媳，卖女及贩妻等。夫妻共同占有与管理家庭的财产，共负养儿育女及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的义务。该法例因而准许独立家庭与支系家庭的存在。

较单纯为改善婚姻关系而立的法例更重要的一点是：将田地按男女之间平均分配。接着，集体化将男性可能利用所有权作为剥削和压迫的机会完全粉碎了。妇女们在教育上的平等与同工同酬法例的订立，进一步巩固了她们的“独立”。在年轻人当中，一种新的互相尊重的表现随处可见。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表明男女之间的地位和感觉上有了转变的名词——爱人。它代替了含有捧场意思的“夫人”，“太太”等称呼；它也代替了如“老婆”之类的不雅称呼。“爱人”一语的意思就是“自己最爱的人”。现在，它是年轻人当中最流行的用语，夫妇之间不论谁说及对方都可以应用。这句惯用语是由老共产党员介绍出来的，因为很久以前它在党的领导之间已是

常用语了。“毛同志，你的爱人在那里呢？”一语是完全适合的——虽然对上了年纪的老太婆来说显得有点儿使人吃惊似的。

看过新中国的人，很少会怀疑由于这个政权成功地使妇女们介入了整个国家的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所以使她在文化上与经济上得以大踏步的发展。所有上述的因素，加上利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使城乡逐步工业化，使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经济上和社会体系上普遍达成一个整体的成功，实际上已摧毁了任何尚存的“家族制度”的幻想。在政治上，这个制度的遗害——裙带主义，贿赂和盗用公款等——尚未完全绝迹，在不停的整风运动中可见一斑。但是，人们目前的高度警惕性是史无前例的。在一个不能用金钱买通律师，也不能将职位出售的国家里，欺骗的手段基本上也是行不通的。对于身为高级官员亲属的人来说，不利之处似乎较有利更多，从来也没有人是因家庭关系而获得卓越成就的。

轿车仍然在黑夜中飞驰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年轻的军官说：“在中国之内，家天下的政府与蒋介石一同完蛋了。蒋与他所有的襟兄弟和结拜兄弟——孔，宋，陈三家——以家族本位的规条来统治中国。他们吮吸穷苦人民的血汗，使自己成为巨富。俱往矣！中国已彻底推翻了家天下政府。”

返抵新侨饭店后，我遇到一些加拿大访客，其中一位是享有盛誉的儿童精神病专家丹尼斯·拉热尔博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在他到中国的学校，托儿所，孤儿院，医院，公园，私人住宅和公社的无数次访问当中，拉热尔博士进行了一项特别的研究：看看在革命政权建立十二年后，儿童们对家庭

和国家的态度有何转变。他对一群十到十六岁的儿童进行了一项“主题统觉测验”。他个别地向他们提问有关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为，梦想，记忆，选择，忧虑，感情，观点和希望。我不打算在本文中胡乱以门外汉的语言引用他那吸引人的发现，该文现已成为医药文献。他的观察足可以代表现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方法。它已取代了过份依赖家庭的传统习惯。

以“最常见的答案”为基础，拉热尔博士发现：“成年人似乎特别侧重孩子们的爱国主义，学习和工作上的努力，利人主义，和接受建设性批评这几方面。”在孩子们所能做到的“最好行为”中，最具典型的是：“帮助长者搬运行李”，“拾到遗物送交警察”和“为实现农业计划的成功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菜园劳动”。对于犯罪方面来说：“少年先锋队和好学生不会做坏事”；这位精神专家反复听到这类答案。最后，他承认中国国内广泛地“对不正当的行为有着潜在的反抗意识”，这“实在使到中国访问的大多数西方人大表惊讶”。

在他提问的十五位对象中，仅有两名承认有任何的“悲伤的感觉”。其中一个女孩子，她说：“当我们国家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一个领导人逝世时，我便感到有些儿伤感。”另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说，某天晚上他梦到自己在游戏，“但第二天早上我好象太疲倦，起床太迟，以致返校迟到了。我当时很不开心呢。”至于忧虑方面呢？“每个被询问的儿童都表示没有。”其中一位十三岁女童的答案最具典型，她说：“我没有恐惧，也没有忧虑。我知道毛主席和党最关心我的利益，并且能够保护我免受任何的危险。”拉热尔博士发现：通常儿童们对父母和环境的敌意，已被成功地转化来对准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侵略

和残暴的标志”。此外，“这些孩子们似乎有一种异常的能力，能将他们潜伏的野心尽量发挥于努力工作上，使他们为个人的幸福，为社会的进步而工作，而奋斗”。父母的形象“常常被看成是慈爱的，帮助的；这和对北美青年人所进行的T. A. T. 的结果恰恰相反”。

拉热尔博士表示他对中国青年人所下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他们的领袖已极有效地完成‘将人们的感情投资从家庭方面移到整个社会去，移到为建设社会的位置上去’的革命。……在所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将家庭作为独立机构已失去其重要性，但在中国则更觉真确。……”在另一方面来说，拉热尔博士否认了“将妇女大量输往工厂和土地，是削弱家族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一种说法。他观察到母亲们现在“可以在工作之余将全部时间用来照顾她们的孩子……”

“儿童和青年似乎主要注意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而存在于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的纠纷纯为次要的问题。”若与西方比较，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变化较少”，但是，从表面上看来，在中国人当中，“心理性神经病，精神错乱和反社会行为等病态大概已显著地减少了”。

警告：任何人也不应将这些年轻人有关他们“没有难题和忧虑”这句话表面化，或幻想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乌托邦”。拉热尔博士强调说：“更近乎事实的说法是，这个国家在创造一个快乐的年轻人塑像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而热切响应号召的年轻人都接受了这个假象。”他们的目标和抱负表现了对未来职业“广泛不同的选择”。拉热尔博士精确地看到“在中、美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里，今天的年轻人经历着强迫协调的强大压力。”

对美国青少年来说，要达到他们这一辈人的标准完全是被迫的，而中国的青年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以证明自己适合于五年计划和党的口号所提的标准。”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医学史

本人曾有四次机会一试中国的医疗设备。在我乘机降落于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我的防疫注射卡不见了；很显然是在莫斯科检查时，未有连同我的护照一并交回给我。我签了一张宣誓书，宣称我已接受了一切必须的防疫注射；这些注射手续在北京机场由一位中国医生给我重新做妥，而二十分钟后我便取得了一张新证明书。费用是人民币一元，即美金四角。

在东北的长春市，由于一只眼睛发炎，我请长驻饭店的医生给我诊治，据我自己推测，这次可能是颗粒性结膜炎。他诊断出是眼结膜炎，但由于他只是一位“中等医生”，所以他请邻近的一位眼科专家来替我诊治。她迅速而果断的证明了他的诊断无讹，处理了我的眼睛，给我一瓶滴眼药水，不用十分钟便离开了。费用：两角。她连留下喝杯茶的时间也没有，因为她要赶往一间卫生所，那里有“五十人”等着她。我的眼睛在两天内便好转了。

在北京时，我的一个旧伤口再度发炎，这个伤口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九三六年在同一个城市里。那时，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用膀胱镜法切除一粒细小的肾石。该手术很成功，但手术后的处理不当，引起伤口发炎，经多月治疗才告痊愈。自此之后，在极度过劳的情况下便会产生复发现象。自东北回京后，伤口

复发，痛楚莫名，确是前所未有的。我重临北京协和医学院旧址看病，该院现已成为北京医学院的一部份。当我进入该院的首席泌尿科专家的办公室时，他已找到我自一九三七年起的整个病历表，那年我已离开了北京。他提醒我一些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的抱怨，以及一些有关我健康的错误警告，包括我第一次到那里检验时怀疑我患上肺病的报告，时为一九二九年！跟着，他替我作了全身检验，用最新出品的中国机械给我照了X光片，发现并无严重之处，开了一些抗生素给我服用，几天后我服完了。费用：两美元，这是不确实病况的病人的标准收费。

在参观北京胸科医院时——该院是一座新的、极端现代化的机构，每年培训二百名助理医生，在负责医生当中，有些是曾留学于美国的外科能手——我在它的十座诊疗室中，发现有一座规模不大的牙科诊所。该所设备一流（包括有喷气式牙钻），并且全部为中国制品。我坐在一张椅子上，要求一位医生给我照一张定位片。一位年轻的牙医不单和我倾谈，并趁空检查了我的牙齿；他满意地发现我的两只大牙之间产生了问题。他给我照了X光，并约定时间叫我回去复诊。我再到诊疗所时，他费力地给我挖通一条象针一般的洞，直抵牙龈的边沿。当我要求他用奴佛卡因时，他大表惊异。我听到他对护士说：“这些外国人连最轻的痛苦也忍不住。没有中国人会感觉到这些痛苦的！”他熟练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从那时起我便再没有牙痛了。费用：一美元，标准收费。

读者们现在已看完有关我离开中国之前的治病历史了，现在，让我愉快地加上几笔吧。作为一个非病者，我曾参观过十多所在长春，上海，包头，武汉，昆明和重庆等市内或附近的

其他大型现代化医院，以及一些记不起来的农村保健站和卫生院。在汉口市既新型又宏大的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内(九百张病床，三千八百名学生)，我得到了一次不平凡的经验。在那里，透过玻璃天花板，我看到了五个手术同时进行，其中三个是食道癌。一位女外科医生和四个女助手主持了其中一项。

在中国的城市里，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已降低至千分之三十二，而据同济医院的儿科主任表示，该院的比率更“低于千分之二十”。该院的助产设备和对孕妇的照顾，已达纽约医生医院一般完善，我的孩子都是在纽约这所医院出生的。对可预防疾病和传染病的控制，加上国家对母亲们的保护和照顾，大大降低了大人的死亡率，增加了生产率。那些从前诅咒落后的中国对过度的死亡率漠不关心的批评家，现在却对太多的中国人生存这一现象表示关切不已。

一九五七年，有九位英国医生联袂访问中国，他们大都证实了中国对公共卫生的基本宣布是真实的。T·T·福克斯医生——英国《刺胳针》杂志的著名主编，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在“群众路线”的努力上，已走在英国的前头。举例而言，在某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已降低至千分之二十一，而伦敦却是千分之二十五。(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伦敦出版的《刺胳针》杂志。)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个座谈会上，美国的医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详细说明。一位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博士，用他个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检查近期曾到中国去的外籍医生所作的报告，以及研究一系列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其中二十五本是“颇重要的”)，在座谈会上总结了共产党人面对着的历史性问题的范围和他们所作出的努力的部分

结果。

“在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控制权之前……”这位权威写道：“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组织仍在其初生阶段，远远低于现代化标准。贫穷和疾病实际上统治了全国。”每年有四百万人民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另外有六百万人民需要“天天治疗的设备”。陈博士对中国的需要之估计暗示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起码的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要有一个医生，而每千人便应有五张病床。这就是说，从中国的整个人口算，应有四十六万六千名医生和三百五十万张病床。

“一九四九年受过科学培训的医生的总数，据估计只有一万二千名；对总数五百间的医院来说，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够出五百名医科毕业生……”，而全国的病床总数只有七万一千张。

“由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民，不能支付私家医药费用，唯一能较早解决这个悲剧的方法，相信只有是国家医疗制度(或社会主义医疗制度)。”这种意见早在一九三七年，便为中国杰出的医生所提出，而当时的“农村保健中心的制度，大部分是由曾在美国留学的医生所计划，建成和主持的；目前，这些人很多还生活在中国内，而且事实上成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分子。”

陈博士并没有故意加以贬低这个情况，他说“共产党人极端需要医护人才”。他继续报道他们充分利用了“三十七万个”(今天是五十万个)传统的中国医生(包括以草药行医者)，如哈谭姆医生解释过一样。陈博士报告说，在开始的十年内，高等医学院的毕业生共有四万三千人，另外还有十五万三千名“中等医科学校和中等公共卫生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学校为他们提供

了两到三年的医学训练”(据一九五九年卫生部的纪录，医科学院毕业生共四万八千四百七十四人，接受过“四年”医学训练的“中等医生”有二十六万三千名。一九六〇年，中国共有一千二百所医院，共有四十六万七千张病床，数达二十万个的公社卫生院和保健站不算在内)。陈博士详尽地描述了农村的卫生设备。该等设备现在已完满地实现了当年由留美医生所设计的农村卫生中心制度。

因此，合西方标准的病床和医生，在十年内增加了四到五倍。这仍然远低于陈博士的“最起码标准”，但他报道了“改善清洁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正大步展开……

肺病的死亡率也迅速下降。以北京为例，肺病的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的十万分之二百三十，降至一九五八年的十万分之四十六。由于推行了正确的个人卫生运动和有效的治疗，梅毒和白浊已不是妨碍健康的恶魔。……实行了广泛的医疗和工业卫生工作，清查流行极广的石末沉着病，并且在诊断和治疗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成功地战胜了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之后，共产党也认识到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重要。……群众性的调查癌症运动，特别是对子宫癌、颈癌、食道癌和鼻咽癌的调查，已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

英国的医学报道在“(中国)控制苍蝇的成功，纸屑全无的街道和令人惊讶的家庭清洁”的结果方面，提供了详尽的消息。利物浦热带医药学校的校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发现他们在

“控制肠胃传染病方面有着优异的成绩。”他描述了农村卫生委员会开展的群众性工作以及街道清洁和卫生的执行，大部分是沿着哈特姆医生所提及过的路线进行的。对于那些认识旧中国农村的污秽与贫穷的人来说，他的一段文章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梅格雷思医生说：

其中一个进一步不断地进行的控制血吸虫的方法，说明了从人民方面取得的普遍合作的程度。在人造肥料能足够地大量生产之前，人类的排泄物仍然是最便宜和最有价值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虫卵如果没有与水接触，在粪便中是不可以活得很久。精密的保存使粪便成为非传染物。由于宣传得宜，粪便的存储正在成为一种经济与社会的行动。目前，每户人家都有私家厕所——一个涂上悦目颜色的手提便桶。早上，桶内的排泄物被倒进大的公用瓦缸里，盛满后便封起来，使有足够的时间让缸内的亚摩尼亚杀掉虫卵；之后，桶内的粪便就可以安全地用于田地上。为了确保家家户户的粪便能天天收集，国家又按各人的年龄比例发给征用金，如每人每天若干份不等。为了免使渔民弄污河水，该方法也同时在渔民中实行，因每只船现在都有各自的便桶，后者也被认作是收入来源之一。

从约翰·D·谈到针灸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莫里森街中抽出一小部分美籍医生和教师到它的中国式瓦面建筑物内工作。约翰·D·洛克菲勒之所以设立其基金，有几个不同的因素。但若然他知道中国共产党，针刺

和艾灸最终成为他的受惠者的话，他定然会大呼不值，并宁可让财政部将该笔款项当作遗产税征收而不作上述用途。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办者们轻视传统的中国医药，和教会团体将孔礼视为异端同出一辙。

当我重临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一次长时间的观光，以及和它的副院长许医生及员工讨论一番之后，我获悉了一些有关中国经验科学的新情况。许医生是一位身材矮小，精悍能干，欢愉乐观的人，当他感到迷惑时，他总是习惯搔头与微笑，露出他那局部脱落的牙齿。他毕业于旧国立北京大学的医学院，现年已五十多岁，他的职业资格大概要比他属下的许多年青医生要低。他坦白地指出他本人当行政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职业上。

北京协和医学院到目前仍是一所重要的医院，它现在是规模宏大的中国医学院的一部分，后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十大组织之一。而中国医学科学院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一九五八年起，大多数的医学院都设立了六到八年的医科课程，但大多数学生肄业四年便毕业，名之为“中级医生”。公共健康与卫生工作一天存在着紧张的需要，这种情况便会一天继续存在下去。中级医生边干边学，于业余时间继续钻研，有机会更可回校深造。中国医学院(约有学生三千六百人)及一些省份中的分校现在只设八年制医科课程：三年学习基本科学；两年学习基本医学；两年学习临床医学，包括中国医学在内；还有一年实习。所有的医科学生都要学习俄文与英文两种必修课。如其他各界人士一样，医科与预科学生都有“到农村劳动”

的时间。每年中，他们到农村里度过两个月的时间，帮助农村的医护工作者。他们与农民们同吃同住(按〔一九七〇年〕，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指出城市所占的现代医疗设备的利益比率太高，接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一种“农村医生(赤脚医生)”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卫生工作人员在地区或县的医院里接受短时期培训，以便回去可以当简单疾病的医护员；诊断和照顾一些常见病，烧伤，意外事故等。然后，他们要回到本身的公社去。他们与专业医护人员和医院连成一气，通力合作，他们担负了主要的联络与急救工作，弥补了技术人员不足的缺点)。

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即今之北京医院，再也不是一间学院而是与一家妇儿科医院合并了的联合诊所——新的建筑物使原来的病床加倍，达到五百六十张，但这里似乎没有多余地方以供扩展之用。新的医院与学院多集中于郊区，环绕着中国科学院的总部。在北京医院的医生群中，约有三分之一毕业于美国管理时期的旧北京协和医学院。整个医院的医生共有二百五十人，差不多有一半是女性。

据许医生说：过去，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最顶峰时期，每年诊疗病人十万人次。当时，它是全华北独有的一所一流医院。现在，该医院每年要处理五十万人次。我指出，这数字几乎达到北京人口总数的十四分之一。许医生解释说，该数字是东城区人口的百分之一百，这所医院目前只负责照顾该区的居民。这里的医生和邻近的街道委员会的健康与卫生工作队紧密配合，而现在的“处理”并不一定表示“诊疗”的意思。

在每一条街道里，各排住宅都推派人选负责组织工作，执行天天清理垃圾和废物的任务，以及将行人道打扫干净，而且还到各家的饭厅、托儿所、学校等等地方视察，看看有没有按规定完成清洁与卫生的工作。在市卫生部门的监督下，这些队伍还与各类的防疫工作互相配合，并且定期进行消灭害虫运动。各家各户都要将一切疾病向这些街道卫生队举报，在可能的范围内，卫生队会协助诊断症状，并代安排检验或住院日期。城市中各区的医院就这样负责起监督公共卫生的工作。这个制度也在县的医院周围建立起来，县医院之下就是区中心，以下则是公社，生产队与村卫生队。

“这种措施使医疗效能降低了多少呢？”

“如果我们单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个措施，”许医生回答说：“水平是低了一些。也就是说，（集中医疗制）可以使为数尚少的专家们较目前得到更好的装备。假如我们从诊疗病人的总数，社会健康的一般水平和复元率等方面来看，确实比以前大有进步。过去，住院病人的复元率低于百分之三十，现在却是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更有甚者，我们较从前接纳更多病人，其中很多是过去的医院会拒绝住院的。”

拥有工会医疗劳保的病人，无论住院费与医药费都不需缴交。危急的病人可获准马上住院。普通病症则通过街道委员会与病人的工作单位代为注册。普通的私家病人每天要缴纳床位费一元（人民币，下同）——我所看的病房都住满了人。许医生举例说，割阑尾（盲肠）的手术费与住院费平均要二十到三十元。生产婴儿平均五元；如属难产而要住院一周左右的则要十五元。这些费用较普遍的农村医疗费为高。院中的药物售价与外边相

同，有时甚至较市面售价更低：例如，注射一次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只要一角到两角。但医生的薪水也并不高。外科副主任费医生，一个美国时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的医生，每月薪金为一百五十元（即美金六十五元）；他的妻子也是个医生，薪金与他相同。

这所医院为每二千名东城区的居民提供了一名医生，并为每千人提供了近两张病床。但从整体上看，北京市的比率还要高一些，因为除了大医院外，市内还有无数较小的诊疗所和专科医院。在众多的大医院中，最好的大概要算是规模很大的友谊医院了（六百张病床），曾经有过苏联医生驻于院中工作，但现在的工作人员则全是中国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照顾更多病人的另一个原因，”许医生继续说：“就是由于我们将传统的中医学与西医学结合起来，也因为我们的医生都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医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诊断和治疗。”

我获悉自一九五八年一起，所有的西医最低限度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学习中医学。在我访问期间，北京医院有两名主任都暂时离职到中医学院上课。

我连续向许医生提出了有关中草药，针刺和艾灸的原理等问题达三小时之久。在我从前居住中国期间，我从未认真地尝试过去弄清其中任何的一项；象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我认为它是江湖医生的治疗法。许医生提醒我说，它已有二千二百年的历史，还包括有数以千卷计的医学著作、处方和实际的治疗

纪录。对传统中医学的评价，我们可以再次引用美国公共卫生权威陈博士的文章。他在报告中指出：

传统的中医学是一种以四千年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治疗术。它对健康与疾病的简单观念就是看体内官能的两种力量协调与否，此两种力量称为阴(负)和阳(正)。在解剖学与生理学两方面来说，传统的中医学事实上没有什么贡献。然而，中国在草药及麻醉药品方面的大量著作，以及记录观察病情的论文是很珍贵的。采用这些麻醉药及针刺，艾灸，和通脉畅焦的治疗技术的结果，肯定有它们的实践价值。……

针灸……包括将热或冷的银针在身体某些特定位置(脉门)刺进去。银针或细或粗，或短或长(从三公分到二十四公分不等)。……当银针刺进体内，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了不同的组织和器官时，它们便产生生理上的反应，因而产生了治疗的效果。

现在，针灸家们还要学习消毒的技术，并且要学习与“中级医生”同等课程的基本解剖学和普通科学。他们只是在医院中实习。目前，差不多每所医院都有了针灸专家。很多还采用了低伏电力的银针以助疗效。在治疗的过程中，有时还一并采用了放射线治疗法。陈博士继续指出：

现在假设的理论是：针刺所引起的刺激是由外神经传导至脑部的皮外组织，因而压抑了脑部的病理反应。这样的解释似乎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定理相吻合。

针灸基本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中都被广泛采用，从外科症状如阑尾(盲肠)炎到慢性症状如糖尿病等，不一而足。人们相信它在治疗神经系统或神经官能的症候中收效最大。据纪录，针灸在治疗面部神经麻痹，关节炎和湿疹等症状中，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一位苏联医生报告说，他那历史悠久的、令他感到无限烦恼的风湿病，经针疗处理后，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位于一九五八年到中国学习针灸的印度医生，开始时对它的价值仍然抱着一些怀疑的想法。然而，他后来相信传统医学与西医学的结合，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本人也成功地以针灸治好了他的急性鼻窦炎。……

我在北京、汉口、大连等地的医院里，也与接受过中医学治疗的病人谈了话，他们的病症包括有阑尾(盲肠)炎、湿疹、风湿、鼻窦炎、肺结核、神经衰弱、支气管炎、以及各类的神经痛症。这些病人都认为中式治疗较好，有几个已经到满意的复元阶段。在汉口市，我遇到了一位病人，他抵院时已昏迷不醒；西医诊断后认为他是患上了急性盲肠炎。但经过用中药与针灸处理后，他便痊愈出院了。

这种类似邪术的医疗法与科学化的医学，共存于现代化的医院中，确实使外国人大为震惊。在胸科医院里，我看到一个患支气管炎的病人正在接受针灸治疗。同一医院中，两位心脏外科医生带我见一个复元中的小孩。他曾接受了一项不寻常的胸科手术，成功地治好了所患的“法乐氏四连症”或称蓝婴症。此症包括了以下四个症状：右心室肥大，肺动脉瓣狭窄，心室中隔缺陷，主动脉右位。手术需要长时间使用人造心与人造肺。该小童无意之间告诉我他父亲是在大连市当海员的，而他由家到此的一切费用都由工会负责(据报道，这所新医院一九五九年的手术死亡率为百分之四点一)。

中国的草药与针灸术互相合作，中医生通常就是针灸家。语意学上存在着的困难，使人难以迅速地解释中国医学的理论，

但“矛盾”上的“阴阳”概念可以作为其基础。人体代表了器官的总合；疾病是由于不同的器官或它们的附属组织之间的不平衡所引起的，而治疗则包括了恢复平衡与协调。这就要使八条引起精神紧张的主要“线路”之间的“敌对状态”松弛下来，它们是：阴一阳，表一里，凉一热和虚一实。

若我们不作进一步研究的话，可以简单地这样表示：人体就是代表了那些要素及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的“生命力”。在正常状态之下，非敌对性质中的“矛盾”在平衡中是存在的。当“不团结现象”（疾病）发生时，就表示某部分的器官或某组机能工作过度，刺激过度，受伤或受到其他的干扰。医生的工作就是要使该部器官恢复平衡，也就是要排除那些引起敌对状态或过分充积的原因。

“疾病是有内因与外因的，”许医生对我说，为了向我解释这方面的问题，他已费尽唇舌。“脑部的较高等神经系统当然会影响整个人的生理。我们所说的‘逆阻中关’可以在其他地方引起器官痛症和损伤。有时，一个病人因患痛症到医院，据西医诊断可能说他患心脏血压过高症，而中医可能会用中医疗法与针灸来联合治理他。

“西医通常只问及病人的病征和病历。中医认为一个人是内外张力的合体。他会要求弄清该病人的家庭情况，他与父母之间的相处，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怎样，他个人的爱恶是什么，他的生活上存在着那些不愉快的地方，究竟他是本市人、南方人或北方人。所有这些都是诊断时要提问的。”

“南方人或北方人？这个也有区别吗？”

“是的，一些对北方人是‘热’的药物，会使南方人产生‘凉’的反应。”

“我想，这样的询问也需要触及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啦——各种各样的斗争都属于被讨论之列。”

从以上的对话以及后来的讨论中，我弄清了中国的病理学家既是分析家，也是精神病学家，而针灸则是往往用来作刺激性治疗上用的。

“究竟共产党人能否实现他们的抱负，即将传统中医学与现代科学化的西医学组合，而产生一种新的中国医疗科学这个目的能否实现呢？只有时间才可以证明。”陈博士总结说。“然而，不论结果如何，它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二日出版的伦敦《观察家报》中报道：“国际针灸协会现在召开了，几百位欧洲医生正在设法将西医学上的科学技术与古代中国针灸的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古代医疗法取得显著成绩的病例”，包括有“各种类的不良精神症状——例如，某些种类的失望与忧虑等。据推测，该等病症是由于人体机能错乱而引起的；但当精力的正常循环一旦恢复，这些病状便会消失于无形之中。在一些病例方面来说，医学家经数年分析可能仍然束手无策，但用一支银针刺两三下，却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医院的外科副主任费医生是个上海人——瘦削，严肃，三十多岁。他说，外科医生只得三十人，而他们需要多一倍，病床也应倍增。他毕业于旧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该校因抗战而迁往重庆；战后，他来到北京。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间，这所医院被马歇尔和魏德迈两位将军用作陆战队的总部。他也

曾学习过中医学一段短时间。他怎样抽出时间呢？

“你的工作是否较前顺利呢？”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听得懂英语，但他要通过翻译员回答——或可以说回避吧——我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装备和手术基本上与从前相同，”他说道：“已转变的是我们与病人的关系。从前，医生决定怎样办便怎样办。现在，如果一个病人不喜欢这种方法，他可以对我们说出来，我就试找其他方法。以结肠切开术为例吧。人们都不喜欢做这种手术。过去，若他们不愿施手术的话，我们便送他们回家。现在，我们要解释，说服——或想其他方法。”

“象针灸吗？”

“有时是的。”

“你曾经推荐过针灸吗？”

“他们利用针灸来治疗盲肠炎和痔疮。它对减轻肠胃痛症是很有效的。它能帮助克服手术后输尿管的痉挛之苦。”（那是在每所医院都可以听到的）

“但在你个人方面来说，你的工作是否较前顺利呢？”

问题提出以后，良久也没有回答。我再问一遍，翻译员也复述了我的问题。

费医生最后说：“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改变了。如果病人合作的话，我们的工作便好做。但如果他要争论，那便浪费很多时间了。”

在谈及手术上的死亡率时，费医生说过去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而现在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可不能用数字来与过去相比较。从前，我们只容许那些有机会复元的病人留院。

今天，我们连后期肺癌的病人也准留医哩。”

“但是，肝硬化病人的复元率较从前高了很多！”许医生插口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但显得有点儿激动。“甚至一些我们从前不允留医的病例也是如此。”

第四篇 民主专政

八百名老革命战士

毛与其他几位最高层领导经常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反对我们的人占不到百分之十。”在“百花齐放”时期——即公开接受批评的那段短时期内，在大庭广众中提出反对意见的远少于百分之十。

在中国，若反对“民主专政”的人口少于十分之一，那倒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了。据共产党自己计算，中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属于“剥削阶级”之列，在革命中受到了财物（或更坏的）损失。在大部分国家来说，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人的反对算不了怎么一回事，但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已超过了英国和加拿大两国人口的总数。中国成年人口（指十八岁以上的人）的十分之一已是一项使人吃惊的数字——约四

千万。

最高领导及其忠实追随者究竟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几呢？一位在党中地位很高的领导人回忆着对我说：“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屠杀之初，我们共有五万人。在几次大屠杀之后，剩下的便只有一万人。今天，我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了八百名。这几年以及未来的几年中，我国主要由这八百名老革命所领导。”

这是一个光明坦白，直言不讳的解答，说明了在全国范围内，党的最高领导所扮演着的极重要角色。重要的决定最后都由这“八百人”通过：在最高领导的四周是一百九十三名中央委员（九十七名委员和九十六名候补委员，于一九五六年八届党代会中选出）；他们之下就是其他的老战士，准备于未来的岁月中接替他们。民主集中制的最高领导之旁的高层领导就是政治局的其他十九位委员和六名候补委员。这年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则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在同志背后说闲话”，“互通情报”，“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等名言都是毛有关作领导的观点的一部分。多年前在保安，我在毛的贴邻住了几个星期。在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我总见到委员们都先到毛的窑洞里，起初是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或两个或三个一起，与毛作长达数小时的讨论。因此，当毛召开会议时，他就可以掌握各方面的观点作综合性的分析。全体会议的时间往往比个别会晤的时间还要短。

然而，在对内与对外的政策上，政治局还常常存在着极大的意见；无法解决的僵局也曾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以解决彼

此间的分歧。中央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由“应声虫”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而是由许多强人所组成，他们之中很多人曾在战争中指挥大军冲锋陷阵，有时并掌握重要兵权。从党的纪录上看，毛能够消除分歧并有办法维持彼此间的团结。

就这样，党的最高层领导在团结的纪录上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廿五年来，党内有时也会有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一个政治局的成员都有着超过三十年的党内历史，大部分的中央委员也是这样。较高阶层的人物几乎全部都是被革命实践和一套接近的思想方法所教育的。在策略上的分歧，甚至私人的敌对显然是存在的。一九五四年的“严重分裂”牵连了十二个高级人员。最主要的是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他是政治局成员，也是前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次要的是该委员会的副主任饶漱石，前华东区政府负责人，当时也兼任很有势力的组织部部长。此二者是多年来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仅有的两名，但有五个省长及几名卸任的地区负责人也被开除出党。

毛是否独自决定一切较大的政策和国内事务，以及决定干部们执行它们的方法呢？这些倒不是易于回答的问题。虽然，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人们对毛的崇拜已迅猛增长，但较早迹象显示了毛并不打算独揽大权于一身。

一九四八年九月，*全国各地都已明显地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这时在毛氏主持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较赫鲁晓夫有关“集体领导”的演辞早了八年），宣布：

党委会组织是为实现集体领导，防止任何个人独断独行的重要的党机关。近来，在某些组织内，发现有个人包办控制的

现象，……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今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一定要由委员会处理，并且由出席的代表充分讨论。（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氏发表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六个月之后，在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决定禁止进行党领袖们的生日庆祝，并不准以党领袖的名字来命名地方，街道和企业单位。

我可以证实有人曾单刀直入地问毛泽东，他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崇拜的公开指责的演辞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毛氏回答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正好表达了他个人的印象。该两篇文章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且是以一九五六年四月和十二月先后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为基础的。由于毛经常为这份官方的党报写评论，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猜测上述两篇文章都是由他本人撰写的。以下是他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一些重要的言论摘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一定要……十分谨慎和谦虚，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并且常常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以后，一些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

时期内保存下来。……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怎样做好这件事呢？在领导的问题上就是要紧紧地依靠“群众路线”，一如一九四三年的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示：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见《毛泽东选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

（《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虽然对斯大林作了严峻的批评，但肯定斯大林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毛曾经指出：假如一个人的工作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斯大林的错误并非被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内部固有矛盾，而只是党不能适当地执行“群众路线”所致。

虽然有人指斥中国的领袖们对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政治局的成员中有十一人在革命前曾到外国留学或旅游。虽然最高层的七位领导只是在电影上看过美国，周恩来总理通晓英语，而外交部长陈毅也曾在法国留学。“八百名”居领导地位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已是五十多岁或六十岁以上的人了。党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领导包括了长征年代较年轻的生还者（不超过

一万人)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约一百万人。目前，各处的行政与生产的最高职位都由这些四十多岁的领导担任。他们主要依赖于较年轻一辈的“共产党战士”协助——后者就是最后一次内战和朝鲜战争的战士，现在大多数都已近三十岁或三十多岁了。

任何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认识到差不多每个国家最后都是由一小部分人来统治的。在中国，这“八百人”在管理和国家利润方面所拥有的权力较美国所有的商行董事会联合起来还要大。然而，这个国家的稳定最后也有赖于有组织的群众支持。

党 和 人 民

“我们的党员人数目前超过了一千七百万人，”中国共产党一位负责人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宣布。“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而百分之七十是于一九五三年后入党的。他们是党的新血液，但缺乏经验，很多人还未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青年党员所占的高百分比也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在维持高级领导上的需要。

若该领导人的数字不包括“候补党员”在内，那么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总数便可能超过二千万人。但在一九六〇年的十月，周恩来总理也曾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当时党员数目的资料，那时候的数字远低于一千七百万(这些资料是在总理的要求下，由当时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女士提供给我的，她指出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党员总数“不超过一千三百万”。她提供的数字表明了自一九五九年起，党员的数目下跌了一百万人——一九五九

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当时的党员人数是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当她一年后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老挝问题的会议时，我要求她加以解释，龚澎女士回答说，一年前在北京告诉我的数字是最新的，但却没有包括“候补党员”在内，而“去年这些人当中已有很多人正式入党了”。因此，一九五九年的数字可能包括了党员和候补党员在内。若上文所述的负责人所说的“一千七百万”只是包括正式党员，那么所增加的三百多万人，可能是其后自候补党员中批准入党的一批人。但该数字也可能是包括正式党员与候补党员在内。当时，我也获悉中国国内有“超过二千五百万名共青团员”（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和“超过五千万名少年先锋队队员”（九岁到十四岁）。据同一消息来源报道，属于“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指“教师、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人数从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五增加至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工人阶级党员的比例也占了百分之十五，“少数民族”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农民党员仍然占着较大的比例，但比例从接近百分之七十跌至百分之六十六。所有农民党员都在“已受教育”之列，但“很少受过正规教育”。总的来说，少于百分之二十的党员曾经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里学习。然而，由于青年党员的剧增，该百分比不久后无疑会显著上升。

在中国，任何人也不会被迫入党。非但如此，申请入党需要经过高度细心的挑选过程。然而，后来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国家机构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生）入党，大概是党员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据说增加了二百五十五万）。

假使组织的支持单独局限于党员，这些支持者的数字可以

说是不足道的，但它的组织控制力远远超越了上述的程度。让我们以中国的总人口为七亿来推算，可以粗略估计出现在中国每一百个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中，便有四个左右是党员。但在每一百名十八到四十岁年龄的成人中，便有七名是党员。而每一百名十四到四十岁年纪的人中，有十四人若不是党员便是共青团员。若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的总数合计，人数则达到九千万到一亿，这个数字大概占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强。

若估计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力量，还要考虑数达二千一百万人的工业工会会员，三百万到四百万的武装力量和公安部队，以及二千五百万名的民兵和后备军队。以这些人中百分之二十是重复分子计算，该等组织使“可靠分子”的数字增到四千万名。此外，我们还要将一千九百万非工业工会的会员包括在内，也要记着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的积极分子的支持，以及渴望入党的人士和党员家属对党的支持。由此统计，各方面直接有组织地响应共产党最高领导的人，大概累增至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

过去，中国是一个由高高在上的绅士阶级所统治的国家；现在，它是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那里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较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同辈，都负起较大的责任和掌握更大的权力。很多二十岁的中国青年，较他们的父辈接受较好的训练和能生产更多的东西。“青年领导”的情形就象“政治挂帅”一样，全国到处可见。中国人的平均年龄，相信仍在四十岁以下（一九五六年的人口统计中指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了一百八十五万人，其中三千三百八十四人超过一百岁。一位老

人据登记出生于一七九八年)，而人口的分配则以年轻人为多；百分之四十一的中国人，年龄皆在十七岁以下。在这群人中，对旧社会的记忆已是很模糊或者已忘掉了。（在中国），由于上了年纪的人可以领取养老金或得到较轻便的工作，由于有了医疗照料、休养和娱乐的设备、疗养院和“铁饭碗”——最低限度也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贫苦大众对自己逐渐衰老这一回事已不再惧怕了。

（党员的教育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若百分之二十的党员曾进入中学受教育，这个比例已在全国平均数之上，但它也表明尚有百分之八十的党员的教育水准只有小学程度，虽然年轻一辈的党员的平均比率会较高，而且差不多全部的党员都要参加“红专”业余学校以“提高知识水平”。所以，由北京发出的一般命令，为了要使农民干部都看得懂，便以最简单的语言写出来（但对高级干部所发的命令却有所不同）。让我们看看一则省级党委书记应要记着和落实在行动上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我们将进一步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加速发展重工业，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毫无例外地动员一切工业、商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力量，全力支持农业生产；我们应该鼓足干劲，努力搞好一切企业上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和自动化，争取更高的生产；我们应该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同时发展大、中、小型企业；我们应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我们应尽力增加生产、实行节约，并动员群众起来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

——见一九六〇年四月六日《北京周报》李先念的讲话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我们一切的经济工作都要由政治统率”。人人都应“敢想敢干”。“至于个人消耗物质的分配制度，党和政府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还教导人民群众努力为未来的目标而奋斗。”

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委会拿出很多时间搞整风运动：表扬和批评党员的表现，留下好的，清除坏的。虽然如此，申请入党的人却越来越多（而标准也越来越高了）。

公 共 安 全

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很少人不附属于农村中公社以下的权力机构或不对它负责，或不隶属和负责于城市中的同级单位。中国现在就象一个活着的巨人似的，它身上的每一器官，包括全身的大面积表皮在内，在未给巨人的神经系统传达讯息之前都是不能随意触摸的。

在公安部的统辖之下，在每一级的行政和管理，低到乡级为止，都有（人民）警察负责公共安全，但人民的安全并不是单独、甚至不是主要依赖于这些职业人员的。与警方力量平衡的组织是“人民保安委员会”，由每个工厂、每个生产队、公社和政府机关的干部领导。在城市内，他们的工作由街道委员会和街道委员分会负责。他们维持秩序、调解争端，有时甚至会负起该区居民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们协助搞人口调查并且将每个家庭的情况备案待查。他们的职位并不是秘密委托，而是进行选举的。他们也要干些踏实的零碎的工作，例如检查卫生和街

道清洁，家庭健康，学生的上课情况和粮食的分配；他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以及送特别的口粮与燃料给需要的人。象警察一样，他们提供了各项社会服务，当然也加上社会监督。“基层组织”的公安人员要定期召开群众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看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违犯良好的警察所应遵守的“八大纪律和十点注意”。

过去，中国已有着很严密的安全制度。在十三世纪，当马哥孛罗旅游中国时，他便注意到家家户户都要在大门挂上当晚在该户住宿的每个人的名牌。但大概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安全组织，在范围和效能方面都不能与目前的相比较。

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是很难很难会丢失东西的。每个人、每件物件都有来源可寻。偷一部汽车有什么用呢？若没有驾驶执照和证明与汽油票是不可能驾驶的。一件偷取得来的皮外衣或一辆单车，很快便会被注意。物主从何得来？囤积粮食，突然间乱花金钱，或反常的离开工作岗位或离家等现象，转瞬便会“街知巷闻”。人们能够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旅行，但是没有有效的证明，不能长期留下去。旅店或酒店需要证明书和询问理由。到私人家里作客，很快便会被四邻知晓。找工作的人一定要拿出工会证明书登记。一个谋杀犯到哪里躲藏呢？一个盗用公款的人到哪里投资或花掉他的金钱呢？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若发生在一个公共住宅里，又怎能长瞒不泄呢？党，它的卫星组织、以及各安全委员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去。

在过去的中国城市里，小偷和扒手之多，与今日美国实在是难兄难弟，轩轾难分。现在，在我留居的任何一间房子里，我将金钱与贵重物品随便放置，永远不锁门，也从未丢失过。

在上海，我将一支墨水笔弃在一间旅店的房间里；几天之后，它被送到汉口交回我的手里。有两三次我忘记自己将器材部件放到那里，或者放错了地方，一被发现，便马上送还给我。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受着这么有系统的管理，那么有纪律性，以及那么快便从混乱的社会制度改变成为这样有秩序的社会。那里，军队极少公开行动。我从未见过满载宪兵或防暴队的车辆在街道上奔驰。虽然我们会见到一小队一小队的民兵操练，但他们却不是作恐吓性的武装炫耀。当然，公安部队都按计划驻守各地，但很少见到他们的踪影。在游行的时候，由各区的组长和少年先锋队负责维持秩序。大多数穿上制服的警察都是交通警，而多数似乎是长着长发的年轻姑娘。这确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从内部得而观之。当我拍摄照片时，从来也没有警察干涉过我的行动，但有两次，我被当志愿民警的家庭主妇坚决命令停止摄影。这件事发生在大连，该市市长对我说，全市的正规警察人数“不超过六百名”（这个较大的城市人口达三百六十万）。他接着说道：“维持秩序和尊重法律是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也是每个好市民——所应尽的义务。”

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出版过详细的犯罪统计。我询问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为什么不进行这件工作。他的答复是：“犯罪的数字如此低，外国可能不会相信。”几年前，周恩来曾宣布在土地改革的斗争，对地主的群众性审判和在一九五四年结束的围捕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消灭”了八十三万“人民的敌人”（附带一提：“消灭”一词在英文上通常译为 destroy，字义上表示“攻克”，“驱散”和“毁灭”，但不一定是指“杀死”）。据中国人

说，这个数字不过是作为驳斥“我们的敌人的种种歪曲和夸大”的根据。（在回答我所提的有关中国两次内战时期双方的伤亡总数这个问题时，整个斗争都居于中国内的路易·艾黎这样写道：“我自己曾估计过，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政变开始至一九四九年止，由政治判刑，国民党在江西和福建等地的‘围剿’（指一九三〇——三四年间的五次围攻共产党的战役），湖南，河南等地区的人为灾荒（指国民党的封锁），各次“事件”（指一九四七年第二次内战前的武装冲突或“边界战争”），国共停火协定会议的破裂，以及最后的内战所引起的总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五千万人。”）

在人类的生命这方面来说，八十三万绝对不是等闲的数字，但若以这个数字（倘若是真实的话）与其他大灾害的损失比较——如美国内战，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希特勒的德国更不待言）——它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并不算大了——每百万人中约占一千四百人（以总人口六亿计算）。反革命分子现在仍然被逮捕。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说，若他们的行为引致另一个市民的死亡才会被判以死刑。执行死刑的告示在各省的报纸中都有刊登——明显是为了产生警告的作用——而西方的通讯记者当然也记录在案。一九六〇年，这种行刑的告示每月约有八到十二则，大多数是犯了暗杀罪或者是偷渡过台湾海峡到福建或广东后被逮捕的国民党特务。

另外还有两种足以判处死刑的犯罪：（一）由阶级仇恨而引起的谋杀或意图谋杀的殴打，或者是特别凶残的暴力行为，和（二）强奸，受害人的年纪在十四岁以下。但在这两种案件中，死刑的执行现在据说可以押后两年，在该段期间中，犯人可以忏

悔和改造。期满后，他的案子将受重审，并可能会获得减刑的处分。

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证实中国内的囚犯总人数“远不足一百万名”，但是公安部以外的任何人士，当然都不可能对此有效地肯定或争论。至于他的数字正确与否，我并没有企图去证实之；但根据我与其他各国人士的谈话中，我能看出和知道外国所谓中国曾处决了“二千五百万人”或“一千五百万人”的传闻，只不过是高度主观的推测而已。

虽然如我所述的中国的公安组织极度严密，虽然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宣称犯罪率大减，虽然公众的行为表现出不可比拟的宁静——很少外国人会见到骚乱的现象，全国性的强力手段仍然实行。法律容许设立“劳动改造”学校，它们在全省和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存在。这些就是城乡和工农业性质的监狱了。一切犯人，无论是普通犯人还是政治犯人，按法律都是需要参加工作的。有人说这些“劳改”学校合起来便是“一所巨大的奴工营”，对这个说法，我却不敢苟同。“强迫劳动”一词在中国里有很多矛盾面，这一点我在下节将有所报道。

本文中提及的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一九五四年前历任汉口市市长，现任武汉大学教授。他告诉我说中国现有律师三千人，人人都负担教学工作，每年出庭的时间只不过几天。七亿人民只有三千名律师吗？这里有说明中国法院组织的必要。在该组织顶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出院长和署任法官组织而成。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就是地区的、省的和专区的法庭，这些法庭的院长和署任法官，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和委员会选派。任何有知识的公民都有被选派资格。在上述各机构中任职的最高人民检察官和地区检察官及他们的助理，也由同一方法推派。最高人民检察官的职位约相当于高级法院大法官，而地方检察官则做地区法官工作。

中国的法律有一点类似法国的法例，即当一个人被逮捕后，他便被认为是**有罪的**，直到他被证明是清白为止。若警方发现某人**嫌涉**与一件案件有关，检察官便起诉他，然后进行审讯。大部分较小的案子就这样解决了。若案情过于严重，或犯人坚称**无罪**的话，便要开庭审判。被起诉者可以自己找律师或要求法庭指派一位律师，甚而可以要求一位朋友替他进行辩护，以及征集证人。他要付五元给律师为他写好案情说明书，然后每天要付五元律师费。若辩方负担不起，则由法庭代支。

判刑后，犯人有权作一次上诉——到较高的一级法庭去。据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指出，只有约百分之五的裁决会上诉，而且“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判决会被取消。那就是说，一旦被判刑后，辩方洗脱罪名的机会是一与一百之比。不论案件于何时准备就绪，马上便要提堂聆讯，很少审判会超过两天的时间。由于没有案件积压，法庭每到一段时间就要关门休息，因为实在无事可做，无案可理。我到每个城市中访问，人们也如此说。上海是我第一个适逢法庭开庭的城市，因而有机会聆听一次审判。

普通的犯罪有三种监禁法：其一是囚于市监狱之内；其二是送往国家农场劳动改造；最后一种是限制行动自由或监视劳动。监禁期少于三年或超过十年的犯人，多囚于标准监牢之内；刑期三年到十年者，则发放往国家农场改造或加入以该等犯人

为基础而组织的流动劳动队；刑期短于一年者，通常是在“监视下工作”。第三类刑罚的对象是初犯者或罪名较轻的人。该等犯人返回自己的家里居住和照常工作，但每天的行动都要向街道治安委员会或十个同组的工人汇报。

在众多的西方法庭中，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用他们的时间来聆听财产所有权的诉讼，或一些不再出现于中国之内的案件。中国人不能请求政府改变任何法律授权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化的行动。有关财产上的争执，目前通常只是牵涉那些较小的盗窃案。盗用国家财产的罪名，较盗用私人财产的罪名为大，盗取物资出售图利，较盗来自用严重得多。很多类的犯罪已经消声匿迹。

由于断绝了任何有可能犯罪的人找到市场来出售赃物的可能性，所以盗匪和歹徒在今天的中国已濒于绝迹。制止一般有犯罪意识者的一项更重要的因素是：人人皆知不论多少钱，不论多么出色的辩护天才，也绝不能左右法庭的判决。然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的司法部门也和立法与行政部门一样，都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工作的。中国的司法部的负责人曾经说过：“由于人民法庭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丝毫不动地袭用旧法庭这种反革命机构，而是要完全摧毁它们。”当然，党员对法律也不能例外；若党员因犯事被捕，党籍便要暂时停止，而一旦证实违犯法律，便被开除出党。

对一切的罪犯来说，入狱是接受一段长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和目标的教育和再教育”的开端。以法律作为改造、教育和灌输思想的工具，并不是完全与传统的中国思想背道而驰的。孔子的信徒常常认为能分辨是非黑白的人，有责任以身作则、

教育他人，也有维持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在危急的时期中。

毛泽东坚持说教育可以使人从善。在我采访他时，毛在一次闲谈中指出：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而且坏人不是与生俱来并永久都是坏的，他们也可以教育的，就象好人也会因受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变坏一样。困难的就是去发现什么是好的，并怎样教人向好的学习。

中国共产党对司法程序的态度，就是以它作为制裁社会主义敌人的工具。在古代，中国并没有民权自由的保障，也没有陪审团审判，或象罗马帝国时期留传下来的西方法律的定义。诉讼人若将争论交与政府官吏主持的正式法庭处决时，便表示他们已出到最后一度“板斧”了。绝大多数案件的仲裁，审讯与判决都是由乡绅集团人物非正式地处理（所谓乡绅集团包括了文人，地主和商贾等人），他们当然为本阶级的权力与稳定服务。在过去的年代里，除了由“法家”学者占了统治地位的短暂时期之外，司法以孔子的教义为理论基础，集中表现了“礼，义，廉，耻”的所谓“国之四维”——当时这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平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土豪劣绅的决定，不用说也是用来束缚广大的文盲者，这些人当然不能引经据典跟他们驳辩，所以便只有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通常，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敢到正规的衙门去。

在条文上，国民党也曾颁布过西式法典，但大多数的诉讼人仍然袭用旧例，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中。因此在形式上，过去由乡绅们控制的传统法律制度和今天由党领导着一群人执行的司法制有着一定的关连。所不同的是：孔子的教义与乡绅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关系”及党所替代了。

“苦工”的真相

旅程中，我看到数以千计的男男女女参加修筑公路、铁路、水坝及其他大型的建筑工程。若他们是犯人的话，周围却看不见武装守卫。有谁能与他们每个人一一谈话呢？我在中国之内一万一千多哩的旅程中，有时也会见到一两个解放军押着十来个犯人在道路上行走。据说这些就是正式的犯人，从国家改造农场送往田地里劳动。在中国的范围内，我看不到从前在苏联常见的用铁丝网围绕着的、四周有高塔与机关枪监视的集中营。

国际上传言中国有“二千五百万名”苦工，这个巨大的数字只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妄自揣测的结果，由国民党政权提供给国际劳工组织(I. L. O.)，然后登于一九五七年联合国出版的一份有关该种情况的研究书上。I. L. O.的报告本身原本对台湾这份文件不须负任何责任，它并注明了没有另外的消息来源和没有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透露过任何相同的消息。虽然如此，世界上的报刊却广泛地采纳了“二千五百万”这个数字，认为是联合国所默认为的。然而，基于台湾文件以外的消息来源，I. L. O.不得不总结说人民共和国已经“在监狱和劳动营中建立了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强迫劳动’制度，用以实现政治教育的目标”，并指出人民共和国正“大规模地应用这个制度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

但是，规模怎样“大”呢？同时，什么是“强迫劳动”呢？它是否包括了那些被迫做自己不愿做的工作的人在内，还是单独

指那些被判入“集中营”，有工而无薪的人呢？即使国民党单方面估计的“二千五百万”中，也包括了三百万水灾区“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八百万“征工制所征得的人民”。

现在让我们看看事实吧。在中国，差不多每个人都要做一些体力劳动，从大学教授到搬运工人也不能例外。这种体力劳动究竟被认为是自愿与否，则要看个人的思想情况而定。但这种工余的体力劳动，显然不是西方概念中那种“苦工”。在另一方面来说，有一部分数目不明的“不守规矩”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从未犯过政治上或刑事上的法例——正干着全时间的指定的“劳动教育”。这种情况由国务院决定，并由一九五七年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为法律。（见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出版的《北京周报》。）

根据这条法律，为了要“把游手好闲之辈改造成为新人”和“更好地执行纪律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一些人可以“被逮捕和加以劳动教育”而不一定要判刑，如果他们被发觉犯了：

（一）游手好闲……犯了公共秩序的法例，经过反复的教育而不知改善；（二）被他们本身的工作单位、组织、团体、企业、学校或其他团体所开除而无生存之计；（三）虽然本身条件适合，但长时间拒绝工作的人，或因违反纪律被开除而无生计的；（四）不同意工作条例和不同意分配其他工作，或那些在生产工作中拒绝接受指导的人，或者是妨碍公共事务的人……

劳动教育是达成教育改造的一种方法；而它也是为犯法者提供职业的一种方法。

这种人仍然“按照他们所做的工作”给予薪酬。他们必须以

薪金协助家庭支出，或储蓄起来以“建设家庭”。他们受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劳动最光荣”的教育，并可以熟练生产技术……和自力更生。

这就说明了那些职业乞丐，托病逃役者，旷职者，顽固的地主，“搞麻烦的人”，和从前“靠打主意为生”的人的遭遇。这个法例对那些不按指示工作的人和“不合作者”或一般“违反纪律者”来说，是强有力的预防剂。不单只公安部有权判这样的刑罚，每个家庭的负责人，街道委员会，各社团组织，学校，或该犯罪者所属的单位，只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同意，无需经过法庭，便可以将他们置于这种劳动改造的服务中。

这些人可能在被开除的单位中，被指定干某种受监视的工作，或者被送往劳动建筑队去。政治法律学会负责人指出监视劳动的最高刑期是一年。若他们依然放弃工作，便受法庭审讯并判以正规的刑罚。

这里，我想不必要特别指明这个法律也可以用来处理被开除的党员。同样，在这个法律之下，没有手令而搜索和逮捕，也与人身自由和保证毫无抵触的——虽然宪法也有所规定。

根据一九五四年实行的“国家劳动改造法例”，犯人可以被命令做任何的工作——“每天九到十小时”。根据同年九月颁布的一条附则，该等犯人在被释放和恢复权利后，“可以由劳改组留下和重新被雇用”。但这种情况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犯人自动要求，二是如果“犯人被判往地大人稀的地区劳动，而移居该地的人是需要工作与建立家庭者”。由于党员也要按分配到任何的地方去，为什么满刑的犯人——或其他任何人不可以呢？劳动改造是被认为较长期游惰更合人道的。在颁布上述法例的同时，

公安部负责人在报告中宣布：

“现在已经组成了许多劳动队，它们为国家进行水利建设，筑铁路，伐树，和建房屋等工作。所有的生产工作不但直接对国家的各种建设工程发展有利，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也是一项真正的财产来源。”

到此为止，有关利用囚犯做各种劳动的问题已是无需争辩的事了。

在欧洲的巴黎，一个由某些人物个别组成的名为“国际委员会”的组织，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一本“白皮书”，据称材料取自一九五三年之前自中国监狱释放出来或自中国大陆潜逃出来的人士。即使如此，该“白皮书”透露，在它的调查员所会见的“数百”据称曾入狱的人中，发觉只有十八宗案件的“历史”适合在“白皮书”发表。老实说，对这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该报道实在太过时，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它唯一的价值就是汇编了法律及历史的文件和官方声明。这些资料证实了监禁制度已完全与生产需要结合起来，并为实现现政权的目标而发挥了力量。

然而，一位到中国去的访客会发觉当地的监狱也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白皮书”内有图一幅，罗列了据称存在于中国国内的二百九十二个“集中营”。但大多数的位置表明它们只是临时建筑营地；其他的都在国家农场近邻。其中一个是在哈尔滨市的郊区三棵树。凑巧得很，我在三棵树附近参观了一个大型的国家试验农村。那次由于行色匆匆，更由于我看过了很多的农场，接触过很多的农民，所以忘记到工人宿舍中看看，而把全部时间用以观察那里的家禽畜养和喂猪的“技术革新”。在离开

时，我看到后边的闸门外，站着两个武装哨兵。我较后才悟起那里可能会同时雇用囚犯与普通工人一起工作。上述的那条法例使人有理由会猜度混合劳动，最少也有时用于国营农场之中——这个情况后来得到官方对我加以证实。

这里可以报道一个相当肯定的消息：中国之内已无儿童苦工存在。战前，无数儿童被卖到矿场主或工厂主手里，或被有钱人买去当奴婢，甚至被迫为娼。这种情况在法国时代的印度支那也很普遍，而现在的南越仍有发生。云南各锡矿场的矿工从前都是童奴（拙作《方生之旅》中曾有叙及）。在战前的马瑟基金（耶鲁大学）那吸引人的研究《中国的家庭与社会》一文中，奥尔加·兰报道说：“……在上海的纺织工厂中，童工的数量占了总雇员数的百分之七，但很多小型工厂……差不多完全雇用了童工。”在北京，她发现“只有很少学徒每月才有五角到一元的工资。……脚气病，坏血病及其他由于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普遍得很”，很少工人“有板床可睡……较幸运的睡在工作台之下，其上则有第二班的工人接班工作；其他则露宿街头。”在北京附近的矿场，兰小姐（象我一样）看到孩子们“几乎赤裸地从漆黑的矿井中爬出来，个个瘦得皮包骨，……平均每人要背三十五磅的重负。这些孩子们普遍年龄只有九到十岁，虽然中间也有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夹杂其中。”这就是三十年代的生活，兰小姐报道当时还有人大量买卖寡妇和穷苦人家的妻子，以及贩卖女童去当奴婢，娼妓或有钱人的妾侍。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强征做苦工；在农村，我时常看到（许多外国人也曾目睹这种情况）人们象牛一般地缚在一块，绳子就索在颈上，被那些武装警察在街上拖

行。今天，我在中国所遇到的外国人，没有一个再见到这种情况。我们还忘记了一点，就是在三十年代当国民党在江西苏区和湖北强令大移民之际，它还设立了一种“思想改造”的集中营。一九六二年华盛顿发表的官方通讯中透露，在一九四三年，美国国务院已获悉“在国民党中国，最少有九个省份有这种集中营存在”。这种集中营并非作劳改之用，而只是用作羁押之所；“酷刑殴打已是司空见惯”，据说那些幸运被释放者，“通常已是肢残心碎了”。

学习与劳动改造

中国人告诉我整个北京地区只有一个监狱——这一点旅居北京的外交官员们都确信不疑。那里还有一个流动劳动队，队员约“三百人”，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改造农村；两者均属北京公安局管辖。该农场共有犯人约二千人。一位旅居北京的外交界人士也作如是估计。不少外国人曾前往参观；大概和其他国家农场不会有很大不同吧。除主监狱外，北京内城还有一幢“拘留所”，地点就在国立图书馆附近的草岚子胡同里。在这里，有二百到四百个政治犯在正式送往法庭审讯和定罪之前，先在这里接受问话和思想改造。

若有人预先告知我今天的北京监狱，原址是旧“模范监狱”的话，我不用向导也可以走到那里去。因为我于一九三五年曾最后一次到那里探监，当时有些我认识的学生被囚禁于此狱中。该监狱建于六十年前，较当时囚禁犯人的牢狱——污秽的无窗的地牢——已是大有改进。监狱的所在地属市东郊，现在

从远处眺望外貌，似乎无多大改变：同样是灰黑色的墙壁。但外围的闸门现已洞开，沿路见不到哨兵，直到抵达内墙之下，才见到一位士兵站在岗亭里。另一个非武装军人打开铁闸，于是姚伟和我步过花园，进入正面向内墙的接待室中。副狱长王先生是个态度严肃的党员，约三十五岁，曾接受过该种职业的“特种训练”。他照例向我奉茶，并说了开场白。

该监狱有犯人“一千八百名左右”，其中百分之四十是“反革命分子”（年纪大部分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女犯人超过一百名。有六十名犯人是暂缓执行的死囚。监狱开设了三家工厂：一个林类织物厂，一个塑胶厂，以及一个机器和电器厂。我获悉监狱的日常生活如下：八小时到工厂工作，二到三小时学习和听讲，八小时睡眠，另外四到五小时则用来吃饭、运动、阅读书报、娱乐和“谈心”（思想改造）。犯人每两星期有假期一天，到时他们可以会见探监的人，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有自己的乐队、剧团，还有一个露天剧场，每星期放电影一次。男女犯人同食于几间饭堂之中，也可以参加狱中举办的游戏与运动会。

介绍完毕，我们先后到各监房与工厂中参观。整间监狱都是一层高的平房，以砖建造。监房建于一条中央甬道的两侧。我留心察看，发觉窗上的铁条已悉数拆掉，而每间狱房的门都没有关上。房子洁白，清洁，内有四到五张床，床上被褥清洁整齐。在一间监房里，一个休假的犯人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的门也是打开的。他被判入狱两年，罪名是盗用国家公款。

工厂的机器款式古老，但已比我参观过的大多数市郊公社工厂的为佳。缝纫机由妇女负责，也有一小部分女犯人与男的

在塑胶车间中工作。他们穿着监狱发给的蓝色或黑色棉布工作服，并无特别标志可以将他们与普通工人分别开来。他们很留心心地操作机器，没有对我们加以注视，只有我在各处停步向他们提问题时，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回答，他们都很有礼貌，而且并非是郁郁不欢的样子。其中有些年轻的女犯人样子很不错。我询问其中一个为什么会被送到监狱来，回答是“诈骗”。我觉得有点儿迷惑，但副狱长稍后向我解释清楚。

各工厂都由犯人充任的管理员料理，由狱方派职工监视。我看到厂中并无武装士兵。犯人们也自己办起理发店，膳堂，小卖部，花洒浴室与图书馆。在各个庭院和旷地上，我看见几个士兵，但没有人被派往瞭望塔上守卫，在围着犯人们种植蔬菜的菜园的围墙上，也同样不设守卫。

“这里毫不设防，不是很容易偷走出去吗？”我问王先生道：“是否很多人曾尝试越狱呢？”

“去年，这里发生过几宗越狱案。通常他们会由家人送回来。”

在卫生所附近有一片植有花木的庭院，庭院的角落有一座圆顶的亭子，亭子旁有六位妇女正在拿着她们的筷子一边吃饭，一边谈笑。她们不象是这一类人。

“她们是期满获释的犯人，”王解释着说：“两个在卫生院工作，一个负责洗衣部，另一个在办公室做事。”

我停下来替她们拍照，她们没有反对我这样做；有一两个还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们承认是在刑满后自愿留下工作并领取薪金的。她们在这里感到就象“在家一样”。其中一个已婚妇人，住在附近；她的丈夫在近邻的一家工厂工作。由于时间

关系，我不能继续追问她们基于何种心理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工作——这可能是个极其吸引人的内容，如果真是她们自己选择的话。

在犯人自己建造的篮球场和舞台的周围，是一排排的大字报，你可以在任何的中国工厂中看到这一些。大字报的内容包括：文章，诗歌，表扬和互相批评的作品，模范工人的名单和他们的奖状。犯人是没有薪金的，但他们每月可获得三元零用钱，工作优异的可得双倍。他们可以利用这些钱到小卖部买香烟或其他物品。厨房中正准备着午餐，有汤，菠菜和烘面包等。

回到接待室后，我提出了更多问题，获悉该处的政治犯普遍刑期很长，有些人更被判“缓期执行死刑”——这些人包括国民党的特务，间谍，从事破坏工作者或在乡村中由“人民法庭”判决的“穷凶极恶的地主恶霸”。有些人自解放后便送到这里来了，其中一些已经“觉醒”，服完经减免的刑期便被释放。在普通的犯罪案中，最常见的是盗窃国家财产变卖或为己用；其次就是盗用公款，施行欺骗的手段，伪造文件及其他通常的暴力罪行：殴打，强奸和抢劫。至于谋杀的案子则“极少”。超过一半以上的女犯人是因犯了欺骗罪名而被判入狱。她们欺骗得什么呢？我向王先生询问。金钱，衣服，食物，各类礼物等。用什么手段进行呢？

“一个冒险的女人在同一时期内假装爱上了几个男子，”他说道：“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骗取他人的金钱。到手后，她又向另一个行骗，但她却不肯和任何一个结婚。”

“听起来好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职业。卖淫是否适当的字眼呢？”

“不是，这并不是卖淫，”他坚持着说：“这只是行骗而已。其中并无“性”牵涉在内。行骗是有多种不同方法的。这些女人聪明得很哩。由于重犯多次，她们才被送到监狱里。”

我希望能够与其中一个骗子单独会晤，进一步追查究竟。王先生说这样做会使她们感到难堪，再者当时已到午睡时间了（这倒是真的），因此在这里我不能特别加插数笔去描述她们，只能指出她们的刑罚较轻，从一年到三年不等。当王先生问我有无兴趣向其他犯人提问时，我选择一个缓期执行死刑的政治犯。

他是个山东人，个子高大，体型粗犷，是个严肃的中年汉子。我问他做过什么事以致被判死刑。他说他从前是济南的国民党警察，领导一个反共小组，逮捕过很多嫌疑是共产党的人。王促他赶快坦白，他低着头说他本人曾杀过四位革命人士，其中一个孕妇。他的罪名远较他人严重，因为解放后他没有自首认罪，而其他犯人得到坦白、悔过和要求受处分的机会。不但如此，他还往北方潜逃，来到北京，并在北京一间纺织厂谋取了一份工作，装成是个普通的工人。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他被另一个山东人认出庐山面目，于是揭穿他的身份，并将他逮捕。他觉得受到公平的待遇吗？

“根据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是死有余辜的，”他说道：“我应该立即被判死刑，但是反而却可以继续生存。我还受到教育，现在已能开机器，做些有用的工作了。我竭尽所能改造自己，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他表现得非常后悔，强烈的内心激动，充分在脸上显现出来。

在该犯人与他的非武装看守离开后，王说他是个好工人。

他已入狱两年了；他的刑期可能会改为终身监禁。

监狱管理的理论认为，一切犯人行事的起点应该是真心实意的忏悔，承认所犯的罪行，并且乐意接受刑罚。在这一点未做到之前，他们要受较严格的看管。第二步就是“诚心诚意”去改造。上述各点受到法律上充分的支持。有部分犯人“真正不知道也不明白革命的一切，或者是政府正在为人民做些什么。”监狱当局就替他们组织旅行，带他们参观公社、工厂和学校，让他们看看国家所做的好事，藉以唤醒他们的“羞耻心”。文盲的则教以阅读和书写，而每个人都要上政治课。这种教育和灌输政治知识的工作，多由“先进的”犯人负责，他们往往被分派到新犯人和落后分子之中。真正“改造过”的犯人接受特别优待；他们的政治工作做得越好，他们获释的机会就越大。由于在犯人圈中组织起干部，秩序和纪律的学习便容易维持了。政治犯也和其他犯人一样，干同样的事，但要接受更多更广泛的思想改造课程，在监房里由已改造的政治犯领导。

那些拒绝“承认本身错误的根源”的犯人为数极少；假若这些无声抗议者工作表现良好，而且又不是政治犯，刑期满后也一样可以获得释放，然而他们失去了减刑的机会。狱中的处罚包括有超时工作和取消休息日等，但王强调说，永远也不会施行暴力处分，而单独监禁“从未有超过一周者”。我很熟悉一些曾受过思想改造的中国人的证供，而且也曾与几位受过这种改造的美国人谈过话。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想法吧。

一位美国精神病专家，R·J·利夫顿，曾经对“洗脑”作过一系列的研究，试图找出它在病理与心理后果两方面的西方科学性解释。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在利夫顿医生所检验的二十五

人中，他出奇地发现即使仍然对共产党最敌对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在某些方面他们本身都自该次经验中得到教益。利夫顿医生发觉中国的思想改造技巧没有受弗洛伊德、艾德勒和巴甫洛夫的影响，而似乎是主要依赖深种于中国人心理中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恐惧的犯罪联想而已。

大概没有任何美国人较哈丽雅特·米尔斯更有资格证明思想改造的过程了，因为她曾受过四年的刑罚。她出生于中国一个长老会教团之家，并在那里度过一生最初的二十五年。回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学成后重到中国，一九五一年被逮捕并被控以间谍之罪。一九六二年当我在纽约与她会晤时，她在康奈尔大学教中文。

在《大西洋月刊》出版的一本专题报道《红色中国》中，米尔斯小姐以权威的姿态描述改造的过程：“共产党知道只有在说服人民相信了他们的地位是正义的时候，他们才会发挥其才能与创造力，会由于信服，并非被迫而充分合作。”施于体肤的暴力不能达到真正的改造和思想的诚恳转变，这两者都是最基本的目标。“在严重的犯罪案中，思想改造与处分则一并施行，但最主要的目标还是通过批评以资改过。……（原文加重语势）

“他们决心否定一条由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定下的，一向成为中国人思想基础的教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改造与学习改造相辅而行，但参加劳动的权利要在某种程度的学习改造完成后才可给予。”

在她的文章里，米尔斯小姐追寻出集体学习技巧方面的“两条主要的经验”。第一条源于共产党人的二十年游击战经验，当时新兵要学会“熟练武器，服从命令，共同生活和保护人民”，

肯定要使“每个人不但要懂得怎样做 并且知道为什么。”每个小组(六到十个人)反复研究所有的问题，直到人人弄通为止。同样的方法又用来向农民耐心地解释土地改革与社会改革的运动和未来的利益。“这样，他们说服农民与他们合作，抗击日本与国民党，”而后果是“士气高涨”。

办法之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体学习中，先组织起党的核心，这是各处的共产党人都奉行的方法。“这两个传统方法——中国式说服法与共产党的信条——联合起来”，就孕育了“在中国无处不见的思想改造的结构”。

所有的学习小组都向党汇报，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参加。学习组内并没有静默的“自由”。随声附和是不算数的；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应不断运用新理论与本身知识。批评是主要的武器。拒绝批评或缺乏诚意者要面对组内成员的斗争——而开除学习组则是最严重的处分。

自我批评较他人的批评更为重要。而公开的自我批评，即承认本身的一切怀疑，动摇，弱点，坏习惯和反社会倾向等，是自我批评中最有效的形式。

“小组学习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这是一种感情发泄吧。”最难改造的要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共产党对待这群重要人物的政策“始终是要达到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此一目标。共产党人通过时而攻击，时而批评，以及团结等方法，迂回地稳定地朝此目标前进——与此同时还将新一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得又红又专”。

“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唤起民族自尊心，唤起中国人对中国新的信心和成就，产生爱国主义的自豪。同样一个中国，一九

四八年那一年由于通货膨胀，资金外流，以致经济破坏不堪，政府颓废无能，管理无方，贪污腐败，只晓得依赖美国的援助；电单车也不能生产，更遑论汽车了。但是，现在她竟然……能够在朝鲜打得联合国要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世界上空中四强，能生产货车，喷气式飞机，甚至建成了原子反应堆，对中国人来说，这岂不是万分令人激动的现象吗？这种自豪而产生了非常有效与发自内心的礼法，包括以诚待人，谦虚有礼，公民责任感等为旧中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风格。

被人质询究竟一个错误的主意是否有存在于新中国的价值，已足以使被问者感到内疚。千千万万的人曾质问自己：“我有什么权利反对那些作出这么大贡献的人呢？”一九五一年的春天，一位英语系的教授——回忆着中国过去的四分五裂和饱受外侮的情景——对我解释说：“现在，我们可以再次为自己能够生为中国人而骄傲了！”

米尔斯小姐主要写一般的“学习”，即思想改造的情况——而不是写狱中的改造。无论在什么地方展开，“学习”的原则是不变的，但在监狱中则广泛存在着暴力与屈辱的“威胁”，另外还有“新生”的渴望。在与我交谈时，米尔斯小姐进一步解释了监狱改造——“集体监禁”——与一般的社会组织所进行的小组思想改造法的区别。“集体监禁”并不是完全摆脱暴力的。诸如武装守卫，手镣，“单独监禁”，长时间站立而不准移动等“暴力”，“偶然”也会施用，但精神上的处分才是最基本的手段。据米尔斯小姐指出，食物从不会断绝供应或作为一种武器，而体罚也并非最后的方法。但是，上述手段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使

犯人对自己自私行为的控罪迅速反应，而两种办法的结合使他得知唯一补救的办法是：思想上真正的脱胎换骨与坦白暴露过去的错误。若人们能真正面对本身的所作所为这个真实，那末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犯罪的意识。米尔斯小姐发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事实：“即使从未向暴力低过头的意志力坚强的人，也会进行慢慢的，逐步的，最后并且是戏剧化的和完全使人信服的改变。”

在如此严重情况下而被拘留的男女犯人，仍然可以“想出一条路来”，最后会被指派往参加劳动改造——逐渐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视为“最好的一回事”。然后，他们努力竞争，使被认为是比其他人“更进步”。最后，他们获得给予工作的权利而不需被看守，如到堤坝或桥梁上劳动，或做些“对人民有用的工作”以补前过；他们会将此事看成是一种奖励，一种“自由”，而不是一种惩罚（以上是米尔斯小姐的客观意见）。

有关少年罪犯的问题

我花了整个下午参观“儿童学习——劳动学校”，那里有一百八十五个年龄介乎十到十五岁的儿童，在接受较温和的思想改造方法。北京还有另一所改造学校，教育着约数百名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罪犯，但我没有到该处参观。“儿童学习——劳动学校”颇有值得报道之处。它那宽广的校舍坐落于冬宫附近的优雅住宅区内。校内并无守卫，只有一个年迈的看更人，也没有预防逃跑的特别措施。“通常如有出走的都会自动回来，”王校长对我说。她是个身裁纤细的妇人，穿着白色的衬衣和黑

色短裙，她把黑色的短发髻曲在耳后。与她的体型相反，她对工作的精力与热忱，使我想起小学时代那位充满精力的校长。

“我校的教育方法，”王校长说：“是按照毛泽东主席为所有小学教师定下的原则实行的。我们一定要象父母一样爱护学生，将感情与严格的规则相辅施行，象成年人般尊重他们，将每个人都看成是独立的一分子，以及向他们谆谆教诲，灌输为人民服务和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引起儿童犯罪的原因，差不多都应由父母亲负责。我校的教师认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最肮脏的工作如洗地板和厕所等，我们都要参加。学校里的一切工作，都由学生与教师并肩齐干。”

王校长认为一切的罪恶都是“旧社会”失败的反映，也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据她说，在该校的小犯人中，百分之四十来自劳动人民的家庭；百分之二十是孤儿，或来自破裂了的家庭，或是与年纪太老而不能工作和看管他们的老人同居者；百分之二十五是干部的孩子；另外百分之十五来自“前资本家或警察”的家庭。我对这四分之一来自干部家庭的孩子表示颇有兴趣。在一个人口多达七百万的城市里，四十六的数目并不算多，但在该校的相对百分比是相当高的了。干部们本身不也是应作为行动的模范吗？

“虽然他们为社会主义工作，但可能仍然不是好双亲，”她说道。“请记着他们也是来自旧社会，在家庭生活方面可能还有不当之处。当父母亲太忙而难以抽空料理孩子们，或当父母们疏忽爱护子女时，往往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孩子们会变得任性胡为，染上坏习惯，喜欢撩事斗非，并且会因为要引人注目而

做坏事。他们可能会开始说谎，偷窃而掉进麻烦的漩涡里。”

该校的学生有些是惯窃犯，有些则多次摧毁公物，或行骗，或在学校捣乱，拒绝学习或工作，更有几个是因和祖父母发生剧烈的争执，而被要求送到这学校来。

“这里的儿童大多数是聪颖而不是愚蠢的。”王校长谈及他们的“不寻常的傲性”和“自负”，并谈到当肯定他们的成绩并给予责任时，他们是怎样迅速反响的。有一回，一个“坏”孩子拒绝参加学习和工作几近两个月。“我只有耐性上一堂课，”他这样说：“之后我便想打人了。”一天，他偷偷地将老师的腿缚在桌子上，当老师站起来时便摔在地板上。该男童以为这次将难逃一打了，但老师却将全班学生解散，单独留下他谈心。老师心里想，这孩子能在自己毫不觉察之下玩弄诡计，足可见他的聪明。他认为这孩子有能力做好，于是便向他循循善诱。这孩子因为曾被父亲打骂，所以心里暗地恨他，但该老师逐渐赢得他的信任。一年后，同一个男孩子在路上拾到一个金表（该校的孩子每月有两天可以自由回家或探亲）。当时他很想拿去卖掉或偷偷地藏起来。他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但是结果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手表拿回学校交给老师。当失主领回手表后，亲自到学校找这个少年表示感谢，后来成了好朋友。三年后，当他毕业之时，他已是该班的班主任了。

王校长还讲了几个类似的事例以证明他们的成功，其主要因素看来是两种基层控制的策略。学校设立了一个学生会负责很多管理工作。其中包括负责帮助“新同学”学习正确的行为。“新生”要接受“旧生”两个月的教助。如果到时被通过加入学生会，他们便可获得一枚会员章。若他们的行为不及格，便要接

受另外两个月的试验。能被收录为“正式学生”是“光荣的时刻”，王校长说。学生中最优秀的分子都属于少年先锋队队员——在一百五十名男孩子和三十五名女孩子中，有三十二人已加入少先队，参加少先队的资格是“五好”学生或在学习、体育、劳动、课外娱乐和卫生清洁、及社会主义学习和社会主义觉悟各方面都获得优良成绩者。这些少先队员在学生中的地位，就象干部在成年人中的地位一样。

学生们每天下午要劳动两小时：男孩子学习木工，女孩子则干缝纫和刺绣的工作。余下的时间则按普通小学的课程加以分配：早上七时三十分到十二时，正式上课；下午则有两小时上体育课与文娱课。我参观了木工工场，孩子们在那里制造大小不同，用以盛载商业订单的箱子，由一位男教师负责监督工作。他们的产品售出后，赚到的钱一半拨作福利和文娱基金，另一半则作为工薪与奖金分配。他们还利用福利基金替学校乐队购置乐器，当时乐队还操练给我们看，使我隐约觉得有强烈的军事气氛。

该校也安排学生到工厂、农场和博物馆参观，并放映电影及邀请先进的人物到校演讲。王校长指出孩子们最爱听战斗英雄的讲话。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大部分男孩子对航空特别有兴趣。他们当然较普通儿童接受较多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政治课。流氓主义吗？噢，新进来的同学时常有这样的倾向。学校当局依靠学生会的月会和少先队的领导来粉碎它。当肇事者受到集体批评，并被组织要求他们自己解释原因时，他们就开始看出“会员资格”和服从规则的好处。在这样的集会中，老师帮助与支持学生领导的方法是具有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使

学生们自己抓起领导权。

学童们自该校的高小毕业后，可以投考其他中学或到工厂里当半工读的学徒。他们能不受歧视地进入常规学校吗？王校长充满信心地微笑着说：“我们的学生——那些具有必要资格的——是特别受欢迎的。在北京各校的五好学生中，我校被列为十名之内。我校有一件事更闻名全市：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运动中，我们用了三天两夜建成了四个高炉，熔钢二千九百六十二斤（一吨半）——这是所有小学中的纪录。”她挺直了五呎高的身躯，自豪地总结说：“较这件事更光荣和更出名的是：儿童学习——劳动学校连续两年夺得北京西区小学清洁工作红旗奖哩！”

一个陌生人要想查问这些孩子们有关过去的错误，而不会使他们感到难堪是不容易办到的。况且责任也非全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看起来也很欢乐，很健康。“神经错乱的孩子”和“不受感化的少年”呢？王校长说并没有特别的方法处理他们，只不过给予他们大量的“爱护”和与他们“真诚相处”罢了。他们对奖励制度也和其他人有着共同的反应。学校的教师（三男四女）都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到该校工作前曾在党校接受特别训练，但是他们没有应用任何外国的或苏联的儿童心理教学法。最严重的警告就是开除出学生会——这也表示丧失“会员资格”，开除出校及个人耻辱等。王校长说，三年来她从未有必要开除学生出校。她接着说，那是幸运的。因为学生一旦被开除，就要重返法庭，而她本人也不知道后果怎样。

经过更进一步回忆后，校长说学校有一个特别难教导的学

生——一个“神经有问题”的女孩子。当时她已十七岁，是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她的学习不及格，因此往往要留级再读。事实上她并非资质愚钝，而是怕羞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少与人交谈。她之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害怕重返“外边的世界”。她度过一个完全没有爱的童年时代，常受毒打和辱骂，年纪很小便被坏人强奸了，在到学校之前，简直就不知道有“家”这回事，所以形成她不敢面对世界。在一张缝纫桌的旁边，王校长指出这位女同学给我看。她的头垂得很低，我默默地看着她刺绣了一会儿；她的手工极为精致，比其他同学熟练得多。

“你们打算将她怎么办呢？”向前走时，我这样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正在要决定。”王校长显然对这个孩子极怀同情。我很想了解她本人的童年生活怎样，但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若她能放开一点心怀，”她继续说：“我们可能在学校为她找一份类似助手之类的工作，但这只是假定而已。不过，我们一定会找出解决的办法来。”

思想改造并不就是局限于改造思想那么简单哩。

“百花齐放”的前奏

到一九六〇年，关于中国独有的“百花齐放”时期的外国评论已堆积如小山了。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极力发动人民利用必要的工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有了这次言论放宽，那些欲知红色中国的究竟或欲穷其领导上的理论，技巧，心理与哲学的，最低限度也要知道这次大胆恳请群众批评的运动的主要事实，动机和目的。

大胆到何种程度呢？事实证明类似的事在任何专政之下发生，尚属首次；但是，在发表公众意见的必需工具还掌握于个人，而不是掌握在政府手上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也是罕见之至。倘使美国规模最大，畅销全国的报刊的主事人能将发表言论的工具，完全用来发表非有产者——如工人、和平人士、社会主义者、学生、学者、知识分子、专业工人、农场工人、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观点与要求，或用以发表全民（除真正的共产党人之外）的意见与不满的话，类似中国一九五七年的“整顿”事件也会发生。但若成事实，广告户势必全部退出，跟着财政必然崩溃，而政治反应也必定是非常有趣者矣。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刊物绝对没有脱离自我批评。政治上的错误，某些干部的愚昧无能，不忠诚坦白，以及一些干部迫害人民的例子常在报章上揭露出来，但是这种材料的公开印行，却成了外国攻击这个政权的基础。自一九四二年起，党定期进行的“整风运动”，时常透露了很多内部紧张与不同的意见。在整党期间，党没有企图遮掩一些党员最坏的行为，但在外国人的眼中看来，它们对中国的声誉比个别的难民故事更具破坏性。举例来说，在一九五三年的整风运动中，某些农村干部所作的坏事，就大量刊登于公开的政府报刊上。但象一九五七年那样大规模的全民性批评运动，是领导上从来也未曾发动过的。原因何在呢？

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是充满混乱和广泛危机的两年。赫鲁晓夫当时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了一篇演说辞，攻击斯大林是刽子手，并推翻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因而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结构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当赫鲁

晓夫在莫斯科刚巩固了他本身的地位时，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却松弛下来，于是在“修正主义”敌人高叫找寻“到达共产主义的其他道路”的攻击之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物”也就相继下台。然而，苏联共产党本身却未准备取消斯大林主义化，而北京更没有这个念头。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的讲话全文在中国没有出版（在苏联也无公开发售）。首先见诸中国的消息是《真理报》一篇指责“个人崇拜”的文章，当时重印于三月份的官方报刊上。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已经完成了整顿工作。当时一连串的文章“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虽然如此，毛泽东的“主要领导”地位却没有被否定。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已走在赫鲁晓夫的前头，吸收了斯大林后期的一些教训。一九五六年一月，毛已经宣布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党准备广邀批评与公开辩论——这个诺言是在一千八百名人大代表，党代表，和党外人士代表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的。在祝贺国家的团结和迅速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之后，他出乎意料地讨论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之前的一个月。

接着，党内与党外人士都有参加的互相批评会议陆续展开。早在一九五六年初期，一个反对过度的官僚主义的运动已然开始。所以当时的运动便稍为扩大，包括了对新中国采取过度的模仿主义的批评在内。

团结——批评——团结

一九五六年间，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国家间发生了不团结的

现象，震动了整个共产党世界，……赫鲁晓夫经常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却不能够为他的困难提出任何充分的，有系统而确切的理论说明。

当时，中国为这个纷乱的局势提出了解答，那就是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下半部和较长的一部分。就这样，按照毛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发表的《矛盾论》一文的精神（该文分析了当年中国内互相作战的各阶级的力量），提出了一条国际性的定律。一九五六年的文章指出：矛盾不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和在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还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内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人民之间，甚至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兄弟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若容许这些矛盾发展到对抗性或暴力的阶段，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当然是由于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教唆所致。

在赫鲁晓夫透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隔膜情况以后，毛泽东下令对所有干部及他们对群众的“作风”进行彻底的调查。若情势与布达佩斯相似的话，同样的反革命事件也会发生于中国吗？人民，知识分子，学生——以及一些负责干部，有几分可以信任呢？这一切除了保证不满者“言者无罪”而引导他们发言之后又怎能知道？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举行的，有党员及党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实行他在一年前的讲话时，他采取了一个新而且较聪明的方法。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于一九五七年六月正式公布，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题》，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上的重要文件。

在探讨毛的讲话之前，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其一，这篇讲话是政府改革或整风运动的动员令。整风运动的真正目标有三：评定结果，肯定成绩，揭露和改正错误。但它们主要还是搞整党运动。

一位党的历史家曾这样评述过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斯时起，这已成为一种不断循环的运动）：

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党党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分析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党的领导，特别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运动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意之二：毛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试图在匈牙利事件中找出教训与为这次事件提供理论解释的共产党领导人。结果，他一方面在此事件中引出了应变之策，使党能保持全国性的团结，另一方面则避免犯上引起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巨大错误。

毛再一次断言“矛盾”或利益方面的斗争不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之间，也存在于“人民”之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这些真理后来却被赫鲁晓夫所拒绝，他一口咬定它们只是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是不适宜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

若那些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不认为这些言论是胡言乱语的话，在这里简短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传统的中国思想的关系是颇为有用的。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辩证法——马克思从德国的黑格尔学派中吸取了——与中国古代“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二二一年）前后流行的哲学思想颇有相似的地方。这种辩证法相传是由以弗所城（小亚细亚一古城）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所传下的思想（例如：“百物皆不断移动”；“神乃日与夜，冬与夏，战争与和平，饱足与饥荒”；“和睦出于敌对双方的紧张与争斗”；以及“始与末总成圆形”，等等），它和中国道家圣人的思想非常相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语实出自“战国”时期一位思想家的术语之中。当然，这句话并非按字面直解作某“百种”事物，而是通指思想的“自由斗争”。

“对立统一”的思想在阐述道家的书籍中特别解释得明白，诸如《易经》，《庄子》及其他作品中皆有详述，在符号上则有“八卦”等，更常闻的则是“阴阳”。

所谓“道”者，是指包含了整个生命力（“太极”）的要素。太极上的圆圈，一边呈黑色，一边呈白色，象征大自然同一性内的各对立力量不停地循环周行，贯串不断之势：如阴阳，虚实，男女，生死——皆表示分裂中的统一，并且是完整的辩证上的象征。道家的象征渗透在中国的文艺与科学各方面。毛泽东曾常常注意引用中国民间故事上有关辩证方面的例子，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以下是《矛盾论》一文中的一段：

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

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任何的历史情况——即提出有关各种矛盾的斗争的论断以及一种反证，从而显现出其同一性及延续性——很快便会为中国人所接纳，而哲学的观念当更强于神的概念。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的现阶段（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产生的阶级对抗性的阶段）只能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解决了一切矛盾后才能终结。在这个理想社会之内，历史再也不是成败起伏的无目标循环——如（英国历史学家）托因比所幻想的“挑战与应战”的社会那样，而是一系列按照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出的根本法则而变化的现象而已。

一九五七年，毛总结说国家与前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或者是“人民内部的”。虽然如此，“对抗性的”（不能妥协的）斗争依然存在。但在中国，那些属“对抗性”的人，总的来说都是被蒙蔽的爱国人民，他们现在都支持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与共产党的目标已连成一气，并且已超越了他们的反共情绪。然而，让矛盾长此存在而不想解决是危险的。若不暴露这种矛盾，不在讨论中加以克服，它们就会转化成主要的“对抗性”矛盾，并产生匈牙利事件这样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

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继续指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人民中的各种矛盾力量正是推动社会向前的力量。”

但是：

“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现在，是把这个方法向全民推展的时候了。“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为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

专政怎样才可以表现出民主呢？毛的解释是：民主表示“人民自由”，它也表示“对人民的敌人专政”。毛接着指出：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人们可以随便指斥这些说话只不过是鼓动性的言论，但却不容易认识到这些论断还暗中吻合了“分清是非”的道德观念，因而使党的领导与传统上中国人期望统治者能“大公无私”的观点达成一致，也就是代表了“对立统一”的规律。

我们还要提醒自己注意一点，即中国从前甚至未有过十九世纪俄国那样软弱但却重要的民主传统，这种传统或多或少影

响过列宁(但斯大林却没有)。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有足够的民主让敌对派合法地存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后期也曾经尝试)前两个世纪不断冲击着欧洲的民主热潮——自笛卡儿起,经穆勒、休谟、卢梭、蒲鲁东以迄孔德等人止——对中国影响甚少。但中国也有人道主义的传统,梦寐以求自然的和谐,包括权力在内。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产生了最强烈的争取个人和民族平等的愿望(反对帝国主义);牺牲个人自由而换取平等的社会统一完全符合中国的哲学传统的逻辑。

据高尔吉亚说,当苏格拉底与希腊三位最聪明的人辩论而取得上风时,他最后那段话的寓意是:“演讲与一切活动一定要为正义而用”。苏格拉底进一步说:“当一个人犯了任何错误时,他一定要被处罚,而他想改正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处罚而后改正。”在“什么是正义”这方面而言,毛与苏格拉底的意见可能永不会相同,但“正义的知识”对毛来说也是负有人人“改正”错误,不许坏人有自由的责任。

毛的观点是既适合党内人士也适合党外人士的。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出版时,他提出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明确的标准。这些标准清楚地表明了“非对抗性”的批评一定不能“暗中打击和恶意中伤”,而一定要“帮助巩固民主集中制的各方面”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毛也承认党曾经犯过了一些错误。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曾出现有“太过份”的现象。他命令对所有刑罚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重新进行理智的调查,并要求“将错误纠正过来”。他承认计划上的错误造成了供与求之间的“不平衡”,并保证国家的农

业税将稳定地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不变。他警告党员们要“不尚空谈”，对人民不要妄自尊大。他注意到当时发生的一些“乱子”（如农民与干部之间发生的冲突与打斗），并且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其中“十分坏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出现了“不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只顾个人地位和得失”。他接着提出警告：“这批人中很多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

毛的讲话当然就是要发动群众对那些犯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官员和党员展开批评。他的谈话发表后的两个月内，人们召开了无数的会议讨论他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总结了“矛盾”的理论，各级机关将讲话的内容传达到群众中去。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道命令，正式授权展开“整风运动”。

香花和毒草

在北京及其他地区，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解冻”期间出版的带有批评性的文章，也曾与参加过“不满意”集会的中国人谈了话。大部分的抗议是指向共产党的干部、机关和带有官僚作风的领导——抗议他们的骄傲自大，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并抗议他们身为领导而滥用权力。这些抗议形形色色，既有“建设性”的评论，也有捣乱分子声嘶力竭的反对；既有虚报严重的不公正事件与办事无能的例子，也有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叫嚣。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袖要求除了可以在垂死的资产阶级之中(他们肯定是附属于这个阶级的),还可以在学生、农民、工人及其他组织中发展新党员的权利。有一部分还提议建立两院制的国会,结束“民主集中制”。

所有这些攻击都刊登于政府的报纸和定期刊物上,或在电台广播出来。运动开始后六个星期内,政府并没有企图作出反应或加以镇压。党确实想知道这“百分之十”对她有何印象,这种诚意确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反革命分子”要求权力及表示要用武力推翻现政府的恐吓之辞,也出现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注意:“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是错误的。”很明显,任何反对目前社会制度的人就是跟随着一条危险的路线。但很多人似乎听不到或看不见毛的谈话似的。然而,党仍然没有进行反击。书信与文章依然如潮水般涌往报社。

话又说来,虽然很多批评者当时犯了真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按毛的原文被称为反革命路线,很少人反对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些投诉个人困难、粮食不足、或工作时间过长的人,比较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许多人要求审讯一部分党员,认为他们在对反革命嫌疑犯的判罚上犯了错误(毛本人也曾命令进行“复查”)。控诉警方残酷、腐败、贪污及无道的信件则绝无仅有。一些工会会员指斥党施行“命令主义”(指未经讨论及说服而强迫执行)及要求过时工作而不补薪。

在学校、农场和工厂前面的布告板上贴了无数的大字报,

当然只有一小部分刊登在报纸上。党在六月初掌握的资料，已足够在未来的许多个月中自组织内外展开整顿工作。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开始反攻了。“正确的批评”仍然受欢迎，但六月十七日毛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六条忠于国家的“标准”的发表，明显地表示了很多人已违反了那些规定。

党扭转了整个局势。会议继续召开，但目的是揭发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百花齐放”的尾声

“百花齐放”时期中一件颇为出奇的事，就是这个由党发动人民对她本身展开批评的运动的广泛性。另一件令人颇感迷惑的是即使新的批评已在六月中结束，政府的报刊与电台仍然继续报道攻击她自己的文章。在几个月内，右派分子的讲话和文章也照常印刷和派发，而它们的作者则被带往讨论会中亮相。当时的分别是：他们受到党的支持者猛烈的反击。我曾询问一位官员为何要报道那些反党文章，他回答说：“假使我们不将右派分子的谣言公诸群众，人民又怎能觉醒和行动起来呢？”

在党的有力人物主持下，各地召开了很多反击会议，数以千计的超越了“以团结为目标”的人，都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很多被证实曾“极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在本单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大会中，被群众以“不信任投票”的形式撤去其担任的职务。他们往往被停职，或者要干些较低级的工作，同时要出席每周举行的学习会，努力将功赎罪。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公

布的法律中，一段条文明确规定那些被本单位驱逐的人可以被判往参加“劳动改造”。该项法律指出这种处分也可以加在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许多右派分子身上。当时的右派分子的完整统计并没有公开发表。一九五九年十月，政府宣布有二万六千人已摘下这个“称号”——据非正式消息透露，这个数目占了那些人的“绝大多数”。

为探索事情的真相，我曾在北京市内与一群相识多年的学生与教授共进了一次晚餐；他们多已四十开外甚至五十多岁了。我向他们复查了一份党内外知识界的名单。其中一个现在当上副市长；一个是副部长；一个出国当大使；一个成了出版界负责人，另一个则是编辑；还有些在各地当上工程师、医生等，有几个仍在教学，另外几位教授已退休，一些在战争中牺牲，也有死于自然者，内中有四五个人到了香港，还有不少的当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非常坦白的对我说，只有从事反革命“暴力行为”者才会被逮捕，而仅表示不满的人，个人主义者及批评党的过失的人，是没有受到处分的（那可能决定于究竟人们是否把公开的抨击看成是处分吧）。据该高级官员表示：“言者无罪”的诺言已充分执行了。英国作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他所著的《百花》(The Hundred Flowers)一书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判处死刑的例证，除了指出在该期间曾在武汉附近处决了三名带头搞反革命叛乱的学生之外。这三名学生被控带头殴打官员及警察，企图在农村搞“武装暴动”，后来当着一万群众面前执行死刑。

改造右派分子的主要方法是思想改造，在外国则称为“洗

脑”，过程并非在集中营里执行，而是由犯者的同伴负责；对顽固的“反动分子”来说，则要在被排除出社会或忍受公开认错痛苦之间作出抉择；在本单位的介绍下，可被送往农场参加一段时期的劳动；另外还有各种在过去会被叫做“丢脸”的方法；这都是改造的主要手段。

一位十年前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学者这样对我说：“过了几年的时间，我才习惯在别人面前作自我批评，但现在我认识到它对我是有益的。我很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武器——多么需要它！我现在较前谦虚多了。我对人民群众的看法提高了。现在我还可以帮助落后的人呢。”

第五篇 西北：新中国的摇篮

人 口 问 题

在进行探索人民公社的问题之前，我们有需要研究一下中国实行大规模集体化这个困难的逻辑——有关她那存在着的重重困难的人口问题。人口过度稠密并非是共产党人的创造，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相反，由于大量地增加了群众的雇用率，采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粮食配给制度，共产党目前已成功地防止了由于广泛灾荒而引起的传统性的人口毁灭。矛盾的症结在于：人口与粮食供应的不平衡，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是有增无已，几乎与防止疾病方法的成功，生命的延长，以及为使性活动合法化而作出种种改善的成功成比例。至于人们究竟将这种情况看成是悲剧性还是认为有趣呢？则要决定于情形是永久性还是暂时性

的。中国共产党人——大概对世界其他地区算是幸运吧——相信这种情况是可以挽救的，最低限度在中国可以做得到。

人口过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若中国的人口密度达到英国、比利时、荷兰与日本那般稠密，中国的现有人口便将有三十到四十亿人，也就是说较目前的世界人口还要多。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人口研究，一三六八——一九五三》一书（作者何炳棣，颇堪一读）生动地指出，若中国人一早将“新世界”占作殖民地，或者他们能逃避过一切天灾人祸的话，同样的事情恐怕已发生了。在《中国的历史》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提供了明、清两朝的人口统计数字如下：一六六一年，一亿零四百七十万人；一七六六年，一亿八千二百零七万六千人；一八七二年，三亿二千九百万人。

很多杞人忧天的马尔萨斯主义的信徒，在我回美国后向我询问：“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做过节育的工作呢？”我的回答是：有，但无疑是不够的。然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已较美国政府多得多。

中国的面积稍大于美国。一八七〇年，美国的人口是三千八百万人。到一九六〇年，该数字增加了五倍左右，而中国的人口只是增加了一倍。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若；在欧洲的白蚁开始向外作大规模移民时（当时欧洲人口少于五千万），中国约有二亿人口。从那个时间开始，欧洲人已填满了三个“新”大陆（以及第四个的一部分），总人口达四亿二千万。若将该数字与一九六〇年的欧洲人口加起来（包括苏联在内），总数便超过了十亿人，由此可以看出危机四伏的西方，一向也有参与繁殖人口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看来，欧洲人恐惧“黄祸”的泛滥未免有点那个了。中国人用了五千年才确定了今天的疆界，而欧洲人却掌握并占了世界的大部分。在一九六〇年，中国人的繁殖率与美国约略相等，但由于中国的“基础”这般雄厚，所以按最保守的估计，到一九八〇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十亿。然而，若人口的繁殖按目前的速率继续下去，到时白蚁的总数便会多达二十五亿人。

托马斯·马尔萨斯坚说各种人种的增殖，不可避免地“快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加”。若他的理论正确，数目众多而又不得外流的人民——如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便肯定要受灾荒之苦或推行扩张性的侵略战争。但这些灾害却并不单是东方才有发生。在革命前，采用现代避孕药的中国人只占人口极小的一部分，但“土办法”却屡有施行。堕胎虽属非法，然而却常见得很；谋杀婴儿是贫苦人家广泛采用的“最有保证的方法”。在中国，贫苦家庭的子女较“小康之家”为少，这点与西方的常例相反。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抨击过马尔萨斯，苏联共产党也曾对他加以嘲弄。在取得权力以前，基于服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快于人口繁殖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也拒绝执行节制生育的措施。为了使生产率倍于人口增殖率，共产党在六年内不断努力，但成效却不很稳定，所以他们结果采取了一个更现实的政策。一九五六年，北京“为了减少非生产者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消耗”，认为有实际必要节制生育。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将现代“计划生育”的知识，传播到每个农村和城市中去。生动的标语，图书，电影和示范性的讲课，将这些方法深入介绍到农民家里。在一段试验期后，

由于与公社发展计划起了冲突，这些努力在一个期间暂时减弱了。

从与妇女联合会负责人的会谈中，我得出以下结论：该项运动初期遇到广泛的反对是由于下列原因：农民以及带有农民观点的工人“并未作好思想准备”；他们仍然将后裔与养老的问题并列（法律上，孩子们必须负责父母的生活）。很多人认为性与生育问题是私人的事，不愿意由国家管制。具有说服力的指导人员尚未能大规模培养出来。虽然婴儿死亡率已大大降低，但是由于过去的婴儿死亡率确实太高，以致在农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他们需要较多孩子作为保险。有些农民询问若不利用他们生殖子女的权利，生活在一个福利国家中对他们有何利益。再者，潜伏在人们意识中的孝道思想及多世纪来的男权思想，尚不可能在短短十年内完全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观念所遮盖。

在中国，避孕药是不论男女都可购用的。在各个医院或卫生所里，我发觉标准的“设备”只需等于二角到三角美元的价钱便可供应。据说必要时还可免费供应。在遥远的内陆省份四川省的一所较为简陋的卫生院内，我看到很多图表，示范器具及各种琳琅满目的供应品，但据悉要求指导的人还很少。在那里，一个子宫套只需三角。当然，若大量的人民一旦实行节育时，现存的供应品肯定是不够的，但对目前参加“计划”的人来说，便不觉得有缺乏之感了。

在一九五六年，当中国展开“计划生育运动”时，人工流产与绝育手术就象教授避孕法一样容易获得。但在一九六〇年，当避孕教育仍然通过电台讲座及文章推广时，绝育手术只有经

过医生指示才可以进行，人工流产也不再受到鼓励，虽然在同样情况下仍然可以施行（按〔一九七〇年〕：在一九六四年，作者获知只有在孕妇本身要求下，才可以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现在有一种广泛采用的机器能以真空吸出法来中止妊娠，这是一种迅速、安全和比较没有痛苦的人工流产手术）。人们甘受绝育手术的程度可以印度的经验为例，那里，不但手术免费，而且还附赠一笔数目颇为可观的奖金。到一九六〇年，印度全国接受绝育手术的只有二万二千人，即全人口的二万分之一。

马德拉斯市人口研究学院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人口学家，S·钱德拉塞卡尔于一九五九年到中国访问。象其他访客一般，“一切事物的清洁与干净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对中国粮食经济的结果特别留意。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大西洋月刊上，钱德拉塞卡尔先生指出：（中国）一九五九年的生殖率达到千分之四十，而死亡率则减至“千分之十二，在亚洲国家来说，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婴儿死亡率——一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和整个教育环境的水平最敏感的指数——每年都是出生率的千分之五十左右。”钱德拉塞卡尔先生在另外的文章还说，与革命前的估计比较，这些数字事实上表示死亡率已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钱德拉塞卡尔先生的数字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如上所述，设若一九五三年的统计无误，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周恩来在一九六〇年也对我说，该比率是一个“平均数”。即使中国的增长率低至如日本一样（百分之一一点零一——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展望》杂志；美国的增殖率较日本高百分之四十），每年也多了六百万到七百万中国人。

文章与电台广播继续宣传节育的技术，定期刊物促请年轻人展开计划生育，采用避孕药。很多接受我询问的工人、农民，以及我在上文提及过的女大学生，都说他们“计划”只生育两个到三个孩子。有些党员告诉我说，在党内，“无纪律”的生育是不受欢迎的。大多数职位高的党员只有小家庭，虽然我起码认识一位在一九六〇年还为他的第七个孩子——儿子——的出生而庆祝（他本人后来也颇觉尴尬）！两个儿女的家庭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党员再多生孩子便不能领取额外津贴了。

一种在其他社会难以奏效，但在中国却颇见效果的“计划”就是官方支持、社会赞成的晚婚法。在西方来说，早婚对具有野心的学生可能是一种障碍，而现在人人都象成了有野心的大学生似的。由于党与报刊支持男子到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女子在二十三至二十七岁才是理想的结婚年龄，所以在接近党领导的青年中，这成了一种新风气。他们的榜样最后终会使“较外围”的农民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农民们也不想被人认为落后或“思想陈旧”。党并没有如海外谣传那样“挑选新郎和新娘”，但青年人在结婚之前，通常也征求组织领导与父母的意见。

综观上文所述，这里既无“颠倒”政策，也没有所谓增加生育的运动出现。真正发生的是中国人认识到急需于短期内解决失业、生产不足、改善人力分配等问题，这些并非生育计划所能提供的。中国目前的数亿人口是一个现实政治中的事实，并非能够由毛泽东的一个命令便可转变。还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区，抱怨人民、说他们不应生存于世等，绝对不是聪明的政策。毛及其他领导人曾反复宣称中国众多的人口是她

“最大的资本”，这和太依赖生育节制产生了矛盾，所以又鼓励人民找寻其他解决办法。（按〔一九七〇年〕：到如今，节育指导的宣传中心已在每个城市的街道组织及农村人民公社中设立，同时周恩来总理曾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将人口增长率降至每年百分之一。）

没有任何长远的改变计划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中国广大的领土有百分之六十处于六千六百英尺以上的高度，而且还有百分之三十五因气候与地形关系，证实是不能耕作的。在先进的工业化使耕作能更广泛，更密集进行之前，最迫切的难题还是中国可耕地的人口过度稠密这种情况。在华北平原，平均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一千人。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与长江三角洲一带，平均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三千人。目前，每个中国人平均所拥有的可耕地实不足零点三九英亩（假设一九六二年的人口为七亿）。

但中国的农业学家当然不会认为前途是毫无希望的。日本的成功就是一个例证。日本全国的谷物耕地面积只有八百万英亩左右（或平均每个耕农约有半英亩多一点），它目前每年能出产约二千万吨的基本口粮，其中大部分是米。若中国的耕作方法能比得上日本，她的总年产（将她较高百分比的双造田计算在内）将是目前的四倍。再者，若中国的耕地面积最后能达到目前耕地的两倍——如她的领导人现在所说——她将不但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更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

英国与西德平均每个居民的耕地面积只有中国人的一半；丹麦、荷兰、日本和比利时等甚至更少。然而，中国人的平均

收入只有那些国家人民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种差异当然是由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贸易发展的程度不同而致。中国的农民并非能力有所不及，而中国人民的能力也不低于其他人民；从历史的观点上看，它的社会所表现的效能较大多数的国家为佳。据现在所知，中国的天然资源并不逊于上述诸国，且远较日本为丰富，而后者有效率地组织人们的劳动力，为现代的财富打下了基础。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谷物产量，主要依靠大规模的科学耕作，包括在每亩田地里较中国利用多十倍以上的化学肥料，更加上广泛地采用电力、机械、作物保护和政府对谷物控制等措施（如中国一般，日本的农民需要按定额向国家缴粮）。到一九五八年，中国的工业尚未能为该时期的农业出产足够的现代化农业必需品。这一年，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展开了。原因之一是希望人民公社最起码能为党暂时解决这个不但困扰着中国，也使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太多的人住在一个不能出产足够的粮食以养活他们的土地上。

访黄冈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轰动世界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到十一月，拥有百分之九十九农民人口的全国七十四万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已合并成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前乡政府及党委会联合组成了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国家权力的机构”。公社直接管

理贸易与商业、小型工业、来往账目、银行业务、市场与供应、教育、公共食堂、住屋、医疗设备、民兵的训练与命令和其他公共事业等。

在所有这些公社的背后，有着很多踏踏实实工作的人物和无数的重要的小开端。

黄冈公社的社长严伟全(译音)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开端崛起的人物。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到黄冈公社访问了严伟全及公社的农民，这个公社位于北京城墙以东约二十五英里，公社共有九千三百英亩农田、菜地及畜牧场。严只到过北京一次。

他身穿旧斜纹布农民装，蓝色衬衣和布鞋，但他戴着一个奖章，一只廉价手表——常常是奖给模范工人的奖品。在他那所以砖砌地板，茅草盖顶以及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摆设着几件挺不错的中国家什，墙上还挂着一个壁钟。他看来不象三十六岁，而且甚至比年纪少于他两年和当他助手的妻子更年轻。他的双手结满厚茧，顶上头发差点儿剃个精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有在谈及他的工作时，态度才显得轻松些。

在我听他说完一般性的报告之后——如数字、日期，对毛泽东的感激，有关“总路线”的问题，农业“八字宪法”，对公社的赞美等——他勉强地回答一些有关他个人历史的问题：

“我的父母从前是黄冈的贫苦佃农。我还能记起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捱饿。若有水灾或饥荒发生，我们便要以借债为生。母亲在日本人侵略时因贫病交迫，加上吃不饱、穿不暖，便一病去世了。父亲今天还活着，现在仍然是公社的劳动力。七岁时，我便开始干农活。到十四岁为止，我都是蜷缩在父亲的棉衣下睡觉。在那个年纪，我到本地的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要

签合同的劳工)。我们属于十分之六全无土地的佃农，或出卖劳力的工人的家庭。

“教育吗？我曾胡乱认过两年字，但解放时已忘得干干净净了。至于写字则连‘月’和‘日’也写不出。但自那时起，通过参加业余学习，我已学会读和写了。在这十年内，我们已扫除了六百个公社家庭中的五千五百个成年文盲。

“你问我是否当过兵吗？没有。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我没有参加革命；当时我对它可说是一无所知。

“解放后，我们村的地主逃跑了。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了好转。党的干部叫我与三户贫农联合组成互助组。由于我首次当上自己土地的主人，我心里充满感激，而且很希望协助党的工作。况且我自己的农具甚少，也需要别人帮助呢。他们选举我当互助组的组长。

“新的乡委会发给我们一些种子。我也分得一辆胶轮木头车，于是我负起运输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再没有其他机器了。在一九五一年，即成立互助组的第一年，我家除了粮食以外，还分得了一百六十元——这样多的钱咱们从前见也没见过。我们买了一些用具和更好的种子。我们多招了四户人家，组成了一个合作社。我再次被选为社长。

“合作社的第一年非常艰苦。水灾摧毁了我们的春耕和夏种，只有一个农场得以幸免——到八月，我们已无食粮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兄弟也会争执起来。但是由于当年各地的情况都是这样恶劣，政府只能给予我们很少的帮助。有些人甚至想离开这里到城市中去。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并且成功地说服了一户尚有余粮的农民，将种子和食物借给合作社而不求高

价出售。但我们的粮食仍然只够吃一个月。在接近季末时，我们八户人家老老少少，一齐动手在地上种菜作最后一试。有些人嘲笑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收成。凭着密集耕耘法和一些令人吃惊的方法，我们及时夺取了很好的收成。那一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一半多。不但可以购置更多用具，又买了八匹布，足够八家人做衣服过冬，每人都做了新鞋和新衣；此外，清偿了一切债务，还有一些盈余。我们八家人中，有七家从来也未曾穿过新衣服哩。

“在我们成功之后，附近的农民认识到合作农业的优越性。超过五十户人家要求参加合作社。我们吸收了二十五户，并协助其他也分别组织起来。到一九五四年，我们将整个村一百零六户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的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在整个地区当时还有十个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我们与另一个村合并，于是共有二百九十六户人家。我们组成了一个高级社，我仍然当选社长。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的资金增加了一倍。

“从那时候起——对了，我们的高级社加入了人民公社，一切结果你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取得过去梦中也想不到的进步——单就一九五九年，我们的收入便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去年这里还闹水荒呢。”

“一切结果”包括黄冈第一生产队的总部，一间长形、清洁的砖建平房，这是一个可作会议厅，可作剧场的建筑，坐落在一个树影婆娑，鲜花吐艳的庭院之中。在建筑物的一隅，我访问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出身农民家庭，是中学毕业生，现负责管理大队广播站。此外还有三个大队设有广播站，向全公社五十六个村广播，每个村则装有接收系统和扩音器，广播音乐、

新闻、各种课程、当日各条战线上的命令，以及地区领导的指示和通告等。这里还有一个女孩子操纵电话总机；目前，各乡都有电话联接起来。

“——还有五千三百公尺的高伏和低伏电线，三百七十座电动水泵，十一部拖拉机，四辆货车，五百辆胶轮运输车，一千五百头马和骡，”严讲得很快，使我赶不及记下来。

“这一切都是合作社和公社对我们的贡献。现在队队有卫生所，共有五个医生，四十四个医护助手和护士，九十六间公共食堂，我们的工厂自己动手制农具、肥料和建筑材料等。在过去的年代里，有谁会提起机械和电泵呢？贫苦农民们哪里听过定时开饭，新衣裳，银行存款，学校和人人都享有的医疗补助呢？即使在好时年里，我们也一样要挨饥抵饿，衣不蔽体；在恶劣的年代，我们的人民不是死于饥饿，就是要卖儿卖女，甚至更悲惨——”

“你们的孩子现在怎样呢？参加工作还是上学去？”

“他们当然进学校，他们当然也要参加工作。现在每个人都到学校里学习，每个人都工作。我的大儿子在念初中二年级，他希望能当个工程师。我的两个女儿也念小学了。他们课余也干农务——就象有时来帮我们的北京市的学生一样。我的孩子早已比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你问学校吗？我们有二十三所小学，共有学生八千人；三所中学，一千八百名学生；一百二十个幼儿园和托儿所，有多少孩子已记不起来了——但我们的孩子现在统统都进学校了。我们也有四间为成人而设的业余工艺学校。”

“而你是整个组织举派出的领导了——最高级的，是吗？在

美国，人们会说你是白手起家的成功。”

严满面疑窦地望着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地方党委书记沈耀(译音)。然后两人都出奇地望着我。

“你是开玩笑吧，”严最后说。“我不知道资本主义之下的情况是怎么样，但这里没有人是‘白手起家’的。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为社会主义而尽力工作。如果没有党，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我这样一个无知识的贫农又怎样替自己‘白手起家’呢？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所给予的。”

现在让我顺带一提沈耀吧：他已四十多岁了，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深古铜色的脸上有着象征饱历风霜的皱纹；他穿着农民服装，体格壮硬得象条牛，性格明朗，爽快，态度严肃而自信，神情欢愉，他显然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老党员。他敏锐、仔细地看着我，并向一旁记录我所提的问题的那位女秘书指点。我对沈说，我猜他是个老八路军战士。

“对，”他说道：“我曾在五台山地区打过仗。”

午餐的菜式有本地出产的蔬菜，新鲜的沙拉和鸡。吃饭时，我追忆起聂荣臻将军等五台山的战时领袖——我多年前已认识了他们。沈耀也越谈越起劲了。我获悉他是个小学毕业生，除了军事训练以外，他也曾到党的机关里工作。他本人是山西省一个富农的儿子，后来加入红军，二十年来，一直担任着组织农民的工作。他是本地区仅存的八位革命者之一，后来他加入严及其他大队的负责人的队伍中去。在他身旁，严就象个孩子一般。沈耀实际上是整个公社的最高负责人和领导。

成功的公社

党的负责人和由党推荐、由乡直接选举的本地农民的自然领袖之间的微妙而又重要的关系，存在于中国全部的二万四千个公社。（乡、大队和公社委员会的主席通常而不一定是党员；习惯上，他不是地方党的领导。）这种关系的亲密和相互信任的程度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或失败。当地方党的领导是“外地人”时，他的工作便会困难得多。他既要懂得农民心理，也要精通农务，能使群众理解及接受党的指示，组织起足够的支持力量以防止前地主和一些能干但却反党的一小撮分子占了控制权，并要给予大部分人对公社的所有权和积极管理一种自豪的感觉。

认为二万四千个公社负责人员和七十五万名乡大队级人员，有着同样的才干、经验、智力和必要的柔韧性来执行党的命令，只是空虚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超过八百万名农民出身的党员中，很多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党已深入地渗透进整个农民阶级中去，但农民还远未能达到思想一致。然而，若以为没有党员高高坐在农民头上，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在很多地区，党委书记也同时是被选举出来的公社社长。若这样一个社长是本地的农民，而他在实际农务、政治知识和能力方面能迅速提高，成功的机会便可以大大增加——这是我在几个例子中观察所知道的。

在黄冈，百分之二的成年社员——共约五百名男社员和一百名女社员——是党员。这里，党委书记和公社社长（后者也

是党员)显然合作得很和谐;他们已并肩工作了多年,书记已成为了当地社会的一分子。按我推想,大概这种关系在各大队和生产队里也同样满意地存在,而且是造成这个公社兴旺的重要因素。

据沈耀说,黄冈公社的党员百分之八十都是本地人,并且十人中有七个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也是公社行政委员会属下各部门和支部的工作人员,此类部门包括有:农业、工业、畜牧、公共卫生与清洁、文教与福利、会计部、计划部、公安与民兵部、司法、储蓄和银行业务、机械管理、商业和供销等等。

据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从前都是全无土地的贫农;余下的是中农或富农,此二者在分配土地时得以保留其财产。在清朝时,此地大部分属皇家狩猎园;其中有一半的土地是低洼多沙的沼泽区。在分配土地时,很多佃农只分得最劣的土地;这个地区经常患水灾,需要大规模的灌溉工作。当高级农业合作社组成之时,很多富裕农民由于发觉自己只是一小撮,于是都大量参与公共投资以恢复较贫瘠的土地。

“以前我们在灌溉方面的投资太少了”,沈耀解释着说:“虽然我们已尽力去做,但我们的堤坝怎样也不能挡住一九五九年的水灾——这是整个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一次。五分之四的土地被水淹没了。但当年的水灾却不只一次。我们的早造收成很好,但秋播却遭到严重的摧毁。我们的种子曾先后四次被洪水冲去!在过去,这表示贫农们又要遭受极大的苦难。分散独立的家庭决不可能与这样的水灾作战。而不受水灾影响的人,也不会让人们把他们的土地挖成渠道和运河,以拯救贫苦的人家。

“现在，事情完全不同了。我们公社各大队的领导集中起来，制定了一个紧急措施以救全乡。我们选择了全部土地的一半，当然是那些较易灌溉的，并动员人民单在这片土地上工作——收获属于全社。播种的季节已过去了，但凭着集中全部机械，农具与人力，及用最充足的肥田料，我们及时完成五千英亩土地的播种。从那时开始，气候也转好了。经过艰苦的劳动之后，我们取得了大丰收——比一九五八年更好。即使富裕农民也较前有了更好的收成。收割后，我们又集中力量对付那些被洪水淹过的土地。再一次动员所有的资源，我们最后又成功地完成了一套新的堤防，水坝和灌溉渠道的系统。接着，我们又利用联合基金重建各村。我们极大地改良了土地的结构。从前一度是黄冈较贫穷的那一半土地，现在已和较富饶的那一半差不多了。”

黄冈公社收入的分配表明了一个很高的利润增长率，非常迅猛地增加的基本投资和资金的增长率，这些都是在管理得宜的集体农庄中十分典型的。在减掉应缴税款、物资、生产品跌价、应付债款、一切的生产和供销费用后——除了工资之外——黄冈公社一九五九年的实际收入为八百一十八万元人民币(三百三十五万美元)，即每人得三百一十四元或每户得一千三百六十二元(五百五十九美元)。但每个劳动力实际上收不到这个数目。在整个集体的利润中，公社将百分之四十五投资在新建筑和设备中去，这包括六部新拖拉机，五十辆车子，六十匹马和七部电动机床。所有这些都属公用品；每个大队，每个村庄都可以随便利用，并分享各项企业的利润。百分之十八预算用来作借贷基金，娱乐设备，保健设备，养老金和储备金

等。薪金总额约达百分之三十七或三百零二万六千元。他们的粮食储备，除去饲料不计，占全社产量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以上各类款项以及各人的工资，都是由生产队负责分发，因生产队是“最基层的单位”。

该年度的工薪中，有百分之十是付与外来的“季工”和“散工”（多以粮食计算）。照这样计算起来，每家约可得四百五十四元。据严伟全社长指出，一些有四个成年劳动力的家庭，每年都很轻易便有一千块钱的收入。只有一个劳动力的家庭，每年可得二百五十元左右。各人的薪金（与其他地区一样）都是按出工率分计算。在黄冈公社这样的混合农业经济中，薪金率的差别很大，“工分”是按照各劳动者一致同意的标准而定的。

农民们收到的现金又有多少呢？生产队将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一折算成口粮分给各队员。这主要是谷物。在黄冈公社，由于蔬菜的产量非常丰富，所以社员所吃的蔬菜一律是免费的。农民们也有面积小于五分之一英亩的自留地。我看到的一些，都种上玉蜀黍来喂养自家的鸡群或一两头猪，养大后留为自用或售给公社。

托儿所、幼儿园的费用及其他各类支出减掉后，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便减少了一成到两成。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超过一半的工薪是按月发出的，其余的拨在各人的储蓄户口中，到年尾便可以提取。沈承认人人都参加储蓄存款，退款也偶尔会发生，但都是和队的领导讨论后才退款的。

在整个国家中，我看到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起码具备以下各种家庭设备，而且超过一件以上：壁钟，收音机，暖水壶，各种家什，电灯，充足的被褥，多余的衣服，甚至书籍和图书

等——据各家庭的主人说，他们是用储蓄买回来的。没有这些新“奢侈品”的家庭，可以说少之又少了。虽然如此，储蓄款项显然是资金积聚和基建投资的方法之一。

即使每月的现金收入只有十到二十元左右，黄冈地区的生活已在平均的生活水平之上。现金，加上他们的粮食，免费住屋（大多数如是），各种福利，等等，他们的标准已很接近城市工人的生活。在这里，新婚的年轻人可以建筑自己的新居，大多数是小型的两三间房间的砖屋，建筑费用只需四百元左右，他们以自己的积蓄和从福利基金中贷款建造。在这里，就象其他公社一样，还有一些新建的一层到两层，有一到三间房间的平房，供多户人家居住。据悉大部分的家庭仍然居住于旧式的农舍中，而且很多人喜欢这种住屋。

“我们的总计划，”当我们行经田野和村落的时候，领导人对我解释说：“是将整个公社组织在四个现代社区中心的周围。每个中心将有行政办公室，学校，医院，戏院，运动场，公园，工厂区，修理商店，招待所，俱乐部，大量的树木，等等——类似现代化城市的核心建筑。至于值得改善的旧村庄和房子，我们仍然保留，但最差的房子则在新房子建成之后便被拆下。当块状耕作转为大规模农庄以及机械化增加时，我们便需要较少的村落。我们的农庄经济正在转变为工厂——农庄经济。黄冈公社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庄，而是一个工厂化的农庄了。”

黄冈公社的领导人带我参观了其中一个社区中心。不久后，我在上海之南又参观了一个公社，在那里，类似的社区已是十分先进并且很成功，但黄冈地区的社区中心还只是在建筑阶段。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之中，部分地区已建筑了新的办公室，商店

和住宅，以一间新型的建筑物为中心，里面的大礼堂可坐八百人，既可用作饭堂，又可作剧场之用。建筑上所用的砖，窗，以及一些家具是本地所制。建筑物内最终会建起抽水马桶，这是农村生活中很显著的改善。但是，即使抽水马桶这种设备现在更易获得，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农村广泛采用还是太浪费，人粪仍然需要用来作肥料。虽然如此，有盖的便桶已广泛地强迫使用；卫生队则按上文所述的方法收集粪便。我看到这类便桶在这里及其他农村都有应用，黄冈公社卫生所的一位医生对我说，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他所在的大队的四千人中，只发现过三宗痢疾。

在市中心附近，我察看了几间新砖房。大多数的居民都已落田工作，但在一个有两个小房的屋子之前，我遇到一位六十五岁高龄的老妇在她那栽满向日葵和卷心菜的园子里忙碌着。她邀请我到屋子里喝茶歇脚，于是我坐在一张古老的中国式台子旁边，那里还有几张椅子和一个麻栗木制的衣柜。在那张巨大的、砖砌的炕上，摺叠着清洁的、色彩鲜艳的被褥。老太太是个寡妇，她已去世的丈夫是个贫农。整套家具都是土地改革时分得的——是地主的家什。

在狭窄的饭厅里，那个新砌的砖炉上，锅里的水在嘶嘶作响，看样子饭也快要烧好了；食水就在附近的一眼新井中打来。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与媳妇共同生活，他们两人都上工去了。王老太太满怀感激，衷心赞美“新生活使人人都得到好处”。举例而言，她与她的丈夫都是文盲；但看看她的孙子吧，两个都快念完小学了。更有甚者，她的儿子与媳妇都能进夜校里读书识字。在过去，谁可以有多余的钱积蓄起来呢？现在她的儿子不

但能替孩子们买新衣，甚至有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即使她本人也有两套外衣，几件背心和几条裤子。在从前那些日子里，谁能养活一个没有劳动力的人呢？可现在她，一个年老的妇人，是由生产队负责她的生活费。

“你负责在家煮饭的吧？”

“呃，只是煮一点儿早饭。孩子们在工作的地方吃午饭。至于晚饭嘛，我们到生产队的食堂里吃的。那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也能到外面去吃饭了。”

“怎样算是幸福呢？”

“哎呀！多着哩。不用打柴，不用准备食物，碗啦，碟啦，锅啦，也不用自己洗，也不怕烟把屋子都熏黑了！当然啦，煮饭的手艺并不常常都是最好的。当我们吃厌了，我们就回家自己动手去煮。”

“这里是否曾经尝试过要你的儿子和媳妇分开居住，在隔离的大房子里——也就是说把男女分开的情况呢？”

我这个问题要由翻译员复述多次，并且要加以解释。老太太满面惊异的瞪着我。当然没有啦。那可能符合“人道”吗？她反过来很想知道我的国家是否实行这个制度哩。

我们再到村中较古旧的地方瞧瞧，但见新的砖房已零星零星地建筑起来，最后到达一座托婴所和幼儿园，那里共有七十二个孩子。该幼儿园和普通的乡村幼儿园一样，坐落于一间地主的屋子里，装饰很简单，有一些粗制的童装椅、矮凳、桌子和板凳。那些小公民们穿着棉布游戏装，脚上踏着小小的布鞋；只有几个是“鼻涕虫”，没有一个显出是营养不良的样子。

他们象平常欢迎客人一样站起来，以娇嫩的声音参差不齐

地叫道“外国叔叔，欢迎您！”然后集体唱了一段“社会主义好”，然后拍着手，跟着欢呼起来。一个满面含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小女孩，向我献了一束采自校园里的黄菊，之后便攀在我的手上。在我访问过的幼儿园里，这种欢迎仪式——除了这束鲜花之外——是少不了的。通常我也能带给他们日常生活中意料不到的娱乐，就是把我那小型的瑞士制上链音乐箱播放给他们听，甚至把它放在那些敢于聆听的孩子耳边，听得他们眉飞色舞。

这所幼儿园较一般乡村的好，但它的环境仍旧比不上办理得宜的城市幼儿园的标准，后者是农村中人亟望达到的。每个孩子都有通常的装备：他们有衣架挂起已洗的衣服和外衣，有地方放置牙刷和梳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筷，在饭台旁和早睡、午睡的炕上，都编有固定的位置。午饭有粥和各类蔬菜，孩子们都配给有大豆油。卫生设备包括有日本式的厕所，还有一个盥洗室，里面有一股清水流进一个石脸盆内作洗脸之用。在阳光普照的庭院里，有很多自制的秋千，滑梯和摇摇马等玩具。

每个孩子的托管费和午膳费每月只需三元——可以从工分扣除，而不需现金支付。这里并不象一些托儿所那样可容孩子们留宿；住在附近的母亲们每天放工后便接他们回去。四位职员都是本地妇女（一个还是缠足的老妇），他们自己都已当过母亲了，并且也曾接受过一些有关护理婴儿的基本训练。她们的领导曾念过小学，为人爽朗明快，精力充沛。至于她的工作效能，我只知道两点：第一，据环境看来，她把孩子们弄得很清洁；第二，据称大多数的孩子在三岁便已学会自己洗澡，四

岁的已全部懂得了。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每星期到此巡视一次，当时刚好应邀而至。孩子们都种好了痘苗，本年度的健康纪录表指出只发生过几宗小疾病，主要是着凉而已。

在这里，我本来可以很快乐，很有收获地度过一整天，但我刚好在北京的一个托儿所里访问了一天的时间。此外，由于我曾要求参观大队的卫生院，一个新的学校和一两个商店，所以我被催促匆匆离去。我们驾车驶过了菜地，又经过了连绵数亩种植着剑兰、菊花和牡丹的花圃（黄冈种植鲜花交售附近的北京市场），然后来到另一个大村子——近渭县的外围。

“邓家大队共有十四个生产队——在全公社的二万六千人口占了四千人。”说话的是大队的副队长和党支部书记张顺海（译音）。我们下了车，慢步行过一块大菜地。

“你说我们的收入较一般社队好，是吗？对的，比较好一点。我们有着城市帮助的便利，而且比较机械化，有电泵，有拖拉机，我们还有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我们每年有三造收成：春天有蔬菜，夏天有蔬菜和小麦，冬天有蔬菜和玉蜀黍。整个公社的产品平均有三分之二是蔬菜，三分之一是谷物。我们在培育树苗和栽种鲜花两方面也进行得很好；在冬季，玻璃屋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但我们的收入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七月份的农作物收成，今年看来又是丰收在望哩。”

在种植着番茄、胡椒、肥大的椰菜和韭菜的田地里，一群头上扎着布巾的女青年和年纪较大的妇女正在除草，也有些用雾状喷射器施肥；当我转过身来，接触到她们凝视着我这个陌生人的目光时，她们不好意思地把满是笑容、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藏到蔬菜中去。我停下步伐准备向一些女园丁提几个问

题，但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骤雨所中断。我们跑到田中央唯一的一间小农舍中避雨。屋内，一位年轻的女农民和她十多岁的弟弟向我们表示欢迎。炕上，一个婴儿瞪着大眼睛，好奇地凝视着这些突然光临的客人。这位妇女说，那间屋子就是她出生的一间；她很喜欢这座农舍，目前还没有意思搬到公共住宅区去。她的丈夫在附近一个工厂当工人。她的弟弟（我们进来时还捧着一本教科书在学习）说他刚好念完了高级小学。目前，有多少农村的儿童能进入中学读书呢？一半左右。他准备学习当那一类的人呢？

“为社会主义的需要服务。”

“这个我知道，但我问你——如果可以由你自己选择的话，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喜欢当一个医生，”他的脸上刹那间露出了热切的希望，并且不好意思地露出牙齿，笑了。

“为什么呢？”

“我希望成为祖国一员穿着白色制服的战士，”他这样回答说。

雨停了。我们步行到镇上，进入了大队的卫生院，这是一间旧屋翻新的建筑物，四面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庭院，骤雨后显得湿漉漉似的。一位三十刚出头的医生值班，另外一位护士负责药房里的工作。设备显得较为简陋，但砖砌的地板和刷上白灰的墙壁保持得很清洁。

吴翥英是一个短期（三年期）的医学毕业生——实际上他只是个医生助手，跟随镇里一个正式医生实习。他表示希望以后能继续完成他的学习。吴医生负责全大队的各村工作，现在村

村都已有公共卫生队，并已和卫生院有电话联系。大的疾病已在控制之下；没有霍乱、天花及其他流行病已经几年了；接受种痘的人达百分之一百；自一九五二年来，肠胃病降低了百分之八十。现在最常见的病只是伤风和支气管炎。要动手术的病症则送到县医院里，或直接送往北京。

“你们接受过很多人请求指导节育吗？”

“只要有人要求，我们便提供协助。”

“你们有鼓励这样做吗？”

吴医生迟疑了一会，说：“我们并不反对。但当女方身体会受生育影响或她已有足够的孩子时——如三个或四个，我们便会劝导她实行。”

“未结婚的男女可以买到避孕药吗？”

这个问题产生了一阵满带疑惑性的沉默。沈耀书记这时再一次到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正是他。

“我们的人民在婚后才会有性关系。”

“人人如此吗？你们从来未有过婚前性关系的例子吗？”

这类谈话（象在其他几个场合一样）产生了一种即使不是痛苦，也是极其不舒畅的场面。

“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这里可以说是完全两样。”

“资本主义吗？我在苏联住过了几年。那里的婚前性行为就象任何的工业社会一样普遍。我知道过去在中国的农村妇女中，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婚姻在她们年纪很小时便订下了。现在，妇女们已有自抉的权力与自由，有性的平等——情况难道毫无变化吗？”

“变化是有的，不过是越趋于好的一方而已。在封建的时代里，年轻的女性时常会被地主强奸或诱奸；有时地主还会强占她们的‘初夜权’。这个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结婚，合法的年龄，男性是二十岁，女性是十八岁；在此之前，性行为实属不必要。但我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发生过。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整个公社多年来只发生过两到三宗。社会意见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有施行某种处罚吗？”

“尚未有专为此而设的法律条文哩。我们通常劝导人民适当时便结婚。”

“若他们不想结婚，那又怎么办？”

沈耀严肃望了望其他人，他们似乎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

“通常，他们是会接受教育的——这是他们的责任。我可以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情况。但后来问题总算得到解决，该事件的男青年到城里的一个工厂工作，后来女方也搬到城里居住。”

“若事情牵涉到一个孩子的诞生，那又怎么办？”

“该男子要负起合法父亲的全部责任，这是当然的。他们一定要结合。”

“若他们不足法定年龄呢？”

“法庭将会下达特别的准许令。”

“通奸的问题又如何？那是犯法的吗？”

“除非受害的丈夫或妻子要闹上法庭，那仍然不能构成罪名。在婚姻法初推行时，这里曾有几宗这类的案子，但近年已没有了。现在确实是罕见得很呢。”

在我离开前，沈耀叫我提意见和提些建议。“如果我能在这一

里生活和工作一年，”我这样说：“我可能会提出有价值的评论。一个访客怎能了解你们的内部紧张和管理上的问题哩？举例来说：农民们对他们的自留地感到满意吗？他们喜欢多些吗？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对盈余额的分配觉得怎样？”

“我们从来也没有收回人民的私家地——我知道有些公社曾经这样做，但这里没有，”沈耀回答说。“情况是处处不同的。对那些有兴趣自己再搞耕作的人，我们有些边际土地供给他们。然而，他们可以在公有土地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况且，那也是他们的首要责任。有关管理的问题吗？权力在生产队手中。公社行政与大队和生产队商定计划，因为后二者最了解他们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倾听群众的声音。”

“是谁实际上拥有土地权呢？公社还是生产队？”

“我们这里的所有权分为三级。生产队拥有土地，工具，住宅地区，一些小学和幼儿园，他们负责管理这一切。但各大队也有集体所有权。他们要督促计划和管理的实行，并给予充分的合作。此外，各大队集体拥有一切机械，马群，牛群，蓄水池，电泵，大队中心区，以及普通中学，这一切的投资都是队队皆有的。公社则管有大的水塘，电力厂，电话，大的工厂，新的技术学校，并将拥有一所目前正在兴建的农业大学。基本的所有权在于大队级，基本的管理也如是。”

“这在一九五八年有了很大的差别，不是吗？”

他微笑了。“在我们能跳之前，我们一定要学会步行。所有的生产资料最终都会由公社所拥有。但那还是一段很遥远的道路。我们还要等待。贫困的地区一定要赶上较富裕地区的水平。我们需要更多的机械化，我们的政治水平一定要提高，人

人都要了解政策。首先，我们要从经验中学会很多东西。我们会犯错误，但这样却学会了我们原来所不懂的。”

洋洋数千言！然而，这只是我在参观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笔记和回忆浓缩出来的一部分！我一共参观了十一个公社。黄冈较一般的公社都要进步，并因接近北京而大受其惠，但是，它还未及我在长江流域所参观的一个公社那样繁荣兴旺，也未及在四川参观的公社那样进步。在撇开这个题目之前——这个问题仍然是共产中国未来之钥——我在这里还不厌其烦地多报道一个公社的详情——这个公社远离繁荣的地方，坐落于陕北极度贫瘠的地区之中。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天时间。

西 安

我亟欲重访陕西省的原因有几个。

一九六〇年九月中旬，美国报刊便开始印刊来自香港的有关中国该季度闹饥荒的报道。本人于上文已描述了一个严重旱区的情况——那就是包头。另一个地区据(香港消息)说是陕西，据报道那里的人民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以维持生命(见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华尔街日报》)。其次，虽然东北的工业化使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如上文所提那样，我认为要更好地判断新政权的能力，最好还是到从前甚少与现代化生活接触的地区去观察。地处内陆的陕西和黄河中游可以说是中国最落后之地区。战时，我曾经凭着一双腿，走过该省很多地方，吃尽苦头；然而，那些可怕的黄土山丘仍然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最后一点，自延安成为毛泽东的游击队的山区基地和首

都之后，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中，曾到过延安的外国人还没有一个人曾经重临该地（按：路易·艾黎曾返过该处，但艾黎是长居于中国的人而非访客了）。

由于刚好写完了一本书，路易·艾黎得以自由地伴我同游，他对这部分地区有着深厚的认识和满怀自豪的感觉，因他个人曾为此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自北京乘坐一部DC—3型机起飞，中途曾于山西的太原降落，然后再到陕西的省会西安；在这里再转乘一部中国制的较小型飞机前往延安地区。从西安回北京时，我们预计坐火车，在新建的黄河下游的调节水坝“三门峡”流连参观；在洛阳准备参观一间拖拉机厂；并打算在郑州游逛——是一次历时两周的旅程。

天气晴朗、干燥，使人觉得精神爽快，是飞行的好日子，但却不是秋耕的好天气。在到西安的整个旅途中，我们沿途不绝地看到蓝光闪闪的水塘和四面环山的盆地。大多数的盆地都处于很低的地区，而引水灌溉这些地区的渠道远未能满足那些干涸的谷物，农民们盼望着雨在最后一分钟来临，但尚未见踪影。至于过去在这个时候便泛滥成灾的黄河，从高空往下望也成了一条纤瘦的带子，水位比正常低了二十英尺。

飞机上，无独有偶地有两位服装整齐鲜明的军官，各带着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都用柔软的棉被包裹着，各吸着一个橡皮奶嘴，这种景象，过去休想在公众场所见得到。不久，其中一个婴孩由于掉了含在口中的奶嘴，所以便张大了嘴巴，声嘶力竭地表示对此情况不满。为了助这位军官一臂之力，我将那个小型的瑞士音乐箱放到他的孩子耳边去；这玩意使孩子停止了叫喊，直到空中小姐（在机尾仓检查完货物之后）到来为他

作彻底的“修理”。

“你的妻子到哪里去了？”

他解释说，他被调往新岗位工作。妻子已带了另两个孩子乘火车先他而去，在该地参加工作，并已开始上班。他到达时，她将安排好孩子的托管了。后来，在中国南方，我再次在飞机和火车上碰见几位带着婴儿的军官。这些以“住家男人”式出现的战士，与西方所描述的“象疯狗一般，酷爱战争的中国人”是多么强烈的不同啊！

当我等进入陕西省境之后，大地的模样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在渭水流域一带，谷物一片青葱嫩绿，眼看又是丰收在望。这里的经济已不再是纯农业经济了。在我的记忆中，河的沿岸只是一些散散落落的小镇和乡村，现在却已是工厂烟囱林立、铁路支线四通八达的工业城镇了。

“渭水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重工业基地，”路易说道。“新的铁矿已进行开采，煤田更触目皆是。从这里也可看到甘肃和以西地区的发展情况。石油吗？多着哩；中国有很多油田，足够她的需要。要将原油从地下抽出来，把它运出西北还需要时间。基础太薄弱了；要建筑很多铁路和公路哩。人力和时间都很需要，但他们进展得很快。”

中国地理上的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一部分——面积大于印度，从前人口却少于印度的十分之一，但新政权已优先发展这个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期间所开始的大型企业，有三分之二集中于这片广大的地区之内，数以百万计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移居到这里来进行建设。就西安一市而言（当我于一九三九年最后一

次到此访问时，此地是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市镇)，面积已较前扩大了七倍以上，远远超越了它的古旧城墙以外。同时，它已有铁路经兰州与新疆的乌鲁木齐连接起来；并经兰州、包头和乌兰巴托与西伯利亚联接；此外，又经成都、重庆与长江上游流域连接起来了。一条三线行车的公路已迅速地自西安向西一直铺往兰州。

“啊，到了！”当我们慢慢下降的时候，路易叫起来。绵长而笔直的柏油路上隐约见到小如蚂蚁般的货车在爬行，这些公路直往西伸展，消失于地平线之外。

我们刚飞过的地区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圣地；渭水和洛水的流域：中国文明的摇篮。三千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多 次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地点就在那弯弯的河曲以西，敌对的军队持着铜制的矛和盾，跨着两轮的铜战车。在“战国”时代之后，秦始皇帝(公元前二五九——二一〇年)获得胜利，并在西安附近兴建他那近乎神奇的宫殿(阿房宫)。当他广大的国土毁于他的儿子手中之后，后继者就在今天西安市的地面创建显赫的汉朝(公元前二〇二年——公元二二〇年)，当时西安被称为长安。汉朝统治中国的时间等于整个罗马帝国时期。由于这四个世纪的业迹在人民心中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所以自此以后，他们仍然乐于称自己为汉人。

在汉代，天文学和医药有了显著的进步；茶叶的耕作，酒的酿制也于此时开始；其他发明包括有汉代的罗盘、水钟、造纸、搪瓷和上釉，以及简单的独轮手推车——这些是在一千年后才传到欧洲去的。西安跟着成为隋朝的国都，就在这个朝代，中国已领有澎湖列岛和台湾了。在作为隋朝国都的基础上，

西安跟着成为唐朝(六一八——九〇六)的首都，并且进入了艺术和文学的黄金时代。它成为这个最辉煌的皇朝的中心。唐代的文化整体地输入日本，一位西藏的帝王通过婚姻关系与皇朝结成联邦。外来的思想，艺术家和教师都得到热诚的接待。

作为一个现代城市，西安的历史可以说是主要源于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我很高兴地看到古旧的明朝时代兴建的钟鼓楼上的那些上了釉的瓦面，金色辉煌的红柱子和窗格子，都美观地、忠实地恢复了原状。街道已大为扩宽，但古代建筑计划中，以钟鼓楼为中心而向四个大城门(每个都向着一个方向)作辐射性伸展的方法，仍然保留不变。

由于开发矿山，开凿运河，水库和各种建筑的地盘，中国对发掘古迹的兴趣大为增加。自一九五二年到今天，单在陕西一省已发掘出二千八百多个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古墓。数以吨计的瓷器、陶器、玉器、铜器、兵器、工具及其他人工制品已先后出土，参加工作的工程师和建筑工人都接受了简短的辨别和保存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的训练。中国现在到处都堆满最近出土的历史和文化的宝物。超过三百家新的国家博物馆已开幕了，很多公社也开始收集本地发现的文物。

在西安市内一片古旧而不受注意的地方，种植着蔬菜的土地上，考古学家最近有一项惊人的发现。经过仔细的发掘后，发现了地下是一条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各种文物都保存得非常完整，他们将之命名为半坡遗址。现在，整个村庄都已有上盖遮覆着，它屹立于一条长长的石级顶端，两侧是一座新的博物馆的建筑物。半坡遗址目前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生活的最佳样本。它的公共谷仓和一座砖窑和陶器窑的情况依然非

常良好。这个村庄由一条很深的濠沟所保护，濠沟显然是与四周田野的灌溉运河连接起来。半深于土中的圆顶型屋子，中间有一个火炉，十分类似菲律宾的伊克鲁特族土人的住屋，所不同者只是这些屋子的墙壁是以烘过的泥砖和稻草制成。无数的陶器用具、各种饰物和玩具也发掘出来。墙内埋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大瓦瓶，据说是用来做孩子们的棺材的。考古学家断定这个村子的年龄在五千年到六千年之间。

在我们居停的那座宽敞的现代化酒店内，却没有丝毫的东西是有新石器时代气味：酒店的建筑属于经过润饰的中国式建筑法，有二百五十间房子，现代化的沐浴设备，各项设备也达一流水准。这里为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更多的居住条件，这些专家们现在都已离去了，留下来的是一些有基本价值的工业。

在西安市内外周围数之不尽的新旧建筑物群中，我这里只提三个有历史趣味的建筑：一是孔庙，二是临潼池，三是第四纺织厂。

西安的孔庙被认为是构造和建筑得最好的孔庙之一，庙内的庭院展示了唐代建筑学留传下来的最佳样本。这些庭院包括了一幢瓦面结构异常精致的茶亭，大约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檐下挂着串串响铃，在微风下摇曳作声，清脆悦耳；此外，各对称部分都显得极端完美。该庙现在成了中国科学院直接管理的博物馆，整间庙宇内共藏有三万件文物。在一些雕刻在长久不变的石碑上的历史文件之中，有一块景教的碑文记录着中国当时已有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存在。基督教在公元六三五年传入中国，并一直得以发展，直到一世纪后，由于牵涉进一宗叛

乱事件中才被禁止。

这里还藏有世界著名的，于五世纪时塑造的六只骏马中的四件。其中一只于多年前被窃去的马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中；中国人对这宗犯罪案切齿痛恨，好象就发生于昨天一样，他们指出这是“另一宗文化上的帝国主义的例证”。

临潼池(华清池)又如何呢？这是西安城外十英里一处休憩和旅游胜地；临潼的主要风景是那些一个个用石砌成的温泉池。在歌谣和诗词中，它是美丽的杨贵妃安居之所，杨贵妃则是唐代最出名的女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临潼池再一次扬名于天下，事缘于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被他本人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囚禁起来。

路易和我发觉临潼池现在已成为一间公园，而且建成了一座刻画西安事变的博物馆，使杨贵妃的吸引力从头牌演员的位置掉了下来。蒋介石当年的睡房现仍保持原状，未有改变；他赤足逃上一个峻峭的石壁那段路程，以及他被一个士兵逮捕的地方都画上了清楚的标记。这里还流传着当年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在反对处决蒋介石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英雄角色。

临潼现在正兴建着一个有上盖的巨型游泳池。在游泳池竣工后，公园的面积将进一步扩阔，将秦始皇帝的墓也包括在内——如果那座坟墓真是秦始皇帝的墓的话。皇帝死亡至今已二千二百年了，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正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着这座坟墓的试掘。传说在建筑这座坟墓时，动用了七十万人民工作达十一年之久，并且还建造了不少假入口。到目前，尚未有人肯定能否在临潼附近据传是这个伟大的皇帝憩息之所掘出真正

的坟墓来。

第四纺织厂是一座大型的新工厂，面积达十五英亩以上，它就象很多新建的卫星城镇一样，是一个设备完善，自给自足的复合建筑；它拥有一个购物中心，几所学校，一所戏院和几个俱乐部，有铺上碎石的街道，还有可容纳厂内六千名工人居住的，建筑得很美丽的住宅区。在六千名工人中，三千七百一十名是女工人。这是一座颇为现代化的工厂：共有三千二百四十部织布机和十万个纱锭。厂房内通道宽阔，上盖以玻璃制成，间间有空气调节；由于厂房内绝无嘈杂之声，加上清洁异常，所以遇到那些穿着白色长袍，带上口罩的技工时，免不了会想起“医院——肃静”的标志。车间内的运输工作由电池带动的胶轮小车负担起来。全自动的机器转动部分都遮盖了，一个管理员可负责一百部以上。

“这里的每一部机器都是中国制造的，”赵平厂长自豪地说道。“工厂用了十二个月便建成。生产吗？我们每年生产四千四百万公尺布。我们的产品包括葛巴丁，床单布，各种衣料——共有六百种不同的纺织品。西安还有四家同等规模的工厂。”

较早一年，我曾到过日本，并且访问了大阪的几间纺织厂。那里的日本女工人的工作时间和第四纺织厂的女工相同，收得同样的工资，伙食也相差无几。她们享有一些福利，并能多买些布和其他便宜的消费品。其中有一点显著不同的是：在中国的纺织厂里（在其他国营工厂也是一样），丈夫和妻子并肩工作，他们的孩子由厂办的幼儿园和学校照顾。他们共同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共同的工作目标紧紧地连结起来。在日本，年纪多是十来岁的工厂女工睡在工厂里，希望能多积点钱以备

结婚和养孩子之用，但她们很少会嫁给本厂的工人。一般来说，日本的工厂并不为结了婚的男女工人供应住宿，或在他们的工作中心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社区中心。

对于观察人民生活的方式这件工作，我是从来也不会感到厌倦的。在我亲眼目睹许多真人真事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即人民生活的改善非常广泛，虽然还远未能达到全国化。对那些惯住于美国的农场式小别墅的人来说，中国新建的公共住宅区会显得很原始似的。但对那些出生于窑洞之内或昏暗的茅屋之中的陕西省工人而言——那些窑洞和茅屋当然没有自来水和暖气设备——新的生活表示了他们获得了基本的舒适生活，除此之外，更有新的服务以及教育和娱乐方面的种种便利。

在第四纺织厂，我参观了几间专为未婚的青年男女工人而设的集体宿舍，也参观了些给已婚工人居住的有二到三间房间的平房。王老五的宿舍最小的是只有两张床的小房间，也有较大的可容四到六张床的房子。房间都很清洁，布置得很简朴，由一盏到几盏的电灯照明，房间内都有厕所、浴室以及洗衣等设备。

午间，我走访了一间家庭式的平房，见到了一位技术工人，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七十元，他的妻子则赚四十二元。支出：房租用去八元，水电煤气等共二元，伙食费（他们两个人及三个孩子）共五十到六十元，托儿费六元。（按官方比率折算，他们每月的收入合共约四十七美元，但若以此数字比较则难免使人发生误会，须知他们的房租，五个人的伙食费等合起来也不超过二十九美元。）此外，在减去衣服及杂项支出的预算后，他们每月可储蓄十到十二元。他们拥有一辆自行车，并且打算购买

一部收音机。

在一张铺上有刺绣的台布的桌子上面，挂着些藏在一个相架之内的照片。我发觉这些照片都是在海滩拍摄的。询问之下，我获悉这位工人和他的妻子都是青岛市人。从前他在青岛的一个工厂工作，后来被调到这里协助开设第四纺织厂。这里的雇员有百分之六十来自其他省份。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好转还是较差呢？“差不多一样。”他们能返原籍探亲吗？他说他本人曾经返回故乡一次。他们较喜欢留在青岛吗？

“不，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协助建设社会主义。”

“但山东也是社会主义的省份。你们不离开家乡不是也可以干同样的好工作吗？”

“家吗？陕西省是全中国人的家嘛。这里不是中国的发祥地吗？”

虽然如此，我想很少美国人甘于被迁徙而不发一言的。但后来我看到一份《纽约时报》，里面有一篇霍默·比加特发自西贡的通讯，他揭露美国正协助将数以千计嫌疑受过越南共产党影响的越南人“强迫迁徙”。

再者，当我着手写这节文章时，我又偶然听到电台播出一节由玛格丽特·米德主持，谈及美国家庭的节目。在节目中，她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三千万美国人转换了住址。若以人口比率计算，这等于有一亿一千万中国人要移居。人口的迁移和大家庭的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程度的增加，而政治行动仅属次要。但美国人可以说是“自愿”迁移的；他们到“有机会”的地方去。他们也会迁往“公司需要的地方”。他们的孩子将来却会迁往其他地区。

延安——革命的博物馆

我们坐上了那架中国制单引擎飞机升空了，慢慢地飞过那些植满树林的黄土山以及那些令人赞叹不绝的梯田——这一切都使这里长久以来便废弃的土地获得了新生，并有助于制服黄河。

“毕竟我们大概有理由相信人类及他的将来之说了，”斯诺带来陈腐的哲学观点感叹地说道。“当个人自此往下望并回忆起那些住在下面那个原始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人们，以及经过六千年来的恐惧与灾害而他们的子孙仍然能生存，并想到人类最后始发现自然的财富自历史开始便静悄悄地躺在地下等候人类开发之时——呃，一个人便几乎会相信人类是不能被同类所毁灭的。一千年后，人们又可能自此往下望，他们会奇怪我们怎能有勇气在目前这样的原始情况下生存下去，而无视今天包围着我们的各种无法知晓的事情呢。”

一位我将称他为赵先生的年轻人——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指派陪伴我们到延安的向导——对此表示大为震惊。

“你怎能将无知的新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与文明的社会主义作比较呢？”他提出诘问道。“人类将永远把这段时间认为是真正的文明的开始。”

一条铺好了的公路蜿蜒直达延安，我向赵先生表示祝贺他们有了这样大的改善。“解放前，那里只不过是一条供骡子走的小路罢了，”他回答说。“果真如此吗？”路易和我多年前也曾在这条古老的泥泞路上驾驶过车子哩。

“这里顺便一提，”赵先生对我们说：“在未得我同意之前不要拍任何照片。有问题可迅速提出，不要迟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对路易苦笑了一下。“不要紧的，”他低声说道：“欣赏这里的风景吧。”赵年约二十九岁，甘肃省人，头发浓黑而鬈曲，他的长鼻子表示他是阿尔泰族的后裔，紧身的藏青哔叽服一直扣到下巴。

多年前，我在这里骑着马和步行了几个月，我的足迹踏遍了陕北、甘肃和宁夏，所经过的是一片象经过鬼斧神工开凿的，具有不可思议的，超现实美丽的丘陵和山脉，一望无际、人迹罕见。但见那狂风暴雨将山丘冲得四分五裂，只留下光秃秃的山峰，深邃的山谷和倾斜度极大的豁谷——这片土地就象曾经被成群的鲸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样。现在自天空下望所看到的变迁，美丽得使我不能把目光移开去。

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厚、最大、最丰富的黄土表层沉积区。过去，由于树木被砍伐得一干二净，加上无节制的让畜群吃光了这一带的草，每次暴雨后，黄土便泻向海洋，失去了土壤的肥沃度，并使黄河夹着大量的黄土流向下游，于是使下游河床日浅，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水灾。每年，单是陕西一省所流失的土壤便达五亿吨之巨（占全部流失土量的百分之四十）。现在新建的巨型黄河水力发电和水利计划主要是要有效地结束土壤的冲蚀。

在农业合作社成立后不久，延安地区的农民便展开了震天动地的护土工程。一九五六年，整治黄河的总计划开始了，这是一个黄河流域各省总动员的计划，所有的村子和大小市镇有计划，有系统地同大自然作斗争。如今，陕北的结果已经非常

显著，足以成为吸引游客的风景区。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山地已劈成层层叠叠的梯田，处处都种植着松树及其他绿影婆娑的树木，这里是宽广的果园，那里又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些陡削的坡度已得到控制，土壤不会再流失；沟渠与山溪被水坝、储水盆地和土堤所挡住，这样使数以百计的峡谷变成了有用的良田。新的土地逐渐增加，水灾的危险也大大地减少，山谷内满载着清水的水塘既解决了人们食用的需要，也为灌溉和水力发电提供了便利。

在进入地势高峻的延安之时，远处闪耀着几个白色的大字：“绿化祖国！”在这个国家从前一度被水灾冲蚀得最厉害和最贫困的角落里，我所看到的都证明了她正在为完全实现这句口号而阔步前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收复了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失去的土地。

在我们的飞机绕过那座唐代兴建的宝塔之时，我们看到延安郊区增添了以下的建筑：两座环抱于峡谷之中的水库；一座中型的水力发电厂和多所工厂；一条自山中流下，穿过市区及附近地区，用石砌成的“延渭运河”（共灌溉四千英亩土地）；一座战争的纪念碑以及一块从延河边直抵山边的大旷地。我们的飞机慢慢地低飞过重建的延安市（延安市当年几乎全毁于日本人的轰炸之下），我看到一座新建的石桥。我高声地表示从前曾听说过此桥是在周恩来涉水渡河，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臂之后才建造的，但不知是真是假？

延安的高度大约是海拔二千五百英尺，它横卧于历史上从蒙古进侵渭河流域一带的必经之路中。数千年来，它附近的地区曾目睹过数以百计的沙场血战。在本世纪中，中国再没有其

他土地象延安般经历过那么绵长、持久的战斗，再没有一片土地象延安那样因战争而变得那么贫困。在盗匪与军阀之间的争斗之后，这里又成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军事领袖们所组织的阶级战争的战场，他们发现这是游击战争最理想的根据地。

延安现在成为一个特别市，也是长城以南的七个山区县的行政管理中心。作为一个几乎连续不断地被共产党人所控制的地区(较任何其他地区更久)，它是年轻的中国人所景仰和崇拜的圣地。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阶层的人物，差不多全部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期。曾在延安山上的战时学院接受过训练的人，现在有延安老战士的光荣称号。就是在这个地方，毛描绘出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蓝图，为第二次内战的胜利打下了理论基础。延安曾一度于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所占领，但毛翌年的光复延安，标志着蒋介石末日的开始。

当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首次抵达延安时，红军的部队已占领了陕北的大部分地区，但延安市仍然由隶属于张学良元帅的国民党部队所驻守。共产党人在取得张的默契下，指挥红军——当时约有四万人——占领了延安和附近的地区。自此之后，陕北便成为共产党人主要的训练基地，他们就在这里派人渗透进整个华北平原，并且在次年开始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展开了敌后游击战。

根据一九三七年蒋与毛所签订的协议中的条款规定，旧红军放弃了本身的名称及旗号，而改称八路军，名义上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它还放弃了一些过激的阶级战争口号，而着重推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和其他“民主改革”。然而，在实行中，

毛仍然能够继续(较保密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吸引着千千万万爱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并在组织农民群众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使他们对将来的革命运动作好思想准备。这个时期，共产党人实际上取得了全国性的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华北区的政治控制权。

由于不能使毛真正向他投降，也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不能和毛作战，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名最精锐的部队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地区展开了全面的封锁，断绝他们的一切外援。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双方面的军队都迅速开往日占区，尽量占取土地。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战已蔓延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驻中国的美国政治顾问们企图展开正式谈判，签订和约和建立联合政府。但到一九四七年，这个企图终于告吹。那时候，中国两方面的军队已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席卷全国的，决定性的战争。

在共产党一方来说，直到全国胜利已握于掌中为止，最高司令部的首要人物和各项命令仍然集中于陕北的荒山野岭之中——这里看来简直不似藏龙卧虎之地，谁也料不到七亿人民的未来领袖会隐伏在这儿。

在延安这个地方，很适宜于重温毛对战争的概念中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这些对解释他于今天采取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和战术是最为重要的。多年前，根据红军在早期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毛泽东写出了游击战争的“四条规律”：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当蒋介石的部队对延安展开大规模攻击之际，毛就是用这样的总战略打败了他们。在胡宗南及其他国民党最高级的司令员指导下，国民党出动了二十三万军队进攻陕北、甘肃和宁夏的红色根据地。共产党的大多数队伍都在黄河之东，分散于整个华北平原直到东北，蒋在那里已经遭到凌厉的反击。延安直接指挥的正规部队只有三万名，受围攻时并没有命令河东部队增援。

在毛的十项军事原则中，有五条可以说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游击战术：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三、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三到六倍的优势兵力，在敌军部队能增援之前，包围歼击敌军的一部分。

四、以俘获的兵器和士兵作补充(百分之八十的俘虏可以争取过来)而不需于地方招募(避免干扰生产)。

五、以“新理论”彻底教育部队(毛将它归纳为“团结人民”和“不可战胜”。)

当武装到牙齿的敌军抵达延安地区时，他们发现村镇内既无食物，也无动物，甚至连有工作能力的人也随军撤出一空。如到乡村中分散搜索，便遭到袭击，并被迅速吃掉。若集中兵力追赶，共产党军队便会突然消失，然后静悄悄地自背后反攻，咬断他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曾经四度包围整个省以围捕共产党部队；每次，他们都有几旅部队因孤立而被共产党的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个措手不及。到那年年尾，

国民党遭到彻底的失败，并被迫在极度混乱中溃走陕西。自那时开始，延安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总反攻。

甚至在战后，虽则陕北在历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它仍然是极端贫穷和落后的。解放前，延安既无电力，也无现代化工业，甚至连汽车也没有。到一九六〇年，延安市（人口六万）已拥有上述的一切，我更看到一些交通警察（多数是女警，他们用手提扬声器警告那些不知货车速度的乡下人），道路许多已铺得很好，还有一个设备优良的省级医院，一个舒适的旅店，俱乐部，戏院和——最重要的——博物馆。

我等曾往参观延安展览馆。这里展出了一些过去罕见的甚至见所未见的产品，包括各种水果，葡萄，胡桃，蜂蜜和柞蚕丝等。当时，我很留意地察看了一个重达八十磅重的南瓜，一棵高十五呎的玉蜀黍，以及由新鱼塘中捕获的肥美鲜鱼。图片告诉我们延安地区已绿化了八十三万英亩的土地，并且已“基本地完成”防止土壤流失的工作。

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一）在一九五二年，当时共有人口六十七万七千人，全区只有二百六十六个铁犁；一九六〇年，全区人口九十一万九千人，共有钢犁七万三千一百个，这对大多数家庭仍居于窑洞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二）有七千二百五十二人领取养老金，有一百六十一间老人院已经开放；（三）被接纳往延安党校学习的当地干部中的文盲数字，一九五二年尚有百分之二十六，至一九五八年则全部扫清。

延安师范学院

在延安于一九三七年成为红色的首都之前，这里完全没有较高等的学校。该年，这里设立了一所战时的“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它的宿舍与课室都建在山边的窑洞内。这所临时的大学保存下来，变成了今天的“人民革命大学”，它拥有学生一千名，以农科为最突出的课程。今天，延安还有一所陕北学院、两所中学和延安党校。所有这些学校的建筑俱相差无几，它们既有整体的建筑物，也有后半截伸进了黏土山壁之内的“半体建筑”，这种结构别具一格，前半部是按当地传统的方法建造，门口与窗户都呈圆拱型，上有几层有平台的屋子。这些房子建筑费很便宜，维修也花不了许多，而且看起来也很悦目。

在陕北学院访问的整个早晨中，我获悉该校进行着培训师资的计划，其目的是希望在整个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普及中学教育。从这里往四周看，以前最接近的高等学院远在西安市，陕北学院的郭院长就在那里的西北大学毕业。现在，他已四十六岁，自一九四八年便起便在延安工作。他的助手或行政上的共同领导叫李顺贵，年纪只有三十四岁，但已是个老党员。从前他是个八路军军官，只读过几年中学。他们两个人都和“学生工人”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我到达时，校舍尚未竣工。所有的学生每年都要参加十个星期的生产劳动。

陕北学院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当时学生人数是二百一十人。一九五九年，整个教学课程扩充了，学校还开始了两年期的医科。该校于一九六二年将医学系改成五年制的医学院，拥有完

全合乎资格的教职员工。目前，学院共有三十六位教师和四百一十二个学生。在这四百多个学生中，女生占了八十五个。在一百名学生中，据说有八十名左右属于农民或工人成份；余下的来自混合成份的“资产阶级”家庭。学费，书籍和宿费全部免交，但每月要缴伙食费十二元（相当于五美元）。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每月可获得十五元的助学金。

郭表示目前急需要把所有的毕业生送往早已在陕北地区开设的“几十所”中级农业与技术学校中，去充实教职员的阵容。这类学校于公社未成立前，便已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开办，现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半农半读的教学制度，类似城市中专为工人而设的半工读学校一样。

在中国，正式工人的合法工作年龄是十八岁，但是在农村，我时常看到一些年龄未足十四岁的青年便已干着全时间工作了（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农业区——包括美国在内——也是屡见不鲜的）。目前，要使全中国适龄入学儿童都入学校念书，暂时仍未有可能，即使经济上能容许劳动力自生产中抽掉出来，也难以迅速做到。一九五三年的人口调查数字显示中国在一九六〇年将有一千三百万年纪达十三岁的儿童，但该年度的经济计划预算草案在这些儿童中，只有四百万能进入普通的全日制中学学习。据一位党的发言人说，在一九五九年，年龄介乎十三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共达三千七百万。

要中央政府为全国各地提供各种设备，显然需要多年的时间。为了将责任交到各基层单位以及尽量利用各级的潜力和才能，党号召公社及各县市的委员会各自组织半工读的学校以教育青少年。在工业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称为“两条腿走路”的

方法——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工艺二重性”的另一种讲法，意思是将高比率的资金投资于现代工业，而将高比率的人力投资于农村的公共事业的意思——在中国的农村教育方面正在大力推行。

这些学校多被称为农业中学，它们的创立确实解决了数以百万计、未能获取升中学机会的小小学毕业生何去何从的难题，因为正规的中学教育目前仍集中于城市里。它们强调要培训青少年学会掌握更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农业技术。除去普通的农业知识属必修课之外，还需要学习特别的技巧。据一位负责人宣称，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将需要有一百八十四万农机技术员与四十四万名“农业技术干部”。

半工读的中学的课程随着情势而灵活地变更。据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四日中国新闻社一则题名为“中国农业中学的新发展”的电讯称，这种变更的形式主要为：“农忙少学，农闲多学，最忙时定时偶学，雨天时整天来学。”它们的课程变化颇大，但普遍都类似陕北学院的方法，但还要各自学习适合本地需要的技术课，因为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都要留在本区服务。按常例而言，学生们每年中有五个月要学习理论知识，另外五到七个月到田中干活。

目前，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一步的农业中学还比较少；大多数学校三分之二的费用，依赖国家和公社的支持，另外三分之一则可自给。它们的经费较完全中学低得多，与西方的同等教育事业比较则更不待言了。举例而言，为了使一个标准初级中学的学生能读完三年，国家平均要花五百元（约合二百美元），然而，用四年到五年时间来完成同等学习的农业中学学生，据

称每年只需要国家支助三十元，另外由公社拨出少于三十八元的津贴而已。

各处的半工读学校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做到完全自给自足的地步。除了农业商品以外，它们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蚕、养鱼、养猪、养兔、编织草鞋和草绳、制造杀虫药、肥田料和皮革产品，以及修整农机等。在东北的泰岭林区，我见过一所学校，它的经费好象完全是靠业余伐木和植林而获得的。

在一九五八年由公社发动的各个“大跃进”中，这所学校因准备不足，并企图在太短时间内进行太多的工作，以致遭遇困难。有些类似的学校因为主要依靠业余的、自愿的、薪金低微甚至完全不发薪的教师和行政管理，故产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党的哲学观点是要领导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一些学校则不能与农业生产和谐地合作，有时还拖慢了农业生产或不把它列为必要的劳动，所以被解散了。现在余下的学校中，最好的也只能提供尚未尽善尽美的中等教育。

在检查各中学本身出版的自我批评报告中，个人得悉“教育的质量尚未达水平”，“各种试验只是死记强记而未能充分理解，因此不能正确地运用”，“有些学生害怕艰苦的工作，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生产是光荣的，愉快的这种思想尚未能牢牢地建立起来”，以及“一些实验农场只是在名义上存在而已”。补救的办法包括改善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法，使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的意思表示支持党和社会主义；“专”则表示以个人的特别知识服务社会主义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作及生活的条件一定要保证“教师们能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负起正式的责任”。

上文所述的批评来自一个比较先进的省份——广东省——的完全标准制中学。人们可能会推测，在陕西北部那样偏僻而落后的地区，半工读学校中又红又专的质量不知要低至何种程度。然而，在整个长远的过程中，承认这种弱点和低水平并不如它们的存在那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努力求取较高教育的人来说，他们的机会确实大大地扩阔了。熟悉过去陕西省人民毫无进展的原始农村生活的人，马上可以认识一个巨大的转变对当地人民的意义。在陕西省，一个只有两百户人家的乡村——渭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人进大学念书，最近曾被赞扬培养了十个年轻人及格地考进了学院——其中有六名已毕业了。

穷苦人民的骄傲

这一次，我的主人名叫李裕华，一个五十五岁的农民，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已起了不少皱纹，活象这地区四周起伏的冈峦一样；他的皮肤晒成了象胡桃树皮那样的颜色，双手长满厚茧，就象同一种树的根部。他穿着陕西农民的一般服装：白色的头巾包在剪得短短的头发上，腰上扎了一条白色的腰带，旧长裤一直反到上膝部，也用棉布带束起来；宽阔而弯曲的肩膀上，披着一件已穿破了的外套。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他便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原籍旧宏山县，现在是柳林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领导，这个公社占了延安县二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

“宏山？”我回忆着说：“一九三六年当红军将我偷运过分界线时，我们曾经到过那个地方，那是人迹全无的荒山野岭——

就在洛川附近。一九三六年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回答说，并且突然激动起来。“大约在你到达那个地方时，我刚巧被‘民团’（地主的武装）逮捕。为什么呢？原因是当红军占领我们故乡时，我加入了贫民团。在国民党和地主回来时，我们很多人都被拘捕。”

他被投进监狱，饿到半死，并且因拒绝透露情况而被反复拷打。“后来我做了一件蠢事，”他说道。其他农民筹足钱来保他出狱，他却再到地主家里干活去。为了要将债务清还，他将家里的东西卖得一千二净。我插嘴问他一生最凄惨的岁月是在什么时候。

“噢，就是上述那一年——那个冬天，”他说道。“我们的粮食不足糊口，全家饿得象皮包骨似的。最凄惨的时刻是当我那饿得奄奄一息的儿子对我说：‘爸爸，让我死吧，让我死了吧。横竖你只能仅仅使我不致饿死，请你让我死了好使你们能够活下去。’那个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刻了。”

当时，我们坐在李的窑洞里，这里高踞于山谷之上，往下望去是一片稻田。窑洞是一间阔大清洁的房子，地板铺的是方阶砖，屋顶是一个拱型的结构，抹上一层灰泥；前边有一个宽阔的拱形窗子，窗格子上糊着透光的纸板。墙的一角是一座有两个灶头的火炉，炉上摆着一个碗柜，里面排列着五、六个上了釉的瓶子。火炉之旁还放着四个瓦罐，盛满了当地人最喜欢吃的腌菜。在那张巨型的炕上，整整齐齐地折叠着五条新净的被铺，炕旁还有一个很笨重的衣柜。通过房中的一堵门，这房子还可以通往贴邻的那个窑洞里去。我看到隔壁的炕下摆着三双童装的胶靴以及一双运动胶鞋。在一张麻栗木桌子四边摆设

着四张同等质地的椅子，桌上放着一个巨大的柳枝盖暖水壶，还有一个大茶壶和一些瓷碗。我不禁感触地想起这类物件在过去只能在地主家中才可看到；我还记忆起当年单就暖水壶一样东西便足以引起陕西盗匪的垂涎，以致下手行劫（李的家什可能是在分地主的田地时一并分得的吧）。一边墙上，挂着一个相架，里面藏着老李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较年轻时的八张照片；照片旁边是一些已经发黄的报纸剪贴，报道老李的大队所取得的各种荣誉。

在红军占领了延安后，老李偷渡过封锁线，越过群山到此地观察情况。他继续叙述当年之情景：

“这里的一切就象宏山初获解放那时一样。我跑回去告诉我的邻居，两日后，另外七户人家便准备好出发了。当时我已有四个孩子，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我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收拾妥当——只用一个轻便的包袱便已全部装下。八户人家摸黑出发，于两日后便安然抵达延安。”正说话间，一个穿着粉红间白衫裤、梳着辫子、面色红润的姑娘走了进来，只见她手里拿着一碟向日葵籽，放进我们的茶杯里。在她转身走出去后，李满意地望着她的背影，深情地说：“这是我最年轻的女儿。”

“你们一到延安便分得土地了吗？”

“那时候还未有。我们已错过了第一次分田地的机会，但是我们都分得了栖身之所和口粮。一九四二年，这里进行了第二次分田地大会，我们也得到自己的土地——四亩（约三分之二英亩）。我等八户人家留在一块儿，并于一九四三年组成了合作社。对，我被选为主任。在党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买了农具和肥田料。一九四六年，我们的产量增至上两

年的总和。于是，我们又有能力买了些羊、猪和两头牛。”

“之后，你们在国民党占领时期又失去了一切，是吗？”

“我们只是不能继续耕作而已，因为早在一年前我们已接到警告，并且有指定的地方将农具和种子坚壁起来。我们失去了那两头牛，但是却把大部分的羊和猪赶到山里去。当时我们就住在山上牧羊放猪。第二年，我们又回到这里，这年秋天又取得了很好的收成。从那个时候起——呃，当你参观时我们再谈吧。”

李夫人的年纪与她丈夫一样，但是头上连一根白发也没有。她默默地坐在一旁，故意把缠过的双脚遮掩起来；她一定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所以她拒绝和李及孩子们一同拍照。她为老李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已经有四个孙子。“只有四个吗？”我追问道。

“过去，穷人那能活着见到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呢？”他反问道。“能够见到一个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这么说，你刚才没有把孙女计算在内吗？今天，妇女们都有投票选举权，现在男女平等呢，不是吗，老李？”

老李咕噜着说道：“啊，现在男女的确是平等的。今天的妇女跟男的赚一样多的钱呢。”当他步出门口时，他回头对我说：“假如你把女孩计算在内，单是我的大女儿已经带给我五个孙子了。”

要正确理解柳林公社的成就，我一定要重复指出：在三十年代时期，陕北地区饱受大自然的摧残，更受到人为的蹂躏，整个地区都是荒凉一片，当我发现竟然有人居于这些破山残洞之中时，心中确实大为惊诧。这里的土壤贫瘠非常，全无肥沃之

地；总而言之，整个地势都不利于农业耕作：十分之九的土地都是斜坡或易于流失的地域，加上山谷也极其狭窄，可耕地少得可怜；以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来比较，那里的地主所过的生活也只不过是属于贫民之列，更无论其他贫农了。在这个地区，地主与农民一样都是文盲之辈。一句话，这里的土壤受摧残的程度更甚于俄克拉何马州的泥泞区及得克萨斯州的坏土区；这里树木稀少，气候非常干燥，然而仅有的夏季湍急的洪水和冬季的连绵大雪却使农作物更受其害。它的唯一好处是有晴朗干燥，健康宜人的天气。这大概是穷苦人民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不致全部死光的唯一原因吧。那时候，人们住的是蝇鼠横行、随时有崩塌危险的窑洞（过去，黑死病往往成为流行之病症），他们赖以为生的是栽种在倾斜度达三十度的斜坡上那些散落的谷物，他们每英亩能收成三到四蒲式耳作物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噢，这个地区是有可能好转的。”艾黎打断了我底起伏的思潮。“你曾经看过它最坏的时刻。这片黄土其实是非常肥沃的。它大有潜力，只不过需要大力的改善，水源，肥料和有效的组织罢了。”

我们站在老李的窑洞之前那片宽阔的，晒得发焦的粘土旷地之上，眺望着山下的田野。在较低的山脊处，一个男子正赶一群白色的山羊下山喝水。放眼望去，山的那边是一条长长的峡谷，这边却是青绿金黄的农作物；更远处，柳林公社的其中六个乡村尽入眼底——各村的房子多属古旧新饰的窑洞，但也有新建的单层瓦顶砖屋，三三两两的分散于其中。在一条泥石混合铺成的公路上，几百头绵羊踏起了漫天的灰尘。峡谷里，一群测量员正在计算怎样建筑一条通往新水库的公路。那边厢，

延河的一条支流正滔滔不绝地把河水灌进灌溉渠里以供应水稻田的需要。啊，这里还种有稻吗？全年性的耐寒作物当推粟和玉蜀黍，小麦和蔬菜则栽种在较好的田里。至于米，则是我首次到此旅行时难以得尝的。

李详尽地叙述了这一带的风光：“看到那边的幼松林吧？看看那些银杏；它们已是第二年结果了。我们共栽种了四万七千亩松树，栗树及其他果树。土地流失吗？这里已经基本上（他们多么喜欢用这个字眼哩！）解决了。我们公社现在有六千亩旱梯田，另外还有四千亩是保证有水灌溉的水田。”

他们的土地总面积共达六万五千亩（约一万一千英亩）；我想除了山脊和峰顶以外，他们已完全用植物将其他地区遮盖了。

“建筑一亩梯田要多少时间呢？”

“大约十七工吧。如果用小型铲泥开路机则只需要两到三工。我们目前仍然未有拖拉机哩。”多年来，公社动用了约二千六百名男女农民，一共开垦了一千五百亩梯田，其中三分之一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开辟的。

我们走了一英里路，穿过了一条峡谷，来到公社的一号水坝参观。这是一条建筑得很好，全部以石砌成的堤坝，高约七十英尺，横卧于注黄河支流的一条小河河床上。堤道之内，蓝蓝的河水将高高地耸立着的群峰连接起来，造成了一个长达半英里的湖泊，但见那湖内水平如镜，山光水色，倒也秀丽异常。在湖边一绝壁之下，新辟了一条公路，一些赤裸着上身的孩子们在浅滩的柳树之下追逐嬉戏，构成了一幅静中带动的图画。

“或许你尚难以理解水坝和水库对我们的重大意义，”老李属下的生产队中一位年轻的队长对我说。他是个谦虚而热诚的

青年人，刚来陪伴我们到处浏览。“我们已建造了一座比这座更大的拦河坝，另外还有七座具有同等规模的。过去，住在这些穷山沟里的人民，从来也未试过全年有水洗澡的滋味，更无论灌溉及水力发电了。从前有人说陕西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其一是出生之时，另一次则是在结婚的日子里——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大了的说法，但也显示出此地多么缺水。现在，我们的孩子甚至可以随意学习游泳了。我们在水库中一共蓄养着六十四万尾鲜鱼哩！附近的农民过去有谁曾尝过鲜鱼的味道呀？我们的前景多么灿烂辉煌，我们的孩子将来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的啊！”

作为一个“公社”来看，柳林的人口较普通公社的大队多不了多少。这里的所谓村子（柳林公社共有五十九个村庄），只不过是十多二十户集中居住于邻近的窑洞里的人家罢了。由于平地难求，所以村落很少会建于平地之上；甚至连牛群与其他畜群，也是安置于山间窑洞里。柳林总共才有一千五百九十二户人家；六十四万尾鲜鱼——岂不是每户平均算来有四百尾吗？天天有鲜鱼，逢节更双倍？不。这些鱼都是公社的资产，是为建设更美好的将来才蓄养的。社员们当然有得吃啰，但却是有计划的分配而不是乱吃乱用。每个社员每月的肉类和鱼数的分配额约二点二磅（即二市斤），但各户人家可以利用他们的一小块自留地来养猪、羊等家畜，以补肉类配额的不足。如大多数其他公社一样（特别是穷公社），柳林也将大部分的肉类交售给国家，而将利润储蓄起来，购买用具以进一步发展。

艾黎与我在李家作客两天，但要他们答应——颇使赵先生失望——不搞任何铺张浪费的形式。我们每天吃的是用小米制成的馒头，以及马铃薯、萝卜、玉蜀黍和南瓜等。延安人现已

学会了吃玉蜀黍的穗轴，这些过去只是被认为适宜于喂猪的。吃的东西多经煮或烘焙；这里的食油还较为“缺乏”。我们也吃到了新鲜的，拌以盐和蒜头的番茄沙律——也是一种新食品。我们用膳在柳林村生产队总部的饭堂里，这个公社也是以本村来命名的。这个饭堂是全队大多数人家吃午饭之所——共约九十户之多。晚上到此用膳的人数较少，大部分都是未结婚的党员和年轻人；结了婚的多回家自开伙，与子女及父母亲共叙天伦之乐。

饭堂搞的饭菜餐餐略有不同，但早餐却一定是小米粥。柳林公社的食品已远较当年我与老红军们一同以破瓷瓶盛着吃的面条为佳——这种食物，象格兰特将军的威士忌一样，即使打胜仗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这里，让我谈谈食物营养价值的枝节问题。

中国人一向喜欢吃肉类，而且也无宗教规条禁止之。然而，在过去，只有那些“有钱人”才有资格在每年的大节日里吃到三四次肉类，穷人呢，免问。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好象相信：人一天不吃肉类，便得不到适当的营养了。然而，对于习惯的素食者而言，缺乏肉类并不是一件怎样艰苦的事儿；乔治·萧伯纳和甘地都曾证实不吃肉类的人能活至很老的年纪。根据“中国人每月配给一到两磅鱼和肉类”的报道，一些人恶毒地造谣说中国人“面临死亡边缘”，“陷于饥饿困境”，“被迫以甘薯代替肉类和谷类”等（解放前有些地区确是这样）。今天来说，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话又说来，甘薯的营养价值实在也并不低。据阿德尔·戴维斯所采用的“食物分析表”统计：一个中等的甘薯所含的维他

命A较一个橙多十九倍， B_1 和 B_2 则多两倍，所含的磷质和铁质也是橙的两倍，而热量则几达三倍之多。一个中国出产的马铃薯(或者大甘薯)所能产生的维他命A较一碗大米饭多二百倍， B_1 则少三分之一， B_2 多四倍左右，又能产生六毫克的维他命C(米则全无)，钙质多百分之四十，而热量则较大米饭多十个“卡路里”(至于蛋白质而言，两个甘薯的含量便等于一碗饭)。与相等重量的牛肉比较，马铃薯所含的热量要少百分之十，但是，除磷质与铁质之外，它所含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较牛肉多得多。还有，那毫不显眼的干豌豆所含的热量较同等重量的牛排多五倍，蛋白质多三倍；与同等重量的猪排比较：蛋白质多四倍，热量也几乎多三倍。最后，一杯延安出产的南瓜所产生的热量和钙质，分别是四盎司重量的牛肝的三分之二和五倍，至于维他命A则多百分之十。

据报道，这个地区每人每月的小麦、小米、大米和马铃薯的配给额是三十四市斤(约三十八点四磅)。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产季不限额供应，但冬季仍要配给)。椰菜和萝卜等多藏于窑洞内的禾秆堆或土坑之中。社员们也畜养几只家禽和一两头猪，这些可以随意自用或出售于市场之中。食物是较朴素和单调了一点，但肯定可以供应二千个卡路里以上，即较“足够的热量”还要多。对一个“基本上仍贫困”的公社来说，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

柳林公社已经建造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供应一百二十间建筑物的照明和一个分布到五十九个村子的电话系统之用(所有的公社现在都由电话连接起来了)。各生产队目前经营着十一种小型工业。我参观了一个石棉瓦及瓦筒工厂，一个运输

服务队(有六十辆胶轮车子和一百三十八匹马和骡)，一个化肥厂，延安最大的砖窑，一个木匠店和一座小型的露天炼铁炉。

炼铁炉位于大队办公室三到四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旁边是条较小的水坝和一个风景宜人的水库。它每天能生产半吨铁锭——全部供产给制造犁及其他农具的铸造厂应用。这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期所建造的地方小型高炉之一，因为实际有用，所以继续进行生产。(远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时，在海外的经济援助之下，路易·艾黎和他的中国养子们便以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名义开办这种原始的炼铁工业了。他们的杰作有些尚保留至今天。)

在柳林公社，根据全中国通行的劳工法例，男社员每月获得三到四天假期；女社员则有六天。在旧中国，劳动人民所得的假期只有春节，立春和中秋等几个大节日和偶然的赶墟日。现在，传统的节日依然保留，但由于加上了“五一劳动节”，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后数天，每周的规定假期和每年一度的例假(通常是十天)，人们的节假日较过去多了。

当我初到陕西时，只有县城才有学校设立，乡村中是完全没有的。目前，柳林公社每五个村子便有一所学校。七岁以上的儿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入学读书。李指出十八岁到四十岁的成年人，百分之八十都是有知识的。一些年老无儿女的孤独老人今天都住在公社办的养老院里，那是一座有三个房子的窑洞，就在老李的山顶“碉堡”附近的一块旷地之上。那里，我遇到了八位都已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其中一位长着中国人中常见的白胡子，他坚持说自己只有五十六岁。“他连自己何时出生也不清楚哩，”另外一位老人取笑地说道。

老先生们都享有足够的食物，并由一位兼任他们的厨师的社员负责照顾他们；老人们养一群小鸡，种一个小菜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有知识的。他们怎样消遣时光呢？当他们精神充沛时，便联袂遨游新水坝。（这种情况我见过吗？我自己的国家里有这种情况吗？）有时他们会下一两盘象棋，有时在菜园中略舒筋骨；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庭院中憩息，或眺望谷下稔熟的活动情况。他们对这个家的感觉怎样呢？老先生们重复了我在各处所听到的话。

“喜欢它吗？”一生劳苦之外，谁不想安安稳稳地休息一下呢？在旧社会，没有子女的老人有谁抚养呢？现在我们可以无忧无虑了！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呀！过去我们早就死掉了。”

然而，尚有两位老人家，“老至难以转变”，仍然单独居于自己的窑洞里，只要有饭可食，便不理什么“家”不“家”了。

从柳林公社看中国的农村

第二天，我们来到既是大队总部，也是会议室的那间大窑洞里，大家依次在一张长方桌旁坐下，促膝谈心，前后共讨论了数小时之久。墙上，一些缀有五角星的红旗挂得高高的；此外，张贴在墙上的还有：照片、标语、地图、生产计划表、标贴画、图表，以及一些奖状和奖品。李及队中另两位负责人，妇女工作组的主席，医生，财政，青年团负责人，全部都出席了今天的讨论会。农民们也静静地进入会场，好奇地聆听我所提的疑问，然后低声交换意见，并且步出窑洞之外讨论应给的答案。

事实，事实，事实！过去，你休想自任何的农民口中得知真实的情况，你所能获知的只是：他有“几个”孩子，邻近的县城“不超过十里远”，他的农舍的面积只是“上下”——即普普通通；诸如此类。现在，无论对方是党委书记，还是一位护士，一个厨子，或是一个学生，他都会讲百分率，母猪和小猪的头数，年份和增长率，高产和平均数字，以及人人在会议上反复讨论过的事件：如老蔡为大队除草应得多少工分，什么应算做重活，什么应算做轻便工作，应送多少椰菜往老人家的家里，今年应卖多少小麦，多少作食用，多少留作储粮，如何增加肥料——甚至一九六七年应计划些什么！等等。人民对于他们应缴的税项知道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他们深切理解到他们的“四规定”和“三保证”以及他们的劳动力和金钱用在那里。这里提到的“四规定”的项目是土地，人力，牲口和工具。“三保证”是保证生产额以缴付国家税项；保证售予国家足够公粮；最后一项是保证满足“外地合同”和本地区的消耗。超额的生产者所得的奖励就是定额的奖金。

李裕华只是柳林二十四个生产队的领导中的一位，但是由于他在落户的柳林村中组织了第一个互助组，所以公社也以该村名为社名，而他也成为二十四个生产队中最高级的队长。他的“成功史”与黄冈公社的严伟全十分相似。一九五五年时，这地区共有二十一个高级社；由于在高级社成立后，社内农民的生产较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其他抱有怀疑态度的农民也倾尽自己的资产，投入高级社的怀抱中去。

“贵公社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发表的，赞扬河南

一个人民公社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并且广泛展开讨论。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很适合我们的情况,句句话都说到我们的心窝里去。于是我们与其他高级社以及乡和县的干部展开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公社。”

“显然是由党领导的,是吗?”

“不错,是由党领导的。”

在延安时期,老李经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并曾与他交谈。

“主席也是一个好农民。他深懂耕耘之道。在有关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他都是正确的。我们紧跟他所创立的八字宪法,这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成果。”

这个“各个农村人民公社都高举着”的宪法包括有:施行深耕与改良土壤(土);施用更多的肥田料(肥);搞好水利(水);改良种子(种);密植(密);保护农作物不受虫灾(保);改善管理方法(管);采用更好的农业工具(工)。李裕华和他领导下的一群,个个都是亲身下田劳动的实践战士,他们都没有向外人介绍复杂的材料的经验;他们有时会举出一些你闻所未闻的历史事实,所以,我有时也听得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们没有准备怎样才会使外国人留下印象,也没有负责公共关系的干部递给你一本包裹得整齐洁净的介绍——但他们这种介绍却是最真确,最朴实和最令人信服的。

一些重要的资料确实引起我的兴趣。一九五九年,公社的总人口是六千二百五十四人,其中三千六百五十五人是老老少少的家属。公社共有家庭一千五百八十二户;照上述数字推算,平均每对夫妇只有两名家属。在二千五百九十九名全劳动力中,一千五百九十二名是男性,据报道其中只有十名尚未结婚。该

公社的工业生产尚未占得重要的地位，这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参加工业建设的全时间劳动力只有一百八十一个男女工人和一百二十八名家属。在这里，全劳动力表示那些从十八岁起到退休年龄为止的成年男女。领导上还鼓励退休的老兵到此地落户插队，现在已有很多来自外省的“移民”了。一九四八年以后，延安的人口曾一度急剧下降；成千上万接受过党和部队训练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此地到东方工作，并且很少返回来。

在一九五〇年，这个地区的农作物平均每英亩的产量不超过五蒲式耳。到一九五六年，李领导的高级社已将产量提到近十二蒲式耳。一九五九年，即公社成立的后一年，耕地面积已从三千五百英亩增至五千英亩，这是由于二十四个大队将人力组织起来，以及进行水利等工程的结果。同年，谷物的产量平均达到每英亩十九蒲式耳。在一九六〇年，陕北的气候颇佳（与南方的干旱相反），从早已收得的作物初步统计，这一年全公社的产量必定远超他们的生产指标——每英亩二十八蒲式耳的混合作物（包括牲口饲料在内）。

即使以混合作物计算，那些数字与美国平均每英亩出产二十一点三蒲式耳小麦的数字来比较，也是挺不错的。但是，中国的人力投资依然远较美国为大。北京的经济学家们最近指出，美国的农场工人平均每人每年可以生产谷物一千蒲式耳左右。在中国来说，要想打理好二点一英亩的作物，共需三百个劳动日之久。假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等于美国，那末，她只需要二千一百万农民便可以养活目前全国的人口——而不会象现在那样需要近十倍之数了。

柳林公社的收成包括了在一千六百五十英亩良田中，平均

每英亩可获得五十五蒲式耳的产量，全公社的最高产纪录是每英亩一百一十八蒲式耳。这些数字在陕西北部来说是十分突出的，但较诸四川省及中国肥沃的三角洲地区的平均产量却多不了多少。在上海近郊的一个人民公社，社长说当地曾创造了每英亩产量达五百四十蒲式耳(混合作物)的纪录。

李指出，灌溉工程，开辟梯田，增加钢犁，改良方法及加重肥料等措施已产生了优异的成绩。劳动力和资金还用作其他种种投资之上；例如，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柳林公社的牲口群增长如下：猪，二千三百七十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牛，三千二百二十头(包括有一千五百四十头母牛)，增长了百分之十；羊，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鸡，八千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之所以认真地诘问老李有关数字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在提及柳林公社一九五九年的纯收数字时，实在是太低了。我不能自他的报告中得知该公社的总收入，或者在实际总产量中，究竟有百分之几是一定要售给国家的。他只能使我明白应缴税款永远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他还指出，大队获得保证最低限度可以将全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作队员的食用或按市价“现金出售”。

现在让我暂离本题，简单地谈谈中国的征税问题。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农业税并不象海外许多人想象那么高。据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称，一九四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这个数字约相当于一亿零五百万吨，或者这只是要抽税的粮食而不是将全部计算在内。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或约等于一

亿八千万吨——这数字与外国经济家的估计相差不远。(美国在一九五七年的谷物产量为一亿五千七百万吨。)毛在一九五七年指出：

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约一千五百万吨)。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约四千万吨)的水平上，……

——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总粮产一亿八千万吨中征收一千五百万吨，约稍高于百分之八。一九五九年，柳林公社的农业税据说只是粮产的百分之五点四，而在黄冈公社则达百分之十一。在其他地区，我发觉税额的差别是据该地区的繁荣而变化，大约是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四。在一九六〇年，很多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公社都免除了征税，没有灾情的地区则按情况加多。据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的《人民日报》称，该年度的农业税平均是百分之十五点五，这是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的具体收成而制定的。

农民的工资决定于一个特定的基础上，他们将农务划分为八到十二级，薪额按级而定(通常以工分为计算单位)。每个生产队天天将每个社员所完成的工作量和种类分门别类地列起来，到月底再进行结算。这类统计制度相信连合格的注册会计师也难以应付，但中国的农民却显得颇为满意，因为他们对这种公平的计算率都表示同意。在柳林公社而言，社员的收入是以现金和口粮一并计算的。

李先生提出的有关一九五九年的“纯收”数字实际上是在减

去经营费用、支付税额和出售余粮给国家后所剩下的——这几种费用约占了生产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他的支出包括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牲口饲料费和留种费；“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用作损耗费，维修费和福利基金，另外约有“百分之十”用作新的投资。在投资入新项目和新设备的资金中，百分之六十用以改善耕地、工业和牛群等等，这些项目均由大队或各村自己拥有，其余的资金则拨来用作公社的发展。

在减掉了各种各样的支出后，剩下来分给社员的现款只剩下十八万七千八百元，按该公社的全劳动力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分得七十二元左右。除了现款进账之外，每个劳动力还可分得八百三十斤口粮，包括等量的肉类在内。在分配得的八百三十斤谷物中，公社拨出三百九十斤作为每个居民的食用。余下的则集合起来按市价出售。

如上所述，直接拿回家的只有七十二元，这个微量的数目听起来好象是少得很可怜似的；但是，在整个公社里，家家都不用缴纳房租，也不需要缴付公共事业费、托婴费、幼儿园费和学费等费用（由公社的福利基金和国家共同支持），治疗疾病所费甚少，没有个人所得税，主要的食物全部免费供应。社员们还可以畜养猪和家禽，耕作十分之一亩的自留地，以供自用或出售来增加收益（一头猪可卖四十元）。一些身体健硕的农民，收入较平均数字多得多。他们向我介绍一位于一九五九年收入了一百九十元的人。

在过去，农民们很少有机会能有一、两元现款在手的；他们所买的东西也局限于盐、灯油和针线等，很偶然才有资格买到一块布料。贫苦的农民往往欠下高利贷者一身还不完的债务；

现在，如果一个农民要买一辆单车或一头猪的话，他大可以在福利互助基金中借款，充其量每年要多付百分之三的利息而已。在柳林公社，我参观了很多家庭，当然并不是家家都象李家布置得那么好，但即使最穷的家庭也有一箱箱的衣服和折得整整齐齐的床铺。虽然他们的现金收入这样少，他们怎样也要将孩子们打扮得利利落落，而且很引人注目。当见到那些坐在驴背上出入于延安公路上的农家女打扮得那么漂亮，我常常也感到惊异哩。

在柳林，所有的田地、果园、水坝、灌溉工程、建筑物、工厂和牲口都是由各大队和生产队共同拥有的。由此推算，公社积聚的资金实在较流动的现金收入大得多。所以，可以预料，当国家的工农业基本建设一旦完成，以及消费货品能吸取更多的现金进账之时，他们必定可以换取更多收入。

集体所有制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教育农民对这个制度忠信不渝和保持满腔热忱。最低限度在柳林公社里，已经切切实实取得的利益，加上能清楚地看到由他们的集体努力所创造的新财富，确实使人们充满信心去实现他们订下的计划。而且，每个人对这些计划都了如指掌。

在我离开柳林之前，我参观了柳林大队的幼儿园和托婴院，这是一个高踞于绝壁之上的窑洞，负责人是老李的一个女儿——现在可以称她为陈夫人了。到访时，她正在悉心教导孩子们学习社会主义互助的初步知识。看到这里，大概有人会在心底升起这个疑问——在洞里的托婴院吗？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们解释一下。陕西地区的“窑洞”并不是在地下挖掘的地洞，而是“在山里的房子”。除了外貌稍逊

之外，窑洞实在较一般的农舍更优越：夏天较乾燥和凉爽，冬天则较温暖。在赤黄色的黄土坡上掘成的屋前平台，使窑洞看起来格外悦目；烟囱都是斜斜地自土壁中向外伸出；窑洞之内都有圆拱形的天花板；宽大窗子的顶部也呈圆拱形，它们给窑洞以充足的光线。通常，一间住宅是由两间以上的房子串联而成。

陈夫人的房子打扫得很洁净，她料理的孩子们也穿着得整齐乾淨，甚至周围的成年人也是这样——连指甲也异常清洁哩。（陕西的农民有清洁的指甲吗？单这一项已是一个革命了。）过去，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赤痢的病者。陈夫人说已一年没有这种症状发生了。一个负责公共卫生的护士每周到此巡视一次；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注射疫苗。在他们当中，我看不到有人患上以前非常流行的颗粒性结膜炎。孩子们显然有足够的营养，而且非常健康，他们的行动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他们身上穿着价廉而又美观的工人装，颜色和设计各有不同；女孩子们在短发上束着红色的丝带；男童们则把头发剃得光光的，个个笑容满脸，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

这次，轮到孩子们接待我了；幼儿们用力拉着我的手和上衣，拖着我去参观他们堆起来的南瓜和玉蜀黍；这些东西由他们负责看守，而且是由他们自己搬运到山上来的。他们所用的梳子、牙刷、脸盆和毛巾都整齐地排列在一些号召搞好健康的标语之下，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碗筷，他们的食物除了粥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并定时分配鸡蛋；婴儿们每星期更有两次牛奶供应。

如在许多农村地区一样，柳林地区的社办托儿所只是在忙

碌的插秧季节和收割季节才办起来的，因为在农忙季节中，母亲们都要全力投身于工作中去。但大部分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一样都是日托；农民夫妇于早上放下孩子，完工后便领回家去。

在本章里，我已详尽地描述了两个人民公社的情况，它们足以代表我另外访问过的九个人民公社，只不过黄冈公社是最富裕的公社之一，而柳林公社却是最穷的一个。在我所访问过的诸公社之中，搞得最好的是地处上海附近的马桥公社，这是一个十分先进和繁荣的大农场，其产品足可以媲美任何美国的大农庄。由于它较平均的地区先进得多，所以如果着重评述它则会使人误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在这里也不提在哈尔滨郊区参观过的那个高度机械化的国家农场的情况。

国营农场的经营就象工厂一样，职工们都是受薪工人，他们是没有私有权的。据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出，这种农场是走在集体所有制之前的另一阶段；他们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已经拥有“共产主义的要素”。农场工人们一般领取很高的工资，大约与工厂里的工人不相上下，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互助农场的工人高得多。

早于一九五〇年，东北地区已组织和建立了一小部分模范的国营农场——这个地区的大型小麦场和牧牛场最先是由白俄罗斯人开设的。不久之后，这种国营农场便推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些不毛之地，内蒙古和云南也跟着发展起来。自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国营农场的面积已增大了一倍，但是到一九六一年为止，它们的总面积还不过是一千二百五十万英亩左右，或者是少于全中国可耕地的百分之五。大多数的国营农场由于各种基建工程搞得不好，所以都没有受到一九六〇年后期的旱灾

所影响——在这一年，它们宣布收获了二千五百万吨粮食，而且只需要二百八十万工人。若全中国境内的农田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一年的总收成应在五亿五千万吨左右（即一九六〇年估计粮产的三点七倍），并且只要六千万个农业劳动力即可。这样既可以节省出很多劳动力，也可以使粮食大有盈余。国营农场高产稳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施用肥料，它们共计拥有二万八千辆拖拉机和三千三百辆联合收割机；在机械化的程度方面来说，它们较人民公社高出约五倍之多。

我在上文曾经指出：在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巡回式的旅行，使我较为了解这个国家分散得极广的地区的情况。然而，我尚未敢自称为熟悉“中国境内每一个地区”的人民怎样工作和吃什么粮食的权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个当时居于澳门的名为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先生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境内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是空着肚子，集体带着锁链干活”。他还胡说八道地“证实”说：“在人民公社中，脂肪和蛋白质……已成为过去的梦想，……很多公社要求人民每月起码有一半日子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等等。据称，他在澳门获悉中国之内存在着“无数人吃草的事例……吃树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农民被迫连续不停地做二到四天的工作，每天干足二十四小时而没有休息”。

作者本人曾经试过在战时的逃亡人群中审查饥荒情况的经验。当年，在饥荒流行的灾区里，我亲眼目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真真正正吃树皮，吃树叶，甚至吃泥土以充饥。但他们却绝对不可能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或者二十四小时！

一九六一年初，这个艾尔索普先生又匆匆到香港一游，然

后又发表了一则更具“内幕性”的报道——中国人饿至要吃胎胞充饥！

事实证明，这种谣言实在是不值一晒的。

黄河之水今变蓝

我们自西安乘搭夜间开出的快车飞驰往一个新建的城市——三门峡去，在这里，人类终于使桀骜不驯的黄河戴上了一条节流器。一些人认为这是亚洲东部目前最雄壮，最蔚为奇观的独立工程上的杰出成就。

若我们假设中国的已知历史和文明为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那末共产党建立政权至今只是其中的五分钟左右。按此比例，中国历史上统治得最长的朝代则几达五小时之久。那些发现这个国家或它的历史上有任何值得羡慕的事物的人们，一定会对这“五分钟”在改变大地的模样所作出的两种卓越的成就上，感到莫大的快慰。这两种改变在乘飞机往下望时，最能看得彻底：（一）即我在上文提及过的数之不尽的水库；（二）那些即将成林的幼树——密麻麻的满布于一度曾是光秃秃的山坡；排列于河流、运河、公路和铁路的两侧；并且逐渐将中国北部的沙漠推出国境去。

前些时候，我曾经参观过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现在又越来越接近三门峡水库了；这三个水库是一系列大型的、新的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一部分，统属于一个全国性的建设计划中；这个计划包括了要兴建四百条主要的水坝，其中部分已在施工，其他的都已处于设计阶段。自一九五〇年到今日这十年中，中

国的水力发电总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二十五位跃至如今的世界第七位，即仅次于法国。与此同时，无数劳动的巨手在解放后的十二年内，建筑了一百多万个类似柳林公社中的小型水库或水塘，并且挖掘了九百万口井。他们同时还发展和扩建了无数的运河和可供耕作的盆地，使可灌溉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亿二千万英亩。

但是，要永远地、巩固地达成整个水利计划，还要等待大面积的新植林区中的幼树成长起来，以阻遏暴雨的破坏。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〇年之间，中国培养了五千多个造林专家，而且还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森林服务中心。在陕北地区，我看到一条长达三百六十英里的大型防风林带的南端，这条防风林带横亘在黄河以北，阻挡着自戈壁沙漠刮来的风沙。在这条林带之北，另外有一条由内蒙古一直至东北省份、长达七百二十英里的防护林带，亦已完成了一半以上。在其他地区，大部分的植林工作是由农村人民公社负担起来，但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实在都有参加植林运动，并且每年依然按分配种植着自己一份的树苗。大多数的集体单位和生产大队，现在都已有树苗培育场，人们在那里细心培育和耕耘着数以亿万计的种籽和树苗。

在西北地区的柴达木盆地附近，大量的新资源已被开发，工业也飞速发展，所以，那里正致力于开垦盆地边缘的土地，增加生产，以养活越来越增长的人口。据报道，自一九五五年以来，该区域已成功地将十五万英亩的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地，自一九四九年来，便由退伍军人和其他青年人建设了一百四十几个高度机械化的国营农场。革命

后所开垦的三千万英亩的农田中，很大部分就是处于这个地区和内蒙古。据最新的消息透露，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间，整个中国新植及重植的面积达五千一百万公顷——为英国全国面积的两倍。

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和工业展览馆里，我不但见到所有的大型水利建设系统的模型，更看到很多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工程，其中很多已竣工，它们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中。一个立体模型展示了一个长远的水利建设计划：这就是要建设一个最终可环绕中国的运河系统——从东北地区最北的国界直抵云南，又从北京到达中亚细亚；使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都由水路连贯起来，并且使货船和客船可直通各地。这个计划当然十分艰巨，其中包括了要使长江上游支流的河水，自西藏东部转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按：即指大戈壁沙漠）。当然，要描绘未来的图画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要实行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然而，这些计划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早日将它们变为现实，中国已经进行了若干重要的步骤。有很多成就只是在本地发表，外边世界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在一些小国家，甚至象印度那样的大国里，它们已经可以称为大事件有余了。

“对，对，对，三门峡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当我们接近这个新都市时，路易·艾黎感叹地说：“但是，你若要真正看到这个国家所解放出来的创造力，你一定要看看在所有边远地区里所建设起来的许多小三门峡，如延安——如云南等，这些小三门峡，每一个都代表着各处的人民为了建设祖国而作出的奋斗。”那些整天忧虑着中国可能会发动侵略战争的杞人们可以

在路易·艾黎的新作，《中国的内陆》一书，以及书中叙述的无数真实的无名英雄的工作故事中，找出一些有吸引力的消息：即中国全国的巨大人力资源，目前正全部投身于建设活动中去。而这些活动是使全世界都感到欣慰的——当然，除非这种发展会象私人资本主义的白人世界那样，一定会导致战争，那又该当别论。

在一九五六年时，三门峡市只不过是一个沉寂的乡村，当时名叫淮县，地处河南和山西的边界。现在，它在不知不觉间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七万人口的都市，并且还将有许多人会迁到此地。由于淮县距三门峡最近，也是火车路线最接近三门峡之地，所以被选作为工程的基地。由此之故，西安——郑州的铁路主干线要改铺路轨，以便经过三门峡市。此外，为了方便工人到水坝和水库工作，以及使铁路干线能直接替西北的新油田服务，西安——郑州线便加速建成双轨线，而且一直通到兰州。三门峡水坝建成后，形成了一个长达一百九十四英里的水库，它的另一边竟到达西安市的郊外。我获悉该水库目前已是中国的第二大湖。

在三门峡市来说，什么事情也只是开始，离完成之日尚远，但市内已建好了宽阔的平坦笔直的柏油路，路旁尽是一幢幢尚未竣工的红砖建筑物。柏油路通往许多新建的机构和工厂：如铁道工厂，铁道分局等；还有一些支线通往钢铁厂，汽车修配厂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矿企业，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时间前往视察。我到此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到水坝上去。我们匆匆赶到宾馆，便忙着安顿行李。宾馆是一间朴素的建筑物，与其他同型的建筑绕着一个庭院和花园而建，中央是一间茶室。

吃过了火腿和鸡蛋的早餐后，我们坐上一辆新“福特”牌小轿车，穿过了一条泥路，然后突然转入一条铺得极好的碎石路，接着立即便驶上峻峭的山区。公路的转弯很急速，但是防护堤建得很好。司机驾驶得很快，沿途的景色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一边是深邃的山谷，另一边那高高的山地——黄土梯田好象直上重霄，牧羊人和放牛者的轮廓隐约出现天际。突然，我远远看到一群为数约一百个，带着白色兜帽和披着白色披肩，活象三K党徒的人们向我们这边走来。我坚持要停车拍一些照片。

这些是什么人呢？和尚？犯人？是男还是女？我们蜂拥到他们那里，发现有一半人在喝着茶。我们走到一个坐在阴地乘凉的人面前，和他攀谈起来，得悉他们在附近石壁上埋炸药爆取石头。他们的毛披肩是用来保护他们，免被飞出来的碎石所伤害的。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曾怀疑他们是和尚。他们听罢都把披肩脱去，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只是坝上的一个工作队而已。

当车子驶出峡谷口之后，我们来到一块美丽的高原耕地；不久便到达一个峭壁的边缘，车子就在此停下。接待员秦先生促我下车，并带我到绝岭崖边。在我们之下一千英尺左右，一条宽阔的拦截了黄河最窄河面的新水坝两边，大面积的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蓝得象爱琴海的海水一样。

“我们的黄龙已改变颜色了，”秦先生微笑着说。“黄河已经被制服了！”

畅游三门峡

或许只有中国人或曾目睹黄河过去狂暴的人，才会觉得三门峡的水闸胜利地把黄河水截停下来是特别使人兴奋激动的。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三门峡水坝并不单是在黄河上多建一座拦河坝，或在全国的总发电量上增加一百二十万千瓦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自古以来便存在着的悲剧，到今天已获得了愉快终结的开端。

“即使人民政府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即使它在明天便即灭亡，”有人在水坝参观留言簿上这样写道：“中华民族将会在未来的一千年内满怀感激地记忆着它，因为它征服了黄河！”三门峡水坝是黄河上四十六条“级型”水坝中的第三十七条，但也是最重要的控制点。这四十六条水坝横卧于高二千五百英尺、长二千英里的梯级之中，凭着它们的威力，中国人民终于征服了黄河。

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但在农业方面而言，黄河的作用是同重要的。黄河流域包括有中国小麦产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棉花产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烟叶产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七。黄河发源于西藏贴邻的青海省，向东流经甘肃省，然后突然北转流进内蒙古，跟着向南奔驰于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的深邃峡谷，最后折往东北流经河南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的平原，并于山东省注入渤海之中。黄河出口处在天津市以南；在结束它那近三千英里的流程时，黄河每年为渤海湾沿岸增添十四平方英里的新土地。在很多地区里，它挟带的沙泥所遗下的沉淀

达(美国)加拉多河的二十倍。有史以来,它曾二十六次改道;在过去一百年中,黄河的泛滥超过了二百次。

到一九五〇年时,由于这条河一向习惯所影响,加上多年来执政当局疏于保护和料理,更加上大自然所给予的天然控制被胡乱破坏,造成了我在上文提及过的严重问题:如西北的高原和耕地变得全无树木,过度的畜牧破坏了草的生长,土地干燥,完全不能贮存水份,等等。黄河流域一带的雨水有一半在七月到八月之中降下。这时候,一年一度的湍急洪水将更多的泥土,天然的磷酸盐和硝酸盐冲进河道里,并由水流带到华中平原去。在山东地区,黄河的河床竟然较周围的土地高出二十到二十五英尺,我曾经见到帆船高高地在这里的河道上行驶。过去,即使河流的流量正常,人们也要花巨大的劳动力来防止河流泛滥。他们在过去的年代中,要不停地进行科林斯王式的劳动。

治理和驯服黄河所必要采取的部分急切措施,已于多年前由一群美国的救灾工程师们所预见了,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O·J·托德。过去,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曾经尝试过实行大规模的治理黄河的工程。一九五四年,北京政府设立了一个黄河计划委员会,治理黄河的战鼓擂响了。大规模的测量工作在黄河上、中、下游一起展开;一九五五年,一个综合的黄河大计完成了;当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实际的工程按时在一九五六年展开。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国已可以宣布它已经(提前一年)“基本上”征服了“海龙王”——这是多世纪以来迷信的人们所幻想出的管理一切湖海江河的“天神”,黄河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乖乖地屈服于人类的手中。

但是，这个胜利还是来得晚了几个月。早于一九六〇年的夏天，三门峡水坝已经竣工，并可以挡住黄河任何巨大的洪峰——但这年的困难却不是这样。反常地，这一年全无降雨，更无洪水泛滥；在居住着五千七百万人口的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包括整个山东省在内，竟然有几个星期看不到河流——黄河消失了。在一九六〇年，整个华北遭到了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直到十月份，当我见到这个大湖终于得到一股由来得太迟的秋季暴雨所形成的水流所注满时，下游地区焦裂的农田已使秋收遭到极大的损失。

三门峡水坝可以说是中国内最伟大的劳力(The Grandest Coolie) 或者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大古力(The Grand Coulee)，在意义上和字的拼法上也是真实的。与美国这条最大的混凝土水坝比较，三门峡水坝主要是防旱和制服河流的工程。它所产生的电力只有大古力的百分之六十，但它的水库容积却达三百六十亿立方公尺，即较诸大古力和博尔德两水坝的总蓄水量还要多。在一九六〇年来说，三门峡水库是世界上第三大水库。三门峡水库计划要供水灌溉六百六十万英亩的土地，并防止这地区发生任何的水灾。

黄河之上的第二大水坝位于甘肃省的兰州市，发电量与三门峡相等，但准备于一九六三年才可应用。其他三座中型的水坝及其水库，还有四十一座较小规模的——有些已经完工了——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水库系统，它们的总储水量将较黄河全年的流量还要大。整个水坝和水力发电系统预算于一九六七年全部竣工。计划完成后，单就黄河上的水力发电总量便达到二千三百万瓩，即全年可输出一千一亿瓩的电力。这个数字

是中国在战前的总发电量的四倍，也就是印度一九六〇年全国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

然而，倘若没有巨大的增补的努力，这个计划将难以完全实行，也不可能象预算那样将中国三分之一的耕地的产量最终提高一倍。假如在这块居住着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土地上，土壤流失的难题不是同时解决的话，那么所有用以发电的水坝和水库的生命，将会如昙花一现那样短暂。

一些地区早在十年前便展开了解决淤泥充塞和土壤利用合理化的运动。这种劳动只有象(希腊神话中的大力之神)赫克力斯那样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但中国人已用双手做出来了；整个过程包括：① 重植和新植树林，开辟果园，广栽果树等——这个项目的面积已达一万五千平方英里；② 保护土壤和水份，广泛开垦梯田，挖濠沟以及加固堤坝等——这个项目的面积更达二万二千平方英里；③ 在四千平方英里的斜坡上，展开了筑泥坝，挖小池塘的工作；④ 在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轮番种植农作物和草类，并且将五万平方英里的畜牧地区重新铺养草皮，作出种种的改善。

在上述的地区之内，提着铲子、锄头、扁担的农民大军共同作战；整个计划共需要建筑九十五万道大小水坝，堤防及沉积淤泥的盆地；还要挖掘三万七千个总容积达三门峡水库三分之二的水塘和水坑。很多小型的水坝已用来发电供应本地区，当然也用来灌溉田地和作护土之用，柳林公社所见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沉积的泥土可用来帮助开垦荒地和沙漠，而长成的树林带就象威风凛凛的军士一样，防止北方大沙漠的风沙南侵。整个黄河流域的水田将增加七倍。

话又说回来，虽然控制系统的确可以造出人间奇迹，但它们却不能造出天雨来。即使在雨量充足的年份里，黄河流域的水始终是不足够的。中国的耕地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一属于黄河流域，但是这条河流的水量只得全国流量的百分之七；长江流域环抱着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但它所得的流量却是全国流量的百分之七十六。为了解决水源问题，中国的工程师们已完成了一个惊人计划的测量工作：这就是把长江的上游分支，将近二十亿立方米的水注进黄河中去。这样一来，黄河的流量将增加四倍。

长江分支的计划将是亚洲最大的建筑工程。这个计划要建设四条大水坝——每条都要比三门峡水坝更大。其中处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的三峡水坝，将是发电、防洪、灌溉和航运的综合利用水坝。它的发电量达四百万瓩，较世界上现存的任何发电厂更大。这个包括一系列长江上游的拦河坝的联合系统，将为中国的总发电量增加一千八百二十五万瓩。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看来，将长江分家以及在长江上建造水坝，两者都是巨大的工程。在中国来说，它们更表示要将资金与工程资源集中起来，而且在目前估计，国外来的技术与材料援助将会有限得很。由于缺乏先进国家的支援，两个计划在一九六二年打后一段时期内，进展得很缓慢。

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中国的工程师们在毫无外援，全部自己动手的情况下，成功地建造了另外十九个现代化的水力发电系统。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浙江省境内可发电达五十八万瓩的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全部用中国首次制造的巨型发电机装备，各机的发电量分别是七万五千和十万瓩。近几年

来，中国工程师还用中国出产的装备，建设了千千万万个较小型的火力发电站。三门峡水电站的发电量由于高达一百二十万千瓦，所以计划要采用八个十五万千瓦发电量的发电机。然而，中国当时尚未能出产这样巨大的发电机，所以要向苏联订购。在我访问时，只有一部运抵此地。若苏联拒绝将发电机继续运来，黄河计划中的发电部分必然会拖迟——其他依赖苏联进口物资的大工程也肯定会如此——但中国预算最迟于一九六三年便可以制造这种巨型发电机了。（按〔一九七〇年〕：苏联果然背信，片面撕毁合约，拒绝将发电机及其他主要部件运给中国；三门峡水电站被迫要押后几年才正式完成。但兰州大坝却能及时将充足的电力与水力供应给建于这个甘肃省省会附近的气扩散工厂使用。这个厂出产了制造中国第一个原子弹（一九六四年）所必需的分裂原素及后期的核子机械。在作者执笔写这段补按时，三门峡水坝已供电多时，但尚未能全面供应。）

工地姓周的总负责人亲自带我参观三门峡坝内迷宫似的层层建筑。“这是一座价值无匹的工地大学，”周先生对我说道。“四年来，我们这里已训练了数以百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这批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可要忙于为国家兴建水坝和水力发电站，以及为国家训练人才哩。”

直接受雇于三门峡计划的工人达二万一千人，其中包括二千名女性。中国第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水库——官厅水库——建于一九五四年，但面积与发电量只得三门峡水库的十分之一。它需要六万名工人，在兴建中的一个时期，还要一师部队协助挖掘工作。三门峡水库工地的技工大多数从官厅水库中取得基本的训练，但在目前，他们已变成了一支机械化的队伍，主要

用中国制造的装备武装，但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机器和工具。

工人们的薪金分别由四十元到一百元，平均额为六十元；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工程师的薪额则从一百五十元到二百五十元不等；半工读学徒的工薪由二十元开始。房租、用具、医药、电影、戏剧和俱乐部等，都是免费供应的；工人们的工作服、头盔、纱网眼镜和鞋子等，也是由国家免费供应。他们主要的支出是伙食费，每月约要支出十二到十五元左右。

工地上到处挂着照明用的射灯，工程分班日以继夜地进行。宣传站上的扩音器轮番播送着戏曲及交响音乐，鼓励性的口号和上级的指示。纵目四视，但见钢梁上满挂着红色的标语；微风轻拂，红旗招展；不时还见到一队队敲锣打鼓的工人，前往祝贺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作者。

“黄河清，圣人出！”一条巨型标语自一个悬崖上垂下来，写着这句中国古代农民的传言。“圣人已出现：这就是中国人民！”

过去，三门峡里的“三门”都是由河道之中的小岛及两旁的峭壁所形成的狭窄水道；它们的名称是“人门”，“神门”和“龙门”。现在，这些小岛已被水坝的大口所吞噬了。因此，另一条挂在竹架的舞台上的标语自豪地说道：“神门何在？龙门何在？唯有人门留下来！”

我停步为一个电焊工拍了一张彩色照片，他的电焊枪正在喷发着闪闪的银光；然后，我请他脱下头盔为他造像。“他”竟然是一个露着牙齿笑着的、短发的姑娘，样子很漂亮。双亲呢？一个公社的农民。喜欢目前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呢？她努力工作，成绩很优异。但她正在参加工地举办的业余大学，希望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就象她之前的许多人一样。

后来我要求走上那部巨型的起重机上看看那里的工人，我想他们的工作是整个工程中最重要，下面数以百计的人们的生命，可以说是有赖于他们工作的准确性。周乐呵呵地带我踏上一部快速升降机，上升到一百英尺以上的平台。我步出一看，整个水库和水坝的壮丽全景尽收眼底。被困在水库中的黄河水，通过一堵水闸咆哮翻腾而下，滚滚东流；闸旁正兴建着一条运河，它要凿通那些坚实的岩石，用以绕过水坝，接通水库及坝下的河道。运河建成后，下游的电船也可以通过一道道的水闸进入水库中去。我站在一条跳板上，俯视下边的工地，只见那起重机的铁臂正提着一条重达二百吨的钢筋混凝土的横梁，慢慢地、准确地放在巨大的支柱之间；那里，装嵌工和电焊工们正准备展开工作。

当我进入控制室时，我发现起重机的二车和三车是由两位年约二十二岁的姑娘担任。身材较矮细的那一位有点儿害羞，她是唐山市的小学毕业生，相貌平平，但双眼充满神采；剪短发，未婚。她曾经接受过考试，才获得现在这份工作，来此之前，曾在官厅水库工作了一年。父亲呢？一个矿工。“从我第一次见到一架起重机之时起——那是在一部电影中——我便决心要当一名起重机操作员。通过学习，我掌握了技术。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另一位姑娘是出身贫农的孤儿，她的想法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里有多少妇女操作起重机，但在中国，人们似乎认为她们较男性更适合于这种工作。

我与周一起驾车前往参观工人新村——大安村。在黄河两岸，许多悬崖绝壁一直升高到三千英尺高的黄土高原之上；许多农民目前还住在山壁上的窑洞里——也就是这些农民，他们

从前年年都要拜祭海龙王，祈求不要在黄河泛滥的哩。数年前，住在这些穷山僻壤里的人民何曾见过汽车？现在，他们的儿子驾驶着一辆辆的大型货车，纵横驰骋，有些当上了医生，为民治病；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和外省来的、有知识的工人结成夫妇。一些工人将会定居于此，其他的则会迁徙他方，担任另一项工作。时间在刹那间象飞越了一万年。

“为了建造三门峡水库，近五十万人要大迁徙，”周对我说道：“起初，我们要耐心地向人们解释‘一家迁离三门谷，万人生活获幸福’这句口号的含义。现在，本地已经建立了渔业和造船工业，新的城镇沿着湖边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里将会出产很多鲜鱼，还会建立罐头工厂——这将是一件大事啊。我们离开后，服务性的工业将会继续发展、扩大。看看大安吧——从前，谁能够在岸边居住呢？洪水一来就没命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的湖港。它将变成一个风景旅游胜地；此外，它还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

大安是为安置水坝上的工人们而建设的，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建筑的小镇；一个建设委员会负责审查一切的建筑物。笔直的街道上还未铺上三合土，主要是因为安装各种地下管道和电线，但电话和街灯已经接通。目前，大安的人口已达二万七千人，它被组织成一个城乡混合的城市，将四周的土地开垦成农田。在这城市上的山坡，还有数约六千的人民居住在窑洞里——现在都由爱迪生先生的神灯所照亮了！

在一间屋子里，我遇到了一个自少便当铁路工人，现年已五十四岁的男子；经过了八年的业余学习之后，刚好考得了工程师的资格的他自豪地将证书拿给我们看。在另一处地方，我

停下来准备为两个洋娃娃似的孩子照相。较美丽的那个女孩子有着一双慧黠的大黑眼睛，烫过的头发上扎着两条丝带，显得分外惹人怜爱，但她拒绝和我合作。“我不要拍照，”她坚决的说，并且把脸藏在双手之后，但是却接着咕咕的笑起来。甚至连认识她父母的老周都没有办法哄服她。

“她常常是这样的，”周和蔼地说道：“但她可聪明哩。将来大概可以当个演员吧。”

我们随便地访问了另一间平房，那里一位女工人正在准备着午饭。她在坝上工作时摔伤了腿，所以留在家中疗养。当我与她交谈时，周抬头打量了一下屋里的情况，然后走到一帧家庭照片之前定神细看。“这个男子是你的亲人吗？”他突然地问她。是的，他是一个表亲。周说他俩是老朋友，以前他们在同一部门工作。然后，他便与她扯起家常，谈论彼此都认识的熟人来；分手时，他们已经熟落得象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呀。不久后，类似的情况又再发生。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个缠足的老太太，于是我跟她打个招呼，倾谈了一会。她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和媳妇都在坝上工作。她热情的向老周问好，因此我问周是否与她相识。

“是的，”他说：“她是一间工程实验室里的清洁女工。”

那么，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跟他一道相处了两天，才腾出时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相貌平平，身材瘦削结实，神采飞扬，牙齿有点突出，唇厚：这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简短明快地回答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我记得他未曾在我面前提过美帝国主义的字眼。

“看看我能不能猜出你个人的历史吧，”当我们在小食店坐下喝茶歇脚时，我这样说。路易·艾黎却躲到一边打瞌睡去了。周蜜有兴趣地听我说。“不用说，你一定是一个老兵，虽然按照年纪看，你不可能是一个长征战士，但你一定是个老兵。环境使你要拿起枪杆子杀过一些人，如日本人及一些其他人等。你看过、尝试过许多饥饿的痛苦——你的年纪足可以使你明瞭‘需要’和‘需要去干’之间的分别。你是在那一个阶段来到这里的？”

“猜得不错哇。对，我是一个军人——曾经受过伤——差点儿没命了。我的父母是小地主，但是我只上过三年学校。我家就是毁在日本人的手里。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然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后来我在广州一个部队中当了司令员。之后，党将我送到党校学习。那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的爱人；她也是党的工作人员。离校后，我被调往领导协助建设官厅水库的部队。这就是我成为建坝‘专家’的前因后果。”说着，他不禁笑起来。“当然，在实践的同时，我也不停地钻研工程技术。后来党将我派来三门峡，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一直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你算是军队的官员还是党的负责人呢？”

“我同时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我真正的上级是现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

“噢，那么说，你是替败在你手下的将军工作罗？”

他微笑不答。傅作义将军是华北最后投降的一个将军。平津战役时，他据守北京一个月并派人跟围困北京的解放军谈判，要求宽待他的手下和他本人，作为和平解放的条件。（在历史上，北京象巴黎一样，都是先被围困，然后和平投降的。）他并

不是一个民主展览橱窗中的挂名部长，他工作非常努力，受到广泛的尊敬，被誉为一个能干的领导。

当天下午暮色将临之际，我们驱车返城中；路上，我们经过了一队队扛着铲子和农具的青年男女，他们时而手挽手而行，偶然也有些人攀在拖拉机或装满蔬菜的货车上；时而以红旗为前导，迈着军人般的步伐，唱着歌曲并肩前进。他们是来自新城技术学校的学生和工厂里的工人，下放到农村中参加收割工作，人人都显得很健壮。

返抵旅店后，我们匆匆收拾好行李，然后驱车往火车站。三门峡的一切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洛 阳 与 郑 州

洛阳的历史已超过三千年之久；自周朝开始，它便连续数代成为中国的首都。由古旧的城墙环抱着的旧城以及城内窄窄的街道，仍然构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但是现在洛阳古城周围，满布着新建的住宅区和工业区，容纳了洛阳市六十万居民的大部分，他们就在新区的新企业中工作。在一九四八年，洛阳人口只有八万人，更无现代化的工业。但是洛阳附近的煤和铁的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人民政府决定将洛阳变成一个“重要的生产城市”。

市内最大和最重要的新企业，是拥有二万三千名工人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工厂的周围现已建筑了一个新的模范卫星城市，那里有很多购物中心，宽阔的三合土街道和行人道，以及可容纳十万人的优美住宅区。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拖拉机厂。

我参观时，它的流水作业装配线工作得很顺利。一九五九年的产量是一万五千部拖拉机，而一九六〇年的指标是三万辆。

拖拉机上的一切部件——从轮轨到发动机都是在洛阳制造的，该厂的平常装配速度是每十九分钟完成一辆拖拉机。“现在，我们几分钟便可以生产一部‘东风牌’拖拉机了，”厂长对我说。‘东风’是一种结构坚固的多用机器，发动机有五十四马力，附有拖拉、泵水和发电等等部件。厂长指出每部东风牌拖拉机的售价为二万一千元（约等于八千四百美元），从这个数字可以约略看出中国机车制造业目前的生产成本。

这里，工人的薪金较一般的国营工厂低一些。据称平均月薪只有四十元，最高薪的工程师（“每个车间有一到三个”）可获二百八十元。学徒的薪金由二十一元起。房租（现代化的住宅，有厨房，有花洒浴室）每月只需缴付六角钱。每个工人的伙食费平均是十到十二元左右。厂内工人的医药费全免，家属则收半费。医疗费、退休金及其他福利支出由福利基金拨出，每个工人要将薪金的百分之一·五到百分之三拿出来作为福利基金费。

我只参观了这个大型工厂的四分之一。厂长告诉我，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能够再建造象第一拖拉机厂这样的工厂了。一个同类型的工厂计划于一九六二年在包头市竣工。规模略小的拖拉机厂在上海和东北都建设起来了；甚至在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的昆明市，我也看到了当地工人已能制造出打谷机。

一天下午，我访问了洛阳一所小学校。该校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名学生和四十八位教职员工。校舍是新的砖砌建筑，学校后面有一片菜园。校长是一位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亲自领我

参观了该校二十四个课室和五个工作间的一部分，沿途还指着墙上的标语给我们看。部分标语和工厂内见到的相同，其中有些写着：“敢想！”“敢干！”“敢创新！”

“我们自从于一九五七年开始将实际工作与课堂学习相结合后，”校长指出：“优异生的百分率就从百分之七十九跃升至百分之九十三。实践给予他们新的创造力。”

九岁以上的学生每星期规定要在车间里劳动两小时，但很多人自愿干更长的时间。这种工学结合的教育方法，与堪萨斯市的诺尔曼学校一向实行的手艺和烹饪训练班的制度，没有多大差别。但在中国来说，这还是一个新的尝试。车间工作的种类繁多，产品各式各样，统由学校负责外售，利润拨作学校的福利基金。每一班都选出一位同学负责管理，以收监督之效。在小车间里，我看到男女同学们正在制造小型座台收音机的部件，同时还进行装嵌工作；在一位老师监督之下，有些学生在混制和包装一种专利的止痛药；有些人还在制造家什和陶器。

在洛阳市郊区，我参观了一个很大的农村生产大队——古城大队，它由五十个生产小队组合而成，共有队员约二万人。古城大队是洛北公社的一部分，前身是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据干部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指出，在过去的三百天之内，河南省只下过十四天雨；总降雨量不足四十毫米。这是五十年来最早的一年，但据称湖南省该年度的粮产仍然可以自给而无需外援。凭着新建的运河和深井系统，湖南省的水田现已达一千万亩。

在一块番茄田的中央，我为了摄取运河的照片，结果远远拉在主人们的后面。一位皮肤晒得黝黑、赤着上身、肩上搭着

一件外衣的老农民，站在一旁凝视着我。他是本地人吗？我走上前跟他搭讪的问。是的，他还有一个兄弟。在土地改革时，他们分到土地吗？他指了指运河的彼岸，那里有几个男女农民正在整理着一块种着椰菜和菠菜的土地。那块地就是了。好地吗？

“好极了。我们两家人共分得六亩田。”

“现在归属于全村了吧？”

“它是队里的一部分哩。”

“现在的产量较你本人自耕时增多还是减少了呢？”

“呵呵！增加了四倍！那年头，我们还未挖掘这条运河，而且谁有能力购买肥料，哪里来电力，哪里有拖拉机呢？”在拖拉机站里，我曾经见到有六部拖拉机和一部联合收割机——这只是公社各队共有的三十四部拖拉机和六部联合收割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结婚了吗？”

老汉说他年纪很大才结婚，他们现已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在城里的中学念书，另一个还在念小学。他祖先的墓地现在怎么样呢？他指着一丛树林，但没有加以解释。总的来说，事情有好转还是差了呢？

“我最喜欢还是初次分得田地那个时刻。”他穿上了外衣，耸耸肩，举步离去。但他又转过身来，向着我说道：“但当然，所有这些——”他的手扫过了运河，扫过了田地，指了指远方的发电厂。他微笑了。“倘若没有这条运河，在这个年头我们准会饿死了。年轻人们大概是对的。”

从洛阳往东去，几小时便可以到达郑州。我们在这个古城

逗留了两天；然而，郑州古城也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黄河之水变青色，古城郑州换新装。

以下是我写于郑州的日记片断：

郑州，九月二十七日。六时闻歌而起。宾馆是干部秋季训练的总部。他们清早起床便高唱革命歌曲，然后到花园中运动。他们可自由选择打太极拳或做传统的体操。

郑州的住宅区是我在中国内所看到的发展得最成功的。古城墙已全部拆除掉。新的街道宽阔绰约，新建筑物占地宽广，景色宜人。主要的道路交叉点都有公园般的广场，栽满各种各样的花朵，如向日葵等，另外一些还满植萝卜、椰菜、玉蜀黍及马铃薯等作物。路旁更有一丛丛的翠菊、玫瑰、剑兰和蜀葵。五分之四的人口据说现在已住进新房子里，这些住宅区大多数是三四层高的砖砌楼宇，通常聚建于工厂区的周围。郑州市新建了九所戏院和六所歌剧院。街道上的自行车队远较北京为多，商店的货品很丰富。

在一条满是新建筑物的新辟大道上，一辆辆胶轮货车鳞次栉比，排满路上，装满着——啊！砖，砖，还是更多的砖！此外，还有灰泥、沙、石灰、一袋袋的水泥、青萝卜、椰菜、苹果、马铃薯、番茄、纸皮箱、纸张、钢筋、化学产品、收音机、布匹、家什杂物、浴缸、摩打、坐厕、电视机、煤——和小孩。拉车和推车的除了职业工人之外，还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红领巾等；他们肩上挂着一条绳子，时而唱歌，时而随着红旗前进；一些家庭主妇将公社的产品拉往街市去；职业车工拉的车子载重特大，肩膀上都披上了垫子。东北制的货车拖着三四辆拖车在后面，上面放着来自农村或工厂数以吨计的

产品——铁丝、农具、一捆捆的棉花。一架装置有推进器的巨型起重机在路上慢慢行驶，它那活象长颈鹿的颈一般的吊臂，伸到二十到三十英尺之前；为了保护路面免受损伤，一群男孩子将厚厚的布条放在路面上，让起重机的轮轨辗过。在竹排栅林立，尚未完工的建筑物之间的旷地上，牧羊人优悠地放牧着一群群绵羊和山羊；在疏疏落落的小池塘里，又是挤满了一群群鸭子，它们对这个发展到本地来的市镇，象是漠不关心似的。年老缠足的妇女摇摇晃晃地坐在驴背上，时刻有被拖车、货车和胶轮运输车撞倒的危险。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两旁尽是现代化的、加利福利亚——西班牙式的建筑物，屋子外是一堵矮矮的围墙，一道月亮型的小门通往屋前的花园中去：窗子是百叶窗子——窗台上还摆着一盆盆鲜花。什么人住在这些地方呢？“知识分子，”国际旅行社的向导薛先生回答说。

* * *

在参观完一个大规模的(二千五百名工人)纺织机械制造厂之后——这里的产品都是特别指定运往北越的，我停下步来参观了一些铁道工厂。在那里，我获悉当地有一个由农村人民公社开设的、完全由妇女们负责的棉被和衣服制造厂；在提出要求后，我获准前往参观。大多数的女工人都是在附近的火车修理厂中工作的铁道工人的家属。厂的负责人是一名叫郑纪芝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说，当工厂在一九五八年开办时，她们只有十二部缝纫机，八部为工人的私有物，另外四部则是由厂新置的。

车间是一座白色的水泥建筑物，原本是设计来作她们那一区居民集会的会堂。现在她们已共有一百零八部缝纫机，雇请

了二百多个女工人；一九六〇年的生产值平均是每月二万八千元——大部分产品是工作服，小孩子穿的游戏服，和铁道工人的皮外套。她们的薪金按件数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可得二十二元左右。女工人们上全日班，早上八时到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

一些女工人将儿女交给日托所照顾，每月要付一元五角的护理费，午饭费则每月三元。幼儿园的费用与托儿所相同。寄宿生每月要缴六到七元的膳费。和北京最完善的托儿所比较，这里的费用约便宜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他们的膳费并没有超过他们在家所需的费用。但是，托儿费，幼儿园费和其他公众服务概由公社的福利金代付。厂里办有食物部，但每五个人才有一人光顾。这间工场的利润平均是总产品的百分之十五。

参观时，我停步与一位坐在缝纫机后的年轻妇女攀谈起来，并顺便问她的儿女在什么地方。她有两个小的，年纪很小，都在幼儿园里。她对他们的照料感到满意吗？满意极了。他俩都很健康，并且还学习唱歌和跳舞；她自己本身永远也不会教这些事情的。她现在还有时间参加工人业余扫盲班。她丈夫在哪里呢？他本是个铁路工人，但获得了学位，要到北京深造一年。再过几个星期便会回来了。在他离开家庭期间，她怎能用二十二元养活全家呢？在他离职时，厂方照样支付他的薪金给家庭应用。

在离别郑州之前，我访问了最早成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之一。这里，我不打算再谈它的财政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此地的灌溉系统和小型水力发电站已经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区改变成为一个高度繁荣的社会。

在乘火车回北京时，我们在郑州之北几英里的地方横过了滚滚的黄河。新建的郑州黄河大铁桥是一座双轨桥，长达数里，凌空横跨在黄河之上。

沿路上，我看到一丛丛古老大树之下还有无数的坟墓，四周是广阔无际，连绵不断的田野——集体化已将小块的田地抹去，独立耕作的痕迹已踪影全无了。亚洲有个国家——印度，畜有无数“神牛”、“神猴”和“神鼠”，这些动物每年损耗了总粮产的六分之一——但幸好印度人奉行火化。中国北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粮产损失方面而言）：这就是家族的墓地，在中国人居住了千千万万年的黄河流域中，死去的人据说霸占了十分之一的耕地。几年前，党展开了将死者葬在公墓里的运动。很多人纷纷表示欢迎这个转变，但由于部分守旧的农民反对，这种压力松弛下来。就象节育运动一样，要赢得广泛的一致的接纳，是需要时间和教育的。目前，华北各城乡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西方通行的火化，或象中国南方的传统习惯一样，将死人葬在划定为公墓的荒野中去。

在早上十时到黄昏这段时间为止，我们经过了五、六个完全新建的市镇，每个都是围绕着一间小型或中型的钢铁厂而建筑的。他们看来都象是经过完善计划而建成的工业社区：电力照明，街道绿树成荫，二层到三层高的新建筑之间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公园，学校、医院和购物中心。我们乘搭的特别快车没有停站，只是在镇旁掠过。但在一个叫做元氏的新站之南——在我记忆之中，过去，当我经常来往于京郑线时，尚未有该镇存在——火车突然在旷地中紧急煞掣。接着火车慢慢地倒后。当火车停定后，艾黎和我跑出车外，看个究竟。

事情是这样的：当火车开到这里时，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子从路旁飞驰而至，见到火车便欲煞掣暂停，让火车先过；但是他的车掣却不知怎么的失灵了，所以便撞向火车的尾卡。一个乘务员凑巧看到这件意外，于是便马上向车长报告。列车上的急救队马上用担架把该受伤的男子抬到火车上，并打电话与元氏站联络。当列车抵达元氏时，车长下令作例外停车，那里已经有一辆救伤车在站上等候，伤者马上被送到医院里去。（在我的记忆中，我回想起过去曾见到一辆货车把一位“苦力”撞倒，司机却停也不停便开车走了。）由于发生这次意外事件，我们的列车误点半小时。

下午，火车经过了辽阔无边的棉田，那里数以百计的农民正在采摘棉花。在一些村子里，脱粒机在忙碌地工作；在机械缺乏的地方，农民们仍然采用双手来打麦子。在很多地区，庞大的铁牛翻起了刚收割完的土壤；在个别农村中，拖拉动物仍然是犁田的主力；在一些田地中，很偶然地还看到有些男女农民象过去一样，拖着笨重的犁耙翻土。在相距不远的田野上，金黄色的玉蜀黍和各种瓜类堆积如山。在歇息之前，我凭窗外望，看到一个村庄正在举行盛大的庆丰收晚会。只见打谷场上点然了熊熊的篝火；场边，玉蜀黍和南瓜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四周红旗招展；在火光掩映中，有人拉起了轻快的手风琴，穿起舞蹈服装的年轻姑娘们就在场中翩翩起舞，欢乐的歌声透过黑夜，传向远方。

返抵首都后，我一连三周都在北京享受那令人愉快的十月，然后跟路易·艾黎和其他朋友们依依握别。我南下到长江流域一带，留下我这次旅行的最后足迹，然后取道昆明离开中国。

第六篇 江南行

重 临 上 海

上海——这个巨大的贫民之窟，西方帝国主义敲榨吸血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旁的巨贾；语言混杂的多边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俱往矣！

再见吧：坐在避弹玻璃的汽车内，对司机颐指气使，脑满肠肥，衣冠楚楚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勒索的专家们；门限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再见吧，一切夜生活：镀金的歌女，数以百计的舞厅和数以千计的舞女；无数的鸦片烟窟和赌场；大餐厅内眩目的灯光，“麻雀”的碰击声，猜拳干杯时的喧叫声；在四川路的酒吧里喝得醉昏昏的、在妓院中进进出出的海员们；在花街中急急忙忙地奔走的娼妓和

鸨母；外国商品的光管招牌，无数摆满丝织物、玉器、刺绣、瓷器和东方特产的商店；生于上海，称上海为家，住在中国不敢正视的租界内，过着安静保守生活的外籍人的后裔们；聚在每个商业大楼周围的乞丐；在围场边随便大小便的顽童和他们衣衫褴褛、心不在焉地捉跳虱的母亲们；在街道上由人负责拖曳的“夜来香车”；长长的殡仪队伍，穿着白色孝服的职业哭丧者流着假泪，一座座纸扎的宫殿和冥币燃烧在有钱人的坟墓之前等等的现象；拚命挣扎着求生的人们、无数的弃婴和浮在河道上的自杀者；人力车横放路中，车夫往往为争客而打斗、时而为价钱而争执，小贩们凄凉的叫声；黄浦江上全副武装的白色巡逻艇，“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美国佬和国民党；旧东方最丑恶及最多彩的城市：全部都见鬼去吧！

连郊区计算在内，上海市于一九六一年的人口达一千零四十万人。外国人仍然说上海是“中国内唯一象大城市的地方”。上海的高楼大厦依然屹立，但“公共租界”和“法国割让地”——从前是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的心脏地区——现在出奇地静得象乡村一样；晚上，商业区也象星期日的华尔街那样平静。

新工业区的交通非常繁密，但“公共租界”内很多商行的建筑物现在已转作学校、住宅区和工人俱乐部。在这个地区里，自行车、为数极少的三轮车、电车等交通工具悠闲地驶过一些售卖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商店；顾客中的一些人，一眼便可看出是初次造访这个城市的乡下人——此地长久以来，便为凶恶的帝国主义者所统治，直到解放才结束了这个局面。从前一度熙熙攘攘的外滩区现在成了娱乐中心。无论清晨或下午，一队队

儿童从旧办公大楼中蜂拥而出，排队操到保养甚好的外滩公园中游戏或做体操。老年人也常聚集此地阅读书报，或闭目养神，或下中国象棋以消遣时光；一位老人告诉我说，他还记得从前此地曾竖有一个侮辱中国人的牌子，上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也记得确有这种情况。

著名的上海俱乐部从前专门开放给有体面的英国绅士们享用，它以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而称著。目前，该建筑物由党负责管理，并改之为“国际海员俱乐部”，各国海员可进内作各种游戏活动，或阅读书报、或看电影，但当然再也找不到陪睡的人了。俱乐部附近，巨型的“汇丰银行”现已成为政府的机关。旧“美国人俱乐部”与北京的“万国宝通银行”大厦一样命运：两者皆改作警察总局。

这回重临上海，我住在旧华懋饭店，这里曾一度是亚洲最佳的酒店。华懋饭店现改名为和平饭店，名字改得贴切极了：安静，有秩序，餐厅很少应用，与从前的醉酒笙歌，夜夜狂欢的情况比较，确实沉寂了很多。酒吧与夜总会也不复存在，酒店的小卖部入夜便停止服务。十时过后，灯光便陆续熄灭了。在这里以及在各省内那些规模宏大、地方宽敞的大酒店中，我的印象是：自苏联人撤走后，中国人好象尚未决定怎样利用这些建筑物似的。虽然“热闹”稍减，“华懋”仍不失为一间舒适的酒店，它的装饰与维克托·沙逊爵士雄踞上海时一般无二：中国式的家具陈旧了一点，但冷热水装置顶好，精良的食品与从前一样，饭店外排列的租赁汽车较中国任何其他地区为多。

接待员让我随意选择房间：通常留给大人物应用的、或从前爵士专用的套房，或一间普通的 双人房——面积约与“五月

花”酒店的一样大。我表示一间单人房已足够应用，但我要求参观这间著名的套房。房子位于建筑物顶部的塔上，高高地俯瞰着黄浦江，内外设计极端类似都德王朝的建筑，窗框形式悦目异常，宽阔的窗子透入柔和的光线，照亮了整个房间。睡房布置得奢华极了，两张巨型的睡床摆在房中，房子旁边是两个铺上磁砖的浴室；套房的其他部分包括一间面积相当于普通平房的化妆间，一间私人办公室，几间工人房，一个酒吧，一个厨房和餐具室，一间内有壁炉的私人饭厅，以及一间也附有壁炉的、面积宽阔的会客室。

“价钱怎么样？”我向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接待员问道。

“每天三十五元。”

“噢，尚不足十五美元。在华道夫酒店，同等的房间要一百美元哩。”这时，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表露无遗了，我对他说道：“我真想知道在维克托·沙逊控制上海经济时，他早上起来有何感想的。好吧，我就在这里过一晚。”

然而，我并不能舒适地度过这一晚。睡前，我长时间地凝视着水波掩映的黄浦江，过去的事情一幕幕地浮现在目前：多年前，我曾将自己的年轻时代投资或者可以说是浪费在这个城市里，并且坠入爱河，经历了一次短暂而又事故多多的婚姻，目睹两场战争，看到很多人牺牲在残酷的战争中；离开中国后，我又在海外见到更多的战争。蓦地，我自沉思中惊醒过来；环视一下周围华丽的一切，我躺在第一张床上，但久久不能入睡。于是我转试第二张床——柔软、弹性和舒适极了——然而却也徒劳无功。最后，我不得不走向会客厅，倚在沙发上，一觉睡至黎明。如果维克托爵士控制上海时也是这般感觉的话，那么

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羡慕的呢？

七点钟，我漫步走出饭店到外滩公园蹓跹，那里早已挤满各式各样的人群了。诚恳的年轻人跟很多中年汉子一道练习太极拳，一些少年学生穿着醒目的红色运动衣和宽阔的束带裤子在练习剑舞。树下，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动下唱着天真活泼的儿童歌曲。人人都心无杂念，聚精会神地进行着自己喜爱的活动。走到堤岸边，我看到一家人在一艘小艇上吃早饭，以蔬菜佐膳；我举手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微笑地向我挥手。他们的热情使我勇气陡增，于是我走到一张长椅前坐下来；椅上早已坐着一位老先生，刚才他频频地注视着我。接着，我操着不大纯正的普通话，搭讪着说道：

“您早哇，老先生。”

“到我这个年纪，用不着睡很长时间的。”

“您多大了？看来尚未足五十岁哩，老兄，”我撒谎着说。

“别说客气话！我已经六十多啦。在苏联，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要做什么呢，先生？”

“啊，您以为我是个苏联人啰？不，我是美国人。”

“美国人？”他再问我一遍，我点了点头。现在，他开始用不大自然，但是却很正规的英语跟我谈起来。“你是我在许多年以来见到的第一位美国人。”

“我想是的。您有多少年没说英语呢？”

“噢，许多年了。再不用，我看快忘得一干二净呐。你在中国住了很久吧？你的普通话说说得挺不错哩。”

我告诉他从前我是当地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并曾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工作。他马上记起了这份报纸，并说曾

经阅读过。他的英语是在年轻时学习的，后来在经商时期常有应用。现在他已退休了。

“我想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吧？”我对他说。

“噢，不！”他笑着说，露出了尚余的几颗大牙。“我是个资本家呢！那是他们评定的。”他拉了拉深蓝色的丝外套的衣袖，接着说：“我过去开有一间丝绸店。”

“你现在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象其他商人一样，我每年都分到应得的红利。”

“生活与过去比较又怎样呢？我是指解放前？”

“我们吃的较大多数人好一点。我们仍然住在过去的房子里——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但现在有另外的一些人和我们同居。那倒没有啥，他们都是挺好的人。是踏踏实实，勤奋工作的好人啊。我们确实住不下那么多房间。孩子们长大了，都结了婚，搬到别处住。你对中国有什么想法呢？”

“官员们带我看些东西，然后就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需要批评。现在让我问问您，请您老实说，您有什么批评呢？”我用普通话重复了这句话。

“呵，我明白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美国人或许以为我们不好过吧？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的生活比较以往好得多。劳动人民的生活尚远远未及我们资本家。但情况是要变的，现在国家做的事都是为人民着想。我们过去以为美国政府也是为人民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却不是这样，呃？美国政府只是作蒋介石的朋友吧？为什么呢？”

“我不大同意你这样说。然而，你能够批评你的政府吧？”

“呀，我明白你的意思。政府不错也有犯错误，但普天之

下，谁能够完全免于犯错误的呢？当然，我可以举出一些不大好过的资本家的例子给你听。我自己也曾试过，但只是短短的一会儿。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也知道，所有权跟从前不同了。然而，一句话：这是个坦诚的政府。手段严厉，但是坦诚无比。它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能在世界人民之前昂首挺胸，吐气扬眉。我们不再是外国人的奴隶了。”他骄傲地挺起了胸膛，说道：“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呢，先生？中国政府虽然尚有错误，但是——它确实为中国做了数不尽的好事，它没有盗取中国人民的一分一毫。我们忘记了它所犯的一切错误。没有人会愿意让蒋介石再回来，绝对没有！”

“你的儿子呢？他现在干什么？”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教师，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另一个现在香港。他亟欲回来，但他应留在那里。我们是老一辈了。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我的孙儿们——他们是新一代。他们生长在新社会，他们热爱新社会。在旧社会，中国实在太差劲了。现在可好了，他们将最坏的都赶跑了。我完全没有怨言。”

“很多人被捕和坐牢吧？”

“据我所认识的，很少。他们对你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我完全理解这一点。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你知道旧上海吗？人骗人，人吃人的社会。罪恶，黑社会，坏人。杜月笙？你知道这个人吗？大坏蛋。（对的，我记得杜月笙，并且认识他。许多年来，他是上海黑社会的第一号头子，“青帮”的首脑。这个帮会把持着上海的毒、赌、嫖市场。一九二七年，他手下的武装匪徒帮助蒋介石——在公共租界的上海市委会的协助下——

在左翼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手中夺取了华界的控制权。五千工人惨被屠杀。后来，蒋介石为答谢杜月笙，竟将他安插在“禁止鸦片局”中把持工作——于是他更明目张胆地将鸦片运到全国各地销售——蒋还公开地赠给他光彩的翡翠。详情见拙作《亚洲之战》。)现在，你可以看到小孩子们也会劝导我们老年人甚至不可随地吐痰，要利用道旁痰盂。不要把垃圾丢在街道上。这好得很呀。人人有工作，人人受教育。不再有人会饿死了。你觉得怎么样？建设，建设，更多的建设——但没有人因此而致富。为什么呐？一切为着中华民族。我理解这一点。”

“可能你并没有把一切都说给我听。可能你害怕我会对政府反映吧？”我微笑着说，但他可不是这样。

“哈！我是据实直说的。为什么——”

这时候，他的一位朋友走到我们面前跟他打招呼，他连忙站起来跟前者寒暄一番。他们一道散步去了，但当这资本家离开时，他还回过头来，跟我点点头，说道：“新建设实在太多了。你一定要亲自看看啊。”

在外滩公园，在海傍，在上海的各条街道上，我随意地拍摄了几十张各式各样的照片。埋头工作的人们，忙于购物的人们，不知道自己被摄进镜头的人们。若说这些人民饿得快要死去的话，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也是去死不远者矣。我再也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污秽满身的小孩，看不到警察追打人民，看不到为争米而暴乱的人群。但是，海外的编辑先生们竟然说我的照片太假了，他们要看“中国的真面目”哩！

“建设，建设——”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位姓张的秘书长对我到上海表示欢迎，并且称我是上海的“老居民”。（按：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是选举市政府和选派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他的年纪约有四十岁，体格强健，结实得象个铁塔似的，出身富农家庭，曾受高等教育。在学时便离开故乡山东省，参加陈毅所领导的游击队。象很多老干部一样，他态度随和，易于攀谈。

“黑社会吗？一旦失去了‘他们的’政府的保护以及人民可以自由揭发他们，黑社会匪徒是不难扑灭的。黑社会的党派是组织来为其首脑赚钱的；他们有所获后便会洗手不干，或当起资本家，外表与其他资本家无异。这里曾经发现有一个黑社会的党魁竟然是银行的首脑；他逃到香港去了。他的承继人在我们的提议下，在报纸上登了一段广告，解散了他手下的秘密组织。从一九五一年起，本市便再无黑社会了。鸨母和妓女吗？同时销声匿迹，但要教育这类妇女和给予她们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不敢说这些人已彻底清除，但可以说是罕见得很了。”

张表示我喜欢在上海看什么，他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我表示最好能看看上海最好和最差的住宅区。

“好吧。但是工业呢？新上海跟你从前所认识的上海大不相同了，甚至跟十年前的上海也大有差异。过去，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占本市生产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现在，我们的纺织业

较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庞大，但重工业生产额已达总生产额的一半以上。一九五九年，单上海一市所生产的棉纱已超过全英国的棉纱总产量。你从来也不会想到上海是个钢铁城市吧，呃？本年度上海将会冶炼二百万吨以上的钢。（按〔一九七〇年〕：据报道，上海的钢产在一九六九年跃升至六百万吨。）从这里俯视黄浦江吧。大多数的船只都是中国制造的。今年，上海已可以出产一万吨的大货轮了。你有多少时间留在上海呢？”

“五天。”

他显然有点儿失望。“不管怎样，我们将令你看到其他人十天也看不到那么多的东西。”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我闭上眼睛就好象感觉到有钢水自耳中流出来似的。我恳求有一天时间完全是属于个人的，我希望能随便在街上走走，看看一些早已忘记了的地方。张觉得这未免太浪费时间，但他终于同意我的选择。接着，他便立即为我安排一个紧密的行程表，并马上派他一位姓李的能干的助手担任我的向导。李是一位上海的大学毕业生，精明能干，英语说得流利快速，介绍及时，从来也没有使人留下不释的疑团。

当我独自漫步于旧购物中心时，我尚能认出昔日的建筑，但却认不出熟悉的面孔。我所记得的商店没有一间仍操故业。上市的高价消费品数量之少与往日南京路上的丝绸行五光十色的装饰，形成强烈的对比。上海今天出产的丝织货品较诸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设计与质量更趋上乘，内容既有现代的新风格，也有传统的艺术，但大多数都运输出口以换取机械。我在百货公司中记下一些货物的价格：人造丝每码约折合一点五美元；黑丝二点二五至七美元；羊毛六元，棉布七毛半到二

元。皮鞋价格则由三元到十二元不等；衬衫每件约二点五到五美元。袜每双从四毛到一元半，皮外衣二十五到三十元。

这里很多货物的价钱都略较香港为高，在后者的百货商店里，中国制的消费品大量上市，很多品种为上海所未有。但是在重庆、洛阳和昆明等地，我看到品种更多、数量更多、价钱更平的各类货品出售。目前，布的配给额是每人每年十六英尺（一码宽度的）——老少相同。

“是的，我们出口了大量物品，”共产党人这样指出：“平均每户人家都较从前多两三倍的衣服。若我国停止将物资输出国外，我们的人民大概可以每人多得一两套衣服。至于丝织物来说，让资本家们多穿几年吧。当我们获得足够的机械后，我们也会有大量丝织物的。”

解放前开设的巨型百货商场：永安、大新和先施等，现在仍然营业；它们陈列着各种各式的衣着、鞋袜、亚麻布制品和品种繁多的廉价商品，包括有一些不入限额的罐头食品、啤酒（六毛人民币，下同）、中国名酒（二元）、伏特加酒（八元）、家庭用具、玩具和自行车等。一辆质美款新的自行车售六十美元左右，约等于技术工人两个月的薪金。

我漫步走到一间以往专供应中国式碟头饭的商店门前——那时候每客饭要三毛，对一般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那是太贵了。现在，饭店已改成一间国营小商店，经售几种不受限额的货物。“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我问排在人龙最后的那个男子。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耸耸肩膀。“不清楚。”甚至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妇女也不知道。我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最后才看到一位顾客挟着一包东西自人丛中挤出来，看清楚原来是一束香蕉。

这些排队买东西的人龙到处可见。他们使我回忆起战时的苏联，只不过是后者的人龙更长，人数更多，而且人人都是排队买面包，而不是香蕉这样的水果。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试图找出任何营养不良的征兆，然而却徒劳无功。大部分人民并不肥胖，但中国人总是比较瘦的，所以这点毫不出奇，“胖子”和“有钱佬”往往是联想中的同义词。北京的一位中国医生曾经对我说，上海的医院曾经发现过有脚气病和玉蜀黍疹等病例，在上海外滩公园，我看到了一宗可能是缺乏维他命而引起的病症。一位女教师允许我给她所照顾的一群打扮漂亮、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拍照。孩子们马上静下来，直愣愣的站着不动。于是我叫他们放自然些，并且可以继续游戏。当我跟他们在一块时，我发现有一个孩子的牙齿黑得很厉害。或许这就是玉蜀黍疹所引起的病征吧。

南京路上现在只剩下十一、二辆脚踏三轮车。它们收费划一：即每小时六毛（折合美元一角六分），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价钱是略贵一点。我租赁了一辆三轮车，坐了一段短短的路程。路上，我问三轮车工人他每天吃多少饭。“每天六碗，”他回答说。够了吗？“不够。我要吃十碗哩。”六碗饭大约相当于一磅米左右。但他接着说：“有办法。在每个星期的一天假期中，我到菜园中帮工，每次都可以分得一些鸡蛋。”他的衣着很整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三轮车工人。

过去，上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丑陋的城市，所以即使全市拆掉重建，也不会损失什么美的观感。目前，市中心区仍只限于全面装修，扩宽和修建尚存的建筑物，但始终都会完全由新的建筑物所代替。大部分的新建设都在旧市区外围，即在卫星

城或上海市郊区之中。新的、宽阔的通衢横贯整个市区，环绕着整个城市，将上海市区与附近的农村更紧密地串连起来。在郊区里，由于建设计划井井有条，效果非常良好，这与其他亚洲城市的杂乱无章，随随便便的扩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东京可以说是这种怪物中的表表者。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乘着汽车奔驰在市郊的公路上，并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区。这些独立的社区在经济上都以一间新的机械制造厂、一间纺织厂及一间其他类型的工厂为中心，这些新厂已大规模地陆续建设起来。工厂附近的菜园、养猪场和饲养牲口的农场，都由工厂开办和管理。林荫大道及四通八达的街道形成了交通网、购物中心、酒店和戏院遍布各中心区。接着，以中心区为圆心，一幢幢三层或四层高的工人住宅向外放射出去；有些住宅区则建设在花园或学校的运动场周围，以便孩子们上学。此外，居民们都可以步行到所属单位中上班。

六个类似的卫星城市已经建设完成，另外五个还在建设中。大多数参加劳动的人都是该处的未来居民，他们利用工余之暇参加劳动，为建设新上海而贡献力量。我在其中三个新发展区中度过了几个小时。

闵行区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区——居民包括有七万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受雇于附近的小型农机厂和农械厂。在闵行区结构简单的建筑物中，有一千多座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建成了。市中心广场周围有十一座用砖瓦盖成的建筑物，其中一间是新开的饭店，我就在这里面饮茶歇脚。从外型看来，它足可以比美任何中等城市的酒店，内部装饰虽然并不高贵，但却很有吸引力。饭店共有五十五个房间，六十七天建成。经理是一

位二十岁的党员，曾接受过专业训练。他说饭店早已客满，并且已有很多人预订房间——大部分是当地居民的亲属、工人代表、讲师、以及一队队来此访问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一个有两间房子的套房，每天房租三元；一个没有浴室的双人房，则每人收一元。

在一条树影婆娑的街道两侧，尽是新的住宅。我随便选择了其中一间，进内坐了一会儿。从外表看来，这些住宅与美国中下阶层人士的住宅不相伯仲，但它们的内部装饰却非常简陋：墙壁未曾上髹，楼梯以水泥建造，走廊狭窄，照明不足。然而，它们胜过纽约市东郊和西郊的住宅，并且较莫斯科的住宅更胜一筹；至于与旧上海的贫民窟比较，则更有极大的改善。

我在闵行区访问时正值下午；大多数人都上班去了。在开初的三间平房外，我们等不到有人应门。在第四间，一位老先生闻声将门打开，并且邀请我们走进屋内，计开：一个客厅，两个睡房，小厨房，花洒浴室和厕所；家具简单，没有地毯，地面很清洁，窗子上有白色的布帘。

“多少人住的？八个：我自己，我的妻子，我们的儿子和媳妇，以及他们的四个儿女。舒适吗？当然啦。从前，我们就住在象现在的厨房一般大的一个房间里。现在我们有地方转身了。至于我自己是一个退休工人，现年六十五岁，每月享受退休金五十元。过去，不能干活的老工人由谁抚养呢？在旧社会，相信我已陷于饥饿的边缘了。”

第二天，我们驱车走访距上海市区十五英里的马桥人民公社。马桥规模很大：人口四万八千，土地一万二千英亩。灌溉工程搞得很好：二十九个电动排灌站。机械化方面很先进：二十

三部拖拉机。繁荣富裕：生产总额从一九五二年的九十万跃升至一九五九年的六百一十万(美元)，每个人的现金收入达八十五元人民币。文化教育方面：除婴孩及老人外，百分之九十的人能够阅读和书写。粮食限额：以成年人平均计算，每月配给三十四磅米粮和三十到四十磅蔬菜。社员们还耕作自留地，平均每个人每月都可以获得十三只蛋和半磅肉类。在一九五九年，每个劳动力可赚取现款二百元左右，其他款项则以粮食的形式分发，这个公社的人民和我所参观过的大部分公社里的社员一样，吃的比城市的居民要好；除了基本的粮食配额之外，他们还有大量的蔬菜供应。

马桥公社的五个中心区可以比美城市近郊的卫星城市。我们访问了第一中心区，这里有三十二座新的砖建筑物，全部由公社的工人自己砌窑烧砖，自己动手建筑的。建筑物中包括有：一所占地甚广的学校，一个现代化的幼儿园和托婴院，一所医院(有四个医生，两个手术室，有X光设备，全院共有一百五十张病床)，电报局和邮政局，广播站，几个商店和百货公司，饭堂，一个戏院、一个公共浴室，以及可以足够六百户人家居住的砖建平房。所有的房屋周围都栽满树林和花朵。房租全部免收；电费每户每月大约要缴纳一到二元。到医院看病一分钱也不需付出；病床租金每天二角；接生费三元整。(据称由于孕妇多属健康，正常的妇女，所以生产时多属顺产；麻醉极少应用。)孕妇在生产前后共可获得产假五十六天。

“好吧，李先生，”我们离开马桥公社时，我这样说：“你已经带我参观过发展得最好的地区，现在让我们看看最差的吧。”

“你认为什么才算是最差的呢？”

“在我的脑海中，我还记得苏州河两岸从前有数以千计的穷人以草席蔽身，露天席地而睡，也有千千万万的人民蜷缩在街头。我还记得在闸北火车总站附近那片火灾场旧址上，贫穷的人民用竹杆枝搭起了无数的竹棚栖身。我曾到苏州河看过；现在已成了干干净净的住宅区。甚至河上的舢板也洗刷得一干二净。市内更无街头露宿者。木屋区又如何呢？”

“木屋区仍未完全改建。我们尚未有足够时间为那些居民兴建新的住宅区。”

汽车返抵市区时，薄暮已笼罩着整个大地，但我们马上驱车往木屋区看一看那边的情况。一些木屋已因岁月悠长而倒塌了，一部分已被拆除，但仍然有很多留下来，不过也作出了很多改良的措施，如翻修瓦面；装置玻璃窗门和铺上干燥的地面等。街巷和里弄都打扫得非常整洁；新植的柳树触目皆是，竟吐新芽；自来水管正汩汩地吐出洁净的清水，注在公用的水池中，整个区域蚊蝇极少。街道上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再也不是身披破布衣，面带难言痛，而是入时衣着穿身上，满面童真露笑容了。虽然这个区域目前仍是木屋区，但区中心已设有医疗站，并且有几个小型托儿所。各种街道工厂仍然忙碌地进行生产，我顺道又参观了一间阅书报室和书店。我们在区中走了不及一百英尺的地方，便有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匆匆出现，她作了自我介绍，原来是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并询问我们有何“贵干”。

了解情况后，她这样说：“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不愿搬出去。过去，他们都是非法居民，但解放后，他们的所有权已得到承认。然而，由于城市的发展，这片土地将被收回，他们迟

早都要迁离此地了，但是我们同时还继续努力，使这地区的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我又一次停下步来，走到一户人家的屋子里访问——仍然是由我自己选择。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一位老太太正在准备着晚饭。一部小型的收音机播送着悦耳的音乐。她的儿子和媳妇出外工作，尚未回来。她高兴地表示她的媳妇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姑娘，“是个小学毕业生哩。”她接着老怀欢畅地称赞围在我们身旁的三个孙儿也是好样的，年纪小小，却懂得学写字读书了。她对其中一个孙儿说道：“写几个字给叔叔们看，亚才。”小孩子的脸蛋刷地变得通红，躲在我们的背后。她告诉我们，媳妇每月赚六十八元，儿子较少，六十块钱。他们不用付房钱。一家伙食费每月大概要七十元；煮饭买菜由她负责，可以说是很精打细算了。食物吗？她指了指煤炉上发出“嘶，嘶”叫声的饭锅。看看他们的晚饭：今天晚上吃鱼。他们的饭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大米饭，另一种是上海人吃的饭糊。“想想看，两种饭哩。”在一张布帐之后，我隐约地看到有一排大大小小的睡床，但是相信他们有些人还要睡地板。

“迁居吗？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的房子啦。我们生活得很快乐呀。假如我们能多买一台缝纫机——”

上海市长一夕谈

在上海，我所参观的工业无可避免地超出我原定的计划。一九六〇年，该市的工业总产值达人民币二百四十亿元，即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我只是走马看花地看过它的一

鳞半瓜，但已知道上海能出产各种先进和优良的产品，如：炼钢用的转化炉、发电机、辗压机、巨型的打桩机、钻机、水压机、锻造铝板的机械、制造化学肥料的机械、内燃拖拉机和重达六十吨的胶轮；而各种抗生素、精细的外科手术设备、X光机、精确的显微镜、电视机及照相机等更不待言了。如果要将一个工厂及厂内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详细报道，需要很多篇幅才成。当你有机会参观过一百个工厂时，你对它们的印象，就会象坐在一辆高速奔驰的汽车内所看到的风景一样，模糊起来了。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新产品。工展馆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属传统的展览会场建筑。中国每一座大城市最低限度也有一间类似的机构。在北京，永久性的展览馆共有六个之多，里面都摆满新生产、先进的产品，除了使人获知国家的工农业最新产品外，还使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类似的展览馆皆足以与“芝加哥市实地博物馆”媲美。展览馆中陈列的电视机，HI——FI音响设备和收音机及电视机座架、钢琴、冰箱、电须刨、各式各样瑰丽多姿的织物，种类繁多的加工食品，精致的瓷器和地毯等——大多数不能在商店中看到。这些产品大部分供应国外市场，在中国内只有集体才能购用。中国人看到这些展品，相信都会充满自豪和满足的感觉吧。

李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打断了我起伏的思潮。“很抱歉通知你，宋庆龄女士今天晚上不能与你会面。”（宋庆龄女士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在中国备受尊崇。她大部分时间居于上海的老家。当我抵上海访问时，她的慢性病已达到极度危险期，但她仍在病床上写信给我。她的信对现政权极度满意和对前途

充满信心。她的病后来幸得康复。)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已知道她的病很严重。”

“但市长请你共进晚餐。”

象北京一样，上海是一个直辖市，该市管辖的范围就象省一样重要。柯市长是一位政治局成员，他的职位较大多数省长还要高级。他是个身材健硕、体格魁梧的大汉，头顶是乌黑的头发，双眼宽阔而锐利，看起来只有四十来岁，但实际上已年近六十了。他的说话非常坦白率直，但却字字千钧，很有力量。

柯庆施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地区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一九二七年，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柯变成了一个“政治矿工”。之后十年，他转入地下工作，先在上海，后来转往北京主持华北局的工作。日本侵华时，他又转移到农村组织游击队。

市长在前意大利总领事的私邸中欢迎我，这间房子坐落于昔时的法国租界，是一座古旧的住宅，周围是护理得很好的花园。房子现在被用作市接待站，柯市长在此设有办公室。当晚出席的包括有上海市的副市长，张秘书长和他的姓李的助手。

市长说他当晚是“自由身”，我可以提出任何问题，他尽可能回答。会谈开始时，他自己先说了一篇开场白。

“李对我说你对上海有两个印象：其一，旧上海表面的繁华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二，上海市的道德风气已经改善。两个印象都是对的。许多外国人不明白这些转变的意义。而你，一个老上海，应该知道嘛。一小撮中外富豪所有的实在太多了；城市的繁华、南京路上豪华的商店和酒店，全部都是为他们服

务的。在污秽的后巷和里弄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挨饥抵饿者有之，在垃圾堆中找生活者有之，饿死的更不可胜数。现在，市内再没有富豪，但也没有人饥寒交迫，没有人再生活于污秽及破烂之中。

“人人都丰衣足食了吗？是的，基本上如此。人民想得更多吗？当然啦。上海市人民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较全国其他地区都高一些。上海的出产较丰富，因此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七十四元半。一般来说，一家人的费用包括：房租四到十五元，水电及其他什用要三到四元，伙食每人十二元。平均每户人家有两个劳动力。因此上海市人民的购买力很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哩。不可否认，我们的消费品的产量仍然不足。然而，我们不能再超前了。本市有一千万人口；想想看：假如我们只是把每个人每年的消费提高二十元，这表示要在生产中抽掉二亿元——但农具、灌溉机械、钢铁：这些都是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对比起来，上海所需要的皮鞋岂不是微不足道吗？上海市所出产的纺织物足够使每个市民获得额外的服装。但是，当你想要提高生活水平时，无论怎样提高，也要联想到该数字的六亿七千万倍。要将布的配给额提高一倍，我们就要先将棉花、纺织机械和工厂增加一倍。你总不能日以继夜不停地、拚命地干的吧？

“粮食的配给额也是同样的问题。本地区的粮产非常丰富，但北方已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其他地区失收意味着需要我们的支援。所以，目前的粮食配给额使我们肯定可以在任何时刻都有把握供应、而且是基本足够的数量。外国报章错误地将我们这种细致的分配认作中国在闹饥荒。我可以说，我们现在

不是闹饥荒、将来也不会闹饥荒。当生产量可以无限地供给全国人民的需要时，我们便会结束配给的方法。

“你问及这里的粮食配给额吗？与其他地区一样，我们每月最起码的配给额是：成人二十七磅米，六盎司肉类、二十六盎司鱼类、三十三磅蔬菜。工人們的配给额较多，一般获配三十三磅米，干重活的工人获四十四磅。艺术家与脑力劳动者获同等配给量，另外还有额外配给的肉类。资本家有红利可分；市上特别为他们设有特别的餐厅。我们尽可能满足人民适当的需要。总的来说，本市有八十多万人领取最高的粮食配给额。至于农民方面，由于有副业生产补充，他们的口粮当然比城市的人更好。”

柯市长还举了很多贴切的例子。“以米为例。米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含有丰富的维他命而缺乏热量的外皮，二是米粒本身。以往，农民们只能吃外皮(糠)和少量的米粒，因为他们要将米粒出售，变换金钱。今天，人人都吃整颗米粒了。最近，我曾在农村遇到一个在厕所中收集粪便的老人。你想想，以前农民会有固定的地方大便吗？喏，现在他们要这样做；若不到厕所大便，甚至小孩子也会责备他们哩。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那位收集粪便的老人吧。当时我问他现在事情怎样。

“‘来来，’他对我说：‘看看这些。’他叫我看看便桶内的人粪。‘过去，当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吃，只吃米糠的时候，粪便都是白潺潺的、稀巴烂的。现在，你看看吧，它是固体的，赤色的。人民吃的较前好多了。’喔，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知道在座的副市长曾在监狱路的牢狱中度过了七年之久，当时他是被公共租界当局逮捕，以共产党的“罪名”投进狱中

的。于是我问他曾否到旧地一游。有，他曾到住了七年的监房中看过，但看不到有人在；房门是打开的。监狱内所有的房门都是敞开的。在他坐牢时，犯人每天只有半小时活动时间（放风），倘若彼此交谈则会遭受毒打。现在的犯人都有文娱活动时间，狱中还设有图书馆及阅览室供犯人们工作后应用。他说现在狱中的犯人总数不超过二千五百人。（在我的要求下，他们轻而易举地为我安排了一次访问，但由于监狱的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北京监狱相仿——除了不用种菜之外，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苏北劳改农场中有多少犯人呢？”我跟着问道。

“大约有六千人，”市长回答说：“我曾经到那里看过。这个农场搞得很不错。表面看来，简直瞧不出它是个监狱——守卫很少。犯人们建筑自己的房子。他们有一个发电厂，农场中用电灯照明，犯人们按时看电影。他们畜养了许多猪及其他牲口，而且他们的生产力比一般人还要好。当他们获得领导信任的时候，他们可以申请一个星期左右的探亲假回市省亲——不需要卫兵随同监视。”

“他们回来的吗？”

“到目前为止，是的。有些人还申请将家人带到农场去，我们也批准了；于是他们工作得更积极了。有些犯人甚至对农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服刑期满后，继续留在那里干活——当然是按劳支薪了。他们跟其他市民一样拥有各种权利。”

“柯市长，若非在北京监狱曾经与几位表示出于自愿选择，期满后继续留在狱中工作的妇女交谈过的话，我将难以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希望能亲自到这农场中看看。”

“路程不短哩。你要坐船从水路走，来回各要两天或三天之

久。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尽力替你安排。”

当时，我本应马上打蛇随棍上，请他替我安排行程，但回心一想，旅程共要花去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那岂不是要挤掉后期的一部分计划，或者要请求延长护照的期限吗？况且也不能肯定可否获准延期。他们说在汉口，重庆和昆明附近还将有同等的机会，但我却相继错过了。所以，我不能证实或否认柯市长所说的、有关中国所承认的几个仅存的“劳改营”的情况——这只能怪我本人没有抓紧机会了。

将八千五百的犯人数目与上海大约一千万人口比较，可以算出犯人率是千分之零点零零八五。若全国都是同一比率，那么中国的犯人总数便达五十九万五千人了。（若美国的犯人率与该比率相同，那么美国的犯人总数应该是十六万一千五百人。一九六〇年，美国的囚犯总数却达二十七万七千人。但美国的逮捕率〔一九六〇年达二百六十一万二千人〕肯定远较中国为高，因为中国的定罪额跟逮捕额是非常接近的。）

“数字并不十分高，特别是如果它包括一切犯人，而不单只是政治犯一类。”我对他们说。

“它已包括了一切犯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政治犯，”柯指出说：“但有一点要声明，今天的真正犯罪率较上述的低得多。你一定会记得上海过去的犯罪率是全国最高的。目前，我们很难在法庭中遇到有案件进行审判，以供希望在中国聆听审案的外国人参观。”

“这点我知道。在北京逗留那么长时间，我也遇不上一件案子上庭。他们叫我在这里碰一碰机会。”

“这好办。你在上海的时间内，我们一有案件上庭便马上

通知你吧。现在，犯罪再也不是严重的问题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支持我们的工作。胆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人只是一小撮——如果他们能够的话。我们共有六千名警察，这包括了消防人员在内。对这样面积的城市而言，公安人员的数字不算多。纽约市有多少警察呢？我们的民警大部分是负责管制交通的。”（一九六〇年，纽约市的警察总数为二万三千名，但消防人员不包括在内。但上海市的交通远不如纽约那般繁密。）

“从前，人们常常说上海的警察、囚犯和娼妓比在学学生的人数还要多。那当然是夸大了的说法而已。”

“那倒不是十分夸大哩。但今天可不能这样说了。上海目前共有学生二百万。假如你把一百三十万业余学校的学生一并计算，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学生了。这也是犯罪率低的另一个原因。”

“听你这么说，上海并不象海外前几年传说那样要强令削减人口罗？”

“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劝导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到内地去扩展和开办新的学校和工厂罢了。本市有两所优良的医学院，我们的医护工作者较国内其他地区多得多。我们将学院的人员分派到安徽省和湖南省开设新学院和新医院。今天，我们更有两所新医学院，学生远远超过了从前，医院中的工作人员更多了——病床增加到三万张。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总的来说，上海市已经前前后后将一百六十万专业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送到内地去。上海和东北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大的训练中心。”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但柯市长依然精神奕奕，毫无倦容（柯

庆施市长已于一九六五年逝世)。对我来说，由于整天东奔西跑，实在已疲乏不堪，于是我试探地作了个告辞的姿势。

文艺与音乐

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文化艺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章保留的原因是为了使读者们对一九六六年以前，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到一九七〇年，外国习惯势力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已差不多完全消失。一切艺术、文艺、音乐、戏剧、歌剧和电影都被要求要符合毛的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的思想标准。

*

*

*

有关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情况用不着在这里太啰嗦了；在一九五六年“解冻”之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形约略与苏联相似。对大多数的作家而言，写作是党的职务上的工作。好的是它对读者起着有用的、有教育性的影响；反之便是宣传了低级趣味，毒害人民的思想。

在数千年光辉的历史中，中国曾产生了伟大的文化，今后也必然会继续如此。毛在一九四二年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作家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要服从党的群众路线的需要。

共产党人相信一切的文学艺术不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便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当然，目前世界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家与为无产阶级发言的作家一样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党的路线代表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所

以作家只能沿着这条路线走。而对某些现实的不满也不可能提出反对或抗议之声——这是任何国家的人民与统治当局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毛本人也注意到中国内部所存在的这种矛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对人民群众有影响力的作家都遭受迫害，或要转入地下工作，有时甚至会遭到谋杀。（一些作家甚至被活埋——详情见拙作《方生之旅》。）因此，在这些有正义感的作家一息尚存时，他的工作便含有个人觉醒的意义。他有助于暴露及反抗旧秩序的专制与愚昧；他可以唤醒人民加速对“新社会”的认识。中国现存的社会已经将鲁迅及他的信徒们所揭露的旧社会的黑暗，大部分洗涤干净。

作家所想的、所写的必定要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现实生活，这才能是好的作品。所以一些逃离中国大陆的作家，决不可能写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有显著成绩的文艺著作。举例而言，香港的资产阶级所办的中文杂志和书籍中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类似战前中国内的平庸的、幼稚的文章，或者是无聊地模仿西方那些只着重表面技巧而无真实内容的散文和诗句的庸作罢了。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因为这类作家已完全脱离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态。在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仍然留在中国内的作家在经过思想改造之后，他们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里深深地扎下根子，并且必然会再次开出灿烂的鲜花。

中国最近还展开了对另一种沟通中外思想的工具的推广，这就是广泛地教授各种西方与东方的音乐与技巧。这件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有长远价值的；这并不是一般性的、暂时性的号召。为了要了解音乐怎样丰富中国的文化，所以我特地到上海音乐学院作了一整天的参观访问。撇开这种世界性的

媒介不说，能够听到音乐学院的众多教职员工们自由地以英语和法语交谈，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令人欢欣的事儿。

在最吸引我注意的人中，有一位是年纪只有十二岁，态度严肃认真的年轻小提琴手朱英湖。小朱早在三年前便参加了音乐院的业余训练学校。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师，母亲在一所农业研究院中工作。她有什么志愿呢？“学好音乐——为人民服务。”她美妙地演奏了一支萧邦的练习曲，然后鞠躬让给许辉平表演。

许辉平只有十一岁，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他的母亲是个音乐家，他们家里有一架钢琴——不是普通的家庭哪——他五岁时便开始练习。辉平在厦门的教师推荐下到这所学院学习。他在这里已寄宿两年了。小许年纪小小，但早已举行过两次公开演奏。他以熟练优美的技巧演奏了一首莫扎特作品的选段，然后向接着他表演的三位女琵琶手鞠躬离去。琵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乐器，有点象西方的古琴。

孩子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表演过了，跟着他们放高嗓门来一个大合唱，高歌一曲“社会主义好”。

接着，四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穿着藏青色的裙子、雪白的衬衣和黑色的舞蹈鞋开始表演。她们之中有三个手持小提琴、一个手持大提琴，演奏一曲大约是韩尔德所作的弦乐四重奏。优美的技巧，良好的风度赢得了“安哥”之声；于是她们再演奏一支由一个学院成员所编写的广东音乐。小提琴是音乐学院附设工厂的产品，音质优美，音调非常清晰响亮。一位年纪约二十二岁的藏族姑娘——才旦卓玛——运用她那悦耳非常的女高音，先唱了几首高原民歌，然后又高歌了“卡门”中的一个

选段。她是一个高大的、令人难忘的西藏姑娘，穿着藏族人民的服装，饰上许多银色和天蓝色的装饰品；她的脸上永远带着开朗的笑容，头上是一丛浓厚的乌黑的头发。

“她是一个翻身的农奴，”音乐学院的唐副院长向我介绍说，唐是一位小提琴家，也是制乐器专家。“她的歌声在农民之中素来是享有盛誉的，在田间劳动时，她时常放声高歌。我们派往西藏的一位教师发现了她，把她送到学院来。两年前她来到这里时还不会认字。两年后，她将会回到西藏向藏族人民教授音乐知识。”学院中还有三个藏族学生，并且有十多个分别由蒙、黎、瑶、壮等少数民族送来音乐学院学习的具有优秀音乐质素的青年。

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于本世纪初叶，当时由外国人资助创建，它在战前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个交响乐团，由一位名叫柏斯的意大利名指挥家领导。唐副院长亦是当年该团的一位小提琴家，并且是乐团开创时期唯一的中国成员。旧上海有很多私人音乐教师，并且是中国的音乐中心。但那些有能力攻读西洋音乐和研究西洋乐器的人，发觉只能在酒店和舞蹈乐队中找到职业。更甚的是除了在一些通商口岸的范围内，不但西洋音乐，甚至现代的中国音乐所拥有的听众数字也寥寥可数。

目前，上海音乐学院大为扩展，并且转而为社会主义服务。该学院现在仍居于国内音乐界的领导地位，但中国拥有大量新乐团。据统计，中国共有中西乐队不下数百队，而且起码有二十队以上可以作职业交响乐演奏。现在，各驻军部队，大多数的大城市，大学和大工厂都拥有不同质量的大乐队和合唱团。经过了解放后十年来的培养和锻炼，一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

九六〇年，一些外国人在北京听到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人人皆大赞已达一流水平。

上海交响乐团今天仍然由上海音乐学院主持，它有着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由柏斯的时代开始。乐团的成员认为它是全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团。

“解放时本院只有十四架钢琴，”唐副院长对我说：“今天我们的钢琴超过了五百架。大多数是中国制造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出产高质量的钢琴了，然而，我们的大钢琴的质量尚未能适应音乐会演奏的需要。虽然设备已大为增加，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钢琴，学院的面积还要扩大。那就是为什么”——他指着校园中一座尚在兴建中的四层高建筑物——“我们人人都参加那座新礼堂的建筑工程。本院除了儿童学员之外，还有七百个在读的中学生和六百五十名考进学院办理的高级音乐学院中的学生——这批正式学员要在院中攻读四年普通课程以及一年毕业班。”

几年来，音乐学院已从占地甚小的原址大加扩展，新院址包括了超过十英亩面积的，由住宅区改成的课室——其中一间从前是蒋介石老婆的所有物——以及由学生与职业工人一起建设的新建筑。儿童音乐学校的张校长是音乐学院院长的夫人。当时院长带了一群学生到江西研究当地的民间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并不单纯是上海交响乐团和民间音乐团的所在地；它还负责录音、广播、收集音乐作品，试验新乐器，并且将自元朝以来便弃用的古乐器进行复制和改良。张女士本身也是个小提琴制造家。她还拿出一个自制的、精美的模型小提琴给我看。

“我们的儿童音乐学校是全国最大的，但在北京和广西两处

地方都各有一所规模相若的学校，”张女士对我说道：“入学的资格吗？到音乐学校学习的孩子一定要由小学的老师提名推荐。全日班学生从第四级标准开始，每年度招收一百零六人。那些来自他方的学员都是寄宿生；总的来说，大部分学生是日学生。学费吗？全免。专科学生们除了每月要缴付伙食费十二元之外，其他各项费用全部由国家补助；至于一些家境较拮据的学生则可获全免的奖学金。投考困难吗？去年介绍来本校的超过了一千名，但我们只有六十个名额。”

孩子们自七岁开始，便可以在每星期上两堂的业余音乐训练班中学习音乐知识。这一类业余训练班的成员包罗甚广，其中包括有成年工人和工厂的合唱团员。各级的学员目前共有一千四百名。

本来，我只打算在音乐学院中访问一个上午。但直到黄昏将届时，我只参观了那个“大机构”的一小部分，并且只见过几位高级的教员和先进的学生。在全校的教职员工之中，有十九位是国际知名的人物；为数不少的人曾在外国留学并取得很好的声誉。高芝兰与才旦卓玛来一个二重唱。高小姐是中国最享盛誉的两名女高音之一。当她在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以原名高芝兰攻读音乐时已誉满该校。她一直在朱利亚学院中学习，直至一九四八年才学成归国。她的丈夫是纽约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之职。

这里似乎有加一点旁白的必要：在西方人的眼光看来，所有的中国歌曲都是以假声唱出的。过去，在妇女们被禁止登上舞台的年代里，传统京剧里的重要女角皆由男演员改装替代，但即使远在战前，这种习惯已不复存在矣。今天，舞台上的趋势

是“顺从角色的需求”，男女角色皆由男女演员分别担任，并且各人都以自己的腔口演唱，也就是说和世界各地再无差异。

当天晚上，我也见到了中国另一名“最负盛誉”的女高音周小燕。她对我说道：“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月到农村去与农民一道工作，并且向他们学习。开始时，由于种种思想顾虑，我真是怕得要死哩。但现在我们都发现这样做对我们是最有益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才能更接近人民。”

我第一次听小燕唱歌是在她参加由冼星海作曲而经过改写的《黄河大合唱》演出会上。后来我在她主演的歌剧《长江风暴》的演出会上，遇到了一位上海文化局的负责人。当我表示希望知道她的事迹时，该位负责人便为我安排这次到音乐学院的访问。

“我的经历吗？那很简单，”她对我说：“而且很简短哪。”

周小燕能说英、法两种外国语言。她是汉口人，在上海读书，抗日战争初期，她结识了中国内拥有最多听众的作曲家——聂耳。（除了我所听到的歌剧以外，聂耳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其中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成了中国的国歌。他死时只有二十四岁，是当时有爱国心的青年们广泛哀悼的英雄。）于是，她参加了聂耳所组织的战时旅行演唱团，他们可以说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音乐的先锋队。

“到一九三九年，我的家庭将我送到法国去进一步学习声学，”她继续告诉我说：“当时碰巧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不能逃离法国。我跟法国的朋友一道住在比亚利斯镇，直到法国获得胜利。然后，我再到巴黎继续深造，而且更参加了音乐

会的演出工作。在上海胜利解放后，我马上回到祖国来，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了。我是在本市认识我的爱人的。当时因为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戏，所以遇上了他。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生，我们生活得很愉快。我要说的都说完了——还有一点：我回来后觉得非常高兴。当然啦，我们也会遇到困难的，但现在我觉得这里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最有创造力的地方。我愿意永远在这里生根开花、永不离开。”

这时候，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来到学院，并且特地临时安排了一个音乐晚会。他集合了一个拥有四十件乐器的乐队，一个女子弦乐四重奏小组，一位小提琴独奏者，一位笛子独奏家，两个钢琴独奏家，一位竖琴家和一组由三个姑娘组成的琵琶合奏组，并且说因为时间仓卒，只能召集这么多人，频频向我表示歉意。在两小时的美妙演奏中，我听到了巴哈、萧邦、布拉姆斯和普罗科菲耶夫等大师的作品选段；之后，艺术家们又演奏了中国作曲家的精彩作品——协奏曲、民歌、革命歌曲等。

中国笛子那种欢乐和使人沉醉的演奏，的确使我听得如痴如醉。我被介绍认识这个出色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并且获悉他在数百万电台的听众中享有“三轮车笛子演奏家”的美誉。当他还是小孩子时，他便酷爱听别人演奏笛子，并学会自己制造各种调子的笛子，自作笛子独奏曲，还得忍受着年迈的母亲不停的责骂——老人家说他宁肯将时间浪费在吹笛子上，而不多拉点客人赚钱来米。十年前，一位音乐教师在街上听到他演奏，发现了他的技巧，于是把他送到音乐学院里进修。当时他还是个文盲，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演奏家和音乐教师，并且作了很多美妙的二重奏乐曲，在中国，在东欧国家都备受欢迎。

迎和被广泛地演奏。

唐副院长还亲自引我到工厂里参观。那里储备着大量经过细心挑选的松木、红木、柏木、象牙、乌木和牛角等材料。他本人年轻时曾跟一位老师傅学过制小提琴的方法；现在他也在学院中担任教授这个课程。我看到有成百个技工和参加业余工作的学生，正在制造和修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木箫、洞箫、铜管乐器、芦笛和弦乐器等等。中国人无论在木雕、牙雕、骨刻和金属制作几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上最高水准之列；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会不相信他们在制造乐器方面，也是超人一等的。

在与唐副院长和其他各人一道品尝着美味的福建茶之时，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与快慰。自一九三九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表演至今天，现代音乐在中国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程，想当年，冼星海刚自苏联归国，只有三十四岁，而《黄河大合唱》是他第一首大型的、在战争中完成的作品。当这首乐曲首次演奏时，我凑巧留在延安，于是有机会听到它。当时的听众是一群穿着粗衣麻布的学生和八路军战士，此外还有一大群农民。

“当年冼所组成的真是一支不可思议的乐队，”我回忆着对各人说：“他用天主教堂的风琴代替了钢琴，只有两到三个小提琴，一两个自制的大提琴，一些中国笛子、木箫、扬琴和胡琴等，还有一些临时制作的乐器——例如把弦线绑在旧的标准牌石油罐上；另外就是几块用来作鼓击乐用的铜片，钹，以及军鼓和军号。他不是用了几响炮声吗？就这样，他便从中演奏出乐曲的主题和优美的过门。

“我真希望，”我加上了一句：“冼能活到现在、亲耳听到你们今天有装备这么完善的大乐队演奏他的作品。”

“冼真真正正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其中一位座上客平静地说道。“你们西方人当时只是向中国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分子教授了一些现代音乐，但是真正把现代音乐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冼和跟他一道到延安去的音乐家——以及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他们不愧被称为沟通中西音乐的桥梁。”

当天色逐渐转黑时，其余的学生与教授们纷纷拥进会客室里；我们的圈子扩大了很多。他们开始询问我有关美国音乐的情况。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爵士音乐、民间音乐、民歌、黑人歌曲、芭蕾舞、歌剧、歌唱片、现代和古典的形式和趋势，音乐上的分科和作曲家等等。通过聆听过去和最近出版的唱片，他们认识的音乐和作曲家比我还要多。他们表示唯一未能达到的是与美国的艺术家们交流和接触。

“你知道我们曾多次邀请很多美国人到中国来吗？”一位文化工作的领导人这样问我。“他们一个也没有来。艺术家更从无一位到访。当时，是贵国的政府禁止他们来的，不是吗？”

事实如此，我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犯罪和刑罚

法庭现设在上海虹桥区的前传道馆内。当年轻的莫法官进入法庭时，早已有四十位左右穿着工人装的人，静悄悄地坐在那里。陪同法官一同进庭的还有两位三十余岁的“人民代表”；按法律规定，在宣判刑期时，法官需要征询该两位代表的意见。

我的同伴告诉我说，莫法官是一位机械师，并且是工会负责人，曾进入法律学校接受特别训练，而且熟习人民法庭的较简单的法例。

犯人名杨官富，三十九岁，一个瘦削，面色黄黄，下颌内陷的汉子。他被武装人员押进庭内，并且在法官席前肃立着。当检察官朗读他的控罪时，杨和他的辩护律师都留心倾听：

“你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被捕。作为国民党政权的特别警察，你伙同黑社会党棍进行绑票，威吓和劫掠市民的财产，并有多次殴打受害者。解放后，你留在上海，没有坦白承认过去的所作所为，披上一般市民的外衣，混进电灯公司工作。你的职务是负责收取修理费和保管费。过去两年来，你伪造收据，前后侵吞公款一千五百二十七元。这些情况首先由同厂工作的人检举。被捕后，经过广泛的调查，证实所报无误，而你本人也承认了。根据人民法律的第三条，你要接受审判。你承认控罪和承认你所作的口供吗？”

犯人肯定地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以后，莫法官直接盘问他：

问：“解放前你干什么工作？”

答：“我是蒋介石侍卫宪兵队中的一员，专门从事政治与情报工作。除此之外，我还逮捕过不少人，并向他们施刑以榨取金钱，与同僚分享。我还有份私运贼赃出口。另外，我还与别人合伙，在公路上拦途截劫……”

问：“你何时获得现在的职位？”

答：“一九五七年。开始时，我只是骗取少量的金钱，但后来便每次骗三十元左右。我的方法是把正单的数码加大，副单

则照旧不变。”

几位证人出庭作证，都是对辩方不利的。莫法官简单扼要地教导他们说：“讲出事实来。不可夸大，也不要试图保护被告。”

第一个证人是一位工人，他证实杨曾到过他的工厂三十五次收取修理费。厂方共付了四百八十七点八二元。第二个证人是杨的公司写字楼的会计，他证明被告只将上述款项中的一百零九点三四元交给公司。由于他对杨起了怀疑，所以他亲自到工厂里核对正副单据，于是发现了两方款项的巨大差异。另外两位工厂代表也提出了类似的证供。旁听席上坐的，大多数是被骗的工厂和机构里的男女工人代表们。他们出席这次审判的原因是希望看到法庭秉公办理，并且准备将情况向本单位汇报。

当辩方完全承认控罪之后，法官问他知否自己是在劫掠劳动人民的财产，并且也是劫掠他的家庭的财产；还询问他究竟是否认识到他的犯罪的严重性。犯人说他已完全认识过来，并且作自我批评地说：“当全国都在进步的时候，我却大倒退的走回旧路去。虽然我过去的生活和表现坏透了，但政府也给予我新生的道路。我的薪金虽然很足够，但自己还不满足。由于贪婪成性，所以我才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检察官要求法庭按法律判处最高的刑罚。他的理由是：被告没有自动坦白罪状。即使当同厂工友于去年五月第一次发现他的舞弊事件时，他仍然不将其他行骗事件坦白承认。后来，只有当工人们搜集到一切证据、治安当局将他拘捕后，他才向警方供认。

之后，莫法官希望聆听辩方律师的意见，后者说话的意思大约如下：

“被告完全承认罪状，并且表示了他对本人的错误深感忏悔。人民法律第三条是双边性的。它一方面指出可判处刑期，另一方面又提出可以用劳动教育的方法实施再教育。对我们来说：对承认并忏悔的犯人宽大，对至死不悟的犯人从严——是我们行事的原则。被捕后，犯人的确迅速承认错误，并且完全全地坦白了。在（治安当局安排的）一次到农村的旅行中，他亲眼看到人人都在辛勤劳动，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而他自己却拉他们的倒车，企图推倒它。在他本人的家庭中，其他成员也在努力参加建设工作。现在，他内心觉得惭愧了。我们应考虑他从前所过的腐化生活所留下来的残余影响，并准许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本人认为他的态度还算好。我希望法庭能宽大处理。”

莫法官转身面向犯人——后者明显地颤抖起来。“你还有话要说的吗？”杨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将诚实地服从任何加诸我身上的刑罚，并且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

当法官们商讨该案的判决时，法庭暂时休庭。它只不过需要吸一支香烟的时间。在庭院里，我跟一个略懂英语的年轻电工谈了起来。他与杨同在一个公司工作，我问他杨怎样花掉他骗来的金钱。

“他把部分钱花在只有资本家才去的、价钱昂贵的馆子里。当然啦，有人看见他在那些地方出入，于是便产生怀疑。听说他还与几个坏女人相好，所以他要钱来跟她们过夜。娼妓吗？”

不是。但是这里还有为数很少的坏女人靠跟男人造爱赚钱的。”

按盗用国家公款的罪名计算，杨有可能被判高达十年的刑期。当法庭重开时，莫法官再一次重述了该案的要点。然后，他将过去腐化堕落的上海生活与今天的新生活比较了一番；最后他说应该给予犯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罪名是很严重的，但犯人现在已完全承认，并似乎诚心改造自己。我们考虑到在接受了再教育之后，他仍然可以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这个事实，因此，我们的判刑是，”他停了停，说：“三年。”

犯人被告知在十天内有权上诉。然后法官宣布退庭。每一个人面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神态。片刻间，法庭变得空空如也。临别时，我望了望这间灰砖墙建筑物，这里大概是传教士们从前唱圣诗和替人们祈求赎罪的地方吧。之后，我漫步走过这些似乎变得灰暗的街道，经过灰暗的黄浦江，一直步行回到从前属于沙逊先生的酒店。

鼎足而立的三镇

在汉口机场，一位名叫李照的工作人员到来迎接我；他是身材短小、胖墩墩的、充满活力而且强壮的中年汉子，年约三十多岁，党员。他肯定是市委委员，当地一位姓李的党委书记的一个得力助手。（我与李后来有一面之缘，并一同喝茶和谈了一会儿。）李书记是武汉市专门接待组的负责人；他是个大学毕业生，略通英语，说起话来谦逊有礼、令人愉快，不象其他人那样胡乱套用政治术语。

“小个子”李照从前是红军里的“红小鬼”。他告诉我说，他于十二岁那年便已参加了山东省的抗日游击队。从那时起，“军队便成了我的父母亲”。一九四九年，政府将他和李书记以及六十个年轻人一同送来开始重建汉口市的工作。“那个时候，由于这里的住所极端缺乏，所以我等六十个人被迫要挤在四间房子里。”从那时至今天，住宅区的面积“已增加了一倍多”。在谈起新工厂、学校、医院和桥梁时，李照总是带着一种曾事事亲力亲为者的自豪感。

长江中游鼎足而立的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现合称为武汉市——确实目睹了一些惊人的巨变。对于一位老中国通来说，最高兴的莫如是见到长江之上起宏图，一条铁路公路两用大桥，飞架在汇于汉口的长江和汉水之上了。武汉长江大桥长近一英里，是一条完全现代化的、极为美观实用的大桥。建筑工程于一九五八年完工，它首次将南北中国用铁路连接起来，并且为西伯利亚到广州这一段遥远的路程，提供了一条不断的干线。

汉口一地的人口占了武汉市二百一十万人 口的三分之二。与上海、北京及其他大城市一样，武汉现在是一个将工农业作整体式管理的城市。若论整个市的面积而言，武汉市包括了八个区，全部居民是八百四十万（区是市的独立行政单位，约等于美国的自治市镇）。规模庞大的武汉钢铁公司就坐落于其中一个名叫“青山”的区里。

“武钢”建设工程始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厂内的现代化高炉便首次出钢。早在一九〇八年，“武钢”附近便已建有一座小型的钢铁厂，铁的来源主要依靠附近的大冶铁矿，但

当时的生产量却是微不足道的。外国及国民党的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大冶的铁质很好(铁占百分之五十)，但量却不多；一九四九年以后，彻底的勘查证实和发现了还有更多新的与蕴藏量更丰富的矿藏。所以，政府便在那时决定将汉阳变成华中最大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中心，与铁矿成为牡丹绿叶互相映照的是距离汉阳不太远的萍乡煤矿。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炼钢必需的焦煤，足供“武钢”需要。现在，萍乡煤矿已经由电力火车与现代化的、半机械化的大冶铁矿联成一气。

武汉钢铁公司的黄总经理亲自领我到处参观，在短短的一天内，我象跑马看花似地走过它的一些车间、高炉、电厂、水泥厂、实验室、学校、住宅区和文娱中心。黄是上海大学毕业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战后曾在鞍山钢铁公司接受该项业务上的训练。“武钢”中大多数负责领导工作的技术人员，都是从“鞍钢”中招来的。他表示“武钢”仍然十分缺乏技术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但是，这个决口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以由本地的“青山钢铁学院”的毕业生们填补上；该学院共有全时间学生五千名，学员则由工人业余技术训练学校提供。

据称，目前“武钢”的生铁和钢的产量各为八十万吨(当时只有一个主要高炉和一个巨型的露天炉床参加生产)，但在我参观时，二号高炉已超出额定时间建成，并准备在一九六一年正式投产，预算单就这个高炉，钢和铁的产量便各达一百万吨。

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我也很难以专家资格说出“武钢”的规模；但我可以感觉的是：无论在各种建设和生产看来，“武钢”也足可以与东京附近的现代化的“日本钢铁公司”比美——后者的产量与“武钢”相若，本人曾于一九五九年前往参

观。然而，“武钢”有很多方面优于日本钢铁公司，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武钢”工人的住宅区和各种社会福利。“武钢”住宅区的总面积超过了一百万平方公尺，全部都是——一座座占地甚广的三层高的新楼，楼宇之间尽是绿树成行的街道。^②住宅区的标准与我参观过的国营工厂的工人住宅区约略相同；住宅的面积则按家庭的大小与收入成正比例。工人们的工资平均每月六十五元，学徒由三十二元开始，技术人员最高的有一百零七元，工程师的最高薪额则达二百三十元。

趁着这次机会，我要求参观一下工程师的家庭。于是在一天下午时近黄昏之际，我踏进一座居住着十四个家庭的楼宇内，然后探访其中一个单位；这里住有六个人，房子内计有睡房两间，一间小厨房，厕所和花洒浴室。工程师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是个中学生，刚从学校回到家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厚棉布上衣，宽大的裤子和厚底胶鞋。年纪只有七岁的小妹妹，穿着一件黄色的毛线衫，站在他旁边天真地笑起来。另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和一个九岁的女儿仍然留在学校中；母亲解释说，他俩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那天留在校中值日。她对我说，丈夫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工程师，现在每月工资一百七十五元。她本人是小学毕业生，部分时间在一家公社办的工厂参加工作，月薪二十四元。他们全家早晚两餐都在食堂中用膳；早餐及星期天的三餐则在家中开膳。他们每月的总支出如下：饭堂伙食费，七十到八十元（粮食配给由二十五到四十磅）；非配给口粮及杂支，三十元；衣着、书籍、“额外支出”，十到二十元；房租及水电费等十一元；储蓄，三十六元。为什么储蓄额是“三十六元”那么奇怪呢？国家发行的公债每券四元；他们每月买入

九券，那不就是三十六元了吗？我问他们能否将债券换取现金应用。“当然可以了。我们需要钱用时就可以换取现款。”做母亲的回答说。“购买国家公债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既可以储蓄余款，另方面还可以协助建设社会主义。”

武汉重型机床厂无疑是青山钢在本地最大的用户；该厂于一九五八年正式投入生产，当时制造四十六种重型机械。到一九五八年，生产已增至三百六十九种；一九六〇年的指标则为六百七十种。所谓“重型”者，是指一些巨型的机械，如我参观时正在生产的、重达四百八十吨的龙门刨床和一具长达一百二十五英尺的金属切削机。此外，各种碾压机、磨床、打模机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切削机械，正在大规模地生产。想当年，在我最后一次到这个城市时，这里连一具最简单的现代化机械也不能生产，更遑论重型机械了。抚今思昔，令人感慨万千。正是：神州临巨变，武汉换新天。

在这工厂里，我获知厂内百分之八十的成年工人都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工厂还办了一所容纳八百名十六岁到十八岁青年的半工读学校。学生们到十七岁时，便要到厂房参加两个月的实地工作，八个月在课堂中学习各种基本知识，另外两个月是假期。十八岁时，他们有一半时间到厂房工作，另一半时间仍在课堂学习。厂内的大小乐队、礼堂、舞蹈、足球场、可以划艇的人工湖，体育队，戏剧组及各种俱乐部等，都是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工厂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厂内百分之八十的机械都是中国制造的，进口货只有百分之二十。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武汉对于教育和健康设备等方面都有

周详的计划，这使它成为中国较先进的城市之一。目前，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滨，新的工人疗养院与休养所象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武汉市可以说是中国第三大教育中心，而同济医学院及其属下医院，则可以说为这个教育中心增添异彩。如今，医学院及其属下各医院，实际上已成为全市各地的小医院和卫生院以及一个新卫生制度的中心。我发觉同济医学院内的儿科医院和总医院，都是美轮美奂、十分现代化的建筑物。他们共有医生二百五十人，其中九十二名是女医生。同济医学院的专业教授和讲师共一百五十名，另外武汉大学还拨出近三百名的兼任讲师到院中协助。目前，医学院有学生三千二百名，此外还有六百四十名夜校学生和几千名参加医科预科函授学校的学生。

事实上，武汉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实较这节短文所提出的重要得多，但是由于不少的西方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已出了不少书籍作专题研究，所以这里也不再重复了。外籍人士参观武汉的机会毕竟比较多，因为该城市正坐落于主要的“旅游线”之上——那就是：北京——上海——武汉——广州。

四川：天府之国

按我等所乘的苏制四引擎客机的航程算来，重庆约位于上海之西一千英里，但若沿长江乘船溯流而上，路程则远了接近一倍。自一九四三年以来，我便没有再到过重庆了，当年该市是中国的“陪都”。重庆市的人口达二百多万，是四川省最大的

城市。若四川不是一个被崇山峻岭所阻隔，并且紧贴着西藏高原的省份，而是一个独立的陆地的话，它本身便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国了。它几乎拥有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而且异常丰富；它还有各种不同的气候——从喜马拉雅气候到亚热带气候——这使它能种植中国任何地区所能种植的物产。在基督教徒入访中国之前，四川省在中国人心中便早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是，在过去，四川却被弄成劳动人民的地狱。

连西康地区在内(最近并于四川)，该省的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英里，即比法国还要大一些。一九五七年，官方发表的人口数字是七千二百万；到一九六二年，大概已达八千万，即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由于境内贯串着无数的河流与溪涧(“四川”一词的意思就是四条河流，言其多也)，它蕴藏着巨大的水力发电的动力。按正常的情况计算，四川出产的大米约为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大有盈余。若中国的运输系统能使四川的粮食迅速地分运各地的话，单是这个省所能输出的粮食，便可以缓和华东与华南因轮番遭受台风与天旱而引致的暂时性缺粮现象。

在一位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接待员陪同下，我们乘汽车自重庆机场出发——该机场面积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机场相若——在一条碎石路上奔驰了二十英里之后，来到了新的四川省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的上盖是模仿北京天坛的式样建筑的，是一座建筑工程庞大、巍峨壮观的建筑物，参观时给人以压倒一切的感觉，就象参观赖特先生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内的巨型浮雕时一样。在这座双重超级建筑物之下，是一座高两层的酒店，既现代化又设计得非常舒适。这里一间有浴室、露台的房间只费三

美元，美味可口的中国食品也比较便宜。步下这座巨型建筑物的宽大石阶，面前就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大会堂对面便是当年蒋介石用作“国家办公厅”的大厦。后者现改为市委办事处，市长办公室也设在这儿。在到达重庆市的次天，我被邀请到该处喝下午茶及进晚餐。

重庆市的负责人在答复我请求他讨论“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指出主要是怎样可以使粮食增产，更好地支援需要的地区，以及将粮食运往外地的方法。这儿农民的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实在“吃得太多了”；近期该省也闹旱灾，但四川仍然有大量余粮运往各地。海外报道西康地区的珞巴族人不断制造麻烦——一九五七年，“西藏叛乱”首先在西康开始——所以我问他是否属实。他说这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报道，或是以讹传讹而已；现今全国都非常平静，虽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偶尔还会发生汉族官员被谋害的事故。

重庆市的负责人强调指出，整体来说，四川仍较沿海一带的先进地区落后。他补充说：“任何公正不阿，熟知这个从前惨受鸦片荼毒的省份的人士当可看到本省人民已经根本地转变到好的方面来了。”

在短短的三天访问中，我实难对他的话作任何的评价，况且我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重庆及其周围的转变而已。然而，倘若世界大战时曾到重庆市的美国人旧地重游的话，他们当会发现这再也不是个污秽的城市了。铺上三合土的街道已替代了垃圾堆积的横街窄巷，而总长二百五十英里的沟渠，加上条条街道的卫生小队，已将从前横行霸道的重庆老鼠差不多消灭得一千二净。从前，人们行走在破破烂烂的石级上，或乘坐轿子到

河边时，总是要小心翼翼，提心吊胆，以防滑倒的危险。现在，这一切都已重新建造一番，轿舆与人力车也一并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角度较陡，供货车专用的马路，一直伸向码头；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悬索吊车路轨。“山城”的山顶上，兴建了一座新体育馆，一个市体育场(可容五万人)，一个公园和一个文化宫，就象市中心区一样。山顶周围是十二家高等学府，从综合大学以至医学院，共招收学生一万九千名。

重庆市负责人表示市区内的住宅，较十年前“多出了一倍以上”。大多数的建筑物外表很不错，沿岸一带还保持有不少用竹建成的房子。在日益增长的工业区里，我看到了一座座占地颇广的砖砌建筑，四层到六层不等，周围多是植满树木和一大片菜园。从外型看，它们跟西方的传统住宅区可说不分伯仲，但里面的装饰则简陋得多。虽然如此，居住环境已大为改进的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这样的建筑物也只是一小部分人才有资格居住。

无疑，我目睹重庆市及四川省内其他地区的最巨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化交通的建设已将四川一贯以来的孤立情形粉碎了。在一本战前著作的，到今天仍然有高度研究价值的杰作——《中国地形概说》一书中，乔治·B·克雷西指出：“……(在四川)，动物稀少，车辆难见，铁路只是梦想，运河难凿，河流太急。……如比治曾经说过一样，人类不过是‘最常见的动物，通商的工具和驮运货物的野兽罢了。建筑道路的费用比人命贵得多。’”

自新政权执政后，重庆至成都的铁路(三百英里)，两年便修筑成功，并且已于一九五三年通车。到一九五六年，较长和

建筑难度大得多的成都——宝鸡线(四百五十英里)也开始启用。通过数十条凿通岷山山脉的隧道，宝成铁路把四川和西北以及华北各地都连接起来。此外，还有其他的铁路一直伸展向南方。一条贯通了贵州省境到达云南，直抵越南边界。据说已建筑了三分之一的重庆——汉口铁路，最后将会把四川与长江中游连接起来——以往从重庆至汉口的唯一途径是：乘小船在极端危险而湍急的长江中直泻而下，此外别无他法。在解放后新筑的公路中，最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成都附近的雅安镇直通拉萨市、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川藏公路，这是一九四九年后建成通往西藏的三条公路之一。建设拉萨第一座发电站的重庆制造的发电机，便是从这条公路运去。

虽然今天四川各地已有无数的货车、胶轮拖车和火车担负起繁忙的运输工作，人力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力量。到目前为止，四川已筑有一万五千英里的道路，但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发展，这里还需要十倍以上的长度，要十倍以上的车辆。按现在迅猛向工业化迈步的情况看来，四川当可以有力量提供上述的一切，以及可以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重庆周围是省内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但很多城市也有各种机械出产。一九五九年，这个省的铁和钢产量，分别是一百零六万吨和七十万吨。

据估计，四川省于一九七〇年便可以做到工业上自给自足。勘测的报告指出，该省内煤的蕴藏量为全中国之冠；焦煤的藏量极富，而且多接近铁矿，便于开采和利用。最近，勘测队在盐边县(近云南边界)发现了大量的铁矿，据报道单该区所蕴藏的铁，足可以在可见的期间内供应全省重工业的需要。内江

和越隽两地的油井正在开发中，这两个地区的天然气非常丰富。此外，四川省的铀的藏量大约仅次于新疆而居全国第二位。铜、铅、石棉等矿物的藏量也很丰富，并且都已被开采中；另外，四川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产盐区，川盐远销全国各地。

路易·艾黎对成都市一个展览会的描述，颇能表达中国人民群众对工业化灿烂的前景所怀有的惊喜与热忱，这一切我在中国内陆也可以感到——这种感情中的诧异，不协调和纯朴。“在该工业展览会展出期间，人们纷纷排队参观，”艾黎写道：“他们之中包括有中年人，甚至缠足的妇女，穿着蓝色长袍，以白色头巾包在头上的农民，城市的居民和数不尽的年轻人。他们深深被展品所吸引着。其中有许多展品是机械的简化模型，甚至在公社中也能轻易制造。”

四川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西面有高达二万五千英尺的贡嘎山，西北有一万英尺高的岷山，南面和东面则逐渐降下为普通山脉和褶皱高地，形成了长江上游的峡谷。四川的中部地区是一个肥沃富饶的盆地，这里从前一度是一个巨大的湖泊。这个“红色的盆地”，高度从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峡谷起，一直升到四千公尺的台地或该区特有的平顶山岭，年降雨量约三十五到四十英寸。霜降极为罕见，每年耕作期长达十个月，双造作物最为普遍。主要物产除稻米和小麦外，重要的作物还包括了棉花、甘蔗和著名的川橙、竹、油菜、烟叶和桐子油。

当克雷西博士观看中国的资源时，虽则他所看到的并不是最优等的物质，他也能毫不夸张地将“红色盆地”中的岷江平原，描写成“地球上最可爱的植物园之一”，他还总结地说：“世界上再没有如此肥沃、生产如此丰富，以及人口那么稠密的、

面积同样大小的农业区。”象长梯阶似的梯田，自山顶直开至山脚——有些山坡可能陡至四十五度——尽皆满植肥壮的禾稻，一片片狭窄的水稻田在阳光照耀下，就象百万面亮晶晶的镜子一样，闪闪发光；这一切都是四川省的特征。从高处往下望，但见绿油油的，金黄色的作物迎风摇曳，活象一个有格子的西洋棋盘似的；山坡上，松柏科植物茁壮生长；无数的小瀑布倾泻而下，汇成千百条溪流，滋润着坡下的羊齿植物和碧绿的竹丛；奇花异草争妍斗丽，色彩缤纷的热带小鸟欢快地翱翔——好一幅美丽的大自然图画。吸引人的还不止此哩。放眼远眺，西藏高原边陲的山峰高耸入云，气势异常雄伟。难怪自古以来，四川便产生了那么多有名的画家与诗人了。

“这个地区为一个繁荣而进步的民族提供了优异的居停，”克雷西博士早在三十年代便如此指出：“但象大自然所给予人类的其他赐予一样，它的容量还是有限度的。……”他认为当时尚未足五千万的人口已经太稠密了，而可耕地的生产实难以支持这个巨量的人口。过去的情况确实如此。其中另一个原因是：“鸦片罂粟种植的广泛程度实在使人吃惊，”克雷西博士写道。在有名无实的“镇压运动”中，农民们“不论有无种植鸦片……也要被罚款充数。”那个时期，中国人食鸦片差不多是全国性的；我常常见到一些农民将罂粟种撒在甘蔗田中，并且当作镇静剂似的给孩子们服食。

在抗战时期，凡属外国人能见到的地区，都实施强制禁植鸦片，但我在一九三九年自重庆到延安的道路上，各村落中的旅馆仍有大量鸦片出售；但它能有效地使某些旅客忘记了店内的跳虱和老鼠，却是毫无疑问的。在餐室外的街道上，往往见

到一群群满身蚤子、披着破衣烂布，甚至赤裸的流浪儿童麋集在一块，等候客人将吃剩的残羹抛出来，然后蜂拥上前拾起来，聊以充饥。

过去，我从不希望见到乞丐；非但如此，为了自己安全起见，还要想方设法避开他们。一九六〇年，我在重庆周围百觅不见乞丐的踪影。街头上的流浪者也不可复睹。我再也看不到有人身穿污秽的破衣裳，虽则有很多人穿着——干干净净的——补钉衣。在中国其他几个地区：包头、陕西、河北、云南等，从前都是种植罂粟的区域，但现在再也看不到鸦片生长。在一九六〇年的旅华途中，我连一点点的鸦片味道也嗅不到，其他外国访客也是如此。

四川省内的卫生与公共医疗事业的成果，并不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得太多。重庆目前拥有三十万名“保健”及体育机构的会员。与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在中心体育馆的一次谈话中，我获悉每个成年人每天都需要规定做十分钟体操。市内共有十三万名“及格”的运动员(分为四个等级)，其中一人在一百公尺短跑中曾跑出十秒三的纪录。体育训练员目前正自小学中选出“身材高大和动作敏捷”的儿童加以特别培训。我想中国可能准备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一振声威吧；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奥运会的席位仍然被台湾所窃据。在体育馆里，我观看了两队十来岁的女孩子进行的一场快速篮球赛(重庆现有二万队篮球队)。中国女子国家队的队员们，都是身高六英尺的高女。这些重庆女球员，平均身高也达五英尺十英寸——在过去的四川人中，她们都可以算得是女巨人了——她们所穿的短运动裤与紧身运动衣，将她们的美好身段表现无遗。我要求替她们拍照留念，

但可惜当天未带闪光设备。后来她们操到球场外时，都已穿上了运动外套和长运动裤了。就这样，我错过了拍摄中国姑娘的美腿的照片。

据路易·艾黎指出，四川的粮产较战后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论怎样说，该省的食物远较其他地区富裕，虽则市内的粮食配给额也管制得很严格。在上海和汉口两地，我仍然可以在孩子中偶然发现一、两宗营养不足的例子，但在重庆，无论怎样留心也看不出来。在我随意前往参观的幼儿园和托儿所中，环境和设备虽然未臻完善，但孩子们都很清洁，很健康。在一家日校里，我看到孩子们的早餐包括有热气腾腾的白饭，蒸馒头和豆浆等；在另一所学校中，则看到午饭包括了面条和两种蔬菜。这里，孩子们每天两餐的伙食费，每月只需六元。

重庆市负责人的评论很正确，城市食物的供应确是他最头痛的难题。为了要从农民中收购更多粮食，城市中的人就要生产更多农民们需要购买的物品。除了在大连和昆明两地之外，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地方的百货公司内的物品，有重庆市的那么丰富。增加生产，保障供给这条路线似乎已有了显著的效果。他对我说该市的“巨变”是：在消费品的制造方面，“重庆现在已经做到百分之八十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而一九四九年前，它要自外地输入百分之八十的需要。

这里，“需要”一字是个相对的名词；你当然不会想象重庆的百货公司会象萨克斯和些尔佛烈殊百货公司那样巨型。重庆最大的百货商店大约与香港的国货公司同等规模，后者以价钱便宜著称港岛。在重庆市的街道上，农民装束的人群络绎不绝，拥挤途中，而且人人都象非常“水头充足”似的。我看见一

位缠足的妇女花了六十块钱，买了一件毛里的织锦缎外套。另一位妇女则与儿子讨论着买童装鞋的事，鞋子的价钱约在四到六元之间，但她的眼睛却频频瞟向着另外一些标价十四块钱的、质量很好的皮鞋。

重庆市场上供应的消费品，有不少是在市郊公社的工厂中，利用家庭主妇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这种方法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便在中国广泛地展开。无论在哪个地区，市郊公社的组织都以街道委员会为蓝本。主要的创造是将没有职业的工人家属们——主要是家庭妇女——动员起来，让他们到手工业合作社或看小型机器设备的工厂里工作。这些新型的卫星城市里的小工厂，大部分负责制造消费品，也有些为国营或市营的工厂制造部件和原料。许多从前未曾运用过工具或操作过机械的新工人，则由个别的技工或技工小组，或邻近的国家工厂的工人负责教练。

在北京——东北——云南的整个行程中，我看过十多个这样的郊区人民公社。它们的工作条件既有良好的，也有较差的。在重庆，我参观一个公社办的铸铁工厂，工人们在简陋的仓库内熔铸金属部件，但我对这种产品的最后用途不甚了解。在东北访问时，我也曾到过一些雇用数百女工的工厂参观；那些工厂的设备优良，光线充足；产品类别很多，计有单车、测量尺、轴承及颇有用途的各种电器部件。这类工厂的薪金一般较低，最低的工薪只有二十元，较高的为三十五到四十元左右。在大部分的小工厂里，工人们每天工作六小时，另外有二到三小时学习文化和政治，每星期工作六天。

据悉，不论在重庆或其他地区，人们可以随意光顾社办的

饭堂。平均而言，大多数的家庭习惯在饭堂进午餐，晚饭则在家中进食。我曾在各地串门，也发现一些丈夫收入好的家庭妇女，较喜欢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事实上，在一些较穷的公社里，有两个孩子以上的母亲，进工厂里所拿到的工资在扣除了托儿费用后，也确实对家庭帮补不大。

在我参观过的大型市郊人民公社中，重庆附近的七星岩人民公社，可以说是最具典型的一个，虽然在富裕的程度，它还赶不上如沈阳郊区的公社——那些地区甚至开办庞大的近郊农场，专门种植菜蔬和畜养牲口，以供城市所需。七星岩公社的面积约有市内一个区的大小，人口七万六千，其中的二万二千名成年人，都已受雇于国营或市管的机构之内。

七星岩最大的企业是电器零件制造厂，约雇用了一百名工人，每月产值估计有四万元。其他工厂的产品包括有鞋、衣服、皮革、砖和竹器制品。厂里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工资平均只有二十三元，即不及国营工厂平均工资的一半。公社一共开设了三十六家小型工厂，共雇用了四千一百六十名工人，有些还属于散工性质；其中有一千四百名主要负责托儿所、老人院、幼儿园、卫生站、食堂和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服务中心主要为工人们洗涤工作服、缝制衣裳、补衣、修补鞋子以及售卖少量的日用品和戏院的戏票；他们之中也有临时的婴儿看护。

据报道，在一九五九年，全中国的市郊人民公社的生产总值达人民币二十亿元。它们还准备在一九六〇年将该数字增大五倍。这一年，它们所雇请的女工人可能达到四百万之多。然而，无论在那个市郊人民公社里访问，人们总是告诉我，它们

还只处于“试验阶段”——这与农村人民公社的情况相反——而且没有人可以预告它们的将来。

在重庆市逗留期间，我看不到任何外国人。过去，四川人普遍对外国人怀着仇视的心理，甚至对居于外国中国人也是如此，但今次我觉得人们对我只不过是感到有些好奇罢了。当我被介绍给人们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彬彬有礼地对我表示欢迎，有些甚至还表现得很热烈。然而，街道上的行人，却很少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的存在，这个情形就象在法国旅行的美国游客，得不到法国人注意一样——如果后者没有东西可向游客兜售的话。

西 藏 实 况

西藏是我经常希望能亲眼看到的地方，但当我居住在中国时，时间与机会却从无相合之缘。这次，我更难强硬要求特地安排一次参观的机会，因为我曾表示这次旅行能沿着我走过的旧路漫游，而中国是知道我从未到过西藏的。事有凑巧，英国记者斯图尔特·格尔德刚好来到北京，目的在中国采访点消息在英国报章上发表。他也很急于到西藏看看，所以我们一起请求给予航空上的照顾。

时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当时西藏早已经开始下着漫天大雪，是以定期班机也取消了。这时中国只有一些军机才设有高空飞行设备，可以安全地载客飞越二万英尺的崇山峻岭。周恩来通知格尔德说，如果我们坚持前往，他可以给我们准备一架军用飞机，但我们可能因气候恶劣而被迫羁留于新疆达数周之

久。他还特地对格尔德说，如果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维克斯飞机制造厂老早愿意向中国售卖她所制造的高空飞机的话，事情便简单不过了。基于上述原因，格尔德和我便只有放弃这次旅行，所以我跟西藏又缘慳一面了。我之所以特地在这里一提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因为当时我很奇怪中国为何不向苏联购买这种飞机。数月后，我从报章上得知赫鲁晓夫已将一批高空直升机售予给印度用来巡逻中印在西藏的边界。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阿姆斯特朗·维克斯飞机制造厂终于宣布已经将五架巨型的涡轮喷射客机售给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苏联曾数度表现了对印度的偏袒，而这不过是其中一次罢了——相对来说，英国对于美国对中国禁运一事却表示了不满。

西藏本来有两个“活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翻开历史查看，远在一七五一年，当清朝镇压了一次巨大的西藏暴乱之后，班禅跟中国的关系便较达赖密切得多。当年发生暴动的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派人暗杀了两个清朝的高级官员——并且将拉萨内的中国人杀个精光，所以乾隆皇帝特别派遣大兵进拉萨收平叛乱。乾隆的报复也是充满血腥的镇压。他的部队还跨过了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打败了正在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之后，乾隆皇帝承认班禅喇嘛是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的首领，并将达赖喇嘛在两方面的地位都降低了一等。那时候，西藏与印度（当时仍称印度斯坦，被蒙古族的土王及他们的封建王国所控制。）两地之间的疆界由乾隆划定于今天中国所要求的地区附近——在有些地区则远远超出今天中国所称的界限。

虽然，在清朝末年，西藏当局在英国的怂恿下，曾经试图举行反叛，并宣布脱离中国，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外国政府质询

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军队不久即镇压了这次叛乱，而英国人从来也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英国，中国和西藏的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镇曾经讨论过一条三边协定。协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要寻求建立起外西藏的“自治权”。但北京旋拒绝承认这个西姆拉协定，认为它触犯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史实。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汉族人民不断向西藏东部的草原和高地移民，所以内西藏逐渐汉化了。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这些地区便自然地划归于中国本部的版图之中，成了两个新的省份：青海和西康。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又成了英国、中国和美国之间所要讨论的题目。在一九四三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承认“中国正式的宗主权”，但又表示希望保证拉萨政府拥有“自治权”，以及“与列强有交换外交代表”的权力。在回答该问题时，美国毫不含糊地拒绝支持第二部分要求，它宣称：“美国政府一贯以来皆尊重这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极早便宣称她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且中国的宪法已将西藏列为中国的合法领土的一部分。敝国政府对该两项事实不表示任何的质询。”

这一切对于一百五十万西藏农民的可怜处境有何帮助呢？甚少。到一九五〇年，整个西藏地区还盛行着绝对的封建主义，大部分人民仍然陷于农奴制度的深渊之中。喇嘛与贵族几乎占有了全部的土地、牲口群和其他财产。由于长时期迷信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农奴们对鬼神、地狱产生了无比的恐惧，再加上统治者对逃跑的农奴所施行的酷刑和死刑，使整个人口屈服在

农奴主的淫威之下，历久不敢反抗——就象所有的封建制度无二。

救星终于来了。中国共产党人来了。他们一开始便马上将贫苦的西藏人民组织起来，反对喇嘛制度，无疑是准备将整个统治阶层彻底推翻。由于看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喇嘛和贵族于是拒绝在“过渡时期”中扮演他们应做的角色。他们发起叛变以及逃往外国，因而更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但这并不表示西藏或其人民也走上灭亡之路。相反，土地、山脉、河流和人民依然存在——西藏人民今天变成了一个自豪的民族，就象当地的山峰一样屹立于地球之上，并好象向世界宣布，他们永远都坚决地站起来。

西藏目前驻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在未来的数年内，这个现状大概也会维持不变。翻身的农奴受到军事训练并且武装起来，他们的劳动力被用来建设公用事业。在前属喇嘛的庙宇和房屋内，学校、医院和军营相继设立，一支现代化的藏族部队已经训练出来了，新建的公路已将拉萨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自治区首都首次见到了它的第一座发电站和第一家炼钢厂。分得田地和产业的西藏人已准备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今天，在中国各地进入技术学校和接受高级教育的藏族党员成千上万。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得从头学起。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为了预备在西藏展开的一个群众性教育计划而接受训练的。一九六二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特别训练班中，第一批藏族学生光荣毕业了”，并且都在为“建设一个新的西藏的岗位上”承担了重要的任务（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地质学者）。据报道，“差不多整个藏族毕业生队伍的成员”都是农奴的子女。与

此同时，汉族的地质学工作者也没有浪费时间，他们与藏族兄弟并肩工作在再也不是不可攀越的西藏群山之中，并且据说已找到很多有价值的资源。

在一九五四年，印度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也承认了后者对西藏的主权；在这方面而言，英国政府倒比印度早走了一步。北京也跟着保证会尊重西藏的“自治权”；但北京的态度显示了她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印度与西藏的边界却一直成了悬案。当两国政府首次在从前难以到达的喜马拉雅山区对峙时，他们在有关疆界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已经设法与尼泊尔划定了满意的疆界，而且也跟缅甸在双方互相让步的态度下达成了协议。那么，为何中印边界的问题竟然蓦地变得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有关克什米尔的分界问题上那样的僵局呢？

中印争端的起因缘于印度无理干涉中国建设一条西藏南部直通新疆的公路。但是，当印度当局发现该公路时，它实际已竣工两年之久，由此可知中印边界一带的地区是何等偏僻了。直到一九五九年，印度才提出它的所谓抗议，接着便发生了中印巡逻兵冲突而引致一些伤亡的事件。该事件的背景颇耐人寻味：先是达赖喇嘛的逃亡，继而是一场有一些外国势力撑腰的“暴乱”，而印度对这场“暴乱”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也是紧随美国向印度贷款后发生的。美国政府当然还在继续承认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所以，既然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美国政府发现有机可乘之际，便可能会积极地扇动蒋介石的野心去“解放”西藏了。虽然，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边界活动（如空投军械或金钱等）的

报道可能未必属实，然而北京政府却非常严肃对待。就在这当儿，莫斯科还向尼赫鲁政府提供新的援助——中国的领导们大概或多或少都对此感到有些不满吧。在印度政府那方面来说，为了恢复执政党日益动摇的优势，为了缓和内部政治的危机，印度有些人叫嚣在西藏的问题上要采取“强硬的立场”。在综合了以上的情况时，北京方面认为印度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符合和平共处五原则，并且指责印度政府为了反对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正在图谋争取美国与苏联两国的援助。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我曾在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长时间地讨论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争论。尼赫鲁先生似乎认为北京报章对他本人的猛烈攻击较诸双方在边界上所产生的争端更使人不知所措——他表示需要更冷静地对待这件事。后来，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次与周恩来的正式会谈中，我对总理说道：

“去年，尼赫鲁总理对我表示，中印争端的基本原因可能是因双方都是‘新国家’，……新近独立，并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领导所致。他的意思是说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边疆中发生对峙的情况。……过去，印度曾一度沦为殖民地，而中国也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基于此，过去的疆界并不十分明显，况且当时的行政也无特别需要将疆界清楚地划出来。”

周总理答称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与缅甸不也是新近独立的国家吗？”他提醒我道。为什么“缅甸可以和中国解决了边界的问题而印度则不能呢？”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解答如下：“缅甸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而印度却不想就此解决疆界问题。他们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将西藏变成国际缓冲区。……他们不想让西藏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西藏。是以在西藏动乱被救平以后，他

们更表不满，跟着中印边界问题便冒升出来了。

“我国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那就是暂时维持现状，并努力寻求友好解决的方法。即使在那所谓‘麦克马洪线’一事而言（该线由英国单方面设立，而印度人也以之为准），虽然我们不承认它，但我们也从未越过此线南进。此外，我们也没有为准备举行疆界谈判而提出任何要求领土的条件。但印度一方却将中印边界问题看成是一张皇牌……即用以反对国内的进步力量，也用作索取‘外援’的资本。事实上，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彼此之间是友好的。目前的情况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

中国当不会认真考虑在渺无人迹，冰封千里的中印边界上展开战争。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清楚地表示过：倘若中印双方发生战争时，他将不会站在中国的一边而置印度的利益不顾。这个声明鼓励了印度将其注意力南转而引致她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以武力征服果亚——或许也想藉此以向中国炫耀印度的武装力量，并表示在“不可避免”时，印度将会不惜动用武力——这是尼赫鲁先生亲口说的。

导致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另一个因素（这并没有出现在双方有关边界争论的官方文件上）是尼泊尔王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在周恩来与缅甸签订了一个和平与友谊的协定后一个月，即一九六〇年三月，周总理亲往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访问，并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尼泊尔还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尼泊尔将保持中立——声明中暗示不单在任何方面的冷战如此，即使在任何的中印争端中也坚持这样做。在英国统治南亚次大陆期间，尼泊尔实际上是英国的保护国，通过印度北部

拉纳家族控制全国，该家族夺取了世袭首相的权利将当地的国王(属藏族和蒙族的后裔)的权力夺了近一世纪之久。然而，在一九五一年，皇位的继承人重新取得了权力，并且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制。一九六〇年，尼泊尔国王解散了国会，逮捕了当时的首相，并将尼泊尔的政策改为完全独立和严守中立的政策。尤使新德里感到不满的是：中国将贷款给尼泊尔的一部分用来修筑一条连接加德满都与拉萨的新公路，并且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建造。在一九六一年到中国的一次官式访问中，马亨德拉国王进一步加强了尼、中两国的关系。当时，印度很多国家主义分子，相信印度与尼泊尔的密切关系是由于中国的介入而致破裂的，并且害怕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使西藏边界一带国家的蒙族后裔的人民，与中国联成一气，孤立印度。

与此同时，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也因订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延长贸易贷款而大为改善。在尼泊尔与阿富汗之间就是引起争端的克什米尔地区。尼泊尔的另一边是仍属英国管辖的不丹公国，两者之间只隔着前属西藏管辖的锡金，英国于一九三〇年将她占为自己的保护国。这两个地区的人口中，很多也带有西藏人的血统。更往东看，在缅甸的北部还有一些未定界的部族高原地区——当年英国只是简单地称之为“东北边区”。在英国人撤走后，印度军队便忙于调兵遣将，镇压当地的那加族人的独立运动。

比对而言，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亚的力量，已是真真正正回复到二百年前那样，成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强国。至于新德里方面，则显然希望边界地区不会有那么强硬的对手。然而，可以确信的是：无论印度和中国，都不会为争夺这片对双

方皆毫无用处的、不能居住的山区而采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以争取“地图上的胜利”。

（注：在本章写完后不久，中国便对入侵中国边防、架设哨站的印度军队展开了全面的“反攻”，时为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突然挥军越过未定界的原因，据说是由于新德里企图恢复所谓“正确的国际疆界”。在一个月內，中国军队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边疆领土上，清除了印度的全部军队。十一月，中国同样突然地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并将中国军队从一九五九年来便一直被中国边防部队所守卫的地区撤出来。北京指出就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后，印度不断破坏这些未定疆界，才会引起边界冲突。在宣布停火的同时，中国主动提出自一九五九年的未定界向后撤二十公里，但要求印度也这样做。在中国军队向后撤之后，北京提议两国召开会议，商讨新的双方都满意的边界。一九六三年，中国实行了她那单方面的声明，将印度的俘虏和装备悉数送还给印度。新德里于是考虑中国所提的条件：在一九五九年未定界的两边设立一条四十公里的无人地带。

到一九七〇年止，中国军队所保持的位置得到了印度的正式承认。于是一个既无战争，也无最后解决的情势便保持至今。）

少 数 民 族

在中国，除了藏族外，其他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方较西藏还要大得多。单单云南一省内所居住的非汉族人，便较居于西藏内的藏族人多四倍左右。为了准备访问云南省，我曾在北京的民族学院中度过了一整天的时间。那里，我发现有来自四十七个民族，总数共二千六百名的各少数民族学生（包括九百名藏族学生在内），他们运用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共同生活，共同学习，

接受高等教育，被培养成为各族的教师和党的干部等。

那所大规模的学院象征着这个事实：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领土都是非汉族人民的“自治之区”。若将所有的自治区面积合起来，便约莫等于欧洲减去苏联欧洲之部的面积那么大。大多数的自治地区都位于中国的边防地带，但少数民族的中心社会却分散于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约为四千三百万。

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较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国还要多，而居于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各地的藏族人民，也较西藏本土为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维吾尔族人民五百万，此外还有五十万哈萨克族人居于与苏联的哈萨克联盟交界的地区。目前，有一百多万掸族人民居住在云南境内，他们与缅甸及泰国北部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在印度支那以北地区，还居住着与老挝人及泰国人有表亲关系的傣族与壮族人民。在百多种部族与少数民族中，过去因互相之间所存在的隔膜，故其文明的水平相距甚大；他们之中，有居住于森林之中，不懂营建房子，经常赤身露体的部族，也有如掸族那样拥有高度文化和先进社会的民族——后者还于一千年前统治过一个面积盖过云南和南亚的王国。普遍而言，少数民族的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部族和半部族，封建和半封建；他们的经济则属农业经济或游牧与农业混合的经济。从前，云南省的部分彝族人民播种农作物所采用的方法就象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先把一根尖锐的棍子插在地上，然后把一撮种子放进洞里，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良好的天气。

过去，少数民族的人民非但不愿与汉族人通婚，而且更对他们怀有很大的敌意。汉族通常将他们看成是蛮子或土著。中

国历代的统治力量承认他们之间的酋长，但却要在他们身上征收赋税与贡品。国民党当权时，该政府从未试图将他们团结起来以组成一个较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首次以完全联合的理论将少数民族组织起来的政党，并且真真正正的让他们在“联合政府”中占上一席位。

在北京民族学院中，我会见了历史系主任林耀华教授。他曾一度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与人种学的教授。他先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深造，一九四一年毕业。一九四六年返国后，便开始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他不肯直接用英语跟我交谈。与他一起会见我的还有校长办事处的一位张书记。张显然是党的代表，而林教授则负责该系的学术研究。

民族学院占地甚广，里面有二十一座建筑物之多——包括了教学大楼和宿舍在内。四座盖上中国式瓦面的大礼堂前面，就是一个植满新树的校园。在第二个花园四边，就是三百七十个教职员工的新居。他们共同管理着四个达到大学水平的系，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一切伙食，衣着和住宅皆由国家供给，所有学生都领有津贴费。

新疆、内蒙古、西藏、回族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所居住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总数，约为非汉族人民的四分之三。除了上述的区域之外，全国还有五十四个自治县和二百六十九个面积较小的自治镇。这些地区的政府组织，与中国其他地区无异，但他们的学校制度通常都落后得多。中央民族学院担负起了培养政治与技术两方面都合格的少数民族学员的任务；因而使扫盲运动与思想发展两个目标能在国内全面展开。在中国，有八个省设有特别训练学院，但中央民族学院却是唯一专门培训少

数民族党员干部的大学。非汉族人民可以并且已实行进入普通的汉族学校学习，他们的社会地位跟汉族人民一样。北京还在近年建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多层大厦——民族博物馆；任何访客都可以在这里对本问题进行视觉上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套政策，保存和保护各少数民族优良的文化特点，包括了他们的语言、服饰、民谣、音乐和习俗等方面在内。这是一种民族自治的政策，其目的是使各少数民族拥有社会主义自治权。在一九六一年，少数民族中的党员人数超过了二十五万人。

作者于上文曾经提及，中国现在的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苏联却只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林教授具体地指出了二者的分别。他说，自汉朝以来，中国各族人民便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之内的平等成员。在这二千年中，中国尚未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地步。在一八四〇年开始，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各族人民统统都受到迫害。按林教授的理论指出，他们都是于一九四九年后才真正获得自由。他继续说：在另一方面而言，沙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它侵略并控制了许多小国的主权。当革命席卷俄国的时候，苏联的劳动人民与殖民地国家同获解放。由于这些国家早已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们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拥有民族自治权的“自治共和国”了。在中国来说，少数民族从来也未曾到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的阶段。他们只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他们与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共享有一个光荣的名称——中华民族。

在云南省的昆明市，作者访问了另外一所民族学校，该校

共有学生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来自二十二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今天，居住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人民达六百万。彝族是人数最众的一族；此外，白族的人口也超过六十万（白族人与泰国人非常相近）。云南省内设有不少党校和师范学校。在昆明市中，最强调的显然是政治教育，但一个完整的中学制度已日趋完善，其中还包括了专业的音乐与舞蹈学校。

昆明学院的校园非常优美，风光如画；内有游泳池，各种新型的建筑物，一间完美的图书馆以及一流设备的科学实验室。在九十名教职员工中，有五十五名是非汉族人。作者曾经与多位教师及学生谈话，他们都表示已经不再信仰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宗教（他们之中有些人曾接受洗礼）。他们在学院中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能，学成后便回原地传授学识，以及负责领导当地政治与教育的工作。

当我抵达昆明学院访问时，恰巧遇着学生们正在排练节目，准备迎接中秋节。姑娘们穿着色彩缤纷的丝绒服装，在弹弄着地方乐器的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他们充满了活力，表露了极其兴奋的情绪，与其他地区参加表演的青少年一样。

云南之行

昆明市——云南省的省会，是我在中国内首次被炮火声惊醒的城市。自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后，昆明机场已经扩大了很多。作者在机场上见到了二百多架“米格”战斗机成行排列——这是本人所见到的第一个民航与军用飞机共同使用的机场。在乘车往昆明旧城的一条宽阔的三

合土公路上，我们驰过了一排排二到三层的建筑物，全部用红褐色的砖瓦盖成，占地广达数十英亩。据悉这些建筑物是陆军和空军的军校。建筑物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菜地，还可以见到士兵们操作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来往驰骋。在市郊附近的一个练靶场中，隆隆的练习炮声使人们惊觉云南是邻近越南的省份。在越南南方有许多美国空军基地。中国政府曾多次宣布“帝国主义者的飞机”不但侵犯北越上空，还经常侵犯云南省上的中国领空。

今天昆明的气候与我记忆中的一样宜人，空气仍一样清新爽朗。昆明素有四季如春之誉，而事实上它也当之无愧。在地形上，该市刚巧位于亚热带之北，高度约为六千四百英尺，气候可说绝佳——既不寒，也不热。雨量充足，但大多数期间，天空总是一片晴朗；昆明平原四面环山，常常沐浴于阳光之中。“云南”一词，可按字面作充分解释：意即在“云的南方”；真的，天上的白云在到达云南省之北的贵州高原时，便突然停下，化成浓雾绕群山。

二十四岁那年，作者曾乘坐大篷车经昆明往云南之西的大理湖，然后折向南方，过湄公河与萨尔温江上游，再南往伊洛瓦底江到缅甸北部（这个地区的自然景象确能使人耳目一新：“会唱歌”的巨竹、长尾鹦鹉、颜色鲜艳的山杜鹃，漫山遍野的山茶，红彤彤的枫树、成群结队的猴子，以及庞然大物的野象等等），当年，这条旅行线上并未辟有道路，篷车行驶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小径上，颇费时间；五百英里长的路途，竟然用去六星期之久。沿途尽是匪徒出没之地；我们雇用了中国士兵为护卫，每天索价一元，通常用作吸食鸦片之款。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才开了一条直通缅甸的汽车路。

目前，新筑的公路将邻近各省联接起来了，甚至在深入的内陆地区也可见到货车与公共汽车的踪影。当年法国人所兴建、由印度支那的河内与海防到昆明的铁路，现已从窄轨改成标准轨道。然而，如今仍未有自昆明直达中国海岸的铁路干线，但昆明出产的货品却可以绕过河内转运广州湾（北部湾）和广州市。现在，有两条铁路干线已将近伸进云南境内：一条起自东南部沿海的福建省，另一条则从四川经贵州入云南。

一九四九年前，云南省可以说是全无现代化工业的地区。今天，乘搭飞机越过云南省上空的旅客们，都可以看到无数环绕着小型的电力厂和钢铁厂的新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附近的山坡上，蓝湛湛的波光掩映的水库更为河山增添秀色。有一件颇使人感到诧异的事，值得在这里顺带一笔：远至洛阳市，我也曾见到一些刻着“云南制造”的大型机床和其他机械用具。虽然云南高原上较为肥沃的土地，只得全省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该省的天然资源却非常雄厚，计开：锡、铜、水银、锌、锑、磷、辰砂、锰、金沙、巨大的水力发电能量、丰富的森林资源等等，还有最近发现的煤矿及铁矿，据说也足以支持地方工业化之用。云南省的锡蕴藏量尤其丰富，居世界最大锡产地之列，它的产量现占中国该种金属外销量的三分之二。

云南省的面积约相当于波兰和东德两国的总和，但人口（约二千一百万）却只有该两欧洲国家总人口之半。西部大多是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巨大的河流分水岭，是以属无人居住区。南部近疆界的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北部民族相近的山民。但是，昆明市现在却增加了不少外地移民。

自一九四九年来，昆明市的人口已增加了四倍，到一九六一年已接近一百万，而它的面积也扩大了三倍。新工厂、新建筑一直伸延到郊区之外，砖和水泥的建筑物触目皆是，旧城垣似乎已经完全拆平了。街道都已扩阔并铺上路面，旧的建筑物或已翻新，或已由巍峨的新大楼取而代之。所以这次虽是旧地重游，我亦难以辨认旧的景象，只有往昔供水给护城河的那条小运河两旁所栽种的、仿如玉树临风的有加利树仍然屹立如故。一条宽阔笔直的通衢大道上，货车及公共汽车此上彼落，行人如鲫。沿着大道走到一个市中心广场前，只见一座三层高的百货大楼雄踞着广场的一边；信步内进，略为参观，日用品琳琅满目，不可胜数。

以下是一件令我颇觉新鲜的事儿：在打扫得一尘不染的街道上（在昆明市本地说来，这也是件新鲜的事），我看到一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带着口罩的妇女推着车子沿街叫卖牛奶，半品脱才要美元四分钱。但当我要求买一杯以饱口福时，我却被投以诧异的一瞥：“只有小孩子才有交易呀，同志！”然而，冰棒却是成人和小童都可购买的食物，而且在工业展览会中还有雪糕出售。晚上，书店里堆满各式各样的人群，我看到店中出售很多廉价的印刷品、书画、标贴画，甚至有很多复印着西方艺术作品的明信片，但却没有抽象画之类的东西。一个年轻的军官看到罗丹（一八四〇——一九一七，法国雕刻家，现代写实派代表）的作品“吻”的照片时，面上不禁露出羞涩的颜色；我想若他有机会看到《花花公子》杂志时，不知他会有何感想呢。商店中供应着丰富的食物，衣着和家庭用品，价钱订得很低。在一些作者本人认为不寻常的货品中，包括有七块钱一对的大肥鸭，

以及十元一只、五磅重的云南火腿。这使我想由于运输货物出口仍然困难、而且较为昂贵，是以云南本土的产品，大部分都留下来供应本地的市场。

上次(一九四五年)我到昆明时，该市连一个象样的酒店也没有。现在则已有多间投入服务行列，包括我所居住的，位于市东郊的西式酒店；我的住房很宽敞，内有私家浴室，连一日三餐在内，每天只要付四美元。酒店的对面就是雄伟的新市府大厦，周围则是很多新型的住宅区。在市中心大街的一个巨型建筑物里，我参观了工业展览馆，那里我看到了云南制造的公共汽车、水泵、发电机、纺织机械、电话设备、收音机、电单车、制香烟机、乐器、车床、柴油机、起重机、电钻、小型拖拉机、五金器具和电器用品、计算尺、外科手术器材、香水、化妆品和品种繁多的丝织品——其中一种棉布上所印的图样，颇使作者惑然：挂上了电灯的圣诞树！(可能是为还信仰基督的民族而特制的吧?)一种只有两个汽缸的小型汽车也在展览馆中陈列出来；据说该种小汽车到目前只生产了一百二十辆；每部定价人民币四千元。

“云南府(昆明的旧称)到处可嗅到鸦片的气味；烟枪和烟灯充斥各市场；购买鸦片就如籾米一般容易，”我在《方生之旅》一书中写下了对旧昆明的第一个印象。“败坏的风俗与极端的贫困尤可见之于诸色人等对孩子们的虐待，虽则在全中国各地孩童们都是受着沉重的压迫与剥削，但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有若云南般过度的。……由于极度贫困的压迫，中国其他部分的贫苦大众也会被迫卖掉亲生女儿……但除了真的迫不得已之外，他们罕有卖儿子者。在云南，被迫作苦役的男童为数极众。”

在美国使用云南作空军基地之际，罂粟的出产已大为降低，鸦片烟具也不象从前那样可以大张旗鼓售卖，但人与人之间的不道德行为却毫无改变。所以，不论现政权带来了何种“罪恶”，今天的儿童们完全有平等的机会享受一切政府提供给他们们的机会：保健、教育、娱乐——以及“铁饭碗”。过去广泛流行的甲状腺肿大症，现在由于食水经过充分的消毒，已经完全消灭掉。其他如沙眼、天花及各种传染病，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清除干净。从前，在简陋的锡矿内，发育不全，身材短小，体无寸缕，以及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童工，受尽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今天，这些锡矿场已尽改旧观：现代化操作代替了危险而落后的方法，工人全部都是成年人；他们居住在清洁、爽朗的屋子里，大部分人已成家立室，儿女都进入学校读书。矿场内，电动运输带道纵横，电车轨道一条条直通矿场内外，锡的产量达一九四九年总产量的十六倍。山坡上，建筑着一幢幢的工人疗养院，热水浴及紫外光浴随时供应。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时期，当我在云南周围旅行时，我发现多数的汉人仍然把非汉族人当成是“野蛮及未开化”的人民，并普遍轻视他们。故此，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彼此之间存在着不信任与敌视心理。在大部分地区中，汉族人统治了平原地带，而部族人民多据高地与森林而居；那里均被汉人视作畏途，等闲不敢单独前往。如今，非汉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汉族人的态度有好转吗？我在上文也曾提及过的昆明少数民族学院，便是其中一种改善云南各民族间的关系的最真确、最有组织性的办法之一，足以代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学院中能说普通话的学生们将成为云南省中四大自治

州与七个自治县中的政治及文化方面的领导。部族人民而且的确分享了平等机会。现在,全省各地各民族都广泛地混合起来;我这个对旧云南有所认识的人,看到傈僳族人与汉人自由交往,一同工作,一起参加社会活动的景象,真是有说不出的感动。这种成绩是不言而喻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在省及国家的政府机关中占着一定比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舞台、银幕、电视及艺术等各方面,都广泛地被用作普及民族歌曲、舞蹈、民间传说及介绍各族人民的形态、体格、衣着、发饰及文化。

在我离开中国前所参观的最后一个公社里,发现该公社是由汉族与非汉族的农民共同管理、合并组成的社会。这个公社位于昆明市外围的一个自治区域中。公社成年人口共二万一千人,百分之六十二为彝、傈僳等少数民族,余为汉人。全社共分为四个大队。在我参观的阿拉大队中,负责人是汉人,两个副手则是彝人,党的书记也是少数民族人,妇女会主席是一个彝族姑娘。通过翻译员的帮助,我跟妇女会主席攀谈起来,并且询问她被谁选举担当目前的职位。

“我的朋友,”她说道。她脸上有些雀斑,外表很朴素,总是带上诚挚的笑容。

“他们为什么喜欢选你呢?”

“呃,可能是这样的。我工作比较勤恳。小时候,我是本地一个地主家里的农奴,年纪小小便需要干重活,一直到十一岁时,家乡解放才得翻身。现在我已二十三岁了。解放后,我分得了一些土地。由于我栽种的包心菜有成绩,产量较别人高,因此不久便被要求领导一个互助小组。同志们教导我阅读和书写,然后,我再把学会的转教别人。后来我对政治日渐关心;

与此同时，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被评为能艰苦工作的农民，而我本人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你所干的妇女工作包括些什么呢？”

“那多得很。我负责使妇女们享有应得和平等的权利。例如，我们订定了三条保障怀孕妇女的规定：五十天内不需到农田干活；供应热水给她们使用；特别供应菠菜之类的食物。其他工作嘛，我还要在妇女们当中展开宣传工作。为了工作能顺利而且成功地进行，我一定要学习和了解政府的政策、并且要能向她们解释清楚。相信你也知道，要使一些人彻底了解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好的事情。有些妇女的性情比较懦弱，无论什么事情也不想自己牵涉在内的。”

在大队总部所在地的村子附近，许多男女社员——一些是穿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汉族人——正在将稻谷放进一部红色的脱粒机内。这部机器一方面将谷粒与谷壳分开，一方面将谷壳与稻秆吹出来。这是公社新近购置的机械，围观的人比较参加工作的人还要多，大部分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喜交集的神态。据领导人说，该脱粒机是公社从现金利润中拨钱出来购置的。公社的现金收益主要来源于米、麦、油菜及蔬菜等产品的外销。

若与有电动孵雏器等设备的新牲口畜养站对比，村子显得较平凡与不甚引人注目。从公社的卫生站往前走数百英尺的地方，作者看到了一座外型十分现代化的、两层高的新建筑，屋顶是用瓦盖的，二楼还建有露台——这与村子里用泥与稻草建成的茅屋大不相同。据悉这是公社新建的住宅，然而却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我介绍。于是，我独自走到屋子之前拍了几张照

片，公社的党委书记跟在我的后面。屋子大约分为四十个居住单位，每单位约有一到两间房子，地面以木板铺成。我走遍了整间建筑物，发现大多数的门户都没有关上；但在整个建筑物中，我看到只有一个房间有人居住——户主是一个彝族的妇人，带着两个年纪很小的孩子。

“为什么这里好象是没有人居住的呢？”我有点惊诧地说道。

“不很多，”书记简短地回答。

“这是什么原因呢？”

“噢，不久将会有更多人搬来的。要说服人们离开旧村子要一段颇长的时间。他们要慢慢的才会习惯新的生活方式。”

显然，公社里面是有人紧跟上级有关兴建公共住宅区的指示行事；而该处的一些群众目前对此尚未投赞成票。虽则旧村子里的茅舍的环境远逊于前者：污秽、黑暗、地板用泥铺成，等等；但它们终究是农民们自己的“家”，所以大多数人仍然留居原屋，不肯迁移。况且，虽然新房子开有玻璃窗门，并且还打算装上电灯，但却不象旧茅舍那样，可以在泥尘滚滚的后院中养鸡和养猪。

在这村子以及偶然在一些较落后的地区里——当然不是全国性的——我感觉到“家家有房子”的保证对很多保守的农民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力，较任何的现代化改善更大。所以，一九五九年以后，公社的改革便大部分集中于使农民恢复安全感的工作。

在酒店中，我遇到了一群来华访问的缅甸军官，他们刚从

缅甸的八莫经公路抵达昆明，从他们的叙述当中，我得知云南西部也在迅猛发展。在洱海湖南端的下关镇（接近大理），一座发电量达二十五万千瓦的发电厂正在着手兴建。那里的新工业包括了一个小型炼钢厂、一个蔗糖厂、一个农具厂，以及一些玻璃厂和水泥厂等。无数的水坝在各地陆续兴建起来，小型的水力发电站现在正使用云南本省制造的发电机，将电流和光明输送给十年前还靠菜油灯照明的城市。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昆明的天气依然那么清爽，昆明的天空依然蔚蓝一片。“和平委员会昆明分会”的书记张先生驾车送我到昆明机场。在巍峨的建筑群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好象向我致意，也好象跟我说再见似的。一位海关人员打开我的行李包检查，将我近五十筒的“柯达”底片，数千英尺长的八米厘及十六米厘的底片放在台上。大多数的底片还未冲晒出来。在北京时，负责人曾保证我可以将未冲晒的底片带出中国去；而且我也知道亨利·卡捷·布雷松等人也曾获得这种优待。在这次旅游中，我拍过了数百张没有任何纪录的照片——很多是在偶然的散步中摄取的——而我本人却没有特别摄影证。现在，我对着这堆照片也觉得未免多了一点——对于一名“历史学家”来说。我将所担心的问题告诉了张先生。

“不要发愁，”张先生说。然后他跟关员说了几句话，后者抬起头来，对我打量了一番。“你是美国人呀？”他问道。“那么，你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看到的第一位美国客人了！”我将剩下下来的几元人民币兑换好，关员跟着干净利落地把我的行李放回包里，于是我可以登程了。海关人员跟我握别时说：“一路平安！”

“请你告诉美国人民，”张先生严肃地提醒我说：“我国人民

对美国人民怀有最友好的感情——从前是这样，永远也是这样。只有——”

“美国帝国主义才是你们所反对的？”我替他说完了他要说的话。

“对！”

我表示感谢他带我参观了昆明市的许多地方；他对我的帮助实在很大。

“那么，让我们为和平而祝愿，”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为了和平，”我响应道。“和平：我们自己保持得越多，我们给别人的也就越多！”

郑先生衷心地竖起了大拇指。“说得好。你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华盛顿吧！”

三小时后，飞机在仰光着陆。翌日，我便飞到欧洲与家人重聚一堂了。

结 束 语

在未来的许多年月中，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这个事实：在任何企图侵略的战争中，“胜利者”得到的不再是灿烂的前景，而是失败。雨果·博伊科博士曾经指出，今天的世界较诸三千年前的以色列还要小得多；那时候，从以色列的北部到最南端的埃拉特需时十四天之久。明天，整个太阳系可能比攸里西斯时代的爱琴海上的岛国还要小。在居住在本地球的人类之中，再没有海洋的存在，有的是河流而已。